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文化语义学
马清华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文化语义学

马清华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语义学/马清华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6

ISBN 7-210-02342-9

Ⅰ.文… Ⅱ.马… Ⅲ.语言学-文化-语义学-研究
Ⅳ.H03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49797号

文化语义学

马清华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财经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年6月第1版 2000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300千 印数:1-1500册

ISBN 7-210-02342-9/H·14 定价:30.00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地址:南昌市新魏路17号

邮政编码:330002 传真:(0791)8511749 电话:8511534(发行部)

E-mail:jxpph@163.net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王 德 春

我与清华相识于90年代初。那时我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了关于语义学的文章。他从海外报道中了解后十分关注，开始与我建立学术联系。随后他去了日本，在那儿继续关注我在这方面的研究。为及时取得我在日本发表的一篇论文，他专程从工作地冈山大学去偏远的大阪外国语大学图书馆。时值阪神大地震刚过，交通中断，天又下着大雨，途中经历了颇多颠簸和周折。可见他那时已专注于文化语义学的研究。后来，我果真欣慰地看到他相继发表在《语文研究》、日本《中国语研究》、台湾《东吴外语学报》上的《词义类扩的相貌知觉倾向》、《感情意念的取象结构》、《论汉语喜悦概念的形成》、《论语意分割细度的文化成因与解释限制》和即将刊发于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语文建设》的《隐喻意义的取象和文化认知》、《可导致思维等失措的词义理解方式》等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不但很有深度，而且让人耳目一新。这部书的特点和成就可归为三点：

(一)它涉及外语、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古今汉语及其方言，对国内外理论也有广泛的涉猎。在丰富的材料基础上，他通过归纳、整理、分析、解释，提出了比较全面、较为可信的文化语义学理论体系。

(二)它深化和发展了语义学理论。比如最新的一些语言学著作谈到，人对事物的关注程度跟事物分类的细致程度成正比。但哪些文化因素可导象关注程度的加强？而正比例关系的反面，又有哪些因素可导致例外的产生？作者对之作了全面的分析。又比如对人们

FF74/37

谈得较多的词据，作者深刻地分析了一些具有语言普遍意义的词据模式，如“相貌隐喻”等，注入了新意。并想到统摄一个同义词聚的概念是不是也有理据？再进一步，比概念更大一级的义类是不是也有理据？作者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得出了肯定的答案。又比如，联想问题是语言学常谈的老问题，“语言国情学”和奥斯古德(Osgood)等人的语义微分法分别从质或量的方面对词的联想意义或内涵意义作了分析。但把词的联想活动和词的联想意义区别开来，再看看它们分别有哪些类型，以前似乎还没有人系统地去分析过，作者则作了极有意义的尝试。书中“意念”和“观念”两章是作者个人的创见，材料异常丰富，“意念”一章所调查的文学作品就达两千万字之巨，“观念”一章调查的词典就达数十部之多。在其他各章中，也有不少独到的见解。

（三）就我所知，目前缺少系统的文化语义学著作，它的出版无疑填补了学术上的空白。它起到了完善语义学理论的作用，对语言研究者、翻译工作者和对外汉语教师都有参考意义。

我还记得，1997年秋，清华特地从苏州来上海看我，我对他发表在《语言研究》上的《汉语单音形容词二叠式程度意义的制约分析》一文表示了赞赏。1999年秋，我们又一次在北京碰面，我告诉他，我在80年代初关于义丛的理论可能对他所提的“意念”一说有所帮助，不久他就在论文和这部著作中吸收了进去。十年转瞬而逝，回顾与清华的学术交往，感到十分愉快，特为之序。

2000年6月写于
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学部

序

林 书 武

近十年来，我国出版了几部关于语义研究的著作，其中从汉语语料出发研究语义，重要的著作有：贾彦德《汉语语义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詹人凤《现代汉语语义学》(商务印书馆，1997 年)。前者的突出特点是阐发了义素、义位这两个概念，讨论了属于结构语义学范畴的语义场理论；后一本书的突出特点是运用语言层次性原理分析语义，认为"按照层次性原则，语素义、短语义、句义的性质和功能都与词义不同，不应忽略。"这两部著作代表着对以词义研究为主要对象的传统训诂学的某种突破。

而马清华《文化语义学》(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又跟上述两部著作不同。马着不直接谈义素、义位和层次分析，而是从文化方面研究语义，即"研究人类基本文化结构对语义的作用规律"(见正文第 1 页)；它不能归于语言学语义学、历史语义学、结构语义学、生成语法学派语义学、孟德鸠(亦译作"蒙塔古")语义学，而是包含了不少认知语义学、认知人类学、语言文化人类学等内容在内，例如第二章《分类》，第三章《理据》，第八章《意念》，第九章《常识》等等，都是如此。

从反映在全书各处的新内容、新提法、新的归纳法、新的观察问题角度来看，马著显然具有理论的始创性。其始创性还表现在运用国外理论来研究汉语(及其方言)和本国境内其他语言，并补充和修正、发展这些理论，这是这部书学术贡献的另一部分内容。

马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语料非常丰富，不仅做到言而有据，而

且读起来也非常有趣。这跟马清华的努力，勤于收集语料是分不开的。记得去年我们在北京参加中外语言文化对比研讨会时，马清华就买了几千元的书籍，包括各种方言、各种民族语言描写的书籍，各种语法，收罗务尽。难怪他书中材料那么多了。

马清华专注于学术研究，喜欢跟别人讨论，向一切人问教。在上述研讨会期间，他多次跟我讨论；一有时间，必到我房间来坐谈。我想，这是做学问的一个根本办法。

语义研究，范围颇广。现在，马清华《文化语义学》拓宽了一个新领域，潘海华等的形式语义学著作也很好。我觉得还应该从其他角度（例如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语义，亟需各方面学者从事这类工作。愿语义研究广泛深入地发展下去！

2000 年 6 月写于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目 录

序一……………………………………………………………王德春(1)
序二……………………………………………………………林书武(3)
第一章 导 言……………………………………………………………(1)
第一节 文化语义学的任务 (1)
第二节 语义和文化的相互独立性 (3)
第三节 文化对语义的作用 (4)
第四节 几个基本的原则性范畴 (11)
第二章 分 类……………………………………………………………(21)
第一节 民俗分类 (21)
第二节 分类细度 (36)
第三节 分类角度 (60)
第四节 分类单位 (66)
第三章 理 据……………………………………………………………(72)
第一节 词据 (72)
第二节 概念理据 (96)
第三节 义类理据 (114)
第四节 句义表达式 (117)
第四章 对 应……………………………………………………………(122)
第一节 词义范围对应 (122)
第二节 词义关系对应 (129)
第三节 同义形式对应 (137)
第五章 变 化……………………………………………………………(143)
第一节 概念体系调整 (143)
第二节 词义变化 (145)

第三节 名称变化 (161)
第四节 理据变化 (170)
第六章 观 念……………………………………………… (176)
第一节 观念和概念的关系 (176)
第二节 实现方式 (182)
第三节 对立模式 (186)
第四节 文化释放 (194)
第七章 联 想……………………………………………… (202)
第一节 联想类型 (202)
第二节 联想意义类型 (208)
第三节 语义测量 (215)
第四节 联想对语义的作用 (220)
第八章 意 念……………………………………………… (225)
第一节 意念关系 (225)
第二节 取象结构 (228)
第三节 文化认知 (236)
第九章 常 识……………………………………………… (248)
第一节 知识类型 (248)
第二节 常识补足 (250)
第三节 常识模式 (253)
第四节 语义组织 (257)

附录一 调查统计材料和语料来源及其简称 ………………… (268)
附录二 术语索引 ……………………………………… (270)
后 记……………………………………………………… (277)

第一章　导　言

第一节　文化语义学的任务

文化语义学研究人类基本文化结构对语义的作用规律，它立足于语义学，发掘文化和语义交互作用的规律，并进行科学的范畴化和体系化，揭示语义的文化本质，完善和深化语义理论和语言类型学研究，指导具体的文化语义研究。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语义学所涉及的文化不是每一桩谈判、交易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具体文化事象，而是相对稳固定型的基本文化结构。如任何语言的意义中所蕴涵着的人的中心作用和对动物的鄙视，就属于基本文化结构范畴。

对语义中基本文化结构的研究，主要是为研究文化对语义的作用规律服务的。法国学者 K. Baldinger 指出，语义学的特征是"把人的注意力从封闭的语言结构引向了开放的经验结构，从语言学引向了非语言学世界以及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的逻辑"[①]。日本学者野林正路也说："在语言学中，语义学比起语法学、语音学来，它是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言心理学、社会心理语言学、文化人类语言学、文化哲学、理论社会学、知识社会学、信息社会学、传播论、认识人类学、认知心理学、归纳理论、修辞学、媒体论、文体论、表达学等等各种新旧社会学科的交合。"[②] 所以，文化语义学的建立，是进一步加深和完善语义学本体研究的需要。它对外语教学、语言翻译、历史文

① K. Baldinger, Semantic theor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0.

② 野林正路：《言語生活の構造と意味論》，载《言語生活》1984.9。

化考证等也有着实际应用价值。渗透在语义中的基本文化结构还可以使文化学者得到启发，为还原一个民族或语言集团的文化图景寻求资料，从而深化文化人类学研究。我国第一位西方语义学理论的介绍者李安宅曾断言：“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与心理科学，受了意义学底洗礼以后，一定会猛增一步。”[①]

“文化语义学”这一术语至迟在日本学者中村敬的著作[②]中就已出现，主要谈词物对应关系的语言文化差异。中国学术界在1997年也开始出现这一名称[②]，有两种提法，一种主要谈词语联想意义的语言文化差异，略同于有些人所说的“国情语义学”或“国俗语义学”。另一种是把它看做语言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它主要从言语者的语言中提取抽象程度不同的各种词语，分析其语义结构，了解其经验是如何组成范畴的[④]。这几种意见都过窄地处理了文化对语义的影响关系，其实它们都只是文化语义学这门学问的一部分。

只研究语言系统自身的各个部分如语音、语义、语法等，而不涉及其他的语言学叫微观语言学(microlinguistis)。不限于这些微观研究，而把研究范围伸展到其他领域的语言学叫宏观语言学(macrolinguistics)。J. Lyons(1987)指出，语言学的语义学主要是微观语言学的语义学(简称微观语义学 microsemantics)，心理语言学的语义学(psycholinguistic semantics)、社会语言学的语义学(socialinguistic semantics)、逻辑语言学的语义学(logico-linguistic semantics)等等都是宏观语言学的语义学(简称宏观语义学 macrosemantics)所分裂为一

---

① 李安宅：《巫术与语言》，商务印书馆，1936年。

② 中村敬：《文化意味論のみ》(文化語義学初探)，载《鶴見大学紀要》(外国語·外国文学编)1975.3。中村敬：《文化意味論》，载《鶴见大学紀要》(外国語·外国文学编)1976.3。

② 吴国华：《文化语义学导言》，载《中国俄语教学》1997.1。

④ 桂诗春等：《语言学方法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

组次分支[1]。同样,文化语义学也属于宏观语义学范畴。

第二节　语义和文化的相互独立性

有种糊涂认识,以为语义等同于文化,"文化语义学"含义本身存在着同义反复,建立这门别出心裁的学问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文化只不过是与语义发生关系的界面之一,除此之外,语义还跟自然、人的心智结构、语言系统本身等其他界面相关。

语义跟文化是相互关联和作用但不等同的两样东西,一方面,相同语言可为不同文化集团所使用,共享一个基本核心相同的语义体系,另一方面,相同文化,可能属于不同的语言集团,具有不同的语义特色。因适应地域环境的需要或文化发展本身的可选择性,操同一语言的集团在生活地域长期隔离后,往往发生文化变异,它们根据各自需要,在不同程度上调节着语义的内容与结构。相反,不同文化集团生活在同一区域,其语言往往互相影响、融合或一种为另一种所取代,从而改变原先的语义组织。但文化的变化模式与语义的变化模式不一定互相平行。也许文化融合了,语义却保持差异,或者相反。语义和文化在发展上都有各自的惰性,其程度各不相同,所以发展变化的速度也常常很不一样。

但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因语义和文化间的不对应面推翻其因果关系,怀疑文化不是语义的影响要素。不能平面地看待不对应现象,而要放在包括时间因素在内的立体坐标中去看。现在的不对应,可能在过去某个时间切面上是对应的。E. Sapir(萨丕尔)指出,在地理分布上,"种族和文化的分界线确有点和语言的分界线相应的趋势。语言的内容,不用说,是和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语言的

---

① J. Lyons: Semantics, in New Horizons in Linguistics(2), 1987.

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①。文化对语义的影响是必然的,但程度和方式上有伸缩性。P. Corder(皮特·科德)说,"凡是社团之间存在着文化差异,则这些差异必然会在语言系统的差异上反映出来"②。反过来,语义特色并不总是由文化造成的,语言有其任意性的一面。语义不是在文化模子里铸出的金块,它和文化都有各自发展的广阔空间。

第三节 文化对语义的作用

对语义起作用的文化,有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两种,具体地说,有文明、价值观念、认知方式这样三种文化内涵。文明是人类创造的客观物质或精神产品,生活习俗、经济地位、科技水平都属文明因素。价值观念是文化集团在创造文化的历史过程中建立起来、世代相袭的是非通则或对重要性的评判标准,审美观、宗教观、道德伦理观、阶级观等都属价值观念。认知方式是人类观察和解释世界的认知模式,它随人类心智的进化而发展,发展方向带有一定程度的选择性。

一、文明 涉及衣食住行的服饰、食品、日用品、建筑物、交通工具,涉及农工商科教文卫等各行各业的职业、器具、机构等,以及涉及社会关系的亲属、友敌、师生等统属人类创造的文明。除了这些物化的文明词外,反映集体活动方式的动作、高于原始动物性的人类意志行为、姿态也属于文明范畴,如动词"抬"(共同用手或肩膀搬东西)、"加工"(对原材料或半成品进行各种工作,使之达到规定要求)等。原始语言都借用人的肢体来计量长度③,许许多多语言的非标准长

① E. Sapir(萨丕尔):《语言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4 年。

② S. Pit Corder(皮特·科德):《应用语言学导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 年。

③ A.Г. 斯皮尔金:《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上抽象思维的形成》,载《言语思维意志感情及其他》,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56 年。

度单位都与人的肢体姿态有关，这些度量姿态构成了一个集团的文化风情。脚部度量姿态较为单纯，一种是用脚板长度测量(如英语foot)，另一种是用脚步跨度测量(如汉语"步")。手部度量姿态比脚部丰富得多，说明手在人类生活中的突出作用。它们有：

·两臂左右平伸时两手之间的距离——这种姿态最为普遍，在汉藏语系圈内极其盛行。如普通话"庹"①，景颇载瓦语 lam，纳西语 ly，傈僳语 bo，等等，傈僳语"半庹"叫 lɛbɑ，指一臂平伸，中指到胸中线的长度。

·张开的大拇指和其他指头间的距离——这种姿态在不同语言间有细微差异②：普通话"拃(zhǎ)"是张开的大拇指跟中指或小指之间的距离③；哈尼语 lathu(手拃)是张开的大拇指跟中指之间的距离，nøthu(指拃)是张开的大拇指跟食指之间的距离④；纳西语 tɑ 是张开的大拇指跟中指或食指之间的距离⑤；傈僳语 thu 是张开的大拇指跟中指之间的距离，ni 是张开的大拇指跟食指之间的距离，gɯ 是张开的大拇指跟下屈的食指之间的距离⑥。

·一个手掌的宽度——哈尼语 tsbo。英语 hand 是一手的阔度，掌幅(相当于 4 英寸)。

·一个手指的宽度——如哈尼语 nø。

还可以见到很多更细的类别，如傈僳语 go(虎口到肘关节之间的双倍长度)、tɯ(五指向内握，小指和食指间的长度)、tɑ(拇指平伸按下的宽度)、de(食指中指并拢的宽度)，hi(四指内握，拇指上伸，小指到拇指尖的长度)。所有这些非标准长度单位(量词)都蕴涵着人计量长度时的体态及计量目的。至于前两种以外的其他几种度量姿态，在现在汉人中都不大见到。

① 湖南江永话叫[pai55]。
② 为行文方便，本书除汉语外，其他有声调语言的注音均不标调。
③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 年。
④ 李永燧等：《哈尼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 年。
⑤ 和即仁等：《纳西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 年。
⑥ 徐琳等：《傈僳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 年。

开化语言的词汇几乎大半以上都是文明词，它的每种行业都有一个数量庞大的专业词库。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化，科学的国际化，哲学和宗教思想的广泛传播，在不同语言的各行业领域，物化文明词通过借词方式越来越朝着术语共享和意义同化的方向发展。如汉语“咖啡”，日语コーヒー，英语 coffee，意大利语 caffè，土耳其语 qahwe，阿拉伯语 qahwa。又如汉语“维他命（维生素）”，日语ビタミン，英语 vitamin，罗马尼亚语 vitamină。文明物质是文化结构中最不稳定的部分，相应地，物化文明词也是词汇中流动性最大的部分。追随着事物发展变化的节奏，词汇场也在不断地进行张缩调整，或产生、或消亡、或减缩、或增殖。王莽时代的货币“大布、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等消失了，历经多少年货币名称的更替，现在又使用着又一种新的货币和币名“人民币”，国际交流广泛后，“美元、日元、马克、英镑、法郎、里拉、卢布”等更加充实和丰富了现行的货币词汇场。不仅如此，即使词的外部形式（主要指它在语音系统内的价值）无甚变化，其意义的流动也有着相当大的规模。“笔”开始指毛笔，后来更多的是指钢笔、圆珠笔、铅笔等；“车”开始主要指马车，现在更多的是指“自行车、汽车、摩托车”等。动态文明词的变化也常常是社命风情演变的结果。汉人古代席地而坐，坐时两膝着地，臀部放在脚跟上，如：“先生坐！”（《战国策·魏策四》）跪时则伸直腰股：“主人跪正席。”（《礼记·曲礼上》）在那时，“坐、跪”都是对同一种姿态的微词。现在，席地而坐的风习早就没有了，这两个词的意义也作了相应地变化。“跪”现指两膝弯曲，使一个膝盖着地，它涵盖了原先“坐、跪”两个词的意义。“坐”现指把臀部放在身体以外的其他物体（如“椅子、凳子”等）上，支持身体重量，意义有了转移。《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1986 年）统计了 180 多万字的作品，“坐”出现 985 次，“跪”只出现 55 次，前者是后者的 18 倍。这也说明坐是现代人正常姿势，而跪却已偏离了常态。

二、价使观念 文化价使就是对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的共同价

值观念系统和共同是非标准。在说明这个问题之前,最好先说明一下内涵意义(intensional meaning)和外延意义(extensional meaning)的分别。这一对哲学和逻辑学术语现已经常用于语义学领域。前者指的是一组定义特征,如"桌子"的内涵意义是"有腿、有平面"等;后者是指词所适用的事实项目的集合,如"花"的所指项目有"玫瑰、水仙、樱花"等。专有名词只有外延意义,没有内涵意义,如"爱因斯坦",只有现实的所指,指那个旅居美国、提出广义相对论的、特定的犹太物理学家,但却没有任何定义特征可资成为它的内涵意义。

人们在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常常倾注着对它的评判。很多词的外延意义和内涵意义的函数关系正好反映了持这种语言的民族或文化集团所秉持的价值观念。最为活跃地表现这种特征的是形容词。会说汉语的任何人都明白"好吃"的内涵意义是什么,即使不明白,查一下词典也就知道了。但什么样的菜才算好吃,不同地区的人有不同的观念和辩辞,湖南人喜欢辣,苏州人喜欢甜,新疆人喜欢酸。又如东北人和南方人对"冷"的内涵意义理解相同,但外延意义大异。东北有室内供热设施,那儿的人能区分出严冬时室内和室外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冷,对南方人来说,只有一种意义上的冷。以绝对温度计,东北人室外的冷温度要大大低于南方,室内的冷温度又大大高于南方。说明不同地方的人受其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对同一种事物往往有不同的评判标准。

名词也能反映人们思想中的价使观念。把什么样的人归入"匪徒、战争犯",对立集团的处理往往截然相反。又如方位词,中国人有右利手倾向,石家庄获鹿话右手叫"顺手",左手叫"不顺手"或"倒手";石家庄灵寿话右手叫"巧手",左手叫"羞手";普通话"左撇子"指用左手干活的人,"撇子"表明是一种缺陷(不说"右撇子")。母系社会中,妇女地位高于男性,用左右手作比,于是,男左女右,右尊于左。现处母系社会阶段的纳西族人,火塘两侧的坐次就有严格界限,女右

男左,右为大,左为小[1]。进入父系社会特别是阶级社会后,观念变了,变成男尊女卑,于是尊左就更具有普遍性,《礼记》孔疏云:"左尊,故昂;右卑,故垂。"其实,右利手也是人类的一般倾向。大多数人的左手都不如右手方便有力,所以"许多民族认为左边是魔道一边,神秘力量的一边,为不唤醒这种力量,往往不提及直接左边的名称,而采用迂回法或隐喻来表示。大多印欧语都保存同一个词指右边,却有各种说法表左边,表左边的名称很容易被废除和代替"[2]。汉语"旁门左道"等说法,同样表现了类似思想。价值观念在这些语义特征的形成和演化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甚至从内涵意义等于零的专有名词中,也能透过理据意义观察到其内在蕴涵的价值观念。美国西南部那法霍(Navaho)部落语言的地名中,最普通的词根是"tó tso(大泉)、tó dich'ii(苦泉)、tó nanees-dizi(交错的水流)、hasbidi bito(鸽愁水)、tsé ch'izhi(荒岩)、tsé lichii'(红岩)"。他们的地名大部分反映了陆标、水标这两种环境特征,那法霍(Navaho)族人部落是游牧民,他们连同自己的羊从一个草地转往另一个草地,季节性迁徙,为寻求交易,在广阔地域内远征。对他们来说,陆标和水标非常重要,因此在环境和空间的认识方面,更加重视这些东西。美国西南部的另一支部落河皮族,是有悠久历史的永住性农耕民,他们的地名分别指与之结成友好关系的氏族或集团,因此大部分地名不指村落,而指近边的地点。表示遗迹的地名也使人联想起家乡往昔的历史。可见,河皮语地名大部分倾向于社会的分割,它与那法霍(Navaho)语地名的专注角度差异,正反映了根植于各自生存方式的价值观的不同[3]。

---

① 吕继祥:《男左女右习俗及其社会内涵》,载《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5.2。

② J. Vendryes(房德里耶斯)(1920):《语言》,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 年。

③ N. P. Hickerson(1980):Linguistic Anthropology(言語人類学入門),日訳,大修館書店,1982 年。

不同民俗和文化的人们，对同一世界的同一事物往往有褒贬不同的理解，形成这种感知差异的主要社会文化因素是信仰、价值观、世界观和态度看法等的差异[①]。中国人传统上喜欢称“老”，如“老王、老张”，有时还嫌不过瘾，又说“王老、张老”，以为老就可以赢得尊重。在英美人的观念中，人老就会遭人鄙视和抛弃，这样就喜欢把年龄说得年轻一些。汉语里只适用于青年的“男朋友、女朋友”，英语的相应词 boyfriend、girlfriend 就不受年龄限制。

三、认知方式　不同认知方式是影响语义的另一个重要文化因素。文化集团往往在某些因素的影响下，对一种现象的感知特别强烈或模糊。有些语言没有专门的词表示“辣”，而是用“苦”或“咸”来兼指，前者如维吾尔语 aqqik，后者如日语からい。操这些语言的人对“辣”的感觉不似汉人那么清晰，与“苦”或“咸”的界限比较模糊[②]。感觉界限的模糊和语言上的词义兼指是互为因果的。

在原始语言的概念体系中，具体概念和抽象概念之比一般总要大于开化语言中的比率。造成这一差异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是认知水平的差异。就以数词为例。任何发达社会的语言，都有一套开放的数词系统。但原始初民因为没有把数从他们所计算的东西中分离出来，计算物品时，对三以上的数即感困难，总要借助另一个不相关的事物进行比对，有用手者，有用脚者，有用豆粒者，有用果核者，又有用石子者。其中以用手指为多，因为手使用起来最方便。巴布亚人计算时，先弯曲一只手的手指，一边发出“劈、劈、劈”的声音，数完后再数另一只手的手指，然后再依次数脚趾。真正是手忙脚乱[③]。我国学者陆懋德汇报他的旅行见闻时也说：“余在美洲曾见土

① 当然其他还有文明因素在起作用，如社会组织形式和体制的差异。史汉生等：《语义的褒贬转换与社会文化》，载《外语教学》1997.2。

② 伍铁平：《语言与思维关系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年。

③ A.Г.斯皮尔金：《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上抽象思维的形成》，载《言语思维意志感情及其他》，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56 年。

人印第安族与美国商人交易货物，假如物品只排列三个或三堆，则土人即可一目了然。又如排列物品至三个以上或三堆以上，则土人即不能明了；彼等至此必须另用手指一一分别，而后能算清数目。"[①] 缺乏较高的理性和智慧，是造成原始语言数词贫乏的根本原因。也正由于缺乏足够高的理性和智慧，幼儿在语言习得中不是先学会"动物"一词，而是先学会"狗"[②]。他们不能从"猴子、猪、虫子、蛇、鱼"等看上去无关、形态又迥异的事物中抽理出共性，归纳成类。缺乏抽象能力，并不意味着幼儿语言的词所指范围都很狭窄，相反，他们对形态和功能相似的事物，极擅长作广泛的形象比附，具体化程度越高，有时反而不能一下子把握。G. Mounin 指出，"在小孩初学语言时，从鸟窝、兔穴到其他动物小窝等一切住居之所，恐怕都叫 maison（房子）。之后，慢慢学习概念及词汇上一连串的区别，到十八岁，同样的事物就分出摩天大楼、茅屋、农舍等许多细类"[③]。

人类的抽象思维是从具体思维转变和跃升而来，最基本的抽象范畴常常不得不借助更基本的具体范畴来表达。比如，几乎所有语言都以空间喻时间，空间是具体的，时间是抽象的。日语す(透)き原指"空隙"，后引申为"馀暇"。汉语"空（平声）"原指"空隙、没有内容"，后转为"空（去声）"，指"馀暇"。用空间的"前、后"喻时间将来或过去，则更为普遍。由于观念、观察角度等的区别，在具体表达方式上，各语言可能有所差异，一个语言内部也可产生多样性。汉语常以"前"喻过去（如"前天"、"三年前"），以"后"喻未来（如"后天"、"三年后"）。但有时也有相反的表达，如"向前看"是指看未来，不是看以前。法语 devant（相当于英语 in front of）、avant（相当于英语 before）

---

① 陆懋德：《中国古文数名考原》，载《燕京学报》第 40 期（1951 年）。

② 吉田政幸：《分類学からの出発》，中央公論社，1993 年。Howard Gardner: The Mind's New Science（認知革命），日訳，產業図書株式会社，1987 年。

③ G. Mounin: Les problemes theoriques de la traduction（翻訳の理論），朝日出版社，1980 年。

喻将来，arrière(相当于英语 behind)、après(相当于英语 after)喻过去。法国语言学者 Shunchiu Yau(游顺钊)(1988 年)说，在法国人的知识中，未来是在我们的前面，过去是在我们的后面，他问了许许多多的法国人，主观回答的结果均无例外，但 avant-hier〔前天(←在昨天前)〕却是指过去，après-demain〔后天(←在明天后)〕是指未来①。

文化既有类型之别，又有层次之分。一种语义现象的产生往往是几种文化因素在不同层次上进行作用的结果。比如形成经济形态、认知方式甚至意识形态等差异的原因常可以追踪到自然环境等方面。朱谦之说，高地发生宗教的文化(以印度为代表)、平原发生哲学的文化(以中国为代表)、海洋发生科学的文化(以欧洲为代表)②，表明自然环境本来就跟其他文化因素之间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

第四节　几个基本的原则性范畴

中间世界、文化关注、辨证名实观、语言相对论和普遍论、强制观察是与文化语义有关的几个基本原则性范畴，应当给予足够的注意。

一、中间世界　尽管客观现实中的一切人类文明和主观现实中的各种价值观念都深刻影响着语言的意义，但语义不是现实世界的附庸，而是现实世界以外的独立王国。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学者 C. K. Ogden(奥格登)和 I. A. Richards(理查兹)就明确阐述了语音、语义、现实的三角关系③，K. Baldinger(巴迪伊尔)更是详尽地分析了若干个三角关系的交互作用类型④。文化不是现实的全部，山

---

① Shunchiu Yau(游顺钊)：A Rashomonian Analysis：The Orientation of Time in Languages，载《アジア·アフリカ語の計数研究》，1988 年，第 30 号。

② 朱谦之：《文化哲学》，商务印书馆，1990 年。

③ C. K. Ogden & I. A. Richards(1923)：The Meaning of Meaning，Routledge & Kegan Paul，1946.

④ K. Baldinger，Semantic Theory. Oxford：Basil Blackwell. 1980.

川河海、天文气象等非人类意志产品的自然物，本质上不属于文化范畴。但可在语义作用下，转化为人类的精神产物，即中间世界词，从而引入文化考虑的范围。

德国学者 J. L. Weisgerber(魏斯盖贝尔)的《母语的世界图像》详细论述了“中间世界”这一概念。他认为，“野草”其实是从农耕和食用角度来命名的①。人类并不是直接面对外在世界。在它们之间，有语言这个中介存在。人类是透过语言的意义构造眺望外在世界的。我们设法引入脑海的“世界”，多半只是“语言的世界”而已。对失语症患者的实验也证明，语言是人类观察世界的中介。忘记了称说事物的词的失语症患者不能像普通人那样，把四张分别涂着“深红、淡红、深青、淡青”颜色的卡分成“红、青”两类。他们只能认出不同的颜色，而不能进行事实的分类②。可见，“红、青”二词是我们借以观察外界的框架。当人类观察外界事物时，语言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人和外在世界之间，又存在着人类精神的中间世界。面对星空，我们根据众星配列形状(如人、兽、鸟)的星座知识来观察星星。但是，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的配列形状，只要观察的位置一变，配列形状就完全不同了。“星座”是介于人类和星之间、作为中间世界的精神产物。

人类的精神力量是靠联想、创造性想象和一般认知程式所支撑的。人类在中间世界形成过程中，不仅利用别种经验来对当前事物进行想象和观察，而且还努力追求全面性。人类对世界的分割在不断地进行着，尽管经过观察、想象、深思熟虑，也经常出现界限不明的情形。人类回避着分割的任意性和对既成结果的动摇，努力追求着更为完整全面的秩序。比如，要把星体世界分割成全部的星座，并给

① J. L. Weisgerber (1953)：Das Weltbild der Muttersprache(母国語の世界像)，载《文化人類学と言語学》，日訳，弘文堂，1970年。

② 池上嘉彦：《意味の世界——現代言語学から視る》，NHKブックス，1978年。

予一定的界限，争取不留下空白处。

语言的意义正是这个中间世界的产物。从植物界的学问中根本无法得出一个由纯属本事物特征构成的“蔬菜”概念。不可能根据植物学的特征规定和限制“蔬菜”的范围。“蔬菜”是客观特征和主观特征结合而生的典型的精神对象。规定“蔬菜”意义的科学尝试得出了如下结果：“蔬菜是植物的名称，特别是叶的构造问题，所以，乔木和灌木除外。草，谷物，本质上的花卉类植物和花也不包括在‘蔬菜’范围内。”“蔬菜”并非存在于自然界的自然类别，而是我们的精神对象。蔬菜的决定要素是有用性。对人类有用的植物名称，如“谷物、果实”诸如此类的事物，同样也是基于人类的精神依据。如果把“芹菜”叫“蔬菜”，在“芹菜”和命名之间就存在一个中间世界，这不但意味着把“水芹菜”作为“芹菜”的一种类型，同时也基于人类的评价把“芹菜”作为“蔬菜”来看待。“杂草”并不存在于自然界，而是存在于人类精神的中间世界。因为它跟植物界的构成并无太大关系，没有一个植物学家从科学特征上去给杂草下定义。人类根据自己受到麻烦和伤害的经验，用杂草来规定那些植物。依据人类见解所作的规定，植物就获得了“杂草”的精神意义。我们根据自己的思考行为，可以给与之对应的植物界的全部事物命名。中间世界起着改编自然的作用。日常谈话中，人们不是基于科学的专业知识，在各类专门科学形成以前，对于自然世界的俗概念词汇就早已存在了，所以语言的世界图像与科学的世界图像并不完全一致。

植物界只不过是无数例子的一种代表[1]。又以日常用具“桌子”的定义为例，它可以是木质的、铁质的、玻璃或混凝土制的，桌脚可以

---

[1] 与“蔬菜、杂草”类似例子还有“水果、谷物、害虫”等。它们都是根据人类自己的视点来规定观察、判断和评价的内容。参 Helmut Gipper (1978): Sprachwissenschaftliche Grundbegriffe und Forschungsrichtungen (言語学の基礎概念と研究動向)，日譯，三修社，1986年。

是四个、一个、六个(长会议桌),甚至没有(桌面与墙相接);桌面有圆形、方形,还有三角形的(室内放花瓶的小桌);高度也各种各样。从外在形态看,进行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就只能这样去定义:"'桌子'是为人在上面做事确保平面的东西"。但是,供人在上面做事的平面却并不一定是桌子。例如"搁板、地板"具有和上述一样的定义。"凳子"具有"桌子"的临时功能,比如孩子可以在凳子上做家庭作业;"桌子"也具有凳子的临时功能,比如"桌子"可以坐,我曾亲眼目睹一个美国教师坐在桌子上给学生上课!要把"桌子"跟"搁板、地板、凳子"区别开来,就只能这样来给它定义:"'桌子'是人坐或站立在其前,在它的平面上做事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定义里,人的因素如物的利用目的、物与人的相对位置等条件极其重要,而作为素材存在于人的外侧的众多外在形态性质却不能成为"桌子"这个词指谓内容的决定因素。可见,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含义在词义中的地值比科学含义还要重要,比方你不值"烤土豆"是什么,告诉你它是一种食物,你的要求就满足了,也不会再追问它烤出以后是怎样的形状。

对日常语言中的生物词,许多词典里仅解释了它们的生物学含义,没有解释文化含义,如跟人类的关系等,因此在读者脑中仍感到解释不充分。比如,"梅童鱼"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形状像黄鱼而小,头大,尾柄细,腹背和鳍都呈黄色。生活在近梅中。"但是,对于不了解"梅意鱼"的人来说,这种解释是不充分的,很多人想了解它能不能吃,都些地方的人吃,味道如何,有哪些吃法,是否珍贵?足见文化含义的重要性。由此反映的基本结论是:语义现象常常应该作为精神的中间世界来考察。进一步说,由此表现的中间世界正是语义的本性。

二、文化关注 人类对物理世界的观察,都得经过文化过滤。我们的感官是有限的。正在进行中或发生中的许多现象如X光、无线电波、超声波等,我们根本感受不到。我们有时还有色盲、弱视、错觉

等生理缺陷，还有感官疲倦的影响，眼睛每秒可以处理五百万个二进制单位(bit)[①] 的东西，脑子的解释能力只有每秒五百个二进制单位左右[②]。所以，当我们把周围的事物看进来的时候，我们只是选了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用以描述一个事物的字眼，仅仅能够说出这个事物部分特点而已。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用忽略其余某些部分的代价买来的。如果我们说"狗"，我们就已经把这个东西归入某一类了，但是，我们却把这只(或这种)狗与另一只(或另一种)狗不同的许多细节遗隐了。当我们观察时，我们是在精选，但不是任意乱选，而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和我们的目的选的，是选择我们所注意的东西或部分。文化准则指导着语义为人类绘制通向世界的地图。

对任何语言集体来说，不予关心的事物即使就在身边，也会视而不见，更不用说给它取什么名字。有无数天文气象、自然物产都没有名称，除极少数人的专业兴趣外，人类对它的存在、特性等从不予理睬。相反，需要关注的事物，即使五官感觉不到，也能借助科技和想象来接触它。人类的需要随社会发展变化而调整，某些在文化上被关注的事项可能丧失原有地位或资格。现代日常语义观察和表达动植物的细致程度反比原始时代衰减了(现代生物科学的专业观察除外)。也有不少现实只是出于翻译需要才意外注意到的。

语言是人发明来为自己服务的工具，因此语义对世界的划分始终遵循着人的需要。文化准则首先决定人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什么对他们有用、有趣或有害，然后人们对跟自己利益相关的目标产生注意，并赋予名称。不同语言集体基于各自的主客观文化背景，对关注对象作出各具特色的文化抉择，普通话狗叫声是"汪汪"，满语里 giyang 表示拴着的狗急叫的声音，关注的细节性程度明显不同。无

① bit 是电脑的位元或数元。

② Kenneth G. Johnson(姜森)：General Semantics—An Outline Survey(语意学精华)，中译本，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 年。

论怎样，任何自然语言的文化意义在最高层次都具有相似的本质结构，都是对人类有用、有害或有趣的事物，人类才予以关注。

三、辨证名实观 哲学上的唯名论和唯实论自古有之，应充分吸取它们的合理因素，不能简单地对立起来。从纯粹的语言学立场看，唯名论倒是正确捕捉到了语言的构造。因此有人干脆露骨地说，词于物先。在语言出现之前，不存在任何先定的观念，任何事物都混沌一团。语言把在不同情况下呈现出来的繁复、变幻的现象看做是由同一个名称指代的东西，把这些理象视为一种恒常的统一体，赋予这些对象以一粹恒常的本性，所以可在不同条件下辨认和认识它们。动物经验中缺少的正是这种辨认活动，它们不是生活在固定、确定的事物范围内，而是生活在复杂、混杂的性质范围内，其经验处于不甚稳固的液体形态。可以把动物经验视为知觉的世界，而把人的经验描述为对现实的统觉。有了词，世界的片段才能作为物或性质来认识。没有词，连区别狗、猫都无能为力。在畜粹的猿猴或狗猫眼中，某些种类的桌子、侧板、椅子的区别恐怕是非常费解的。设定出"桌子"所指的这类事物，完全是人所特有的观点。我们之所以相信存在有"桌于"指谓的东西，完全归因于词的力量。

人们按照本族语规定的方向对大量现象进行分解，组成各种范畴和类型。词的意义在于以人自己的臆想和虚构对混沌、连续而无缝隙的世界进行分割。语言表面上对不断产生的、流动着的世界进行了有条不紊的区分，但在事和物的集合的深层，却向人们提示着虚构的本质，"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地从各象团的语言习惯上逐步建立起来的。

词对事物的经验分类，从某种程度上看与其说是发现，不如说是发明。同一事物在不同语言中的名称固然不同，但这绝不只是标签的不同，实际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程度差。英语液体在用嘴吸时才叫drink，用勺子舀着喝说eat，汉语吃而态食物和某些液态食物（如乳房里的奶汁等）说"吃"，吃液态食物或吸进某些气态物（如"西北风"）

用“喝”。汉语“吃、喝”跟英语 drink、eat 显然不是对等的。但所指的对象、程度、范围之别并不弥漫语言相互关系的全部，如果毫无相似处，文化交流和语言互译非但无法进行，也毫无意义。所以，孤立地看，汉语“汪汪”和满语 giyang 的所指不对应，但都是表狗叫，其细节性差异可通过临时分析性手段来填补，如“那条拴着的狗汪汪地急叫着”这句话就大体把 giyang 这个词的所指表达出来了。不同的是，giyang 的词义是固态的，临时分析性手段由于属于语句，所以它所表达的意义是液态的。

片面夸大唯名论的作用是错误的。现实是语义的决定因素，人类的概念等作用只是它的影响因素。语义不等于现实，而是对现实的折射，唯实论有着相当大的合理成分。满语特别关注拴着的狗急叫声，因为狩猎民族一般对任何动物都倍加关注（包括对苍蝇、蚂蚁等），如满语 bombonombi[（蝇、蚁）麇集、聚集、堆簇]，zhabchambi（苍蝇、蚂蚁等群聚在一起），yang ying（蚊子和苍蝇飞的声音）等都表明了这一点。居住在岷江和大渡河上游峡谷地带的嘉戎藏民，思想概念里有一套独特的方位名词概念，共有近指、远指、极远指三级，按垂直、河流、距离山水的方向分出以下 18 类：

	垂直方向		河流方向		靠山和靠水方向	
	直上方	直下方	上游方	下游方	靠山方	靠水方
近　指	a-ta	a-na	a-ku	a-di	a-to	a-re
远　指	ha-ta	ha-na	ha-ku	ha-di	ha-to	ha-reʃ
极远指	ʃɐ-tɐtɐ	ʃɐ-nɐnɐ	ʃɐ-kəkə	ʃə-dədə	ʃə-toto	ʃɐ-rərə

在嘉戎人生活的峡谷两岸，群山耸立；岷江和大渡河或其支流横贯其间，道路顺河而设，盘山而行，一边靠山，一边靠水。独特的自然环境，使之对方位产生相应独特的强烈认知，嘉戎倍才有了这样一整套特殊的方位概念[①]。

① 林向荣：《嘉戎语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 年。

四、语言相对论和普遍论 语言相对论又叫洪堡特主义(Humboldtism)或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ian hypothesis)。德国学者 W. von Humboldt(洪堡特,1767～1835)和美国学者 B. L. Whorf(沃尔夫,1897～1941)相继指出,语言系统中的语法范畴和语义分类可决定说话者的世界观这种语言系统是跟说话者的本族文化一起继承下来的。

W. von Humboldt 认为,语言对人类精神和世界观的形成是不可缺少的。词会借助自身附带的意义成为心灵的客观对象,从而带来一种新的特征。在同一种语言中,这种特性必然受到如同语音特性一样的、广泛类推原则的制约。而由于影响同一民族语言的主观性类型也是同一的,所以每一语言都包含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学会一种外语或许就意味着在已形成的世界观领域里赢得一个新的立足点。每种语言都包含着属于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掌握外语的成就之所以被清楚地意识到,完全是因为或多或少总是把自己原有的世界观,甚至原有的语言观带进了一种陌生的语言。从某些语法范畴的运用也可推知使用这些语言的人对有关事物的看法。另一方面,世界观所造就的一切能对语言产生反作用[①]。

萨丕尔认为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会对同一客观世界提出不同的分析和解释。这种观点被他的学生沃尔夫绝对化,成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沃尔夫说,从语言到文化,从文化到语言,从文化到社会行为,从社会行为到文化,人们只能沿着这个封闭式轨道循环走动,不能离开。

语言相对论认为"每种语言都有一组独特的特征,在那里各种语

① W. von Humboldt(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 年。

言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程度的概念一致性"[1]。也就是说，操不同语言的人有不同的概念系统。所以，语言相对论同时也是挑战语言可译性的代表性理论。它认为语言间只要有部分文化不一致，翻译就将受到障碍。

语言普遍论跟相对论相对立，认为所有语言具有共同的语言结构。语言普遍论者认为，在各种语言的基层结构中有着普遍共同的核心部分。在语义领域，最有代表性的成果要数对语言间颜色义场对应和亲属义场对应的研究。关于颜色义场对应的研究，参第四章《对应》第三节"词义关系对应"。语义结构的普遍性具体表现为成分和关系[2] 的普遍性。普遍性本身不是绝对的，它只是一个程度问题，G. Leech 根据其广泛性程度，将之分为强普遍现象(strong universals)和弱普遍现象(weak universals)，前者指一切语言的共同特点，后者指拥有一组普遍特征中的一个分组[3]。

实际上，特殊性和普遍性都只是说到了语言的一个侧面。就其本质而言，语言相互间在具体层面上主要表现为表达方式的不同，而在基本抽象结构上，又主要呈现出语言的共性。正如一副手套，既可以说同，因为它们是同一副手套的两只，也可以说异，因为一只是左手套，一只是右手套。不同语言的可译性证明语言普遍论的正确，翻译在细节上的困难又证明语言相对论的正确。片面强调具体层面上的异，将看不到基本抽象结构上的同。过分强调同而忽略异，势必违背语言学这门具体科学的本质，因为语言学毕竟不是哲学。

五、强制观察 反映某一方面经验的语句，同时也兼顾到经验的其他方面，这样在表达前一种经验时也不得不注意后一个方面，这叫

---

① G. Leech(利奇)(1974):Semantics(语义学)，中译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年。

② 马清华:《句子的语义结构》，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4。

③ G. Leech(利奇)(1974):Semantics(语义学)，中译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年。

"强制观察"。语言不同，强制观察的内容也不同。用汉语可以说："我已经有孩子了。"英语则非要你说出是一个孩子(a child)还是几个孩子(children)。Clyde Kluckhohn & Dorothea Leighton(1948)在《那法霍族》一书中指出，从那法霍语来观察，英语的表达十分含混。如英语 I drop it(我丢落了它)在以下四个方面既没有作出规定，也无法根据语境作出推断，而那法霍语必须明确说明：

· "it"(它)是特定的东西，还是虚指的"something"(某样东西)？词形上必须明确标明。

· 对象是圆的还是长的、液体的，或者是生物的等等？动词的词干要随之变化。

· 行为是进行中，还是处于开始阶段，或终结阶段？是习惯性动作，还是重复性动作？要作出严格界定。

· 行为者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着落下的程度？也必须明示。①

当我们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时，也是在使用一种新的方式观察世界。凝固在语义体系中的观成框架，强制我们注意哪些，忽略哪些。世界上不存在两种代表相同具体现实的语言。儿童开始学习语言，标志着对一种新环境的适应，这一环境完全不同于肉眼可见的物质环境，这是一个新的概念世界。语言的强制观察作用甚至塑造了人们知觉世界的方法(当然严格地说，两者是互相作用的)。比如，祖尼语(印第安语的一种，在美国新墨西哥州)不分橙、黄，因此祖尼人区别这两种颜色有一定困难②。对语言在知觉建构方面所起作用的研究，证实的和否定的观点都有，但不管怎么说，一个人的文化经验多多少少会对知觉的某些方面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

---

① 转引自 Paul Henle: Language, Thought and Culture(言語と思想と文化)，载《文化人類学と言語学》，日译，弘文堂，1970 年。

② D. L. Bolinger: Aspects of Language, Harcourt, New York, 1975.

第二章 分 类

第一节 民俗分类

语义分类(或叫"语义分割")是语言对连续而无界限的经验领域进行分割和范畴化,如全体分成部分,音味色等感觉经验分划成可归的类。在意义结构中反映语言文化关注的分类,往往与基于各种学科的"科学分类(scientific classification)"相对,叫"民俗分类(folk classification)"。两种分类并不总是一致的。南美某部族的语言把植物分成"牛吃的植物、稻草或麦秸残留物、木质植物、其他植物"[①],可见,俗分类是何等粗杂和不科学。许多所谓文明社会的语言中,大抵都有与"驽马、骏马"相当的词,如英语分别为 jade、steed,俄语分别为 кляча、скакун,法语分别为 rosse、coursier,德语分别为 mähre、Renner 等。但动物学的分类中,根本没有驽马科。这只是人类觉得对自己生活有用而分的类,属于民俗分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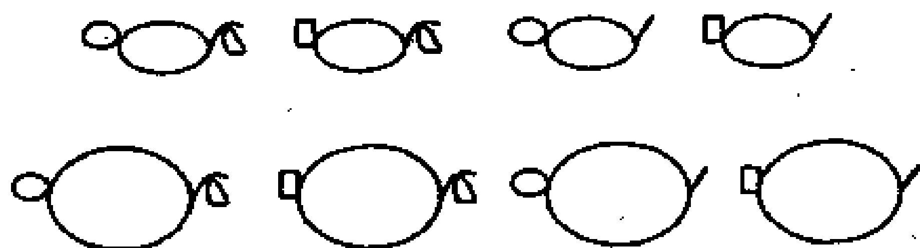
一旦语言、社会、认识发生变化,分类自然也会发生变化。不同文化的民族语言里,同一种事物所从属的类别可能不同。比如,日本山口县宇部市方言曾将粗大硬实的西红柿秸归作树,叫トマトのき(西红柿树)[②],汉语未见有这种说法。土豆在汉人看来是蔬菜,在欧洲人看来,则是粮食或主食,煮土豆、炸土豆、土豆团子等都是德国人的

① 池上嘉彦:《意味の世界——現代言語学から視る》,NHKブックス,1978 年。

② 国廣哲彌:《語彙の構造の比較》,載国廣哲彌編:《日英語比較講座(第三巻):意味と語彙》,大修館書店,1981 年。

主食[①]。汉语许多方言把"蝙蝠"归为老鼠,如江苏金沙话把它叫"油老鼠"(据说是偷吃油后变化成的),石家庄安平话叫"檐老鼠"。德语蝙蝠叫 Fledermaus,词根 maus 也是老鼠。《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②] 将 bat(蝙蝠)解释为"体小如鼠之动物",《现代汉语词典》[③]解释为"头部和躯干像老鼠",都体现了这一认识,但这些都不能给俗分类增入科学的依据,"蝙蝠"跟"鼠"属于完全不同的生物学类别。

替东西取名字的时候就是在给它们分类。加拿大籍日裔学者 Hayakawa(早川原)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④]。假设有八个动物:四个大的,四个小的;四个头圆,四个头方;四个卷尾巴,四个直尾巴。画其图形如下:



最初它们在村庄附近乱跑,对你毫无影响,你也不理会它们,没有给它们取名字。有一天,你发现小的动物把你的稻子吃了,大的却没吃。于是这些动物间发生了差别,你把小的叫"弟弟",大的叫"哥哥"。你把"弟弟"赶走,留着"哥哥"不问。可是你邻居的经验却不同:他发现方头动物会咬人,圆头的不会,因此他就把方头的叫"姐姐",把圆头的叫"妹妹"。另一个邻居却发现尾巴弯的动物会杀蛇,尾巴直的不会。他就将尾巴弯的叫做"杀",尾巴直的叫"不杀"。有一天你们三个人在一起,弯尾巴、圆头大动物恰好从你们前因走过。你说那边跑的是"哥哥",第一个邻居说是"妹妹",另一个邻居却说是

① 段宝林等:《世界民俗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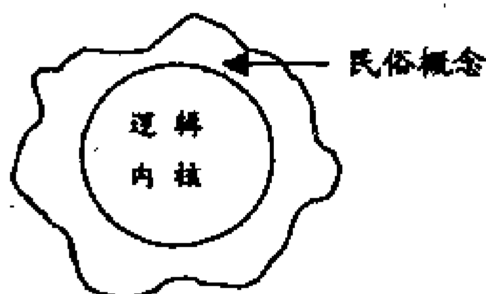
② 《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商务印书馆、牛津出版社,1990 年。

②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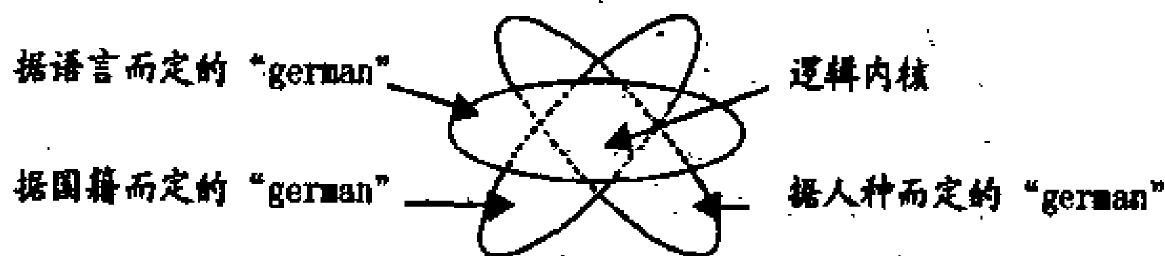
④ S.I.Hayakawa(早川原):《语言与人生》,中译本,台湾淡江书局,1968 年。

“杀”。正在争吵间，别的村庄里又来了一个人，把它叫做“好肉”，因为它是可以吃的，不能吃的叫做坏肉。命名在本质上取决于需要，各语言所注意的焦点正是它们命名的根据，而命名和分类常常就是同时进行的。

民俗分类的基本构成单位是民俗概念。德国语言学家 Erdmann 在本世纪初指出，日常使用的词的内容和逻辑概念是不一致的。如果逻辑概念或民俗概念的逻辑内核是一个圆，那么民俗概念就是一个不规则的图形(参左图)。



以 german(德国人)为例，这个民俗概念词所能使用的极限在下图不规则线界之内，并包含逻辑内核：



逻辑内核是词义的中心要素，但非逻辑特征同样也是词义的重要内容①。在汉方言中，并非所有的家养动物都叫“畜生”，“畜生”的意义不能离开它的实际指谓经验作理性推演。北京话、江苏金沙话、浙江丽水龙泉话都不把猫叫“畜生”。龙泉话不包括羊，据说因为羊比较听话，舍不得用带贬义的“畜生”一词来指说它。北京话、江苏金沙话不包括鸡鸭，在浙江永嘉岩头话、浙江丽水龙泉话中鸡鸭就算“畜生”。浙江萧山河上话把除人以外，有脚、杀后有鲜红血液的动物都叫“畜生”，包括哺乳类动物(如兔子、老鼠)、禽类(如鸡、鸭、鹅、

① 柴田省三：《語彙論》，大修館書店，1975 年。

鸟)、两栖类动物(如青蛙、蛤蟆、乌龟)等,但不包括鱼虾、河蚌、螺蛳、蝴蝶等。尽管养殖的蚕、蜜蜂、牡蛎等在某些语义学著作中已被纳人家养动物的语义场内①,但几乎所有我们能够接触到的汉方言都不把它们叫"畜生"或其他范围相当的词。"野兽"在汉方言里一般仅指稍大一些的野生兽类,不包括老鼠等。可见,日常语言中关于生物、动物、植物等俗分类中的概念,始终是前科学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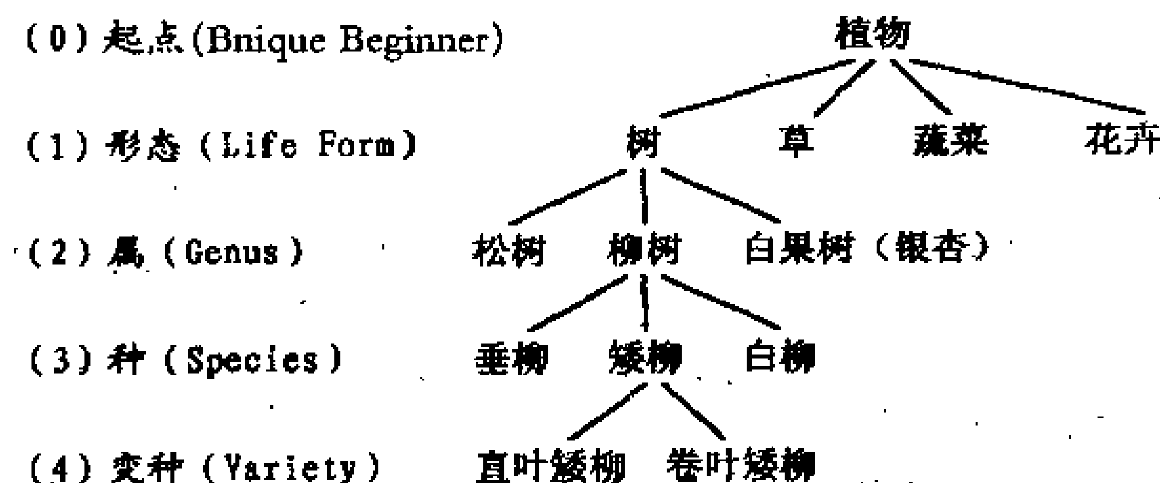
以下从分类层次结构、基本层次概念、文化普遍性和差异性、实地调查四个方面来谈。

一、分类层次纳构 民俗分类是人类学家广泛调查并取得进展的一个项目。Berlin(伯林)等人于1973年、1978年根据广泛的词汇俗分类材料和对其结构的验证提出,语言分类的等级组织有普遍相似之处。其深度一般不超过五层,偶尔出现六层,这五个层次从高到低依次是起点、形态、属、种、变种②。起点是单项的,在许多语言里,列在这一层次的某个用语并不是语言上的习惯用语,它们代表着对自然世界的最宽泛的分割,如"植物、动物"都是这样的名称。其次是形态层次,这一层次的词数量极少,又不处于终端层次。数量最多的概念处于属层次。它们是最常提及的对自然环境组织的分类,是心理上最显著的,而且可能是儿童最早学习到的分类单位,如"松树、柳树、白果树(银杏)"等③。种和变种层次上的词数目不多,一般用二次词位的命名,构成包含一个或几个相同词位对比系列。种概念如"垂柳、矮柳、白柳",变种概念如"直叶矮柳、卷叶矮柳"。如下图(见次页):

① G. Mounin: Clefs pour la Sémantique(意味論とは何か),日訳,大修館書店,1975年。

② S. G. Pulman: Word Meaning and Belief, Croom Helm, 1983.

③ 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说,概念事物在分类层次中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取得属概念资格的事物也不同,如对都市人来说,可能"树"是属概念,参下。



文化的人工物、宗教观、身体部位中都可以看到同样的结构。E.S.Aderson(1978)指出,人体部位作为一种分类结构,其概念层次也很少超过5层或6层①。

日本学者森冈健二(1977)的命名论观点正好是对它的形式验证②。他认为,命名和分类不但同时进行,而且分析性名称还常常反映着它在分类体系中所处的层次。日常语言的第一次命名几乎都是基本词汇的根词,如"虫、马、狗、兔、豆、麦、瓜"等,这些叫"一次名"。人类知识发展了,要扩大一次名的范围,进行第二次命名,于是势必将它们作为属概念,分化出一个个种概念,基本构造大多为:种差+属概念,这样,二次名就产生了。三次名以下对指谓性不甚重视,而更强调表现性。在一次名的上层,是比它抽象的抽象名,一般表示关系、数量、时间、空间、存在、动作、状态、过程、心理等抽象概念。与"山"有关的命体系及其层次如下(见次页)。

一次名、二次名、三次名常常暗示着它在分类结构中所处的层次,但隐喻式命名如"海马"却没有这样的暗示性,不能说"海马是马"。命名层次和民俗分类层次大体上是互相印证的。

① 参 S.G.Pulman: Word Meaning and Belief, Croom Helm, 1983.

② 森岡健二:《命名論》,载《岩波講座日本語(2):言語生活》,岩波書店,1977年。

↑ 抽象名二　自然
抽象名一　地貌、气象　（上属“自然”）
一次名　山、海、河　（上属“地貌”）
二次名　高山、火山、山脉　（上属“山”）
三次名　死火山、活火山、休火山　（上属“火山”）
↓ 四次名　阿苏山、浅间山、三原山①　（上属“活火山”）

普通语义学者们把分类层次结构比作抽象阶梯(abstraction ladder),如“阿花→母牛→牛→家畜→动物(→哺乳动物)→生物→物”。要解释一个词,通常是沿着抽象阶梯爬上一级,用它的上位词来解释它。如果过于抽象,找不到更抽象的词可以寄托了,那就只好从抽象阶梯上走下来,通过示例来说明。定义就是在字眼里兜圈子,尤其是在抽象阶梯上爬上爬下。我们来看《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狗”等时在“狗→动物→生物→物体”上所兜的圈子:

【狗】——哺乳动物,种类很多,嗅觉和听觉都很灵敏,毛有黄白黑等颜色。是一种家畜,有的可以训练成警犬,有的用来帮助打猎、牧羊等,也叫犬。

【动物】——生物的一大类,这一类生物多以有机物为食料,有神经,有感觉,能运动。

【生物】——自然界中由活质构成并具有生长发育繁殖等能力的物体。生物能通过新陈代谢作用跟周围环境进行物质交换。动物植物微生物都是生物。

为满足具体形象的表达需要,常通过言语手段,添加修饰或限定成分把词扩展成临时性下属类别。茹志鹃《百合花》:“她为了这条被子,在做姑娘时,不知多干了多少零活。”又:“我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的感情的花。”从“被子”到“枣红底色上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更加具体化了。

---

① 阿苏山是日本著名火山,位于九州岛熊本县东北部。浅间山是日本长野、群马县境内三重式的活火山。三原山是位于东京都伊豆大岛的活火山。

同一个词有时可以出现在不同层次上。英语 man 在一般层次上指“人类”，跟 animal 相对。在稍微特殊一点的层次上，跟 woman 相对。在更特殊的层次上，跟 boy 相对。英语的 sick，在极其一般的意义上，几乎指各种各样的不舒服的症状，在特殊层次上，表示有呕心、反胃等反应的胃病。在后一种意义上，可以针对 Has he been sick（他恶心吗）？回答 No, he hasn't been sick but he had a high fever（不，他不恶心，只是发热）。一般概念词和特殊概念词的区别，是由层次来设定的。在英语中，thing 是膨胀分类的最上位词，它几乎可以包罗所有的具体名词[①]。许多事物没有名字，但我们没有办法时，可以叫它“物”或“东西”。《荀子·正名篇》云：“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

民俗分类不同于严密的科学分类，它具有三个特征：(1)往往不够系统，缺乏科学分类那样的完整性。(2)不必理解所指事物的语义特征就能区分不同的所指物。(3)各种成分之间存在着重叠现象，并不一定是排他的。如果把分类体系中的各个类别看做镶嵌图案的配件，那么所得的图案和配件则是有裂缝和交叠的。不同的人在区分词语时常以不同的方式使用相同的语义成分。比如，当属概念不被一个形态概念所包含时，尤其是当概念具有经济重要性，需以某种方式显示其区别时，也常出现于属层次，偶尔出现于形态层次，上章所述的“蔬菜”可作为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同时表明，对“植物”进行更为广泛的类型分类并把“植物”置于形态层次，将会遇到更大困难。

二、基本层次概念　数量最多的概念处于属概念层次。它们以基本词位命名，是最常提及的对于自然环境组织的分类，是心理上最显著的，而且可能是儿童最早学习到的分类单位。属概念的形成表明对环境的最经济的分割。它们最有用，适用于大多数场合，其名称

---

① Robbins Burling(1970)：Man's Many Voices(言語と文化)，日訳，ミネルヴァ書房，1974 年。

是基本类名或自然类名。通常把这种概念称做“基本层次概念(basic level category)”。概念倾向于围绕着基本层次概念分等级地组织起来。我们给事物起名,首先是给有代表性动作的事物起名,所以基本类名最短小,用得最多。然后在这个基本层次上再发展较高和较低的层次。基本层次都是从顶部往下数的第三个层次。母亲教三岁幼儿认狗时,也是先教他说:“这是狗。”没有人拿狗的上位概念来教孩子说:“这是动物。”用“动物”这个词教孩子来认狗,很难把狗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同样,如果在远处有一个活动着的小东西,看到它时首先想到那是狗还是猫,理所当然不会想它是动物。就是说,狗这类词是我们认识体系的基础词,跟狗意义范畴相当的词都叫基础词①。

具体事物概念的基本抽象层次携带了最大信息量,具有最高的线索有效性(cue validity),并且与别的事物间有着最大的不同。为什么说基本层次反映最大限度的信息量和最高程度的线索有效性?可以拿“水果”为例。“苹果”继承了判断为“水果”的所有特征,“水果”却只拥有极少的、与之相同的特征,“苹果”与“梨”的相当一些特征是共同的,下位概念“富士苹果”基本上是继承了它上一级概念成员“苹果”的效能。基本概念范畴跟它的上位概念共同特征极少,又差不多全部拥有各个下位概念的特征。所以说,基本概念或属(Genus)概念是信息量最大、线索有效性最高的概念。

什么才称得上基本层次概念?首先,它要比上位概念更能够图象化(imageable),更具直感,下属成员的相似点要多。比较“水果—苹果”。“苹果”的下属成员“国光苹果、黄香蕉苹果、富士苹果”等的相似点比“水果”的下属成员“苹果、香蕉、梨”等的相似点要多。

其次,要容易区别。“富士苹果”的下属成员“正宗富士苹果”和“变种富士苹果”相似点虽然很多,但整个类别与其他同等类别如“黄香蕉苹果、国光苹果”等的不同点又太少。所以,“苹果”反比“富士苹

① 吉田政幸:《分類学からの出発》,中央公論社,1993年。

果"更容易区别。"苹果"是基本层次概念。

以上两点综合起来可见,基本层次概念提供最大的信息,同时花费的力气最小。"椅子"的物理特征比"家具"更具体,后者的功能特征比前者模糊得多。"转椅"比"椅子"多出的特征,在一般情况下跟环境关系不大。要认出这多出的具体特征势必费力一些。由此可见,"椅子"是个基本层次概念,它既不过于抽象,又不过于具体。"我买了一把椅子"比"我买了一件家具"所给的信息量要大得多。

再次,自然类别总跟特定动作相关联,基本层次概念的轮廓可以根据表演的动作来猜想出来,即可以用身体动作描述出来。根据E.Rosch(1975)调查发现,属概念的属性比形态概念的属性更容易用身体动作来表明,种概念也不能通过更详细的动作来表明其追加属性①。做一个采摘动作并放到鼻子前闻一闻,大多可猜出是"花",而"茉莉花"和"植物"都无法用动作来表示。可以用动作表示"兔子",却不能表示"动物"或"白兔"。可以比划出"锤子、锯子、螺丝刀",却比划不出"工具"或"圆头锤、钉锤"等。

基本层次概念和基本词汇不同,但却有联系的。前者是就其在概念体系中的地位而言,后者是就词汇的全民性、稳定性、能产性而言。

三、文化普遍性和差异性　民俗分类除了在抽象结构上具有上述普追性外,在具体细节上还具有差异性。

同一事物在不同的语言里,向下分出的细类可以不同,向上从属的上位类别也可以不同。随着时代变迁,分类方式也可出现变化。E.Rosch(1973)说,在美国人看来,胡萝卜是非常典型的蔬菜(评定等级是1.1),欧芹则属于外围或分(评定等级是3.8)(评定等级的数

① M.I.Posner: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Science(記憶と思考),日訳,産業図書株式会社,1991年。

字越小,越具典型性)①。但胡萝卜在我国某些地区如江苏南通农村,80年代前主要作为猪的饲料,人偶尔食之,认识上不把它当蔬菜,解放前则根本不吃它。三年自然灾害时把它作主食,并不意味它的文化地位得到了提高,其他猪饲料人们也吃。改革开放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知道它有丰富营养价值,加上市场需要,这才引导人们将胡萝卜作为蔬菜。胡萝卜在西方国家被确认为蔬菜,其实也经历了一个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人一直认为胡萝卜只配喂马,不能上餐桌②。

尽管许多汉方言都有"畜生"这个语义类别,但也有例外。温州洞头是面积不大的海岛县,以渔业经济为主,畜牧业极不发达。本岛土话(属闽南话)中没有"畜生"或者与"畜生"范围相当的词,如果他们骂人,也只骂做"猪"或者"狗"等具体的动物。又如,由于自然的因素,粤语和闽语中"水、雨"都混叫"水",粤语中"雪、冰"都混叫"雪"。

由于观察的细微程度因素,天津永清话"玫瑰、蔷薇"不分,都叫"玫瑰",天津献县话把鹧鸪叫"野鸽子",天津河间话把斑鸠也叫"野鸽子"。有些是为了避讳,不得已重新作一下分类上的安排,如张家口怀安话里,老婆儿迷信,不敢叫狼,就把狼叫"野狗"③。观察、归类角度不同,赋予词在分类系统中的价值也就不同。"蝙蝠"在新几内亚的某些语言里归鸟类,因为这些语言判定鸟类的标准是飞行本领,比如食火鸡不能飞,便不算鸟类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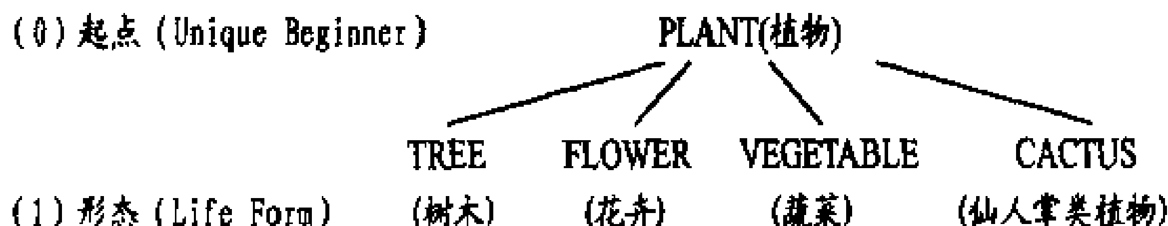
① J.R.Anderson(安德森):《认知心理学》,中译本,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

② 段宝林等编:《世界民俗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③ 反映分类差异的例子大量存在。长沙话中"蚊子、苍蝇"都叫"蚊子"。河北方言"猫"叫"猫儿","兔子"在天津吴桥话、唐山遵化话里也叫"猫儿",石家庄束鹿话叫"大耳朵猫"。河北方言把野兔叫"野猫",家兔在张家口涿鹿话里叫"家猫"。河北方言把蛇归虫,叫"长虫"。汉语把鳖归鱼,叫"甲鱼"或"团鱼",虾、蟹不归鱼。

④ E.A. Nida(奈达):《奈达论翻译》,中译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

不同语言在分类中，上层抽象，下层具体。下层结构的差别往往较小，上层结构的差别往往较大，这是因为下层结构主要取决于人们对事物的感知，它们的形成是出于"文化压力"(cultural pressure)，因为它们在文化或社会上重要，所以要进行区别。上层结构则取决于人们的思想概念，它们是民俗科学的起始部分①。S. G. Pulman (1983)对英语 PLANT(植物)的上层分类，将 CACTUS (仙人掌类植物)列入形态层(如下图)，就与我们汉人的观念很不相同。



把什么概念当基本概念，不同语言和操同一种语言的不同阶层都有不同，在差异形成中，文化起着决定作用。E. Rosh(1976)研究表明，一般农民把"pine(松树)"当基本概念，市镇居民把"tree(树)"当基本概念，森林居民则可能把"ponderosa pine(潘德萨松)"当基本概念(把这个短语名称单词化为"ponderosa(潘德萨)"，就反映这一点)②。但是，尽管不同语言或其变体在具体概念和分类细节上经常有些差异，抽象语义结构的相似程度仍然很高。Brent Berlin 等人研究的所有语言中，生物学等级中第三层次项目的数量大致相等，都是500 个左右。又比如，一般人把"花"作为基本概念，而在养花大国荷兰，一部分人可能把"郁金香"作为基本概念。尽管如此，荷兰人区分花与非花的能力肯定仍大于区分郁金香和其他花的能力。一个文化中不可能所有人都把郁金香当基本概念，但可以有所有人把"花"当

① 引文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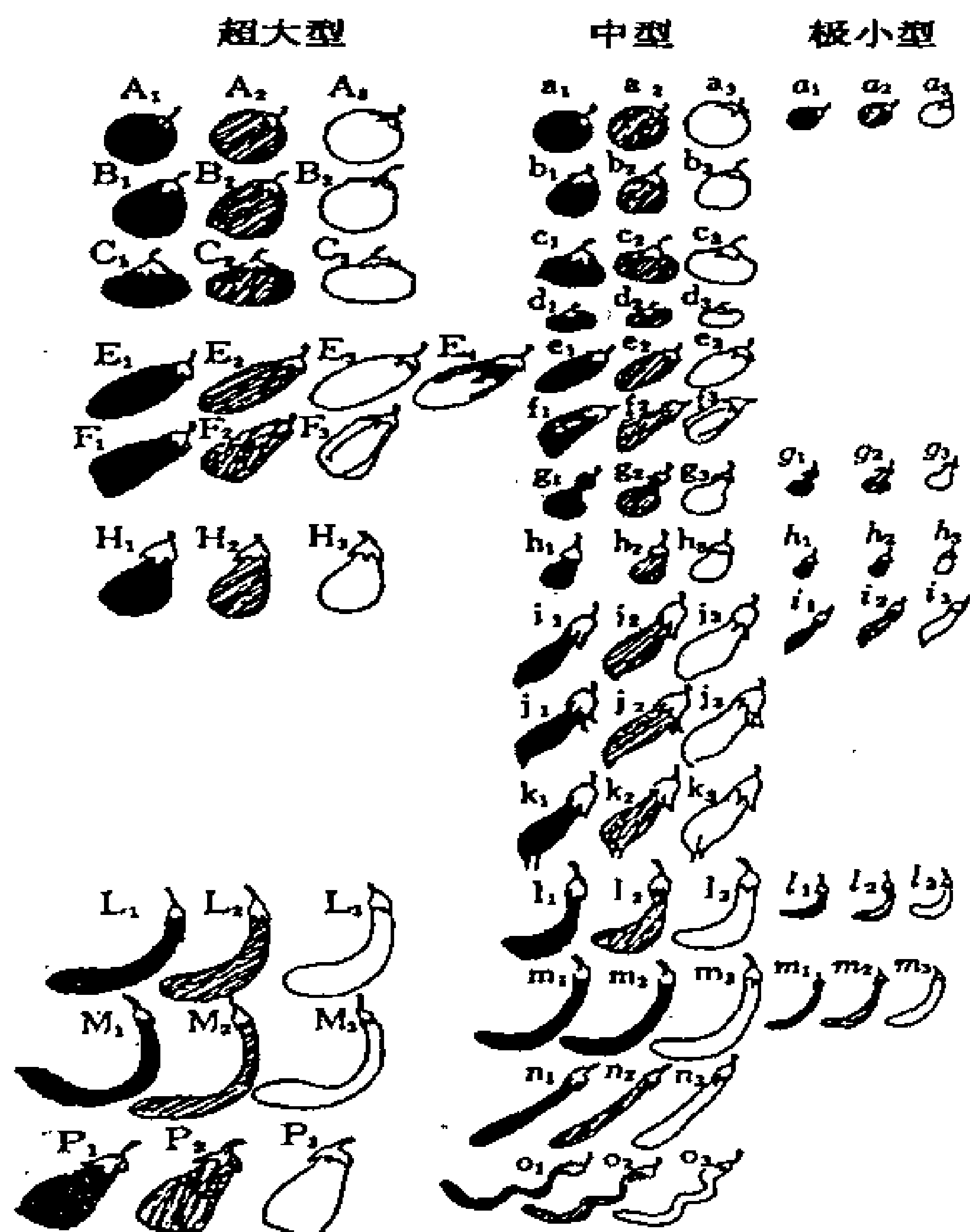
② 参 R. A. Hudson(赫德森)(1981)：《社会语言学》，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

基本概念的文化[①]。语义组织世界的方式，部分取决于世界本身的组织方式，部分取决于说话人的需要，不同语言的基本概念之所以存在如此相似性，是因为不同民族的基本生理心理机制大致相同。

四、实地调查 人类学家目前关心的一个课题是，为抽取和比较分类体系而开展实地调查的方法。日本学者野林正路对中国和日本各地有关茄子分类的考察，可作为这类研究的代表。他在 27 位中、日助手的帮助下，对中国辽宁大连金州向应乡、沈阳和平区、吉林长春市南部、黑龙江宾县、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北京市东部、北京市西北部、湖北江陵、江苏常州、四川成都桂溪、云南昆明岗头村、云南昆明普莲村、广东三水、广州市康乐村、福建厦门、浙江诸暨、上海市北部、东京世田谷、横滨鹤见、福岛郡山、东京绫部、鹿儿岛市等 22 地语言中"茄子"的俗分类情况作了调查、比较和分析。

他事先对当地现实中的各种"茄子"进行全面了解和分类，制成图谱，排列出"茄子"的全部典型现实类别，各以不同的代码表示，再根据被调查人的语言认定逐层分组。如他对东亚"茄子"典型现实类别进行调查，总结成如下的图和表：

① 沈家煊：《语法研究的分析和综合》，载《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2。



1 黑色或暗紫色或紫色　　超大型（A～M）[圆形 约 700～1000g 以上/长型 约 25cm～30cm 以上]

2 绿色或草色　　中型（a～o）[圆形 约 70～500g/长型 约 15cm～20cm]

3 白色　　极小型（a～m）[圆形 大拇指大小/长型 约 5cm～10cm]

4 黑色或暗紫色和白色斑点

特征	名称 \ 调查地	大连金州向应乡	沈阳和平区	长春市南部	黑龙江宾县	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	北京市东部	北京市西北部	湖北江陵	成都桂溪	江苏常州	上海市北部	浙江诸暨	福建厦门	广东三水	广州市康乐村	昆明岗头村
色	紫黑色的	紫	紫	紫	紫	紫·大紫	—	—	—	墨	—	—	屯	黑	—	—	墨
	青绿色的	—	绿	绿·青	绿	—	—	—	—	—	绿	—	—	—	绿	绿	绿
	白色的	白	白	—	—	白	白	白	白	—	—	白	白	白	白	白	白
	白或青绿色的	—	—	—	—	—	白	—	—	—	—	—	—	—	—	—	—
	黑白斑点的	—	—	—	—	—	—	—	—	—	—	—	花	—	—	—	—
形	浑圆的	—	圆	—	—	圆·大	圆	圆	圆·灯泡	—	圆	—	—	—	—	—	—
	椭圆的	—	洋	—	—	—	—	—	—	—	—	—	—	—	—	—	—
	圆的	大团	—	圆	—	—	圆	—	—	—	—	—	—	—	—	—	圆
	大的	大	大	大	—	—	大	—	大	—	大	—	—	—	—	—	大
	大圆或大椭圆的	—	大圆	—	圆·大圆	—	—	九叶	—	九叶	—	—	—	—	—	—	大团
	鸡蛋形的	—	—	灯泡	—	—	灯泡	—	—	—	洋	圆	蛋	—	—	—	—
	葫芦形的	牛蛋	—	—	—	—	—	灯泡	—	—	—	—	灯泡	—	灯泡	灯泡	灯泡
	长的	—	条	长	长·线	长	长	长	长	—	长	长	—	—	—	—	长
	细长的	—	长	—	—	—	—	—	—	—	—	—	—	—	—	—	—
	粗长的	不打叶	—	—	—	—	—	—	—	竹丝	—	—	—	—	—	—	—
	细长弯的	—	线	—	—	—	—	牛角	牛角·长	—	—	—	牛	—	牛角	牛角	—
	弯而头粗的鸡腿形	鸡腿	—	—	—	—	—	—	—	—	—	—	—	—	—	—	—
	直粗长的	—	—	长·大紫	—	—	—	—	—	—	—	—	—	—	—	—	—
	出芽的	芽巴	—	—	—	—	—	—	—	—	—	—	—	—	—	—	—
	头上裂开的	—	开花	—	—	—	—	—	—	—	—	—	—	—	—	—	—
	极小的	—	—	小茄纽儿	小茄包	—	—	—	—	—	—	—	—	—	—	—	—
色和形	圆紫黑的	—	—	—	—	圆紫	—	—	—	—	—	—	—	—	—	—	—
	大紫黑的	—	—	—	大	—	—	—	—	—	—	—	—	—	—	—	—
社会	传统的	不打叶	条	东北	长	长	圆	—	—	—	长	牛	—	—	牛角	牛角	秋
	外来的	—	圆	南方	圆·大圆	圆·大圆	长	洋	—	—	圆	—	—	—	白·绿	白·绿	—

（为便于列表，“茄子”的各次类名称仅标出其修饰成分）

调查时,也可以用下列两种提问方法收集数据。一种是关于范畴的分类结构,比如在广东三水调查,可以这样进行:

问:"茄子"在三水话里有些什么类别,它们的名称叫什么?

答:牛角茄子、灯泡茄子、白茄子、绿茄子。

问:有哪几种牛角茄子?(逐项询问)

答:……

另一种是关于分类成分之间关系的提问,如:

问:有没有不是"牛角茄子、灯泡茄子、白茄子、绿茄子"的茄子?

答:有,但它没有特别专门的名字,它就笼统地叫"茄子"。

问:它是什么样的?

答:……

问:"牛角茄子"中有没有"白茄子、绿茄子、灯泡茄子"

答:有"白茄子、绿茄子",但没有"灯泡茄子"。

问:"白茄子"中,除了也有叫"牛角茄子"的,还有没有其他"茄子"?

答:有。但它们没有专门的名字。

问:它们是什么样的?

答:……

(以下逐项询问)

提问时,常常两种问法并用,这就可以得到一个经纬交错的分类结构图了。同时询问名称所指事物的特征也是必要的,它可以帮助我们修正调查失误,准确把握被调查语言的分类结构,如:

问:白茄子、牛角茄子、灯泡茄子长成什么样子?

答:白茄子的颜色是……绿茄子的颜色是……牛角茄子的形状是……灯泡茄子的形状是……

下面看看有关"茄子"在我国16个地区的分类着眼点和类义词总表(见前页):

调查说明,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的三角洲地带,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的蔬菜种类多,而耕地少、农产品收量少、商品流通不发达的闭塞地区,类别数较少。包括台湾在内的东南沿海地区类义词的数量也较少,体系倾向于单纯。但东北三省和云南省等耕地丰富肥沃的

汉族地区(即使在闭塞地区),类义词的数量一下子就增多了。耕地增加,带来了农产品生产、消费、流通量增大和对外来品种的积极引进。所以,类义词的数量在某种程度上可跟农业经济的统计相符。在名称上,东北、中国南部重视色彩和形状的分类,华北主要从形状上分类,缓冲地带的中部地区对两种角度的关注各有交错。在本地品种基础上接受外来品种的是"媒介型",反之是"无媒介型"。日本和中国某些东南沿海地区(如厦门、诸暨等)的分类体系属"无媒介型",东北、常州、北京、广东三水等的分类体系都属"媒介型"。总体上说,中国茄子的分类复杂,是岛国日本无法比拟的,后者茄子的类别数(包括类的名称)极少。

第二节 分类细度

各文化及其关注焦点的不同,对相同语义场的分类常有疏密差异。文化对分类细度的影响遍及语言各类语义场(semantic fields),如气象地貌、动植物、生活用具、亲属称谓、物件部位和方位、饮食烹饪、搬运、颜色等。凡文化上重视的事项或文化上的特色事项,一般区别细致,类义词多;反之,倾向于概括,用词也少。这是文化与语义分类细度相互关系的倾向性原则。

一、文化成因 对分类细度起影响作用的有三种文化因素:文明、价值观念、认知方式。除此之外,还有自然环境因素。

(一)文明 文明是人类创造的客观物质或精神产品。生活习俗、经济地位、科技水平都是影响分类细度的文明因素。

1.生活习俗 在民族风情、习俗(如饮食、动作、起居、器具、婚姻)等方面起重要作用的事物,往往得到细致的分类。

西方饮食文化中稻米不作主食,东、南亚地区人却看得非常重要,而且很讲究。1994年日本水稻歉收,进口米并不缺乏,一位朋友仍从冈山给远在北海道的母亲寄日本米!对稻米的分类,汉语、日语

和伽罗(Garo)语① 均偏细。汉语用“稻、米、饭(米饭)”分别代表〈植物或谷物〉〈待炊的食物〉〈食物〉三个阶段，日语用いね、こめ、ごはん分别代表〈植物〉〈谷物或待炊的食物〉〈食物〉三个阶段(こめ也可作为这三个阶段的总称)，伽罗语用完全不同的词指说“水稻、脱壳米、米饭”。西方语言则用一词概指〈植物〉〈谷物〉〈待炊的食物〉〈食物〉四个阶段，英语叫 rice、德语叫 Reis。蒙古人主食不是大米，所以稻子、大米也均称 TuTurg-a②。猪肉在汉、俄饮食文化中的地位有差异。汉人以吃猪肉为主(“肉”可与“猪肉”同义)，且食谱又广，凡能吃的都吃，饮食趣味上汉语对猪肉部位的分类偏细。俄罗斯文化中对猪肉的偏好不及汉人(赫鲁晓夫提到所谓共产主义生活时说“土豆烧牛肉”，不提“猪肉”)，故分类较汉语粗，汉、俄猪肉部位词③ 的数量之比为 9∶4!④ 生活习俗的形成，离不开其他文化因素的参与和制约，如水稻在东、南亚地区饮食文化中的地位与这些地区在经济上把水稻作为主要农作物是互为因果的。

从人类学报告中可看到不同民族或部落的动作差异。伽罗人搬运姿态丰富，语言中相应词汇也就很发达，有 ol-(用系着绳子的筐靠自额至背的身体部位搬运)、itchil-(把东西放在头顶上搬运)、ripe-(像搬圆木那样用肩搬运)、ke-(用有带的袋子靠肩部搬运)、detom-

---

① 印缅语的一支，是印度东北部一部落的语言。伽罗语资料见 R. Burling(1970): Man's Many Voices《言語と文化》，日訳，ミネルウァ書房，1974 年。下同。

② 表示麦子的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西方饮食文化以麦、面为主食，日本却不是。不管哪一类麦子，日语都叫“麥(むぎ)”。表大麦、小麦、黑麦、燕麦等类别的词(如“大麥、小麥、らい麥、からす麥”等)，都是形态上以“麥(むぎ)”为根的复合词。而英语对〈麦〉的意义分野不但细致，而且都是非复合词，如 barley(大麦)、wheat(小麦)、rye(黑麦)、oats(燕麦)等，反而没有指说所有类别的总称。

③ 李锡胤:《编词典要从多方面理解词义》，载《辞书研究》1988.1。

④ 又如：中国菜烹饪好用油，对用油加工食物这一概念，分别用“煎、炒、烹、炸”等表示，俄语只用 жарить 一个词。自从美国医学界指出中国菜较油腻后，国外中餐馆曾一时生意大减。

(用手臂夹着运,常用于搬运婴儿的场合,也可不移动)等。其中不少姿态在我们这儿不具有生活意义或从未见到过[①],当然不可能有表现这些姿态的词。

现实分别如果在风俗背景下不具有显著的生活意义,往往不能因此促成分类的细化。藏族人有席地而坐的生活习俗,一般用垫子,凳子等坐具不是主要家具,所以藏语对汉语"凳子、椅子"在结构、形象、制作材料上的细分不加注意,只用一个词[kup54ca?54][②](直译的意思是"屁股托",以功用为义)称说它们[③]。这种分类特征,正是藏人起居习俗的物化反映。有些语言的亲属称谓跟我们熟知的体系完全不同,如玻利尼西亚地方的称谓体系中,父亲与父亲的兄弟同名,母亲与母亲的姐妹同名。父母亲是直接生养自己的亲属,跟其兄弟姐妹当然有区别,但该地语言却予以部分地无视。这里面有我们看来比较奇妙的文化成因,假如在这个社会中父亲早死,父亲的兄弟习惯上就与尚存的母亲结婚[④]。这样,从子女的立场来看,父亲的兄弟常常就是潜在的父亲,它们也就同名了。

2. 社会阶层　同一语言社会的人由于处于不同社会阶层,所面临的环境和接触的现实事物不同,形成不同的生活条件、起居习惯和志向趣味,因而影响到相关事物的分类细度。对农作物和生态环境事物(如知了)的分类,农民和都市居民的处理常有粗细之分,一般前者细后者粗。有人说,法国都市社会对麦子的认识可能一辈子只停

① 生活在兴都库什山脉谷地的游牧民,带孩子方式十分奇特,不是让孩子伏在背上,而是把哭泣的孩子放在背后,两手向后交叉,托住孩子的头和脚。孩子在大人背上,面向上横卧,徒劳挣扎着。参梅棹忠夫(1967):《文明の生態史観》,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这样的动作方式我们这儿也从未见到过。再看伽罗语搬运语汇的特殊处就不以为奇了。

② 藏语、朝鲜语、乌尔都语(巴基斯坦国语)等非罗马文字用音标表示。

③ 邓卫群:《藏汉语词义差异初探》,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2。

④ 池上嘉彦:《意味の世界——現代言語学から視る》,NHKブックス,1978年。

留在"草"和"小麦"的对立层次上，有的社会集体可达到"小麦、大麦、黑麦、燕麦"的层次，有的则可达到"小麦、大麦、黑麦、燕麦、小米、高粱、玉米"等层次①。江苏金沙话(是现今通州市的典型方言)中农村把知了分成三类："假力(大而黑的知了)、知力(小而绿的知了)、蜈斯哆(中型而灰的知了)"，集镇则泛称"假力"，不再分细类。

在牙买加英语(跟英语、美语很不相同，一般把它看做混合语)中，表用餐的词跟英语同，但用法有微妙差异。把牙买加人分成四个阶层：(1)在都市及郊外居住的中等上层社会；(2)包括店主在内私营者的中等下层社会；(3)农园劳动者和在远离自己田地居住的小自耕农；(4)在自己田地附近居住的小耕农。他们用餐词汇的差别如下表②：

社会方言	5:00－7:00(上午)	11:00－(中午)	4:00－6:00(下午)	7:00－8:30(晚上)	10:30－(夜里)
中等上层社会	breakfast 中度地	lunch 中度地	tea 轻微地	dinner 充足地	supper 轻微地
中等下层社会	breakfast 中度地	dinner 充足地	supper 中度地	supper 轻微地	
农园劳动者	tea 轻微地	breakfast 中度地		dinner 充足地	
小耕农	tea 轻微地	breakfast 充足地	dinner 中度地	supper 轻微地	

决定用餐词细度差异的用餐习俗，很明显，是社会阶层的不同造成的。

3. 经济地位　作为生存支柱的经济事物，其不同经济用途的各形态、类别均会有细致的类名。渔猎经济对渔猎对象、游牧或畜牧经济对所畜养对象、农业经济对所种农作物(参前)的分割，都体现了这一点。海豹是爱斯基摩人的捕猎对象，在爱斯基摩语里，海豹因所处状态不同而有不同的叫法：通称用一个词，晒太阳取暖的海豹用一个

① 池上嘉彦：《意味の世界——現代言語学から視る》，NHKブックス，1978年。

② R. Burling(1970)：Man's Many Voices(言語と文化)，日訳，ミネルヴァ書房，1974年。

词,乘着冰块漂浮的海豹用一个词,根据年龄、性别命名的名称则更多[①]。这些特殊化词汇反映了爱斯基摩人经济生活中特别重视的各项特征。一般中国人只把海豹作有趣的海洋知识了解,最多作为动物园内供观赏的稀有动物,所以只称"海豹",英语也只说 seal,至于汉语"雄海豹、小海豹",英语 bull seal(雄海豹)等则已属短语,英语 seal-calf(幼龄海豹)则是关系松散的复合词。日本渔民对渔猎对象""(生活在近海的一种鱼类)是不断改换名称来称说它从稚鱼到成鱼的每个成长阶段,如"せじろ、つばす、わかな、からいお、いなだ、わらさ、ぶり"[②]。鰤鱼在日本被擦成丝或做成鱼干,嚼起来鲜美可口。这种美味鱼干一直是日本有名的特产,是日本人日常喜爱吃的食品[③],所以这种鱼对日本渔民来说,有较高的经济价值。过着狩猎生活的达斡尔人(居内蒙古、黑龙江境内)语言中,狍皮因季节不同而有不同叫法:春天的狍皮叫 angolers,夏天的狍皮叫 gwalantʃ,秋天的狍皮叫 kər,冬天的狍皮叫 buguntʃ,总称叫 dʒuraas[④]。

再看游牧或畜牧经济形态对所畜养对象的分类。蒙古游牧民族把马、牛、骆驼、绵羊、山羊看得非常重要,几乎无法离开它们而生存,类别依体状大小、蹄状奇偶、峰的有无、毛状卷与不卷、性别公母、阉割未阉割、年龄而分,竟多达 84 个左右。以骆驼为例,有 temege(骆驼)、botuɣu(驼羔)、čoyirung(幼驼羔)、kenje(晚生驼羔〈一般指夏季或秋季生〉)、torum(二岁骆驼)、ɣurbatu(三岁骆驼)、ɣuna(三岁公骆驼)、ɣunǰi(三岁母骆驼)、dörbetü(四岁骆驼)、döne(四岁公骆驼)、dönji(四岁母骆驼)、tabutu(五岁骆驼)、tayiluɣ(三至五岁公骆驼)、

① N. P. Hickerson(1980):Linguistic Anthropology(言語人類学入門),日訳,大修館書店,1982 年。
② 池上嘉彦:《意味の世界——現代言語学から視る》,NHKブックス,1978 年。
③ 段宝林等:《世界民俗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年。
④ 仲素纯:《达斡尔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2 年。

güyičegemel(六岁骆驼)、buura(种公骆驼)、ata(骟驼)、ingge(母骆驼)①。东非畜牧民奴衰鲁人的经济生活更集中关注牛,几乎整日醉心于此,语言中对牛的描写和分类的词汇特别多,仅仅指白、黑、栗色等单色调的牛的主要色彩语就有十个,如 rol(肩和前肢白)、kwe(面部白)等。根据牛的毛色和风貌,以其他动物或自然界特征对牛的比喻用语,也数量极多。如根据牛的斑纹毛色,分别有"黑豹、锦缎蛇、珍珠鸡"等名称,黑的牡牛叫"暗云、热炭"等,指牛角种类的用语有六个。还有表示牛的性别、年龄的词,如:tut(牡牛)、yang(牝牛)、nac(年轻的雌牛)、ruath(雄的子牛)、kol(断奶前的子牛)等②。我国古代农耕畜牧时期对家畜的精细分类与此相似。可见,事物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直接影响着自己的分类细度。

4.科技水平　科技水平的进步意味着人类生活中起作用的事物要重新调整原有地位,对这些事物及形态的分析也将相应作出或粗或细的调整。《说文》中马的类别词有 35 个,比同时代其他家畜的类别词(牛、犬各 18 个、羊 15 个、豕 8 个)多数倍。语言对马的行走样态也分析甚细,《说文》所列用词不下十三个,如:驱(驱马也,自人策马言之,鞭也)、驰(大驱也)、骛(乱驰也)、骂(次第驰也)、骋(直驰也)、骁(马行疾来貌)、駉(骑马洞去也)、骖驙(马载重难行也)、骙骙(马行威仪也)、騯騯(马行徐而疾也)、骅(马突也)、骙(马行伉伉也。伉,勇壮也)、笃(马行顿迟也)(参《说文段注》"马"部诸字)等。这是因为在以家畜为陆上交通工具的时代,马有重要的交通用途。到现代社会,机械类交通工具基本取代了家畜的交通功能,其行态类别在现代汉语中就几乎找不到对应词了。温州话对水的区分既考虑冷热,还又考虑饮用条件,分"水(冷水)、汤(热而不开的水,或开而用于

① 斯钦朝克图:《蒙古语五种牲畜名称语义分析》,载《民族语文》1994.1。

② N. P. Hickerson(1980):Linguistic Anthropology(言語人類学入門),日訳,大修館書店,1982 年。

盥洗坏喝的水)、开水(供饮用的开水或冷开水)",是因为中国自来水处理技术不高,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可直接饮用。这些都是科技水平影响分类细度的明显例证。

社会分工使大量事物名称专业化、术语化,由此也形成原始社会和发达社会对某些自然事物分类细度的悬殊差异。菲律宾南部群岛萨巴农人的植物名词超过 1000 个,同在菲律宾的哈努诺欧(Hanunóo)人的植物名词将近 2000 个[①],而我们日常语言中对周围的很多草类叫得出名字的只有几种,绝大多数只泛称为"草"或"杂草"。这是因为我们关于植物的药用、毒性知识已转由医药行业分理,众多名称转为行业词,一般人跟它们的关系疏远了。

(二)价值观念　价值观念是文化集团在创造文化的历史过程中建立起来、世代相袭的是非通则或对重要性的评判标准。作为价值观念的审美观、宗教观、道德伦理观、阶级观等都可直接或间接影响分类的细度。

1. 审美观　凡人们觉得有用、有害、有趣的事物才给它定名,因此对所欣赏的美的东西,常常分类备细。虽然外民族对玉也有爱好,《现代汉英词典》[②] "玉"字条所列英语名称达数十个(如碧玉 jasper,黑玉 jet,黄玉 topaz 等),但中国人自古对它特别地欣赏,外国人一谈到玉,就联想到中国[③]。中国古人眼中的玉石之美,有仁、义、智、勇、洁五德(见《说文》),如《说文》释玉云:玉,石之美有五德者。润泽以温,仁之方也。鳃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疏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之方也。于是古人竞相佩带,出现了各种细致的类名。《说文》佩玉类词如:"珩",佩上玉也。"琫",佩刀上饰也。"珌",佩刀下饰。"瑶",车盖玉。段注:

① C. Lév-strauss(列维·斯特劳斯)(1962):《野性的思维》,中泽本,商务印书馆,1987 年。

② 《现代汉英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8 年。

③ 钱歌川:《钱歌川散文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 年。

玉者，谓玉饰之。“琪”，弁(按：帽)饰也。“璪”，玉饰，如水藻之文。“瑬”，冕饰。“琚”，佩玉石也。在现代中国人生活中，只把玉作一般辟邪饰物，不象征气节，饰品地位也多次于金银，许多人甚至搞不清“翡翠”是不是“玉”，审美价值极大降低了。《说文》中与玉有关的玉部字不下百个，而《同义词词林》[1] 基本玉石类词只有“玉(玉石、玉佩、佩玉、玉串、硬玉)、璧、翡翠”3个，是前者的数十分之一。

《三国演义》中曹操为笼络关公，赐纱锦囊给关公护髯，帝又与众皆呼披髯过腹的关公为“美髯公”。可见，古人很欣赏胡须之美，古汉语将胡须细分为“髭(《说文》：口上须也)、须(《说文》：颐下毛也)、髯(《说文》：颊须也)”。现在中国人把胡子跟“萎靡不振、怪异、流氓、低俗、不拘小节”等丑的方面联系起来，常把它刮得干干净净，不再过细地讲究和分析它了，现代汉语只泛称“胡子”。

2.宗教观　事物一旦跟宗教联系起来(如作为祭祀品等)，分类就更趋细化。宗教迷信认为，祭祀品可被死去的人享用，葬品也能在死人身上发挥作用。这些用品都是宗教观的物化反映。在我国古代，牛和玉都派上了宗教用途。《说文》：牷，牛纯色，祭祀牷牲。段注：凡时事之牲用物，凡外祭毁事用尨。《说文》：牺，宗庙之牲也。牲，牛完全也。段注：毛传，牺，纯也。《曲礼》：天子以牺牛。郑云，牺，纯毛也。祭祀共其牺牲，郑云，牺牲，毛羽完具也。瑒，圭尺二寸，有瓒，以祠(《玉篇》作祀)宗庙也。琀，送死口中玉也。宗教因素加深了牛、玉分类的繁杂化。

此外，人类的拜物教现象也可促成分类的细化。比如，蒙古文化中蕴涵着浓重的生殖器崇拜色彩。广大蒙古高原多处存有古代男女生殖器崇拜的岩画，蒙古人崇拜山洞，因为它象征女阴，也有把祖先男根割下裹在黑山羊皮里当成神祇或崇拜物。语言里，男女阴跟他们所崇拜的熊常常同名。生殖器崇拜使得蒙古鄂尔多斯土语按幼

[1] 梅家驹等：《同义词词林》，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

年、少年、青年、壮年、老年五个年龄段分别将男性和女性的生殖器名称作平行划分，不下 10 个基本类别①。有的类别下还有数个近义词，近义词数目按从多到少排：幼年男根(10 个)，老年女阴(7 个)，青年男根(5 个)，幼年女阴(3 个)，壮年男根(2 个)。10 岁以下孩子的生殖器具有昵称色彩，对其他类别来说，近义词的多少反映着人们对其性交能力的关注程度②。

3. 道德伦理观　当道德伦理观需要人们不得不对某种社会事物的区分予以特别注意时，分类也偏向细化。同胞关系的语义场中〈年长〉、〈年少〉的区分，反映了东方人长者为尊的思想。比如，汉语分"哥哥、弟弟；姐姐、妹妹"，日语也分あに(兄)、おとうと(弟)；あね(姐)、いもうと(妹)。朝鲜语男性称哥哥为[hiəŋnim]，女性称哥哥为[op'a]，女性称姐姐用[ənni]，男性称姐姐、妹妹一概用[nui]，男性或女性称弟弟、妹妹一概用[toŋsɛŋ](需特意区分时，在前面加男[nam]或女[niə])③，其间掺杂了更浓的性别尊卑观念。中国北部达斡尔语、东部裕固语(甘肃省)、保安语(甘肃省)(均属蒙古语族)的称谓中，哥哥、姐姐、弟弟都有明确区分(妹妹不详)④。西方人这种思想的淡薄广泛表现在印欧语言中，如英语 brother(兄弟)，sister(姐妹)⑤，德语 bruder(兄弟)，schwester(姐妹)，法语 frère(兄弟)，sœur(姐妹)，俄语 брат(兄弟)，сестра(姐妹)，乌尔都语(巴基斯坦国语)[bhāī](兄弟)，[bahin](姐妹)。东西方语言这一分界的背景是"到缅甸为止的东方地区以谦让美德决定精神生活的基调，自印度以西则代之以倔强的

① 如果把禁忌的说法包括进来，分别男女，总共就有 12 类。

② 斯钦朝克图：《生殖器名称与原始宗教图腾崇拜》(以蒙古语为例)，载《民族语文》1999.6。

③ 安英姬：《汉朝语亲属称谓词对比》，载《延边大学学报》1985.2。

④ 仲素纯：《达斡尔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2 年。照那图斯：《东部裕固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1 年。布和等：《保安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2 年。

⑤ 在 brother、sister 前加 elder、younger 的方式实际很少使用。

美德"[1]。在中国，伴随着兄弟的长幼分序，其权利（财产继承权）和义务（"长子如父"等）也因此有别，牛郎在与哥哥分家时只能得到一头牛！

匈牙利民族起源于伏尔加河曲，与现居中国正北方鄂毕河流域（俄罗斯境内，蒙古北部）的伏古尔等族关系最近，是第五世纪中叶到第九世纪西迁到中欧的古老东方民族[2]。其语言至今存在区别年龄、性别的两组词"bátya（兄）、öcs（弟）；néne（姐）、hug（妹）"。有趣的是，1840 年～1842 年开始出现泛称兄弟的新词 fivér，泛称姐妹的词 növér 比它早一年出现，19 世纪初出现了表兄弟姐妹集合的 testvér[3]，反映了观念上的土著化倾向。

英、汉语长、晚辈旁系亲属称谓的细度也有明显差异，比较："uncle——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夫/aunt——伯母、婶母、姨母、姑母、舅母/niece——侄女、甥女/nephew——侄子、外甥/cousin——堂兄弟、堂姊妹、表兄弟、表姊妹"，造成悬殊差异的原因除长幼区分方式不同外，主要因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原是游牧民族，对核心家庭有热烈追求，其他狩猎采集社会也基本如此。美国人把亲属分成三组，第一组是血亲（blood relatives），包括指父、母、兄弟、姐妹、儿、女；第二组亲缘关系稍远些，其中旁系关系更远，包括直系的祖父、祖母、孙子、孙女和旁系的 uncle、aunt、niece、nephew；第三组亲缘关系最远，只有 cousin 一词[4]。uncle、aunt、niece、nephew、cousin 5 个词对应汉语 18 个词！英美人之所以把"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夫"概称作

---

① 堀田善卫（1957），参梅棹忠夫（1967）：《文明の生态史觀》，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88 年。

② 温盖尔·马加什等：《匈牙利史》，中译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年。

③ S. Ullmann：Semantics：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言語と意味），日訳，大修館書店，1969 年。

④ 张盛龙：《从英汉亲属词的语义成分对比看英汉古代亲属制度的差异》，载《广州师院学报》1993.1。

uncle,是因为觉得他们与自己亲疏关系相等。中国有早熟的农业文明,人们朝夕相处在封闭狭窄的土地上,各种亲属关系盘根错节,非常注意其中的细微区别,觉得"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夫"与自己亲疏关系不等。可见,对亲疏关系的判定制约着亲属称谓词分类的细度。朝鲜语以寸数法计算亲属关系辈分和亲疏,集中反映了人们头脑中的这种亲疏观念。朝鲜语同胞关系为二寸,堂表兄弟关系为四寸,所以出现了"四寸哥哥[sats'onhiəŋnim]、五寸姑母[ots'onkomo]、八寸姐姐[p'alts'onənni]"等各种叫法(八寸以内算较近亲属,数字越小关系越近,反之则远)①。

4.阶级观 阶级社会里人们关于尊卑贵贱的阶级观念和社会规约可以在一些礼器上得到物化的反映。《说文》"瓒"条云,礼天子用牷,纯玉也。上公用駹,侯用瓒,伯用埒。段注:郑司农云,駹谓杂色。玄谓全,纯玉也;瓒、将,皆杂名也。尊卑以轻重为差,玉多则重,石多则轻。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玉佩上的尊卑界别,反映了古代礼制的重要特征。阶级区分的需要,对玉种的进一步细分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认知方式 认知方式是人类观察和解释世界的认知模式,它随人类心智的进化而发展,发展方向带有一定程度的选择性。

语言贮藏着抽象活动的成果,反映着人类的集体认知水平。对某些需要较高认知水平的抽象义场,原始语言的分类往往偏粗,进步语言相对较细。医学报告称,忘记事物名称的失语症患者只能认出深红、淡红、深青、淡青等不同颜色,却不能把它们分成红、青两类(参第一章《导言》第四节"几个基本的原则性范畴")。可见颜色词是经验抽象的结果。新几内亚高地的加雷族语只有两个基本颜色词(siŋ,hóló)②。分别相当于汉语的黑和白。其他很多色彩尚未从颜色

---

① 安英姬:《汉朝语亲属称谓词对比》,载《延边大学学报》1985.2。

② R.Burling(1970):Man'Many Voices(言语と文化),日訳,ミネルヴァ書房,1974年。

体现者中离析出来(这是原始低级思维的表征[①]),无通用性,故不是基本颜色词,如 mut 指红土,pianó 指可从中取到绿色染汁的树木。汉语颜色抽离前的痕迹可从汉字字形和古代字书上看出来,如《说文》:黑,火所熏之色/朱,赤心木/黄,地之色也(段注:土色黄,故从田)。菲律宾哈努诺欧人的分色要看物体是湿的、嫩的还是干的,如 ma-latuy(大体上相当于淡绿、黄、茶色)和 ma-rara(相当于红、橙、黄三种颜色之间的混色)的对立,来源于植物水淋淋多汁性和干燥脱水状态的对立[②]。这种独特的颜色分类系统、方式和观念是颜色抽离过程中的有趣一步。颜色从体现者中的抽离是通过与其他同类颜色的广泛类比实现的,新几内亚东北的俾斯麦群岛居民用"kut kut(乌鸦)"描述一切深黑色的对象[③]。

(四)自然环境因素　自然环境因素本质上不属于文化范畴,但可成为文化关注的对象,被引入人类精神的中间世界中,并在语义上反映出来。不但如此,它还常是其他文化特征形成的基础。因此,我们把它作为一项非标准文化因素纳人观察的范围。稀见于日常生活的自然事物,分类偏疏。反之,分类偏细。对气候、地貌、生态等自然事物的处理都体现着这一倾向。马来西亚地处热带,水的冷热区分需要不强,又极少见到自然冰,所以表示冷水、开水、冰只用一个词 ayĕr![④]湿带地区的情形大不相同。汉语普通话分"水(有时又含'开水')、开水、冰",英语分"water(水)、ice(冰)",日语分"みず(开水)、おゆ(冷水)、こおり(冰)"。伽罗语表黑蚁、赤蚁、大蚁、小蚁等细类的

① 参 A.Г.斯皮尔金:《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上的抽象思维的形成》,载《言语思维意志感情及其他》,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56 年。

② N.P.Hickerson(1980):Linguistic Anthropology(言語人類学入門),日訳,大修館書店,1982 年。R.M.Keesing(基辛)(1976):《当代文化人类学》,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年。

③ A.Г.斯皮尔金:《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上的抽象思维的形成》,载《言语思维意志感情及其他》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56 年。

④ 铃木孝夫:《ことばと文化》,岩波書店,1973 年。

词不下 12 个，这是因为该地区蚂蚁的种类和数量很多。

自然环境跟生活的密切关系可加深分类的细化。藏人生活在纵向空间显著的环境中，纵向方位体验细致，语言中相应词特别丰富，明确区分有覆盖面的上、下(如水上、水下)，从整体实物切分出的上、下(如上身、下身)，副词性的向上、向下，还有单独表最上方的词。与现代汉语纵向方位词(单纯词)数量比为 10:2[①]。精细度远远超过汉语。爱斯基摩语雪类词很丰富(如有表"正在下的雪、地上的积雪、用来建爱斯基摩人特有的圆顶房屋的雪、融化的雪"等好几个特殊状态的专义词)，不仅因为居住地多雪，还因为雪与爱斯基摩人生活关系密切。外出狩猎时，坐雪橇行进时，把雪筑成住居时，各种场合都有适宜和不适宜的雪，应变方法各有不同，自然该针对它制订相应不同的名称[②]。

无法从自然环境中体验的词(特别是感觉词)即使有，其本义也往往迷乱和丧失。广州话"冷、冻"相混，表不热温度的分级比北方话简化了。W.P. Lehmann 指出，如把爱斯基摩语带到没有雪的地区去，它那些表雪的词要么消失，要么就会改变意义。可见，自然环境跟生活的疏密关系深刻影响着分类的细度。

综上所述，语义分类细度通常跟文化关注程度、文化特色性程度之间呈正比例关系。外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应提醒学习者充分留意分割细度和文化的这一相关原则，以免在实践中不慎落入陷阱。初学日语的美国人去日本米店买米常叫："御饭下さい(买饭)！"进日本饭店又叫："ビフテキとお米ください(我要牛排和米)！"总不留意米是在生长期或加工过程的哪一阶段，成为日本人笔下的笑料。所

① 邓卫群：《藏汉语词义差异初探》，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2。

② 参 John B. Carroll(ed)(1956)：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言语·思考·実在—B. L. Wharf 論文選集)，日訳，南雲堂，1978 年。

以要学爱斯基摩语，就要比现在更注意雪的各种状态区别，哪种状态的雪用哪个词称说；要理解非洲奴哀鲁人的日常和社会生活，必须先掌握指牛和牛群生活的词汇；对有的语言，则恐怕要把认识大意的植物标本作为学习的第一步！

二、解释限制 文化关注程度与语义分类细度的正比例关系只是一种倾向性原则，并非严格对应的规则。在对分类细度进行文化诠释时，常易出现主观臆测，应留心限制性因素，谨防过火议论。这些限制性因素包括语言任意性本质、语言个性、语义分配的不平衡性、语义文化和现实文化变化速度的差异性、文化作用关系的不透明性和多重性。

（一）语言任意性本质 词本身携带着对对象世界作任意分类的结构。在一般情况下，分类细度是以相关原则和任意性本质的混合作用形式表现出来的，前者起主导作用，所以我们能看到文化对细度产生影响的总体倾向。但是，文化作用的前提一旦消失，任意性本质就清楚地显现了出来。以上肢分割为例。英语区分 hand 和 arm，汉语亦同样区分出"手、臂"。但北美帕帕果语（在美国西南，与墨西哥交界处）[①] 用 nowi、藏语用[lak12pa54]一词来指说整个上肢，而不予以细分。很难从文化关注上说明它们的差异。即使排除文化关注因素，对现实基底相同事物的分类细度也可能有差异。

语义借用时因把握的重心与外语不同，对外来词的语义改造引起的细度差异也是如此。英语自行车扶手叫 handlebar，handle 的本义是"抓、拿、握"，handlebar 进入日语时，缩成了ハンドル(handle)，这样ハンドル就获得了"把握交通工具之舵的东西"的意义，于是它理所当然也适用于汽车方向盘(steering wheel)。英语的两个词语借入日语后变成了一个词，这种二对一的关系很难用文化关注的差异

① N. P. Hickerson(1980)：Linguistic Anthropology(言語人類学入門)，日訳，大修館書店，1982 年。

来解释。英语的 steering wheel 是着眼于它的形状命名的。大概日本在语义借入上更重视功能,比如汉语把英语 watch、clock 分别译成"表、钟",日语借入时只用一个泛义词"時計"。从这些细度差异中找不出对事物关注程度或现实基底的差异。

任意性是与理据性(motivated)对立共存的语言本质之一,语言表达本身允许有足够的选择性,语言选择不同焦点或角度对同样的对象进行观察和表述是不足为怪的,并非一定要有文化的深层原因。

(二)语言个性 与语言任意性有密切关系的语言个性是对分类细度进行文化诠释的一个限制性因素。一般以为文化上重要的东西常用单纯词形式[①]表现出来,即使是复合词也不选用,比较英语单纯词 cow(母牛)、bull(雄牛)、beef(牛肉)和日语复合词"雌牛、雄牛、牛肉",就可以透现出农耕渔捞经济下的日本民族对牛的关注程度不及原为游牧民族的盎格鲁·撒克逊人[②]。其次,一般以为词和短语表达式相比,前者反映出来的文化意要性要大于后者。

平心而论,结构松散的复合词和短语等分析性表达的表现浓度,通常确实不及单纯词或词。首先,前者常需注意或频繁感觉各种状态的区分(如英语 falling snow, snow on the ground, slushy snow 等),后者的特征区分埋藏较深(如爱斯基摩语表雪的词,都无语源关系而分别存在),不必经常注意或感觉它们的具体一面。在同一种语言里,后者比前者更为基本,汉语最基本的词(又叫"根词")都是单音节词,如"山、河、火、水"之类。

其次,短语和结构松散的复合词常用来构成表达新事物或新概念的新词,经频繁使用,发生语义凝聚,词形缩短形成为词或单纯词。萨丕尔谈到语言与环境时说,在 Essex 和 East Saxon, Norfork 和

① 它们往往是基本词汇的根词。日本学者森岡健二(1977)说,这些词常在命名和分类层次上,属于对事物的第一次命名。参第一节"民俗分类"。

② 中野道雄:《発想と表現の比較》,載国廣哲彌編:《日英語比較講座》(第四卷):発想と表現》,大修館書店,1982 年。

North Folk, Sutton 和 South Town 之间，前种说法都是后种说法长期使用的反映。不仅固有名词，所有的词都可以这样看[①]。Zipf (1935)也说，词的频繁使用将导致词形缩短，如 automobile 变成了 auto 或 car[②]。在俄语里，广泛用于日常生活或带明显口语色彩的短语同样出现了语义凝聚的现象，如短语 интимная обстановка（暧昧关系）简缩成了 интим 一词。相反，以两词合成法（不能拆开）表新事物或新概念的现象屡见不鲜，如俄语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铁路）、стиральная машина（洗衣机）等；又如操英语的滑雪爱好者常用的 powdery snow（粉末雪状）、spring snow（春雪）、fine snow（细雪）、dry snow（干雪）、soft snow（软雪）等。人们一开始不设法寻求简单的表达形式，而是先创造出结构比较复杂的新词新语，然后加以简化，因为通过较详细的描述，容易认识和理解所表达的新事物。这是众多语言的普遍现象。

因此，认为单纯词或词的文化关注程度深于结构松散的复合词和短语，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不能一概而论，从两方面看：

1. 根据形态学分类，语言有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粘着语(agglutinative language)、屈折语(inflected language)和多式综合语(incorporating language)四种[③]。孤立语如汉语，绝大多数词里只有词根；粘着语如土耳其语，词根和词缀都有很大的独立性；屈折语如印欧语系诸语言，词根和词缀结合得很紧；多式综合语如美洲的多种印第安语，分不出词和句子。应该说，以词的密切程度为衡量标准的语义分类细度在不同类型的语言里，尽管本质的原理一致，但在衡量标准和理论表述上应针对不同形态类型的语言作具体不同的修正。

只能用一般复合词区分的事物，在文化中并非都不重要。应把

① 参 John B. Carroll(ed.)(1965):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言語·思考·実在——B. L. Wharf 論文選集)，日訳，南雲堂，1978 年。

② 参 E. Rosch: Linguistics Relativity. in Thinking, ed. by P. N. Johnson-Laird & P. C. Wa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③ 高名凯等：《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63 年。

某些语言(如英语)里作为非词汇主体的、以短横连接且关系松散的复合词(如英语 seal-calf〈幼龄海豹〉)同某些语言(如汉语)里作为词汇主体的复合词(汉语词以双音节合成词占优势,复合词则是其核心部分)区别开来。以汉语单纯词之少和复合词之多推论中国人对事物的关心之肤浅,显然是无知的可笑的。在汉语"酒"这个近乎无限开放的义场体系中,除个别音译的洋酒名[①]外,差不多都是复合词:【按材料分】〈制作材料〉粮食酒(米酒、高粱酒…[②])、果酒(葡萄酒…)…|〈浸制材料〉蛇酒、虎骨酒、桂花酒、人参酒…|〈配置材料〉雄黄酒…/【按功用分】药酒、料酒、贡酒、加饭酒…/【按声誉分】名酒…/【按出产地分】茅台酒、汾酒…/【按颜色分】白酒、黄酒…/【按用酒场合分】喜酒…/【按制酒工艺分】窖酒、封缸酒…/【按配酒工艺分】鸡尾酒…/【按品味分】甜酒、苦酒、烧酒、美酒…/【按生成物分】汽酒…/【按喝的方式分】交杯酒…/【按存放时间分】陈酒…/【按贮放地分】花雕酒…/【按酒精浓度分】高度酒、低度酒…等。无视汉语酒类词的丰富程度,仅从构词角度来判定中国人不关心酒,是站不住脚的。很明显,应该结合语言本身的特质看待分类细度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文化问题。

2. 一些语言(如法语)有时偏好分析性表达,不少短语固定得像一个词,马尔丁内取名叫自律连辞,如法语 chemin de fer(铁道),chambre à coucher(寝室),相应的德语形式 Eisenbahn, Schlafzimmer 均是单个的词[③]。从词和短语的差异判定法国人对"铁道、食堂、寝室"的关注程度不如德国人,显然是错误的。在谈论分类细度跟文化关注的关系时,不能不考虑语言本身的结构。

值得一提的是,参与分类的词和词义必须限制在同一共时平面

---

① 如啤酒、香槟酒、威士忌、伏特加、白兰地等。

② 为使文字紧凑,在比较、列举的句式中,省略号用三个点,下同。

③ Helmut Gipper(1978):prachwissenschaftliche Grundbegriffe undForschungsrichtungen(言語学の基礎概念と研究动向),日訳,三修社,1986 年。

的同一种语体范围之内，而且主要应该是口语词。文字化起了记录和文献永久保存的功能，具有语言凝结的负面因素，词典里的很多词早已成了死去的僵尸。同时，文学化不可避免地夹带进作家从专业出发的细腻观察成果，而这并不一定符合整个语言集体的一般观察方式。无文字记录的语言或文学不发达的语言，不能与这样的语言作超语体或跨时代的比较，否则将失去平等作业的基础。

《汉语大词典》所收汉语反映雪的各形态的文学词汇十分丰富，意义除了分配到对“各种形态的雪”的命名形式中（词的结构为“X雪”），还分配到对“雪的各种形态”以及“与雪相关的事物”的区别形式中（词的结构为“雪 X”），说明汉语对雪的文学表达方式的词汇积累远远超过爱斯基摩语对雪的分类词汇，但它们大多不是口头习见的词汇，只适合书而文学的专业趣味，并不反映日常交际的需要，很多在产生不久便成为死词，缺乏全民性和稳固性，不能列入语言间分类细度比较观察的范围（详表见次页）。

某些婉曲（euphemism）形成的细度差异与文化关注程度常常并无直接关系，而源于“直说不雅”的心态。北京话[①] 分“吃（+固体）、喝（+液体）、吸（+气体）”，吴方言只说“吃”，并不意味着北京人比吴语区人更讲究吃。这种细度差异不是因现实基底或关注程度不同，而是由委婉需要和语言自身引起的。通州金沙话（属北部吴语）对固态食物的吃有不少委婉式（括号内是普通式），如：剥瓜子（吃瓜子）/嚼甘蔗（吃甘蔗）/吮螺儿（吃螺蛳〈剪去尾部的带壳螺蛳〉）/核（即啃）萝卜、咬萝卜（吃萝卜）。邀请可以用委婉式，拒绝必须用普通式，比较邀请：弄点瓜子剥剥！/弄点瓜子吃吃！拒绝：不哈（给）你吃！（但：* 不哈〈给〉你剥！[②]）北京话的“喝、吸”最初正是以这种委婉式身份出现的，经常使用便合法瓜分了“吃”原有的部分意义范围。至今仍残留着瓜分前的痕迹，如母乳是液体，却可以说“吃奶、吸奶”，不

---

① 北京话是一种方言，普通话或国语是汉民族的共同语。

② 句前标“ * ”表非法语句，下同。

《汉语大词典》中的雪类词

各种形态的雪 暴风雪(大而急的雪)/积雪(堆积起来的雪,积久下雪)/粒雪(又名米雪)/初雪(入冬后下的第一次雪)/瑞雪(应时的好雪)。

雪的各种形态 雪片(雪花)/雪水(雪融化成的雪)/雪粉(细雪)/雪烟(积雪扬起而形成的迷雾)/雪海(广阔深厚的积雪)/雪浪(扬起的积雪)/雪崩(高山上大量的雪块突然崩落的现象)/雪彩(雪花,雪被阳光或月光照射后反射出来的光)/雪粒(雪珠儿)/雪霁(雪花纷飞)/雪絮(雪)/雪幕(飘雪迷漫如幕障)/雪暗(大雪迷漫)/雪阵(阵雪)/雪色(雪将下时的景象)/雪朵(树枝上的积雪,因似花朵故称)/雪暴(大量积雪或降雪随强风飞舞空中而降落后常常淹没道路等的自然现象)/雪影(雪的残迹,雪夜模糊的景物)/雪隐(积雪消融)/雪释(雪化尽)/雪点(细雪飘落)/雪涛(连绵起伏的深厚积雪)/雪花(空中飘下的雪,形状像花)/雪光(雪被其他亮光照射后反射出来的亮光)/雪气(积雪散发出来的寒气)/雪溜(雪融化时的滴水)。

与雪相关的事物 雪山(积雪的山,用雪堆成的山状物)/雪坑,雪地中的洼陷处)/雪枝(粘结着雪的树枝)/雪岫(积雪的峰峦)/雪洞(被雪封住的山洞)/雪原(积雪的原野)/雪峰(积雪的山峰)/雪浦(积雪的水边)/雪野(积雪的原野)/雪帽(比喻积雪的山顶)/雪窖(积雪覆盖下的地窖)/雪窗(映雪的窗户)/雪脊(积雪覆盖的山脊)/雪溪(雪覆盖着的溪流)/雪窝(积雪的洞穴)/雪涧(积雪的山涧)/雪岭(积雪的山岭)/雪庐(被大雪封盖的房舍)/雪垄(积雪的田埂)/雪岩(积雪的山岩)/雪瓴(积雪的瓦沟)/雪屋(大雪封门的房屋,积雪之屋,雪光映照的屋子)/雪珠(霰)/雪痂(雪冻成的硬壳)/雪泥(雪后泥路)/雪风(夹带着雪的风)/雪客(雪中来客)/雪眼(将下雪时,有阳光从云缝中穿透,这种穿透阳光的云隙叫雪眼)/雪叶(覆盖在叶子上的雪)/雪朝(下雪天)/雪云(降雪的阴云)/雪晴(雪止天晴)/雪景(下雪时或雪后的自然景色)/雪貌(即将下雪的状态)/雪照(用雪的反光来照明)/雪意(将欲下雪的景象)/雪线(终年积雪区域的界线)/雪履(在雪地行走所穿的鞋子)/雪兴(雪景引起的兴致,雪夜访友的兴致)/雪灯(雪夜灯火,用雪制作的灯)。

能说：* 喝奶。风属气态，可以说"喝西北风、吃西北风"，但不能说：* 吸西北风。

日语把妻子叫つま(妻)，把一般女性叫おんな。英语分别叫 wife 和 women。但德语不管妻子还是一般女性都叫 Frau，法语也一律叫 femme，葡萄牙语叫 mulber. 从这样的语言事实出发，说德、法、葡三国人不重视妻子和一般女性的现实分别就未免过火了。德、法、葡语正如汉语用"女人"指妻子一样，用的是提喻法(synecdoche)婉称，不反映对事物区别的忽略。

(三)语义分配的不平衡性 语义分配不可避免要出现总体运筹和局部分配的不平衡性，不能以分类细度的局部疏密，判断出总体的文化特质。比如，法语、德语、广东横县平话都关注人与动物或兽类的区别。只不过，法语选择"口、脚"，德语选择进食活动，广东横县平话选择走态来表达。请比较：

		人	动物或兽类
法语	口	la bouche	la gueule
	脚	la jambe	la patte
德语	吃	essen	fressen
	喝	trinken	saufen
广东横县平话	跑	走	跑(如"牛跑")①

于是语言间在这些项目上的细度差异出现了。普通话对之更是无所区分，人和动物的口、脚可以用同一种叫法，"吃、喝、跑"既适用于人，又适用于动物或兽类，其分类之粗疏是显见的。但由此得出汉人总体说来无视人与动物或兽类的区别，那就错了。普通话通过食物、体格等别的项目，同样表现了对人与动物区别的关注，如：

	人	动物
食物	饭	食儿
体格	胖	肥

① 闭克朝：《广东横县平话词汇》，载《方言》1994.2。

可见，局部项目上分类细度情况有时并不像预想的那样反映语言的总体文化特征。

另一种是聚合关系（paradigmatic）和组合关系（syntagmatic）上的不平衡。分割细度往往只针对词的聚合关系的语义场（如有人说，其中“名词或名词性词组的情形最为常见”）[①]，不大考虑组合关系的语义场，因而所反映的文化性并不全面。聚合语义场与组合语义场反映的文化内容有时可能出现反差。从聚合关系看，汉语“帽子”的下位词（hyponym）（“草帽、礼帽、风帽、乌纱帽、鸭舌帽、瓜皮帽、柳条帽、睡帽、便帽、高帽儿、箬帽、缨帽、小帽、呢帽”等）比“袜子”的下位词（hyponym）（“尼龙袜”等）多，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统计[②]，复合的帽类下位词与袜类下位词之比为 14∶0！可见中国人对帽子的关注程度高于袜子。但从组合关系看，中国人又似乎更看重袜子。汉语以动词区别穿戴物是主件还是附件，比较动词：“穿”（+〈上身衣服、下身裤裙、足部鞋袜〉）～“戴”（+〈头部帽子、胸部校徽、臂部袖章、腕部手表、颈部项链、指部戒指〉）。“穿”把袜子归作跟衣裤同等的主件，“戴”把帽子归作与袖章相类的附件。单考虑聚合层而上表现出来的文化关注，无视组合层面上的表现，是没有根据的。

还有一个是词汇方式和义项方式的不平衡。单义词和多义词虽都是一个词，但文化容量不同。如果单考虑词的数量，忽略义项因素，显然不能准确反映分类细度的本相。美语 mother 有多达 10 来个义项，如有：(1)生了自己的 mother；(2)只给了遗传因子的 mother；(3)抚养了自己的 mother；(4)身为父亲妻子的 mother；(5)关系跟自己最近的女性长辈 mother；(6)生了自己还未结婚的 mother，等等。如果因 mother 各义在美语词形上不予细分，就说美国人的家庭生活单纯或对错综关系毫不介意，这就错了，现在不少美国人已经感

①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1990 年。

② 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倒序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7 年。

觉到 mother 称呼的混乱了[1]。

(四)语义文化和现实文化变化速度的差异　世界比语言变化快,现代语言的意义构造不一定直接反映现代人的文化关注,语言有着保守的一面。文化关注是流行性的,能在短时期内起变化。语言作为社会习惯,不会这么容易起变化,在速度上无论如何也比文化变化慢。虽然科学已发展到如此现代化地步,但现代语言仍残留着未开化的原始初民对事物的芜杂分类。生物学告诉我们“鲸”不是“鱼”,但语言的俗分类(folk classification)仍将它归入鱼类,汉语叫“鲸鱼”,德语叫 walfisch[wal(鲸)+fisch(鱼)]。科学告诉我们天没有边,但我们还在说“天边”。“神仙、灵魂”仍可挂在无神论者的嘴边。“马齿苋”的实际功用在现代农村已同“杂草”,但鉴于有过食用的历史(特别是在困难时期),有些地方的语言中至今仍归入“菜”类,如江苏泰县话叫“妈妈儿菜”。《现代汉语词典》说“有些地方叫‘麻绳菜’”。我们使用词语时常有一种错觉,好像词所指事物尚未发生变化或不在变化似的。古今服饰变化很大,但吟诵“游子身上衣”时,从不想那是怎样的衣服。判定分类细度跟文化的关系不但要克服这种错觉,还要注意语义文化和现实文化的时代差。

(五)文化作用关系的不透明性　分类细度跟文化的关系并不总是透明的,从有些语言情况中,只能得出似是而非的推测。分析时很容易出现主观臆测,应努力加以避免。以借贷关系的语义场为例,日语主要由かす(借出、租出)、かりる(借入、租入)构成,汉语有“借(借入、借出)、租(租入、租出)”两个词构成,英语由 lend(借出),borrow(借入),rent(租,含租出和租入)三个词构成,英语同类词还有表及物对象细化的 hire(雇用、租用)、loan(借出、贷)、let(出租〈房屋、土地〉)、

① George Lakoff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認知意味論——言語から見た人間の心),日訳,紀伊国屋書店,1993年。

use[①]。从语义分别中可以看出，日语侧重于人出的区别，汉语看重有无金钱代价的区别，英语既看重金钱代价的有无，又看重人出的区别。这是否反映日、中、英人民传统私有观念和商品意识的强弱差异以及日本人在金钱关系上小心翼翼的婉曲表达？因实证材料不足和文化作用的不透明，对这一推测既不能肯定，也无法否定。

(六)文化作用关系的多重性　影响语义分类细度的文化因素，有时不是一个，而是相互间常有着内在联系的几个。这就为文化诠释的片面性提供了土壤，要非常留意。R. Burling 认为，"颜色词汇出现的顺序，跟文化及科学技术的复杂性之间有密切联系。只有两个基本颜色词的民族(如新几内亚的加雷族)技术也非常简单。有着 11 个颜色词(如欧洲和东亚的语言[②])的民族，却有着很长的历史、复杂的文化和发达的技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三个颜色词的尼日利亚(Nigeria)的提乌(Tiv)族、四个颜色词的菲律宾哈努诺欧族、五个颜色词的爱斯基摩人。具有某种程度复杂技术的非洲一些种族是六个颜色词，印度南部的马拉亚兰(Malayalam)语或缅甸语，有七个颜色词"[③]。科学技术水平对颜色分类细度的作用充其量是间接或外在的，集体认知水平则是其直接内在的要因。两种文化因素之间不是有你无我的关系，它们的联系和协同作用是自明的。无视文化作用的多重性，将会造成结论的绝对化，从而招致批评和责难。比如 N. P. Hickerson 就认为，"对沃垒贡(Oregon，在美国西北部)州的松基修、乔克特、落谷力巴、三第安木四个生活地极为邻近的部落的调查发现，它们语言的色彩词汇差异非常之大。这说明颜色体系词数量

① 東信行：《語義の的比較》，载国廣哲彌编《日英語比較講座(第三卷)：意味と語彙》，大修館書店，1982 年。

② 李未清主编：《俄汉图解词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列举了 11 种颜色，汉语都有对应词。W. A. Foley 说，英语有 11 个颜色词，参 W. A. Foley：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7.

③ R. Burling(1970)：Man's Many Voices(言語と文化)，日訳，ミネルウァ書房，1974 年。

的多少，与这一文化的技术复杂程度、周围环境的色彩、色彩的美术利用等不能说有什么关联"①。但这一结论也是轻率和片面的，它显然忽略了同一地域的文化多样性、影响分类细度的其他文化因素(如集体认知水平)以及语言任意性本质。这一现象只能说明，从同一技术水平和居住地域不能必然导出两种语言语义分类细度的绝对同一。

根据上述分析可见，相关原则只是倾向性的，并非严格对应的规则。在解释分类细度跟文化及其关注焦点的关系时，要谨防过火议论和随意诠释的危险。当分类只有专义词而无泛义词时，总有人认为是民族缺乏抽象能力的表现。这种主张可以很轻易地被反例所推翻，如伽罗语用丰富发达的专义词指说筐篮、蚂蚁、搬运等，却没有一个泛义词；而另一方面，英语的 speak、say、talk 三个词表示的意思，伽罗语用 agan-一个词就可以表达清楚。由颜色分类粗疏得出民族色盲的结论同样也是荒诞可笑的。上世纪有人根据对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等中色彩用语的调查，提出古希腊人可能是色盲。在操英语的人看来，"青(blue，含蓝色)、绿(green)"差别很大，西欧语言一般分得很清楚，各用一个词单独指说。但很多美洲印第安语把它们混同起来。汉语也有同样情况，如：青草＝绿草(green grass)/青天＝蓝天(blue sky)/青布＝黑布(black cloth)/青马＝灰白色马(gray horses)。又如日语：青い草木＝绿の草木。一直有人可笑地主张，非西欧人(如中国人、日本人、印第安人)都患有青绿色盲症②。以前学者发现某民族称母亲的姐妹也是称母亲，便大为吃惊，想当然以为这样的社会不能识别自己本来的母亲和相同称谓的别的女性。这种观点同样可笑。解释限制性和文化作用的有限性可以提醒我们在文化诠释时

① N.P. Hickerson(1980)：Linguistic Anthropology(言語人類学入門)，日訳，大修館書店，1982 年。

② 池上嘉彦：《意味の世界——現代言語学から視る》，NHKブックス，1978 年。

避免随意性和过分夸大，但若因这些限制性方面而对相关原则持全面否定的态度，则将走向严重的极端，因为相关原则毕竟是语义和文化关系的总体倾向。

第三节 分类角度

分类层次、分类细度还不反映分类的全部。不同文化或语言在分类时所选择的角度也常常不同。卡洛尔和卡萨格兰德(1958)对那法霍(Navaho)族人的孩子和美国人的孩子作了一个实验。让他们给涂着青、黄等纯色的积木、绳子、细棒分类。结果，美国人的孩子以它们的颜色来分类，而那法霍族人的孩子却以积木、绳子、细棒的长度为基准进行分类。这是那法霍的语言中，作用于长物体的动词和作用于短物体的动词不同引起的[①]。动词和形容词的分类角度，可结合第六章观念的有关内容，从它们本身的形态和相关变元来分析。如"打"和"踢"，它们都是受事变元和方向变元兼职[②] 的动词，比较："打狗、踢猫"，"狗、猫"在这里既是受事变元，又是方向变元。这两个动词的不同之处在于工具变元的不同，前者是"手"，后者是"脚"，其次在于动作形态的不同，前者是手向前下方冲出，或借助第二工具，后者是脚向前上方弹起，无第二工具。下面以名词和量词的情况为例作些分析。

一、名词的分类角度 名词有设定功能，如设定群("家庭")、类("禽")、积聚("沙")、整体的部分("面颊")、缺少实体("洞")、空间("顶")、时间("早餐")[③]。针对名词的这一功能，我们把名称所指事物进行解体、填空、移位、变形等变化假设，看假设后的事物能不能再

① 藤永保：《思考心理学》，大日本图書株式会社，1976年。

② 参马清华：《句子的语义结构》，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4。

③ S. Ullmann（乌尔曼）：《语义学最近进展》，载岑麒祥：《国外语言学论文选译》，语文出版社，1992年。

用原名来称说,这是名词的外延分析法(或解析法)。根据这种方法可以把名词分成形体词和物质词,或者有羡词和无羡词等。不同类型对物体所作分类都呈现不同的方式和本质。

(一)形体词和物质词 形体词指的是在空间性变化假设(如被完全肢解或破碎,而不是缺损)下,残体或局部不能用原名来称说的事物名称。"灯泡"打碎后,各玻璃碎片尽管可以唤起我们对灯泡的回忆,但它已经只能叫"玻璃"这种物质,不能再叫这种物质的形"灯泡"[①]。所以"灯泡"是形体词。凡指说家具、衣服鞋帽、器皿、人与动植物、交通工具、建筑、山河湖海等等,以及它们各项细类(如"桌子、衣服、篮子、火车"等)或个体(如"王小二、阿尔卑斯山"等)的名词,都属形体词。语法学中的个体名词基本都是可用解析法分析的形体词。

物质词指的是没有特定边界的均质连续体,所以它在空间性变化假设(如被完全肢解)下,各残体或局部仍能用原名来称说。水蓄在桶里,叫"水",如果泼了一桌,桌上的每一滴也还叫"水"。凡指说液态、气态、固态或粉状物质(如酒、牙膏、空气、烟、铁、淀粉)的物体词,都属于物质词。许多用形体词指说的物体(尤其是禽类、水介)在变成食物后,常常转移到物质词的名下。比如:"鸡"指一种家禽时,其被称说的形体本来是完整的,但当它被烹制成食物以后,每一块肉都可以叫"鸡"了。如果前者用"$鸡_1$"表示,后者用"$鸡_2$"表示,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量词变化:一只鸡被惊飞了——→来来来,吃一块鸡。

形体词常常拥有一批指称各部位的词,与之构成整体—部分关系。比如,"衣服"可以解析为"衣领、衣襟、衣袖、衣袋、纽扣"等若干部位词,物质词则不能解析出这样的部位词。

沃尔夫在他的论文《习惯思考及行为与语言的关系》[②] 中把英

① 言语中的换喻说法除外。

② B. L. Whorf: The Relation of Habitual Thought and Behavior to Language, 载《文化人類学と言語学》,日訳,弘文堂,1970 年。

语跟河皮语的称说方式作了一个比较。在英语中,物质名词和个体名词有着形态上的下位区分。个体名词所指物理对象有一定轮廓,物质名词则表示没有边界的均质连续体。在语言形式上,物质名词没有复数形式,在英语里冠词失落,在法语里带 du、de、la、des 等冠词。自然界现象中轮廓不定的事物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多。"黄油、肉、布、铁、玻璃"这些材料词虽不表示形,但都表现带有一定轮廓、大小形状各种各样的事物。因此语言常常不可避免要携带有形和无形的区别类型,英语等许多语言里都被强制打上了这种烙印。它们还进一步用别的语言手段将物质名词个体化,如,根据表示物体形体的名称来实现:stick of wood(～根木头)、piece of cloth(～块布)、pane of glass(～块玻璃)、cake of soap(～块肥皂)。一般还可用容器名称来表现,如:glass of water(～杯水)、cup of coffee(～杯咖啡)、dish of food(～碟食物)、bag of flour(～袋面粉)、bottle of beer(～瓶啤酒)。前一种情况表示材质,跟后一种的容器表现形式相对。从英语模式来说,无形事物若要作有形区分,非得取用这种二项式名称不行。

英语等许多语言中所存在的概念有形和无形的二元对立,在印第安河皮语中却是没有必要的。河皮语没有像汉语这样用容器称说物质名词所指事物数量的说法,也没有分析性地称说物质名词所指事物形状的说法,而是采用专门的名词进行指谓。比如容器中的水(如"一杯水"的水)是一种说法,"水坑"中的水又用另一个专门的名词。其他如"一盆玉米粉、成块的肉"这样的分析性说法都没有,也是各有专门的名词。河皮语专注于物质概念在具体场合表现出来的临时形状,英语等许多语言则采用分析性言语表达法化解了物质事物的临时形状。

(二)有羡词和无羡词 有羡词指的是它名下的事物在核心部分以外,还带有恒常的附件,指说核心部分的名称,也能用来指说核心与附件的总和。比如,

牙膏——《现》:刷牙时用的膏状物,用甘油、牙粉、白胶粉、水、糖精、

淀粉等制成，（核心部分）装在金属或塑料的软管里。（恒常附件）

《中》：刷牙时所用之软膏状物，主要原料为普通牙粉及肥皂粉、甘油及糖水等。（核心部分）

比较这两种诠释可以看到，包装软管是牙膏的恒常附件，并且有资格进入词的意义范围。再如“蚕豆”。作为植物子实时，叫“蚕豆”；带着豆荚，还叫“蚕豆”；连带在豆秸上，还是叫“蚕豆”。但是反过来，剥去子实以后的豆荚皮或豆秸，就不能再叫“蚕豆”了。可见，子实是“蚕豆”的所指核心，豆荚皮或豆秸只是恒常附件或所指羡余。有羡词大多集中于指说农作物、瓜果、蛋类、日用品等（如“玉米、西瓜、鸡蛋、杯子”等）的物体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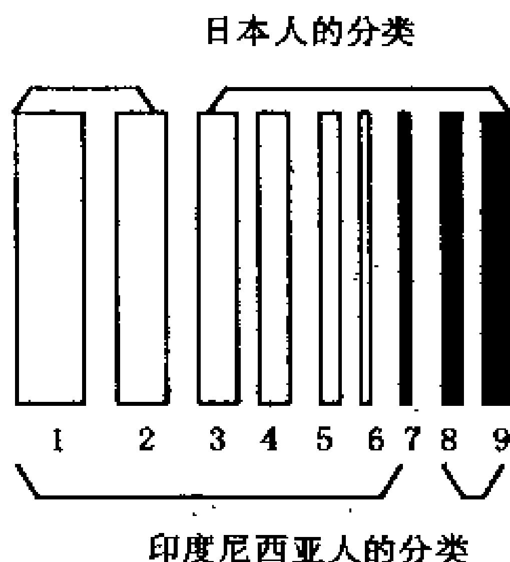
广义的有羡词还包括生长过程中的每一阶段跟着目的物连带称说的过程词，它能经受时间性变化假设的考验。以“花生”为例。它入土后长出的幼苗，叫“花生”；开花阶段还叫“花生”；长出果实后，仍然叫“花生”。果实长成以前的各个阶段都是连带所指，果实才是“花生”的核心所指，是目的物，当获取目的物后，剩余物就不能再称其名了，只能叫“花生秸”。农作物中，以块根为目的物的“萝卜、番薯、土豆”等，以根、茎、叶为目的物的“蒜、葱”等，以茎、叶为目的物的“菜”等，以花为目的物的“菊花、葵花”等，以子实为目的物的“芝麻、黄豆、高粱”等，以粗大茎干为目的物的“树”等，都是过程词。这种词就是两千多年前荀子所注意到的“异状同所之名”。荀子曰：“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无别谓之一实。”是指一物之形虽有变化，但仍为同一个体，如蝌蚪之变为青蛙，蚕之变为蛾，秧之变为禾。又如幼儿之成为少年，青年之成为壮年，壮年之成为老人，其外形上都有或多或少之变化，其实是同一个体。《墨辩》曰：“不连属，不体也，不同所，不合也，不有同，不类也。”同所即同体。他们都未能对这类名称作进一步分析。过程词多集中于植物词一类。

> 汉武游上林，见一好树，问东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阴使人诏其树。后数岁，问东方朔，朔曰："名为'瞿所'"。帝曰："朔欺人矣，名与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为马，小为驹；长为鸡，小为雏；大为牛，小为犊；人生为儿，长为老。且昔为'善哉'，今为'瞿所'，长少死生，万物成败，是有定哉？"帝乃大笑。（明·冯梦龙撰《古今谭概》）

跟有羡词相对的，是无羡词。比如"米"，它是稻子去壳后的子实，稻壳不能成为它的恒常附件，带上稻壳就不是米，而成"稻"了。所以"米"是无羡词。物质词和大多数形体词都是无羡词。

外延分析法主要适用于物体词的形态分析，而不能有效地分析其功能。有些词主要是从外形或内质等形态角度着眼的，如"尾巴"。有些词则同时注重其功能，如"桌子"，它是人用来在上面做事的；"凳子"则是坐具。

二、量词的分类角度 对量词丰富的语言来说，量词是集中表现事物分类的一种词类（参第六章《观念》第二节"实现方式"）。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的量词都根据所数物体的形状不同来分类。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呢？日语对有一定宽度的纸、板，量词用"枚"；对线、铅笔等细长物体，量词用"本"；对粗的、有体积的物体，量词用"個"。但是，印度尼西亚语中，对"板"那样有一定厚度的物体，量词用 keping，搭配对象如 pecahan kaca（玻璃碎片）、tanah（地）、papan（薄木板）等；对薄的、细柔的物体，量词用 helai，搭配对象如 kertas（纸）、daun（叶子）、rambut（头发）等；对木板、铅笔那样细硬的物体，量词用 batang，搭配对象如 sungai（河）、pohon（树）、rokok（烟）、put（草）、sabun（肥皂）等；对瓶子、管子、花瓶等中间有洞的物体，量词用 buah。在这种差异背景下，安田あや子（1966）作了个实验，准备九个刺激材料，由白色薄长方形卡片逐渐减细，然后弄圆逐渐加粗，如下图：



让日本学生和印度尼西亚学生来根据提供的材料分类，结果大不一样，如上图。这是因为日语对有一定宽度的用量词“枚”，对细长的用量词“本”，印度尼西亚语对薄的、细柔的物体用量词 helai，对细硬的物体用量词 batang。这说明不同语言潜意识中对事物的分类样式是不同的①。

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量词分类体系也常有很大差别。普通话对颗粒状果实（如花生）可以不再分带壳的还是不带壳的，都用“颗”来计数，也可以独独把不带壳的计为“粒”，带壳的除通式“颗”外，没有专门量词。通州金沙话分类时平等对待，带壳的用“谷”，不带壳的用“粒”计数，没有通式。漳州话带壳的也有专门量词“夹”②。

① 藤永保：《思考心理学》，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1976 年。

② 林宝卿：《漳州方言词汇》，载《方言》1992.4。

第四节 分类单位

义类和概念是两个分类单位，下面逐一分析说明。

一、义类 义类是词义体系的领域分类。近代西方最有影响并且流传最广的是 1852 年出版的 Roget's Thesaurus。P. M. Roget19 岁获得医学博士学位，24 岁任曼彻斯特医院的医师。后移居伦敦，演讲著述，设立伦敦大学，担任皇家科学协会干事等。1840 年退休后，热心于发明计算机、精巧衡器、袖珍棋盘等。1849 年 70 岁，任教于曼彻斯特医科学校期间，着手对自己使用的词汇集进行体系化整理，于是有了这本词汇分类的著作，当时叫做 Thesaurus of English Words and Phrases, classified and arranged so as to facillitate the Expreeion of Ideas and assist in Literary Composition(服务于写作和概念表达的英语词语分类、配置词典)[①]。这就是通常所说的 Roget's Thesaurus(罗杰类典)。Thesaurus 字面意义上是宝典、宝库，实际上是对众多同义词的体系整理和分类词典。Roget 把词汇首先分成 6 个领域：抽象关系、空间、物质、智力、意志、感情。每个领域又穷尽地细分成次类，共产生出 1000 个语义范畴。接着把词群罗列在每个标题下，并且分出主要的词类。罗杰类典影响很大，实践证明，对职业写作、翻译、语言游戏是一个有用的助手[②]。

谁是义类词典最早的编写者？S. Ullmann(乌尔曼)1957 年在为其著作《语义学原理》第 2 版所作的补遗中说："100 年前，霍力格和华尔特堡计划的概念体系，是同类中最早的一个。"对此，日本分类学家吉田政幸公正指出，像 Roget 编纂的这种类典，最早当推中国秦汉

① 吉田政幸：《分類学からの出発》，中央公論社，1993 年。

② David Crystal: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之间编成的《尔雅》[①]!

《尔雅》分"诂(古言)、言(方言)、训(叠音词和连绵词等)、亲(亲属)、宫(宫室)、器(器物)、乐(音乐和乐器)、天(天文)、地(地理)、丘(自然高地)、山(山岳)、水(水文)、草(草本植物)、木(木本植物)、虫(无脊椎动物)、鱼(水生脊椎动物)、鸟(飞禽)、兽(野生哺乳动物)、畜(饲养动物)"19类,前3类是一般语词,后16类是特殊语词。许多方言词典也常根据义类编排。在义类组织中,常常各有各的编排法,比如华尔特堡把整个体系分为三大领域:宇宙、人、人和宇宙。其中每一个都带有许多大类和小类,认为不可能按合理的次序进行排列[②]。这又与上面两种分法不同。日本语言学者林大在该国《言语生活》杂志上著文提出,可以建立一套为多数人所接受的一般性义类大纲。文化除代表世界文化公分母的普遍性文化外,还有选择性文化和特殊性文化,所以要制订一个合乎世界所有语言的义类细目是不切实际的,比如,没有蝉的地方,分不清蝉和蚱蜢。但制订一个普遍的基本义类骨架是可能的。到现在为止,仍没有一套大纲能说自己已经达到了这一目标,不过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日语教育基本词汇表》根据聚合和组合并重的矩阵原理对日语词汇所作的体系化、系列化整理[③],使我们看到制订一个科学的义类大纲的希望。此表的贡献不在它所列词汇,而在它拟订的义类大纲。它横向方面把所有词汇分成"事物、运动、属性、其他"共四种,这四大词类是任何语言普遍的主要词汇类别,大致对应于E.A.Nida提出的四大语义词类"物体词、活动词、抽象词、关系词"。

E.A.Nida将语义词类(semantic parts of speech)首先分为四类:"物体词、活动词、抽象词、关系词",与人们通常所用的"名词、动词、

① 吉田政幸:《分類学からの出発》,中央公論社,1993年。

② S.Ullmann(乌尔曼):《语义学最近进展》,载岑麒祥:《国外语言学论文选译》,语文出版社,1992年。

③ 《日本語教育のための基本語彙調査》,秀英出版株式会社,1984年。

形容词、介词”等语法类别形成对照。语义词类和语法词类的区分标准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尽管不同语言的语法词类可能有很大差别，但这四种语义词类是各种语言的通用范畴，人类全部生活经验分别属于这四大语义类别。在四大语义词类和某些语法词类之间，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重叠”[①]。由于大多数语言中词的语法属性往往可以转换，如 drinking(饮酒)、learning(学习)、sleeping(睡觉)、smoking(吸烟)语法上都属名词，带了名词后缀，语义上仍属于活动词。因此不能在这两套不同的术语之间简单地划等号。物体词表示发出动作的人或物(如“狗、天、拖把、本子”等)，活动词表示动作、过程或事物的状态(如“问、跑步、追问”等)，抽象词表示事物、活动及其他抽象概念的特性、数量和程度(如“红、快、二、两倍、许多、若干、太、很、非常”等)，关系词表示其他三类中的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往往由语法虚词(如介词和连词)表示，有些语言多借助于词缀(如词尾的格变化)表示关系[②]。R. Jackendoff 提出的基本概念范畴，则更为详细，包括事物(Thing or Object)，事件(Event)，状态(State)，行为(Action)，处所(Place)，通过(Patb)，特性(Property)，数量(Amount)[③]。对于 E. A. Nida 等人的这种努力，J. N. Leech 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他明确说：“我建议不要再硬把诸如名词、动词等单位用到语义分析中去。相反，我们要寻找适用于语义这一层次的单位和结构。”[④] 因此义类大纲中的横向分类是正确的。由于本书是对文化和语义的交叉研究，不是纯语言学的语义学(linguistic semantics)，所以为通俗起见，各章分析里有时仍使用“名词、动词、形容词”的说法。

义类大纲的纵向第一级分为五类：(a)人类活动的主体，(b)人类

---

① 传统语法中正是按照这种“重叠”现象从语义上给语法上的词类下定义的。

② E. A. Nida(奈达)：《奈达论翻译》，中译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年。

③ R. Jackendoff: Semantic Structure. Cambridge: MIT Press, 1990.

④ J. N. Leech(利奇)(1974)：《语义学》，中译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 年。

活动精神及行为，(c)生产物及用具，(d)自然物及自然现象，(e)抽象关系。与人相关的事项在词汇体系中占相当大的份额，纵向第一级确定 a、b 是合理的，同时列出具有潜在对立关系的文明物质 c 和自然物 d，剩余之项便是抽象关系 e。下面我们来看纵向第一级的这五种类别跟横向的四种类别（即事物、运动、属性、其他）的配合。"事物"具备 a、b、c、d、e 五类，"运动"和"属性"都只有 b、d、e 三类，"其他"只有 b、e 两类的一部分。这份大纲既考虑意义，又考虑功能，不同横向类别在同一纵向层次上又可以互参。比较：事物的第 5161 层[①] 标题是火，词汇是"火(ひ)、火花、火事"等，运动的第 5161 层[②] 标题同样也是火，词汇是"燃える、煮える"等。其他的义类表一般只反映纵向聚合层级，不反映横向组合类别，且不能互参。

在这份大纲里，纵向各层级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a)人类活动的主体——人、神、鬼、亲属称谓、民族人种、阶级、职业分工、社会组织和机构、生产服务设施等。

(b)人类活动精神及行为——人类的感觉、感情、智能、意志和社会行为等。

(c)生产物及用具——人类制造的物品和器具等。

(d)自然物及自然现象——自然界的事物、现象及其运动、属性等。

(e)抽象关系——因果、时空、数量、程度、形状、存在、连结等关系。

从大纲里，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的决定性作用。文化关联使各项目成员组成具有内在关系的脉络。如地形决定物产和交通工具的形态，气候决定衣着和住居等的形态。哪怕是一个细节变化，都会带来其他项目的系列性调整。如纸的出现带动了一批文教用品、书刊形式和印刷业的出现。火药的出现带动了热兵器的出现。从以下词汇系列中，可以看到人类对火的运用：

---

① 小数点前是 1，代表处于横向类别的第一类。

② 小数点前是 2，代表处于横向类别的第二类。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火(因)	烧,烤…	熟,焦…
灰烬(果)		
火候(程度)		
火柴、炉灶(工具)		
柴火、煤气、煤炭(材料)		

所以,有人说,狗和蔬菜等都可能有着文化上的关联,自然语言中的这些范畴拥有比人工语言更丰富多彩的内部结构①。

二、概念和概念变体 一团同义或近义关系的词所围绕的共同意义核心就是概念。其中任何一种个体所传达的意义叫概念变体。概念化是通过词汇化(lexicalisation)实现的。只有词,才能"固定所要表达的概念,以不使其他概念渗透进来"②。比如,汉语仅仅一个喜悦概念下,就统摄着上百个喜义词,每一喜义词都代表一个概念变体。

除"高兴、愉快、乐、欢喜、欢欣、欢乐、欣喜、喜悦、喜"等抽象喜义词(也叫概念词)外,还有描述喜义词(也叫形象词)。以下是描述喜义词。第一组词的喜悦义来自生理感觉义,第二组词的喜悦义来自躯体动作义(释义分析见第三章《理据》第二节"概念理据"):

第一组:轻(轻感类)/舒服、舒畅、惬意、快活、畅快、松快、快意、舒坦、写意、舒适、痛快、好过、伏帖(身体快感类)/热呼呼、热腾腾、热腾(热感类)/柔(柔感类)/甜美、甜丝丝、甜津津、甜蜜蜜、甜蜜、甜沃沃(甜感类)/美、美气、美美、美孜孜(美类)。

第二组:喜吟吟、乐呵呵、欢笑、喜笑、笑眯眯、捧腹、喷饭(笑类)/欢唱、喜舞(歌舞类)/开心、开怀、开颜、解颜、开眉、舒眉、舒颜、舒怀、启齿、开畅、欢释(开类)/宽快、宽愉、宽畅、宽乐、宽心、松快、松畅、松(宽、松类)/

① Eleanor Rosch: Linguistic Relativity, in Thinking, Ed. by P. N. Lohnsin – Laird and P. C. Wason, Ci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② 加地伸行:《中国古代逻辑的语义特征》,载《逻辑与语言学习》1989.3。

雀跃、伸眉、欢腾、欢跃、喜跃(起举类)/鼓掌、拍手、抃舞(鼓掌类)/欢叫、欢呼、欢闹(叫类)/抖(抖类)/销魂(销魂类)。

与概念变体相应的词义形式是词的一个义项,与之相应的词汇形式却不能简单地说是词。在语义学领域,如果以词的词汇学定义(即词是能单独运用的最小音义结合体)为起点讨论词义问题,则显得过于笼统和粗疏,无法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准确表述。于是,S. M. Lamb 将词进一步分成三种不同性质的类别:词汇词(lexical word)、形态词(morphological word)、语义词(semantic word)。以 table 为例,table 是一个词汇词,$table_1$($tables_1$)和 $table_2$($tables_2$)是它的两个语义词,table1($table_2$)和 $tables_1$($tables_2$)是它的两个形态词。其关系如下表[①]:

词汇词 / 形态词		语义词	
		1	2
形态词	1	$table_1$ (一种家具,单数)	$table_2$ (表格,单数)
	2	$tables_1$ (一种家具,复数)	$tables_2$ (表格,复数)

所以严格地说,概念变体相应的词汇形式是语义词,它们是语义分类体系中的基本表现单位。

① S. M. Lamb: Lexicology and Semantics. In A. A. Hill, ed. Linguistics Today. New York/London: Basic Book, Inc. 1969. 参马清华:《句子的语义结构》,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

第三章 理 据

理据(motivation)是反映语言或言语片段的实际意义根据的字面义特征,包括词据、概念理据、义类理据、观念实现方式、意念取象、句义表达式等,分属词、概念、义类、观念、短语、句子。语篇组织也有常识作为它的理据等。观念实现方式、意念取象详见第六章《观念》第二节"实现方式"和第八章《意念》第二节"取象结构",语篇组织的常识理据见第九章,这里都不作重复。下面谈其他四类。

第一节 词 据

一、词据类型 从词中表现出来的命名根据叫词的理据[①],简称词据。词据反映语言有契性[②] 特征,跟任意性相对。词据可按形成因素分成声音理据、词法理据、意义理据三种类型[③]。声音理据发生在着重于声音形式模仿的拟声词上。它反映人的听觉经验,是"有意义的回响"。如英语 clatter(咔哒)、bombard(轰击声)等均属此类。词法理据发生在理据透明的复合词或派生词上,如 pickpocket〔扒手←(掏+衣袋)〕、sweet-talk〔奉承←(甜+说)〕、grass-green〔草绿色的←(草+绿的)〕、teacher〔教师←(教+的人)〕。这些都能从字面上推想出来,甚至根本用不着什么想象,就能明了其义。有一些不一定非

① 又叫语源结构或词的内部形式。

② 这个术语借自日本语言学界对 motivation 的译语。

③ Stephen Ullmann:Semantics,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言語と意味),日訳,大修館書店,1969 年。

常明确，但有契性也是非常明白的事实，如 butterfly〔蝴蝶←(奶油+苍蝇)〕、kingfisher〔鱼狗[1] ←(王+捕鱼者)〕、lady-bird〔瓢虫←(妇人+鸟)〕。意义理据的重要形式是比喻，如英语 bonnet〔汽车引擎盖←(无边小圆软帽)〕、coat〔涂于表面的油漆←(在前面扣合的有袖长外衣)〕、jacket〔马铃薯的皮或精装书的封面套纸←(短上衣)〕。词的比喻义是已经凝固了的比喻，有些已消去了比喻的影子，成为死喻。词据集中反映了语言的文化特性，"鸡胸、鸡眼"虽是人类而非鸡的生理特征，但这些词却根植于人类的养殖生活。

意义理据有选择(或个别)的和普遍的两种，选择性理据只适用于少部分语言，尤其是具有同一谱系关系的语言，普遍性理据适用于众多语言，尤其是同样适合于不同谱系关系的语言。当然普遍性只能是程度上的，不是绝对的。英语词 bonnet 的比喻词据就是选择性意义理据，汉语"圆帽"跟汽车引擎盖无隐喻关系。典型的普遍性意义理据之一是将表示外形相像关系的词用来表示可能性。英语词 like 和 likely 当然是同一词源的词。中古爱尔兰语 samlaid("相像的"，跟拉丁词 similitudo 同源)产生了现代爱尔兰语 amlaid(可能的)，威尔士语 tebyg 既表"相像的"又指"可能的"。[2] 汉语"好像"表可能和相像。从词源上也可看出表可能的"似乎"跟表相像的"相似"之间的意义关系。日语らしい既表相像又表推测。越南语 nhu 表相像，由此发展而来的 nhu tuong 表推测。

二、普遍词据结构　下面着重对具有普遍意义的比喻理据进行分析。比喻理据有隐喻(metaphor)、换喻(metonymy)、提喻(synecdoche)三类。以下分别说明。

(一)隐喻　不明示相似性，而是通过暗示方式表明类比意思的比

① 一种啄鱼为食、颜色鲜艳的小水鸟。

② 伊万·E·斯威策：《语义结构与语义变化(上)》，中译，载《外语与外语教学》1993.4。

喻方式叫隐喻，它与明喻(simile)相对，传统上也叫暗喻。词义成员中的隐喻意义是隐喻惯用化和凝固的结果[①]，同时隐喻方式也是词义产生的重要理据类型。在世界的语言中，存在一些建筑在人类普遍心理、现实环境和行为目的基础上普遍的隐喻模式，如用已知事物比喻相似的新事物，用目的物比喻背景事物，用具体事物比喻抽象事物等等。可以按同类隐喻在具体语言中的广泛性程度(或集体与个体的关系)分出普遍隐喻的型和例。

1. 普遍隐喻的型　普遍隐喻的型是指有着成批同类隐喻，具有广泛系统价值的隐喻模式。下面分析几种普遍隐喻模式。

(1)相貌隐喻　"相貌知觉(physiognomic perception)"倾向是一种原始的、比喻性的心理知觉方式。儿童绘画时，山、树常画成一张脸，叙述抽象东西时，喜欢用人体或其动作作譬，这都是相貌知觉倾向的反映。它在大人身上表现也有普遍。这种知觉方式直接影响到语言中词汇、词义的发展，推动着身体部位词经常不断地通过类比转用于别的方面。如"眼"本指人和动物的眼睛，其后转用于"炉、桥、锁、鞋、针"等，有了"炉眼、桥眼儿、锁眼、鞋眼、针眼"等。我们把这种隐喻方式叫相貌隐喻[②]。人体部位词转用后的义项固然增加了，同时意义也比初始意义笼统、一般、抽象得多，等于完成了一次词义扩张，这种词义扩张现象叫词义类扩。相貌隐喻是用有体形象作为其他事物的喻体[③] 材料。有人说，众多语言事实证明，人类先认识自身，而后才按照人的形象来比拟世界[④]。

并非如某学者所说，相貌隐喻是"汉语所有而其他语言所无"[⑤]的特有词义引申现象，反映了汉人"天人合一"观念。世界各地的众

---

① 山梨正明：《比喻と理解》，東京大学出版会，1988 年。

② 相貌隐喻前后的词义关系并不是逻辑上的关系，而仅仅是纯粹的心理联想关系。

③ 跟被打比方的事物("本体")相对，是用来打比方的事物。

④ 吴玉璋：《从语言的类型对比看人类的共性》，载《福建外语》1988.3—4。

⑤ 陈克炯：《"天人合一"与词义引申》，载《学术月刊》1993.4。

多语言中，不管相互间有无历史亲缘关系，它都是习见而普遍的隐喻类型。日语也有大量的相貌隐喻现象。如：目→針の目/足→顕微鏡の足(显微镜的撑脚)/脚→橋脚/口→河口/中腹→山の中腹(山腰)/胴→ズボンの胴(裤腰)。

从英语和法语中可以看到印欧语的面貌。如英语 eye(眼)→the eye of needle (针眼) /mouth(口)→the mouth of river (河口) /foot (脚)→the foot of mountain (山脚) /hand(手)→the hands of clock (钟的指针)/ear(耳朵)→the ear of pitcher(水罐的把儿)等。法语 pied(脚) →le pied d'un mur(墙脚)、le pied de la montagne(山脚)、les pieds d'une table(桌子的脚)、le pied de l'arbre(树脚)/cul(屁股)→cul de bouteille(瓶底)/dos(背)→ dos d'une chaise(椅背)、dos d'un livre(书脊)、dos d'un couteau(刀背)。

再看阿尔泰语。如蒙古语 толгой(头)→уулын толгой(山头)、дээрэмчний толгой(土匪头子)/нуруу(背脊)→байшингийн ноён нуруу(屋脊)①。

相貌隐喻贯穿着语言自古及今的全部历史。以古汉语为例。在它尚处在单音节时代，相貌隐喻已经很普遍了，并且是词汇、词义孳乳的重要途径之一。整个眉系词就是通过身体部位词“眉”(《说文》，目上毛也)的相貌隐喻形成的，如：“楣”(《说文》，秦名物梼联也。《释名》，楣，眉也，近前各两，若面之有眉也)，“湄”(《尔雅》，水草交为湄。《释名》，湄，眉也，临水如眉临目也)，“眉、堳”(《汉书・陈遵传》，居井之眉。师古曰，眉，井边也，若人目上之有眉。字亦作堳，《广雅》，堳，厓也)。

相貌隐喻不但能分析无生命物件，还可分析身体部位本身。比如：脚脖(小腿和脚连接的部分，北京话)、脚腰(脚掌的中间部分)、腿

① 史习成：《谈现代蒙语与汉语的词义比较》，载《东方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肚子(小腿后部隆起的部分[①])、指头肚子(手指第一节中间稍稍凸出之处)、指头心(指甲与指头肌肉相连接处)(河北邯郸话[②])。

从地域分布的广度、漫长的时间跨度和使用的广泛性可以认定,相貌隐喻是人类语言的自然性格。人类把环境特征作为跟自己尚未从本质上分化开来的东西来知觉,这种心理倾向是顺理成章的。德国语言学家汉斯·休佩尔巴说,"人类常利用自己强烈关心的对象来表述它之外的经验领域"[③]。

相貌隐喻是根据与身体部位的三种关系类型来进行的:

①形似,即根据物件部位跟身体部位形象上的相似性进行隐喻,喻指孔状、须状、耳状、鼻状等各种形体。

身体各部位词的相貌隐喻多属此类:口→瓶口儿,舌→帽舌,牙→磨牙(磨里面的沟痕,邯郸内乡话),眼→锁眼,颈→瓶颈,须→菜须子,脸→鞋脸儿,脊→屋脊,膛→炉膛,翼→(飞机)机翼,肘→扇肘儿,掌→鞋掌,翅→鼻翅儿,脐→磨脐(磨下扇中间突出的栓,邯郸肥乡话),肚→瓶肚儿,胎→车胎,胆→瓶胆。衣类词的相貌隐喻可看作此种情形之延长:帽→钉帽(钉的顶端)。也有极少神似者,如:魂→月魂(《汉》:指月亮、月光),脚→日脚。

②位置关系的相似,即根据物件部位的内部位置关系跟身体部位的内部位置关系的相似性进行隐喻。喻指方向性部位(如上部、尾部、中部)的类扩均取此型。常以身体部位词"头、顶"喻上、前部,如:头→山头、江头、针头;以身体部位词"脚(足)、尾、屁股"等喻底、末、尾部,如:脚→桥脚(支撑桥身的桥柱)、墙脚(墙的下部)、箭脚(箭的末端)/尾→月尾(月末)、江尾(江流的下游地段)/屁股→香烟屁股

① 释义见《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汉》。

② 本书所有河北省的方言材料除脚注特别指明引文出处的以外,均来自李行健主编:《河北方言词汇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以下不再注明。

③ N. P. Hickerson(1980): Linguistic Anthropology(言語人類学入門), 甘訳,大修館書店,1982年

（香烟末端，吴方言）；以身体部位词“心、腰、腹”等喻中部，如：心→街心、河心、江心、海心、山心、树心（“心”均指中心部位）/腰→山腰、墙腰、脚腰（“腰”均指中部）/腹→海腹（“腹”指中间）/肋→山肋（“肋”指中部）（参《汉》）。

也有根据与共同接触物的位置关系进行相貌隐喻的，如：脚→山脚，除因位处下端、支撑全体外，显以接触地面为据，如无“山尾、山屁股”之说。

③邻接，即根据物件部位跟身体某部位经常保持接触的习惯进行相貌隐喻。如：头→床头（睡觉时头所在的一边）、脚→床脚头（睡觉时脚所在的一边）（江苏金沙话），腰→裤腰（裤子中接触人腰部的那个部位，并非指它与人腰有什么相像），后脑→（风雪帽）帽后脑，后跟→鞋后跟。衣服的许多部位在日常语言中没有名字，如果要特别指说，一般使用人的身体部位词，比如：江苏金沙话“你心门口（胸前，这里指胸前这个部位的衣服）脏了”、“你衣裳背后（衣服中邻近身体背部的地方）烧了个洞”。遍访其他方言区人，情况也往往如此。英语 the arm of chair（椅子扶手）、俄语 в ногах（〈床铺〉靠脚的一头）均属此类。

在英语等许多语言（包括古汉语）里，词义相貌隐喻后，词的资格保持不变，如隐喻前后的英语词 foot。古汉语如“口$_1$”（说文：口，人所以言食也）→“口$_2$”（进出的通道。《桃花源记》：“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舌$_1$”（说文：舌，在口所以言别味者也）→“舌$_2$”（舌状物。《诗·小雅》：“维南有箕，载翕其舌”），“足$_1$”（《说文》：人之足也）→“足$_2$”（植物的根茎。《左传》：“葵犹能卫其足”）、“足$_3$”（基脚。《墨子》：“室高足以辟润湿”）、“足$_3$”（器物下部支撑物。“鼎成三足而方”）。“口、舌、足”在相貌隐喻中形成了新义，但仍保留着词的资格。

相比起来，现代汉语较为特殊。它以单音节成分为基本语义单位、以复合法为主要构词方法、以双音节词为优选构词目标，因此词义隐喻后常常反而降级为语素义（成字义），词的资格因隐喻而丧失

了，词义隐喻实际上毋宁说是语素义隐喻。单音节词在现代汉语相貌隐喻中起着最突出的作用(试比较：骨——→伞骨，但 * 伞骨头)。在新翻转出的义类词汇中，身体部位语素一般总处于词末，一方面暗示着对物件部位的分割，同时又反映与其他分割部位的横向联系，具有某种程度的示类作用。词义隐喻后降级为语素义，加速了词义凝定。这是系统隐喻至今仍如此广泛分布于汉语各种义类领域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如此，严格意义上的词义相貌隐喻在现代汉语里并非不存在，比如：屁股→香烟屁股(吴方言)，双音词"屁股"的意义被扩充了，但仍然是一个词。所以现代汉语隐喻是混合型的，既包括语素义隐喻，也包括词义隐喻。

同一种事物对象通过具有常规关系[①]的部位词或部位语素进行若干次数的相貌隐喻，翻转出成群成簇的新词，从而达成对这一物体的语义分割，叫做系统隐喻。系统隐喻如：韵——→韵头、韵腹、韵尾，年→年头、年尾，墙→墙头(围墙上端)、墙腰(墙的中部)、墙皮或墙面(墙壁的外层)、墙裙(室内墙面下部起保护和装饰作用的附加层)、墙衣(生在墙上的苔藓)、墙眼(墙壁上开的小洞)、墙角(两堵墙相接处的凹角或其近处)、墙脚(墙的下部)，海→海口(通海的出口)、海心(海中)、海角(突出于海中的狭长形陆地，常形容极远僻的地方)、海面(海水的表面)、海眼(泉眼，泉水的流出口。古人认为井泉的水潜流海中，通江海，故称)、海腹(犹海中)、海湄、海唇、海头(海边)。跟系统隐喻相对的是"孤立隐喻"，同一种事物对象只能作一次相貌隐喻，如把一种食用菌类叫"木耳(←耳)"，这种菌类再不能有"木头、木尾"之说。

系统隐喻在汉语义类领域中分布之广很值得注意。它遍及自然景观(山、河、江、海、树、菜)、日常用品(壶、瓶、炉、灯、钉、锁、针、扇、床、笔)、鞋帽服饰(裤、帽、鞋、被)、交通设施(路、桥、车、船)、建筑住

---

① 参第七章《联想》第一节"联想类型"和第九章《常识》。

居(墙、屋)、劳动器具与武器(刀、箭、机、犁)、时空(年、月)等众多义类领域(参见次页之表)。

文化变异中反映技术革新的词汇常通过相貌隐喻来筹应，物质文化的导入可相应地引起一连串土著语的全部转用和意义扩大。

K·巴索(K. H. Basso, 1967)作过一次有趣的调查，发现阿帕齐(美国西南部的一支印第安部落)西部语言在表达汽车部位部件时，不是借用外来词汇或另造新词，而是把它们当做生物，通过加大成批成类的既有身体部位词的意义范围来表达它们。有 19 个身体部位词本用于人禽兽等动物的 A 组各义项，均扩大化至适用于汽车，分别翻转出 A′组各义项。因文字奇僻，词形从略，仅列义项；请比较：{A_1 脂肪、A_2 颚、A_3 肩、A_4 手和臂、A_5 大腿和臀部、A_6 嘴、A_7 足、A_8 背、A_9 眼睛、A_{10}脸、A_{11}鼻、A_{12}额、A_{13}内脏、A_{14}血管、A_{15}肝、A_{16}胃、A_{17}肠、A_{18}心脏、A_{19}肺 }→{A'_1 润滑油、A'_2 前端保险杠、A'_3 前端挡板、A'_4 前轮、A'_5 后部挡板、A'_6 注油口、A'_7 后轮、A'_8 卡车车厢、A'_9 前部车灯、A'_{10}从前车玻璃到前保险杠之间的部位、A'_{11}汽车引擎盖、A'_{12}司机台的正面、A'_{13}引擎盖下的机械、A'_{14}电气系统的配线、A'_{15}电瓶、A'_{16}油箱、A'_{17}散热器软管、A'_{18}分配器、A'_{19}散热器}①。身体部位词的 A 组意义，在体系上全部扩大适用于汽车，这一点很重要

有意思的是，阿帕齐语的 ni、ɛbiyvl′两词所指的汽车部位，在英语里无一词可以称说。身体部位词向汽车的扩大转用，是文化和语言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汽车(特别是小型卡车)替代了马的功能，因为谈论马时曾经有过使用身体部位词的习惯，所以继马之后，它们也被扩大使用于机械上来了。

系统隐喻所分割的物件可以是抽象的时空概念，身体部位词常

---

① K. H. Basso: Semantics Aspects of Linguistic Accultur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LXIX 1967. 转引自 N. Parrott. Hickerson(1980): Linguistic Anthropology(言語人類学入門)，日訳，大修館書店，1982 年。

《汉语大词典》中部分系统隐喻

山:~口(山与山交会的隘口,山中洞口)/~心(山中)/~足(山脚,山接近平地的部分)/~身(山形)/~角(山的转角向外突出处)/~骨(山中岩石)/~首(山的入口)/~眉(如眉的山形)/~胁(犹山峡)/~容(山的姿容)/~脉(成行列的群山,山势起伏,向一定方向延展,状如脉络)/~脊(山的高处像兽类背脊似的隆起部分)/~眼(山间泉眼)/~嘴(山脚伸出去的尖端)/~腹(山内、山腰)/~腰(山脚和山顶之间大约一半的地方)/~肋(山腰)/~肤(山的表层)/~毛(山中可供食用之物)/~头(山的上部,山顶)/~巅(山巅)/~额(山顶)|河:~口(河流注入海洋、湖泊或其他河流的地方)/~心(河中央)/~身(河床)/~尾(黄河下游近河口处的河段)/~唇(河边)/~脉(黄河的水脉)|江:~口(江水与他水会流处)/~心(江中央)/~身(江面)/~尾(江流的下游地段)/~腹(江身,江面)/~唇(江边)/~头(江边,江岸)/~脊(江心。脊:脊骨)|树:~心(树干的中心)/~皮(树的表皮)/~耳(木耳)/~身(树干)/~衣(一种可食用的苔类植物)/~枝(树木的枝条)/~娃子(树苗)/~顶(树的顶端)/~冠(乔木树干以上连同集生枝叶的部分,其状如冠,故称)/~皴儿(树木开裂的表皮)/~腰(树干的中部)/~肤(树皮)/~发(指树木淹在潮水中,树干上孳生出的毛发状的细根)/~巅(树的顶端。巅,颠之今字,头也)/~瘢(树木经砍伐后留下的瘢痕)/~疮(树木的砍伤处)/~瘤(树干受伤后因病理或生理的作用而形成的瘤状物)/~顶(树干以上的部分)|日:~脚(斜射下的阳光)/~魂(道教阳神,太阳)|炉:~眼(炉膛;冶炼炉上供察看炉情的小窗口)/~膛(炉子里面烧火的地方)|灯:~心(灯盏中用以点火的灯草或纱、棉等捻成的细长物)/~头(煤油灯的一部分,在灯座上面,用以安装灯心和灯罩;接近电线末端,用以安装电灯泡的装置)|钉:~帽(钉的顶端)/~头(钉帽)|针:~眼(针鼻;针扎过后留下的小孔)/~脚(衣物上针线的痕迹或缝纫时前后两针之间的距离;犹针线)/~鼻(针尾穿线的孔)/~头(针尖;安在注射器上的针状金属管)|扇:~面(折扇或团扇的面孔,用纸、绢等做成)/~头(扇面之上)/~骨(指折扇的骨子)|路:~口(路的一端,亦指道路会合的地方)/~心(道路中央)/~面(道路的表层,用土、小石块、混凝土或沥青等铺成)/~脉(连贯而相通的路线)/~脚(路的尽头)/~头(路口)|桥:~肚(桥身、桥孔)/~脚(支撑桥身的桥柱)/~头(桥梁两端与岸连接的地方)|车:~牙(车轮的外周)/~皮(大车的车厢)/~头(火车的机车)/~耳(车两旁反出如耳的部分,用以遮挡尘泥)/~衣(遮盖在车娄上的帏幔)/~胎(轮胎的总称)/~身(车上除发动机和底盘以外的所有机件的总称)/~脚(车轮)/~脑(车毂)|船:~脚(指船底入水部分)/~头(船的前部)|屋:~脊(屋顶中间高出的部分;指屋栋、屋梁)/~头(房屋之上)/~翼(即飞檐)|刀:~口(指刀用来切削的一面)/~身(指刀除刀柄外的主要部分)/~背(指刀不用于切削的一面)/~头(刀的尖端,亦指刀身)/~脊(刀背)|箭:~脚(箭的末端)/~头(箭的首端)|笔:~头(笔上用以书写的部分)/~心(铅笔的芯子;圆珠笔的主要部分)/~帽(套在笔尖上,用以保护笔尖的套子)/~胆(自来水笔笔杆内储存墨水的橡皮盘)|裤:~口(裤管的边缘;裤管)/~脚(裤腿的最下面)/~腰(裤子最上端系腰带的地方)/~腿(裤子穿在两腿上的筒状部分)|鞋:~口(鞋帮的上缘)/~皮(鞋片)/~面(鞋帮)/~头(鞋尖,鞋的前部)/~脸(鞋帮的上部和前部)|年:~头(一年之始)、~尾(年终)|月:~头(月初)、/~额(月旦,指旧历每月初一)/~尾(月末)。(释义均见《汉》)

常因此演化为方位词或准方位成分。如头上表上面："脑头"（张家口万全话）、"顶来"（张家口崇礼话）。左手、右手分别表左右："左膀"（左边）、"右膀"（右边）（邯郸临城话），"左手"（左边）、"右手"（右边）（天津话）。普通话方位词"左、右"在古代也是先表左、右手，后转指左右方位的[①]。腰、胸、腹表中间："当腰儿"（长度的中间，唐山丰润话；立着的东西的中间，唐山宝坻话），"胸腹"（《汉》：比喻中间部分，如明胡应麟《诗薮·内编》：盖歌行不难于胸腹，而难于首尾），"腰身"（《汉》：转指动物或物体的当中部分，如侯金镜《漫游五台山》：我知道小五台是距离北京最近的一座大山，内长城从它的腰身南面绕过去），"腰腹"（《汉》：比喻物体的中间部分）。胸肋、胸胁表旁边："肋里"（旁边，石家庄获鹿话），"胸胁"（《汉》：亦谓近旁、近侧，如《管子·禁藏》：禁藏于胸胁之内，而祸避于万里之外）。人体前部如胸、腹，或眼、脸所面对的，表前后："胸"（《汉》：喻指前面，如汉张衡《南都赋》：汤谷涌其后，水荡其胸），"腹背"（《汉》：指前面和后面，如《晋书》：缘山东下，腹背击之，上策也），"面"（《汉》：前、前面，如《文选·潘岳〈闲居赋〉》：面郊后市。郑玄注：面，前也），"眼跟前儿"（唐山昌黎话）、"脸前"（天津吴桥话）（跟前，距离比附近更近的地方）。有人说，从甲骨文看，方位词"前、后"的本义均与足的态势有关[②]。头、尾表时间前后："头、尾"（如陶五《逍遥之乐》：大贵儿头〈表示在先，北方话〉些年光景不好，是实情。如阮朗《靓女》：我先把后天新加坡的公事交给林厚生去，来回带办事，头尾〈表时间的前后，港穗方言〉得一个星

② 《说文·部》曰：，左手也。段注：𠂇者，今之左字。《说文》：又，手也。段注，此即今之右字。不言右手者，本兼𠂇又而言。以𠂇别之，而又专谓右，犹有古文尚书，而后有今文尚书之名；有后汉书，而后有前汉书之名。有上曲礼，而后有下曲礼之名也。按，盖古人惯用右手，故手与右手同名，如肉与猪肉同名。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凡右字，经传皆以右字为之。《汉》：又，右手，后作右。可见，左右本义为左右两手。

②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

期)。衣内里:"裹"(《说文》:衣内也。段注:引申为凡在内之称)。

即使已具备时空概念成分,人还是有以身体部位作方位参照的习惯。如"中心",已有"中",又以"心"附之。江苏金沙话"上脚、下脚",以"脚"为方位词缀,如"书赖(在)上脚,纸赖下脚(书在上面,纸在下面)"。古代多尚左(有时或尚右),如《水浒传》:"上手是蔡福,下手是蔡庆。"左手一侧即"上手",指位尊一侧。"左、右"已明,又复用"手"。《汉》释"手"为"边、面",可见意义已虚化。方位词缀"头、面"(如:上头、下面)实际也是身体部位词的弱化形式(读轻声),相貌隐喻的泛化和位居词末的固定位置,极易导致这样的虚化。

英语身体部位词也参与方位的表达,如 back(背)——at the back of (在……之后),head(头)——at the head of (在……的前面)。

相貌隐喻是反映词汇和文化脉络关系的、应该强调的部分。

(2)海洋生物的陆地化隐喻 人类生存于陆地,所以认识海洋生物时,都拿惯常见到的陆地生物来比喻或类化。这是海洋生物的陆地化隐喻。陆地生物名是无标记形式,海洋生物名常是与之同根的有标记形式,标记成分是"海"或相应意义的语素。试比较下表:

	陆地	海洋
汉语	菠菜、栗子、豹、牛	海菠菜、海栗子、海豹、海牛
彝语	biphop(百合)、she(参)、ssyt(豹)、ke(狗)、mu(马)、gotdu(枣)	hiebiphop[海百合←(海+百合)]、hieshe(海参)、shurssyt[海豹←(海+豹)]、shurke[海狗←(海+狗)]、shurmu[海马←(海+马)]、shurgotdu[海枣←(海+枣)]
英语	lily(百合)、anemone(〈植物〉白头翁)、horse(马);cucumber(黄瓜)	sea lily[〈动物〉海百合←(海+百合)]、sea anemone[〈动物〉海葵←(海+白头翁)]、sea horse[海马←(海+马)]、sea cucumber[海参←(海+黄瓜)]
德语	Bär(熊)、Pferd(马)、löwe[(雄)狮]	Seebär[海狗←(海+熊)]、Seepferdchen[海马←(海+马)]、Seelöwe[海狮←(海+雄狮)]

在形式上,也有陆地生物跟另一种海洋生物组成的复合隐喻,如

德语 Elefant(象)和 Robbe(海豹)加合起来对海象构成的隐喻:Elefantenrobbe[海象←(象+海豹)][1]。

隐喻只管相似,不管类属。具有隐喻关系的汉语"豆芽"和"海豆芽"中,前者是植物,后者是动物。又如舟山定海话"海和尚[2]、海蛤巴[3]、海瓜子[4]、海芥菜[5]"等跟"和尚、蛤巴、瓜子、芥菜"的隐喻关系,"瓜子"是植物果实,"海瓜子"却是海洋贝类动物,"蛤蟆"是两栖类爬行动物,"海蛤巴"却属鱼类,等等。具有隐喻关系的词可套用到"'海a'像'a'"的公式中去,如"海栗子像栗子"、"海豹像豹"等。这时,"a～海 a"构成隐喻式对立词汇结构。汉语这类例子很多,又如:

陆地	白菜、百合、鸡冠、韭菜、林檎、刀豆、葡萄、石榴、椰子、菜、草、葱、椒、葵、麻、茄、桑、参、罂粟、芋、枣、狗、虎、驴、马、猫、蛆、狮、兔、豚、象
海洋	海白菜[6]、海百合、海鸡冠、海韭菜、海林檎、海刀豆、海葡萄、海石榴、海椰子、海菜、海草、海葱、海椒、海葵、海麻、海茄、海桑、海参、海罂粟、海芋、海枣、海狗(=海熊)、海虎(=海獭)、海驴、海马、海猫、海蛆、海狮、海兔、海豚(海猪)、海象

与"a～海 a"相似的对立词汇结构,有的并不属于隐喻,而是属于分类。其所能套用的公式不是"'海 a'像'a'",而是"'海 a'是'a'"。如"蟹"和"海蟹",可以说"海蟹是蟹",不说"海蟹像蟹",所以它们是分类关系,不是隐喻关系。分类式对立词汇结构主要发生在

① 陆地无生物也可以成为隐喻的供给源,如德语 Seewalze[海参←(海 See+滚筒 walze)]。

② 人鱼。海洋哺乳类动物。能发出像婴儿哭声一样的声音,用前肢抱幼仔喂食,像女人抱着孩子似的。参方松熹:《舟山定海方言渔业词汇》,载《方言》1993.3。

③ 鱼类,形似蛤蟆而得名。

④ 形似瓜子的小贝类动物。生海涂中,肉小而鲜美。

⑤ 裙带菜。

⑥ 海洋藻类植物,可吃。

内陆淡水动物对海洋动物上，如“螺(蛳)”→海螺[①]、海螺蛳[②]，虾→海虾，龟→海龟，鱼→海鱼，鳗→海鳗，蛇→海蛇，鲫→海鲫”。也可以发生在内陆飞禽对海上飞禽的关系上[③]，如“鸟→海鸟，燕→海燕，鹰→海鹰”。

(3)非动物对象的动物隐喻　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和利用，首先是从对动物的认识和利用开始的，经过长期艰苦努力，才逐步对植物有所认识。许多关于植物起源的传说都反映了人们对动物和植物认识的先后和发展次序[④]。在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中，现已认出的动物名称就有七八十种[⑤]。所以几乎所有我们能接触到的语言都能对非动物对象进行动物性隐喻(简称“动物隐喻”)，用动物名来指说人、植物、无生物。

动物形象移用于人，常带有幽默、挖苦、侮辱和恶毒的含义[⑥]，人类被类比成许许多多的动物。如英语 cat(猫→刁钻的女人)、rat(比 mouse 大的鼠→见风转舵的人，变节者[⑦]；小偷)、goose(鹅→愚蠢的人)、lion(狮子→勇敢的人)、jackal(胡狼→助手，勤杂工)。也可以非名词形式表达，如 catty(像猫一样的→居心叵测的、狡猾的、恶意的)、dogged(像狗一样的→顽固的)等。汉语“熊”(→身体粗壮的人)、“刺猬”(→尖刻、精明、蛮横，不好惹的人)、“狼”(→极其贪婪、带有攻击性的人)、“牛”(→任劳任怨、不辞辛苦的人)、“狐狸”(→很能迷惑男人的淫女，狡猾的人)、“老虎”(→凶悍的人)、“千里马”(→良

① 形如螺蛳，个大。渔民常以其壳制成为号角。

② 生在海滩边的一种小螺蛳。

③ 这种对立关系的词汇结构跟野生非野生动植物名词的对立结构相似，如“马”和“野马”的关系，可以说“野马是马”，但不说“野马像马”。

④ 贺学君：《略论植物传说故事》，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2。

⑤ 吴玉璋：《从语言的类型对比看人类的共性》，载《福建外语》1988.3～4。

⑥ Stephen Ullmann: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言語と意味)，日訳，大修館書店，1969 年。

⑦ 因为鼠会舍弃将沉没或遇难的船。

才)、"鸡"(→妓女)、"鸭"(→男妓)等。同一种动物用于人,在不同语言里的含义有近似或等值的,也有完全不同的。比较英语和汉语:pig(猪→肮脏邋遢的人,欲望深的人)~"猪"(→肮脏的人,愚蠢的人);ass(驴→愚蠢的人)~"驴"(→愚蠢的人,性欲旺盛的男人);mouse(鼠→羞怯或胆小的人)~"老鼠"(→胆子极小的人,暗中损害集体利益,谋私利的人);sheepish(像羊一样的→胆小的)~"绵羊"(→温顺的人);dog(狗→无聊的人)~"狗"(→奴性十足的人,混蛋)。

以动物或相关事物词喻指植物的,英语如 goat's beard(山羊胡→瞿麦),dandelion(狮牙[①] →蒲公英)。汉语如"鸡头"(→芡)、"红嘴绿鹦哥"(→菠菜)、"草石蚕"(→宝塔菜)、"羊齿"(→绵马)、"龙眼"(→桂圆)。以动物或相关事物词喻指无生物的,英语如 cat(猫→吊锚的滑车)、cat's eye(猫眼→装于路上以便于黑暗中指示交通或装于车辆如脚踏车等后部的反光钮)、crab(螃蟹→绞车),crane(鹤→起重机(有可以转动的长臂,用以吊起及移动重物),吊车)。汉语如"铁牛"(→拖拉机)、"龙头"(→车把)、"马蹄"(→荸荠)、"铁鸟"(→飞机)、"过山龙"(→虹吸管的通称)、"电驴子"(→机器脚踏车)、"木鱼"(→一种打击乐器)等。

以动物及其相关事物喻指植物或无生物的,汉语大多以加带类名的形式出现,如"龙须菜、牛皮菜、马齿苋、狗尾草、凤眼莲(通称水葫芦)、凤尾竹,鹤嘴镐、老虎钳、龙舟、老虎凳、鸭嘴笔、鸭舌帽、蝴蝶结、猫睛石"等。

2. 普通隐喻的例 普遍隐喻的例是指一种型或模式下孤立的个例,它在词义系统中是单项、零散的。以思量的理据为例。人的肉体动作姿态有时不是指向这些现象本身,而是指向诱发这些现象的心

① 来自法语 dent de lion。

的过程。人类普遍地运用称重量和测定来比喻表达思考过程[①]。如德语 erwägen(考虑),本来的意思是"称称重量",法语 délibérer(深思熟虑)跟拉丁语 lībra(秤、磅)有联系。法语 penser(测量重量、判断、深思熟虑)。德语 ermessen(考量)、拉丁语 meditāri(沉思)跟 modus(量)有联系。汉语普通话表"思量"的词有"掂掇、衡量、思量、忖量、推测、揣测、忖度、揣度、推度、测度、猜度"等,从构词上就可以看到它们跟称重量和测定的联系。普通话"掂量"本指用手掂试物的轻重,也指盘算事的轻重缓急利弊,同样的意思在河北邯郸涉县话说"称量一下",天津话说"掂掂"。苏州话把头脑糊涂、不知事情轻重缓急叫"拎弗清"。这一普遍隐喻的例是"用外在具体行为喻指内在心灵活动"(相关内容参第三章《理据》第二节"概念理据")的型为背景的。

有些理据以译借(loan - translation)方式传播开来,从而取得了普遍隐喻的例的资格。如 sky - scraper,西方许多语言按这个模式命名的"摩天大楼",如法语 gratteciel,西班牙语 rascielo,意大利语 grattacielo,德语 Wolkenkratzer 等,逐词翻译大体都表"碰或刮着云天的物体"。汉语"摩天大楼"也有这样的理据意义。多义词内部义项之间的衍生理据常可在同一谱系的语言中表现出有限程度的普遍性。如西方不少语言用鹅喻指人时都表傻瓜:德语 Gans〔蠢女人,蠢丫头(←鹅)〕,英语 goose〔愚蠢的人(←鹅)〕),法语 oie〔傻瓜、笨蛋(←鹅)〕),西班牙语 ganso,sa〔笨拙的人、迟钝的人(←鹅)〕。

(二)换喻 在人类对现实世界的表达中,要使每一具体事物都有一个相应语言符号,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得让接受者柔性地凭借语境和已有知识预测所表达的事物,因此常常只要传达它的一个侧面就够了,通过局部符号化和语境、知识补足,达成对整体对象的把握。这种符号化手段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换喻和提喻,先说说换喻。换喻

① Hermann Güntert, Grundfragen der Sprachwissenschaft(言語学の基本問題),日訳,株式会社大学书林,1967 年。

是在空间的邻近、共存关系，时间先后关系，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以材料指制品、以原因指结果、以手段指主体等都是换喻的一些常见类型。下面举两种普遍换喻的例。

看别人眼珠中可以照出小小的人像而把瞳孔叫做瞳人，是语言的普遍现象。在河北方言中，瞳孔有“眼人儿、眼珠人儿、眼睛人(儿)、黑眼人儿、黄眼珠人、媳妇人儿、媳妇脸(儿)、媳妇头”等叫法。太原话叫“眼睛人人”[①]，江苏金沙话叫“眼睛人儿”，湖南江永话叫“眼睛鬼崽”[②]。《说文》：“瞦，目童子精，瞦也。”可见，上古汉语也叫“童子”。中国民族语言里也有普遍反映，苗语(贵州台江)叫 tainai〔瞳孔←(孩童＋人)〕，水语叫 nuda〔瞳孔←(弟、妹＋眼睛)〕等。S. Ullmann 发现世界各地竟有三十余种语言，都不约而同用“爱子、孩童”等词来指瞳孔[③]。从下列语言多义现象的对比中就可发现这一点，如英语 pupil〔瞳孔←(学童、弟子)〕、法语 pupille〔瞳孔←(孤儿)〕、希腊语 kórē〔瞳孔←(少女)〕、葡萄牙语 menina〔瞳孔←(少女)〕、意大利语 pupilla〔瞳孔←(女学童)〕[④]，瞳孔在西班牙语和古印度语中也是跟小少女或少女同辞，在希伯来语中则跟男孩同辞。“瞳孔”的理据显然从属于普遍换喻的一种样例。

表示时间的抽象名词常常是在具体实物名称的基础上产生的[⑤]。在很多语言里，太阳表示日子和东向方位。表示日子的词多半来自太阳的名称，因为一日实际上就是太阳出没一次的时间。汉语时令的“日”(一天)就来自天象的“日”(太阳)。法语的 jour(白天，一天，一日)原来表示“日光”，与太阳有关。太阳也是人类认识方位

① 温端政：《太原方言词汇》，载《方言》1981.4。

② 黄雪贞：《湖南江永方言词汇》，载《方言》1991.1。

③ Stephen Ullmann：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言語と意味)，日訳，大修館書店，1969 年。

④ 来自拉丁语 pupilla〔瞳孔←(女孤儿)〕。

⑤ 参吴玉璋：《从语言的类型对比看人类的共性》，载《福建外语》1988.3～4。

"东"的自然标准。人类普遍看来,"太阳升起"与"东"有固定关联。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东,动也;从日在木中。"少数民族语言如彝语(喜德)budu〔东←(太阳+出)〕,台湾高山族布嫩语 insumasvahli〔东←(上升+太阳)〕,"昆明近郊的倮倮叫'日出地'。福晋的倮倮叫'日出洞',英语的 orient 的本义也是'日出'"①。这也是普遍换喻之一例。普遍换喻的型见第三节"义类理据"。

(三)提喻 用部分喻指整体,用整体喻指部分,或用属喻指种,用种喻指属,都是提喻。由于语言经济性原则的作用,大凡语言集团生活中最常见到、最典型、知识程度最丰富的事物,即与之最密切的事物,常可用其上位种名这种最简约的形式来指说,从而跟与之平行对传的事物名形成无标记和有标记的对立,这种提喻理据具有语言的普遍性。它在上古汉语中就有所表现。《说文》"犉"条段注:"尔雅不言黄牛者,牛以黄为正色,凡不言何色皆谓黄牛也。"是说那时"牛"可特指黄牛。永定下洋话"饭"专指大米饭②,因为典型的饭是大米做的。不常见或不典型的事物,则用具体细名来称说。比较:

	常见或典型物	不常见或不典型物
河北唐县话	小米儿(→"米")	大米(→"白米")③
江苏金沙话	大米(→"米")	小米儿(→"小米子")
	蚕豆(→"豆")	黄豆(→"黄豆")
高安(老屋周家)话	小麦(→"麦")	大麦(→"大麦")④
普通话	猪肉(→"肉")	牛肉(→"牛肉")

(引号内是这些话中的名称)

这一现象与联想概率有内在联系。

---

①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语文出版社,1996 年。

② 黄雪贞:《永定下洋方言词汇》,载《方言》1983.3。

③ 李行健:《河北方言词汇编》,商务印书馆,1995 年。

④ 颜森:《高安(老屋周家)方言词汇》,载《方言》1982.1。

人类种植的植物，常用目的物喻指整体植物及其生长的每一个阶段，如玉米这种果实和产出这种果实的植物、这种植物的各个生长阶段的形态共名（或同辞），相关内容参第二章《分类》第三节"分类角度"。

综合以上所有普遍性词据可以看出，共同的喻体供给源和认知方式是支撑这些普遍词据的基础。

三、词据差异性

（一）词据差异的类型

1. 命名角度的差异　跟词据普遍性共存的是词据的语言文化差异性。有时一个相同的概念在两种语言中的表达方法上可能出现差异。汉语的"红茶"，俄语为 чёрный чай（黑茶）[①]，英语是 black tea（黑茶），这是因为汉语就茶水颜色而言，称其为"红"，俄、英语根据茶叶颜色而言，称其为"黑"[②]。这是观察角度的不同[③]。又如，对供食用的禽类的肉，汉语倾向于用相应的身体部位词命名，如"鸡翅、鸡腿、鸡脯"等，但英语却可用颜色给它们命名。如《The Johnson family》[④]中 Mrs. S 说了这么一句：Some white meat, please. And just a sliver of dark（请给我一点白肉。然后再来一小点红肉）。钱歌川注云："火鸡肉可分红白两种，胸脯肉、翅膀肉是白肉，大腿肉和小腿肉是红肉。"鸡肉各部位的颜色区分，中国人即使有所察，也不太关注，当然不会想到取用这一角度来命名。

2. 角度相同，语象有异　角度相同的词据，语象（word image）[⑤]

---

① 谭林：《语言国情学初探》，载《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2.1。

② 宋传伟：《汉俄数词和虚指对比》，载《对比语言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 年。

③ 又如：汉语"磨坊"在日语里叫"粉屋（こなや）"，前者着眼于碾的动态、后者着眼于碾的结果。

④ 钱歌川译注：The Johnson family（美国日常生活），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年。

⑤ 这一术语来自俞敏：《古汉语里的俚俗语源》，载《燕京学报》第 36 期（1949 年）。

也可能不同。不同语言的温泉词据中，反映出温度感受的不同。汉语是“温泉”，英语是 hot spring（热泉），俄语是 горячийисточник（烫泉）。几种说法各取了温泉的不同热度作为词据。汉语取的温度最低，俄语取的温度最高，英、德语介于二者之间。类似例子还有“温室”，英语叫 hot house（热室），法语叫 serre chaude（热室）。汉语和俄语说“天气很热”的“热”，在波兰语里却可以说“烫”①。

词汇层面的相貌隐喻现象集中体现了词据差异的这两种类型，不难找到可以理解但无法套用的外民族语言的相貌隐喻实例。尽管古汉语也曾有过类似法语 cul（屁股）→cul de bouteille（瓶屁股）这样的相貌隐喻，如“臀”转指器物底部，《周礼·考工记》：其臀一寸，其实一豆。郑注引汉杜子春曰：谓覆之，其底深一寸也。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可以理解“瓶底”叫“瓶屁股”的理由，但习惯上却不能套用，就像不能接受日语把声音尖锐比作针尖一样尖那样。黄长著说，“北美和埃塞俄比亚的某些语言就没有类似英语 the foot of mountain（山脚）和汉语‘山脚、山脚下’的说法”②。对于同一物件，即便同种语言的不同方言，相貌隐喻时选择的角度也可能不同。树梢在邯郸话叫“树头”，唐山丰润话叫“树脑袋”，但邯郸内丘话叫“树冠”，唐山乐亭等地的话中叫“树帽儿”。不同语言或同一种语言内部对同一事物的相貌隐喻可借用身体不同的部位来表达。如对“针眼”的相貌隐喻：眼→针眼（侧重于形似），屁股→捏线（针）屁股（浙江兰溪话）（侧重于位置关系的相似），鼻→针鼻（侧重于形似，如牛鼻可穿绳牵引）。相貌隐喻方向的差异之大，可达到取用完全相反的身体部位词进行相

---

① 伍铁平：《不同语言的味觉词和温度词对客观现实的不同切分》，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1。伍铁平说，这多少也反映了三种语言在使用形容词时的普遍规律。汉语表达“高等教育、高等数学、高等哺乳动物”这三个概念时都是用形容词的原级修饰名词。但是英语却全用形容词的比较级修饰名词，如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mathematics, higher mammals。俄语正好相反，全用最高级。

② 黄长著：《语言·文化·社会之断想》，载《外国语文教学》1985.4。

貌隐喻的程度，比较烟头的不同表达：屁股→香烟屁股（吴方言）/头→烟头。外语初学者常常无视相貌隐喻的文化差异性，极易落入盲目类推的陷阱。比如，初学汉语或法语的英国人，知道英语 head(of a person)相当于汉语的"头"、法语的 tête 时，就满以为英语 head 能用的场合，都能以"头"或 tête 来套用，则势必造成各种各样的错误。它们的实际对应关系如下表：

	英语	汉语	法语
head	(of a person)	头	tête
	(of a bed)	上部	chevet
	(of a coin)	头像	face
	(of a cane)	先端	pomme
	(of a match)	胜负	bout
	(of a table)	上座	haut bout
	(of an organization)	首领	directeur
	(of a beer)	泡沫	mousse
	(of a title)	标题	rubrique

(二)词据差异的原因　词据差异源于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的文化理解，但这些不同的理解方式往往还有如下更深层的起因：

1. 自然环境因素　自然环境引发了文化理解或感受等差异。地貌特征是方位的参照。美国加利福尼亚西北部的印第安人用"向上游的、向下游的、向河这面的、离开河的"分别表示北、南、东、西①。因为生活必须更多地面对河流，所以河流成了观测方向的标准。在浙东南仙居县，以"上、下"命名的地名比以其他方位成分命名的地名多，且多"东、西"而极少"南、北"。全县方位词冠首的地名数量依序为："下(233)、上(153)、西(93)、后(74)、东(70)、里(67)、前(49)、外(28)、南(18)、北(3)"。县境南北均是千米以上山脉，对北部一侧的地貌言，北即上，南即下，就南部一侧的地貌言，南即上，北即下。西

① Birght(1992)，转引自平洪(1999)：《语言结构和文化结构》，载《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4。

部平均海拔是东部平均海拔的 5 倍多。所以"上、下"取代了"南、北",也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东、西"①。

2. 经济形态因素　经济形态不同,人们观察经济事物和其他相关事物的尺度也就不同,形成不同的词据方式。对脱离了狩猎经济的文化语言集团来说,家养动物是他们观察其他动物的尺度,所以在家养动物跟野生动物的对立中,前者常用无标记形式,后者常用有标记形式。汉语、英语中这种对立词汇结构如②:

汉语	家养	鸭、鸡、蚕、马、牛、猪、驴
	野生	野鸭、野鸡、野蚕、野马、野牛、野猪、野驴
英语	家养	a dog(犬)、a horse(马)、a cat(猫)、an ox(牛)、a duck(鸭子)、a silkworms(蚕)
	野生	a wild dog(野犬)、a wild horse(野马)、a wild cat(野猫)、a wild ox(野牛)、a wild duck(野鸭子)、a wild silkworms(野蚕)

在英语中,不少野生动物都有单独的别名,和无标记上位概念名并存,如野马(a wild horse、a mustang),野猫(a wild cat、a serval 或 a badger),野牛(a wild ox、a bison 或 a buffalo),野鸭子(a wild duck、a mallard),野兽(a wild beast、a brute)。现代汉语不存在这样的现象,反映盎格鲁萨克森人脱离狩猎经济的历史尚不久远。

在狩猎民族中,家养和野生的对立词汇结构可以是词形上毫无关系的两组,而非无标记和有标记的对立,如满语"ulgiyan(猪)—hamgiyari(野猪)"有词形关系外,"kesike(猫)—malahi(野猫)/ morin(马)—tahi(野马)/ lorin(骡)—chihetei(野骡)"等词形都毫不相关。这就把家养和野生动物作了独立、平行的看待,而不是从家养动物的角度出发看野生动物,其原因在于,对狩猎民族来说,野生动物的经

① 张玮:《仙居地名文化考略》,载浙江语言学会编:《语言论丛('98)》,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年。

② 这指分类式。也有隐喻类型,在有些方言里,"野猫"不是指"猫",而指"野兔"。

济地位固然重要，自己蓄养的动物也具有不可忽略的经济、文化地位，其次他们对动物的关心程度本来就远远超越于其他文化集团。

3. 人类理解因素　对相关事物理解的差异制约词据方式。不难找到基于本民族语言文化背景无法理解的外民族语言的相貌隐喻实例。日本学者山梨正明指出，日本人感觉上的山都是那种高度不大的丘岭景象，相当于英语里的 hill(小山)，不是 mountain(高山)，所以对英语 the foot of mountain(山脚)这样的相貌隐喻很难把握。描绘出这种高山的峭立形状，比如长靴子似的直立着的高山形状，再来看英语词 foot(脚)的隐喻，就容易理解了[①]。《最新英汉四用辞典》[②]称：英国 2000 英尺(合 609.6 米)以下的山通称 hill，印度 2000 英尺或 10000 英尺范围内的山通称 hill。这都可归结到自然环境的原因上去。汉语早有"山脚"之说，但中国人眼中的高山，似乎比英语 hill 为低。《温州日报》1998 年 11 月 3 日第五版的一条消息："瓯海区五垟乡是我市二级蔬菜基地，该乡海拔 600 米，高山蔬菜无污染、品质好，深受消费者青睐。"用英语眼光看，"600 米的高山"岂不应改称为"600 米的小山"？《最》干脆说，给予其地风景以显著变化者，概称为 mountain。可见，对 mountain 或高山的文化理解，制约着 foot 或脚的相貌隐喻。

4. 语言本身的因素　语言本身对词据有制约作用。身体部位词本身的意义范围制约着相貌隐喻的方向。俄语常用词 нога 的所指范围包括脚、腿全体，表脚的词[③] 如 ступня、стопа 同时又有脚掌这个

---

① 山梨正明：《比喩と理解》，東京大学出版会，1988 年。

② 《最新英汉四用辞典》(最新增订本)，以下简称《最》，The World Book Company, Ltd.

③ W. F. Mackey(1965)：Language Teaching and Analysis (London, Longmans)，转引自 D. A. Wilkins：Linguistic in Language Teaching(言語学と語学教育)，日訳，研究社，1975 年。W. F. Mackey (1965)说，俄语没有相当于 foot(脚)的词，只有表脚、腿全体的词 nora。

义项，所以山脚在俄语里，竟是通过脚掌的隐喻表达的：подошва горы〔山脚←（山＋脚掌）〕。

同一角度的词据表层可因表达方式或延展幅度不同而产生差异。比如对“瓦工”的称说，在深层词据结构上，汉英语指“瓦工”的词都含有瓦工直接所及的事物，但在表层词据结构上，汉语用瓦工直接接触的事物来称说，英语则用对它的处理方式来称说。其次，“瓦工”在汉语里不借“砖”来称说，英语却可以。试比较：

英语	汉语
tiling(←盖瓦的)	泥瓦匠、瓦匠
plastering(←在墙上涂泥的)	泥水匠
bricklaying(←砌砖的)	*砖匠

现代英语词往往在组合关系横轴上寻找可发层的功能空间①，如：defend（动词，防御）→defence（名词，防御），又如：fur（名词，毛皮→动词，覆以毛皮）、master（名词，主人→动词，控制）。普通话虽也有类似的理据方式，如：“扇（去声，扇子）”→“扇（阴平，持扇挥动）”，又如“漆、画、锁”既表一种事物，又表与这种事物相关的一种动作，读音相同。但跟英语相比，这类方式数量就少得多，更多的是从纵向聚合体系中寻找材料创造新词，发展出新的词汇成员，或根据起点义项作聚合联想（纵向的比喻或引申），获得新义，或借助临时语句进行液态表达。英语和普通话理据的这种总体策略差异都与它们造词法的不同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英语主要采用派生法造词，普通话主要采用复合法造词。

选择什么样的理据，还跟人们向往和追求什么东西有关。这在人名、品名、地名等专有名称中得到突出的表现（参第一章《导言》、第七章《联想》）。

---

① 古汉语也曾普遍出现过类似词据方式，只不过内部曲折形式是语音上的读破而已。如“折(zhé)”破读为“折(shé)”。

四、透明度 能从词形上清楚看到理据特征的叫理据透明(transparent),反之则叫理据隐晦(opaque)。在词汇系统中,声音理据词为数不多,意义理据词也不及词法理据词那么广泛,所以最重要的词据类型是词法理据。一种语言理据透明度的大小在某种程度上可由词汇体系中单纯词、复合词、派生词的数量多寡及其相对重要性决定。复合词、派生词越多,地位越重要,理据透明度就大。Stephen Ullmann 比较发现,德语词理据透明度较大,法语词理据透明度较小,英语居中。以下表几个词为例,可以看出德语词透明的理据性:

德语	英语	法语
Fingerhut(手指+帽→顶针)	thimble	dé
Schlittschuh(雪橇+鞋→溜冰鞋)	skate	patin
Ehelosigheit(婚姻+否定后缀+名词后缀→独身)	celibacy	celibacy

英语词汇体系中,单纯词所占比例虽不很大,但它是基本词汇主体。有人统计发现,英美平均使用 100 个名词,就有 60 个是单纯词,平均使用 100 个形容词,就有 62 个是单纯词,动词则更以单纯词为主[①]。现代汉语词汇以双音节合成词占优势,它的词义常是分析性的,英语等不少西方语言的词义常是综合性的,如英语介词 on、in 等在现代汉语里一定要说成"在……上、在……里"等,所以现代汉语的理据透明度更大。由于文化、社会和语言差异,两种语言间有时出现理据相近、相同而含义不同的现象,如日语"手紙(てがみ)"指书信,汉语"手纸"指大便纸。这往往影响到日本人和中国人对对方语言中手纸真正含义的理解。许多东方人、甚至欧洲人根据对本国情况的了解,错误地以为美国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内政部)是主管警察和安全事务的部门,其实它主管的却是矿产、森林、印第安人事务、渔业和野生动物[②]。关于词据变化,参第五章《变化》。

① 李冬:《汉英词语理据比较》,载王福祥编:《对比语言学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 年。

② 黄长著:《语言·文化·社会之断想》,载《外国语文教学》1985.4。

第二节 概念理据

按同义或近义关系组织起来的一群词统摄在一个概念之下，这群词在总体上表现出的有规律性的理据特征，可以看做这个概念得以形成的根据。换言之，概念理据是围绕着这个概念的一群同义（或近义）词的总体理据特征，它常可反映出一个民族的语言心理或人类普遍心理特征。

一、汉语喜悦概念的理据 在语义学中，把感情、感觉、躯体动作作为三种互不隶属的义类已成不争之论。几部影响较大的词汇语义系统大纲如梅家驹等（1983）[①]、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1964）[②] 都证明这一点。句法学也作了近似处理，如有心理动词、生理动词、动作动词之分。事实上，这三种义类之间却有着内在的联系。喜悦这种感情现实进入汉语系统并取得概念资格时，归根到底，需要借助感觉、动作意念的支撑。

汉语自古及今（无论单音词时代[③]，还是双音词占优势时代或两代之交），几乎所有含喜类义项的词（下称"喜类词"）[④]（包括损耗废弃的死词）都是从生理感觉或躯体动作意念衍生而来的。具体表现为以下四种情形：

1. 多义词本身已有感觉或动作义，喜悦义是它的引申义项。

2. 喜悦义之来源于感觉、动作，在词的字面上已具有理据自明性（semantic autonomy）。如喜类词"开颜、伸眉、笑眯眯、欢呼、喜吟吟、

① 梅家驹等：《同义词词林》，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

② 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1964）：《分類語彙表》，载《日本語教育のための基本語彙調查》，秀英出版，1984 年。

③ 我们考察了《说文解字》中差不多所有表喜悦概念的词。

④ 有的词虽参与喜悦表达，但喜悦意念并未进入词义范围，词典无法为其设立喜类义项，仍不算喜类词，如"高兴得跳起来"的"跳"。词内部也存在这样的语素，如"欢呼"的"呼"。

乐呵呵、开心、舒心、欢腾、欢跃、雀跃、开怀、捧腹"明显以躯体部位(如脸、眉、眼、口、心、身、胸、腹等)或派生物(如声等)作表情体(表情体又见第八章《意念》第二节"取象结构")。

3. 词本身的理据虽然隐晦,但词内字根的喜悦义是从感觉或动作义获得的,如"喜悦、愉快、快乐、欢喜、欢欣"等,只是字根的理据自明性已在漫长的使用历史中磨损掉了。

4. 感觉、动作义字与喜义字同源。同源现象与多义词内部义项关系并无本质差别,前者是在意义扩张突破张力限度后,不得不以小幅更变字形或读音的方式增加意义容器,使之裂变成几个词来完成意义的分配[①],同时又保留着联想的效果,使它们仍然维持在一个大的家族(词族)里。同源关系成员的衍生次序即便因资料限制不能明断,但仍然反映感觉、动作义与喜义相通的脉络。以下分析时,除个别古代字例为避免歧义或因简体缺字等不得不用繁体字以外,其余汉字一律用简体字。特殊情况下,在词目内以括号()标出繁体字。

(一) 生理感觉义的内化 喜类词的理据结构中,由生理感觉义转表喜义的,至少可归纳出以下十种类型:

1. 躯体觉

(1)/轻感/ 成批表轻感的词均能衍生出喜悦义,如"轻快"(谓行动不费力→轻松愉快)[②]。"轻"本指重量小,《现代汉语词典》(简称《现》,下同)释成语"轻歌曼舞"为"轻松愉快的音乐和柔和优美的舞蹈",可见"轻"已产生喜义。《现代汉英词典》将"轻歌曼舞"译为 sing merrily and dance gracefully ,"轻"对应于 merrily(快乐、愉快、高兴地)。这是"轻"表喜悦的又一个证据。

(2)/身体快感/ 成批表身体快感的词都能生产出喜悦义,表示精神快感。"舒服"原义是身体上感到轻松(如:洗完澡,浑身舒服),

① M. Cohen(柯恩):《语言——语言的结构和发展》,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59 年。

② 参见《汉语大词典》(简称《汉》,下同)释义。

引申义指精神上感到愉快(如:听了他的话,我心里不舒服)。同类词如"舒畅、惬意、快活、畅快、松快、快意、舒坦、写意、舒适、痛快、好过、伏帖"等,都能兼表身与心两种快乐的意味。

(3)/热感/　热义词能生产出兴奋、激动之喜。如"热呼呼"(形容热,温度比较高→形容心情激动兴奋)、"热腾腾"(热气蒸发貌→形容心情激动,如:心中热腾腾,乐滋滋,说不出的舒畅)。有的热义词在词典释义中索性只有喜悦义,如"热腾"形容兴奋激动:她的思潮立刻热腾活跃起来了。

2. 触压觉

/柔感/　表示柔感的词能生产出喜悦义。"柔"本义为软,《汉》释"柔颜"为和悦的面色,释"柔色"为和颜悦色,"柔"在这里显呈喜义,表和悦。"柔"也可与其他喜义字近义相连,构成复合喜类词,如"欢柔"犹和乐①。

3. 味觉

(1)/甜感/　成批的甜义词均能生产出喜悦义,如"甜美"(像糖和蜜的味道味→愉快、舒服)②、"甜丝丝"(形容有甜味→形容感到幸福愉快)③、"甜津津"(形容味道甜美→形容感到幸福愉快)④、"甜蜜蜜"(形容味道很甜→形容感到美好愉快)⑤。有的甜义词在词典释义中索性只有喜悦义,如"甜蜜"(形容感到幸福、愉快、舒适:孩子们笑得那么甜蜜)、"甜沃沃"(形容幸福愉快)⑥。

甜义字与喜悦义字同源的例子如"饴",《说文》段注:以芽米熬之为饴。《内则》曰:饴,蜜以甘之。"怡",《玉篇》曰:怡者,悦也,乐也。

① 参《汉》。
② 参《现》。
③ 参《现》。
④ 参《汉》。
⑤ 参《汉》。
⑥ 参《现》、《汉》。

古多假台字。《广韵》:怡,和也,悦也。

(2)/味美/　味美义字与喜悦义字同源(用←→表示)的例子如:"膪"(《广韵》曰:美肉)←→"恺(愷)"(段注:乐也)/"饎"(《说文》:酒食也。段注曰:酒食折,可喜之物也。故其字从食、喜。据《毛诗笺》,则古文以喜为饎)←→"喜"(《说文》:乐也)。

4.视觉

(1)/明/　明义字与喜义字同源的情形成组存在。如:"燡"(《广韵》:燡,火盛之貌。《古》[①]:燡燡,光明的样子)←→"怿(懌)"(《说文·新附》:怿,悦也。《广韵》:怿,悦也,乐也)/"昕"(《说文》:昕,且明也。《广韵》:日欲出也)←→"忻"(《说文》:忻,谓心之开发)/"暟"(《广雅》:照也)←→恺(愷)(段注:乐也)/"熹"(《文选·陶渊明〈归去来辞〉》:恨晨光之熹微。注引《声类》:熹,亦熙字也。熙,光明也。《中》[②]:熹,微阳也。《现》:天亮,光明)←→"喜"(《说文》:乐也)/"熙"(《尔雅·释诂》:光也。《广雅》:炽也。《汉》:照射)←→"婴"(《说文》:悦乐也。《广韵》:善也,悦也)/"瑜$_1$"(《古》:玉的光彩)、"喻$_1$"(《中》:明也,晓也)←→"喻$_2$"(《广雅·释训》:喜也)、"媮"(《中》:乐也)、"愉"(欢悦)/"焰"(《改并四声篇海》:火光也。《篇海类编》:焰,俗焰字)←→"慆"(《说文》:说也。段注:说,今之悦字)。

从明义引申出喜悦义项的多义字如"憭":段注引郭云,憭意精明。《说文》:憭,慧也。《广韵》:了者,慧也。段注:盖今字借了为憭。段注:快即憭意之引申。凡明憭者,必快于心也。《说文》:佼,憭也。《方言》:佼,快也。《孟子》赵注:佼,快也。又如"憀":姜亮夫说,憀,憀然也。洛萧切,今昭人俗用了然,然非指明白事理之义,乃谓心中舒畅尔,今俗以了为之,则大众化简之效也[③]。《广雅》:憭、晓、佼,快

① 《古》:《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的简称,商务印书馆,1981年。下同。

② 《中》:《中华大字典》的简称,中华书局,1978年。下同。

③ 姜亮夫:《昭通方言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也。《疏证》:憭、晓、佼,皆明快之义。又如"憭"的同源词:"瞭"(《集韵》:明也)、"瞭"(《周礼》郑玄注:目明者。《中》:目精明也)、"燎"(《汉》:烧烤,照明)。明则畅快,故明、快义通。

喜类字"愉、怿(懌)、悦"均有表说明义的同源字,如"喻$_2$"(说明)、"谕"(告诉,吩咐)、"译(譯)"(孔颖达疏: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按:使不懂之言变得明了)、"说(shuō)"(《墨子·经上》:说,所以明也),它们的意思都由明而生,是明的致动义。可见,从间接意念关系也可推定,喜、明义通。

(2)/形貌美/ 形美义字和喜义字同源的情形也是成组存在的,如"颐"(《说文》:长也,美也,广颔也。古人以容貌壮大为美[①],广颔即美颔)←→"嫛"(《说文》:悦乐也。《广韵》:嫛,善也,悦也)/"瑶"(《说文》:玉之美者)、"榣"(《说文》:昆仑山河隅之长木也。段注云:郭曰,榣木,大木也;韦注《晋语》亦云,榣木,大木也。按,即美木)、"媱"(《广韵》:美好也)、"瑶"(《集韵》:美目)←→"嗂、繇、傜"(《广韵》:乐也,喜也[②])/"瑜$_2$"(《古》:美玉)←→"愉"(《中》:乐也)/"娧"(《说文》:好也。《召南》曰:舒而脱脱兮。《传》曰:脱脱,舒迟也。段注:脱盖即娧之假借,此谓舒徐之好也。《说文》:好,媄也。段注:各本作美也,今正)←→"悦"(《尔雅·释诂》:乐也)、"说"(《中》:喜也,乐也,悦也,媚也)/"嫣"(《广韵》:嫣,好貌)←→"嘕"(《中》:笑貌)/"嬉$_1$"(《广韵》:美也。《集韵》:美姿也[③])←→"僖"(《广韵》:乐也。《说文·人部》:乐也。段注:此字之本义少用,其隶变为"嬉"字)。

有些词由美生喜的理据是自明的,如多义词"美"(美丽、美观→得意)、"美气"(美丽的云气→方言词,得意高兴:那几年咱日子过得多美气)、"美美"(美好:上陵何美美,见《乐府诗集》→形容非常满意

---

① 孙雍长:《管窥蠡测集》,岳麓书社,1994年。

② 其他意义从略。

③ 其他义项从略。

舒畅:想美美地活到整一百)[①]。

有的美义词在词典释义中索性只有喜悦义,如"美孜孜"形容内心喜欢、畅快的神态:俺这里美孜孜在芙蓉帐里笑春风(元·关汉卿《望江亭》)。

5. 听觉

/乐(yuè)美/　表示音乐和谐入耳的词能生产出喜悦义。如《说文》:龢,乐和调也。《中》按,此为"龢"之本义。《汉》:"龢",喜悦,"龢会"犹欢会。《文选》张衡赋注,"龢"与"和"音义通。玄应引王注云,和,音乐和调也,即此义(另参下文"(二)躯体动作义的内化")。

6. 神经觉

/醉/　从酒乐义引申出而喜悦义项的多义词如"酣"。《汉》:酣,半醉,另义为畅快。《广韵》:中酒曰"酣",又乐也。《说文》:酒乐也。《广雅·释诂》:酣,乐也。《庄子·渔父》:饮酒则欢乐。

(二)躯体动作义的内化

喜类词的理据结构中,由躯体动作义转表喜义的,至少可归纳为以下9种类型:

1. /笑/　笑能生产出喜悦义。先以喜、欣二字的喜义理据为例。

"喜"的喜类意念也是从笑义衍生而来的。《说文》:喜,乐也。从壴,从口。段注:壴,象陈乐立而上见;从口者,笑下曰喜也。喻闻乐开口而笑。同源字如"嘻"。《中》:嘻,笑乐之貌。《集韵》:嘻,笑也。

"欣"的喜类意念从笑义衍生而来。《说文》:欣,笑喜也,从欠斤声。段注:"訢"与欠部"欣"音义皆同。许慎曰:訢,古欣字;訢,喜也。"言、欠"均与口有关。《集解》:訢訢,声和貌也。《说文》:听,笑貌也,从口斤声。王力说[②]:"喜"与"欣、訢"属之文两韵之通转。从"喜"的

---

① 释义均见《汉》。

② 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

词据为笑推，欣的喜义亦源于笑。

有些喜类词与笑义的词据关系有某种程度的自明性，如"喜吟吟、乐呵呵"均以笑声为喻。笑义字与喜义字同源的例子如："咦"（《广韵》：笑貌）←→"恞"（《广韵》：悦乐）。笑义字可与喜义字构成复合喜类词，如"欢哈"（欢笑。《广韵》：哈，笑也）、"欢笑"（欢乐地笑）、"喜笑"（喜悦而笑）、"欢噱"（欢快地大笑）、"喜噱"（大声欢笑）[①]。对应比照词典释义与词内语素，也能看出笑、喜义通之理，如"欢颜"（欢乐的容颜，笑脸）、"欢靥"（笑窝）[②]。两词之"欢"均以"笑"释。

眯眼、捧腹、喷物、弯腰等也能从脸以外的部位如眼、腹、口、腰等表现笑态，以示喜悦。如从杨朔《模范班》中的一句话可看出"笑眯眯"（形容微笑时眼皮微微合拢的样子）与喜悦的关系：张治国心里高兴，脸上就带股笑眯眯的劲儿。"捧腹"（捧着肚子，形容发笑）、"喷饭"（谓吃饭时因忍不住笑而喷出饭粒，后用以谓惹人发笑）。反映喜、曲两义同源的字如"欢（歡）"（《说文》：欢，喜乐也）←→"弲"（《说文》：弓曲也。段注：偏旁多后人所加，作"弲"者，正是古文草初生句曲也）、"躘"（《广韵》：曲也。《集韵》：蜷或字。《中》：蜷，卷曲，不伸也）。又《说文》：笑，喜也，从竹从犬。但杨承庆《字统异说》云，从竹从夭，竹为乐器，君子乐然后笑。李阳冰遂云，竹得风其体夭曲，如人之笑。段注：从竹之义不敢妄言。按，此处姑作一说。这些都是笑、喜义通的证明。

2. /歌·舞/ 歌舞能生产出喜悦义。

"乐（樂）"的喜类意念从歌舞义衍生而来。《一切经音义》引《仓颉》：喜也。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引叶德炯曰：礼乐（yuè）之乐，引申之，则为喜乐（lè）之乐。《说文》：乐，五声八音总名。段注：引申为哀乐之乐。李金中等：两义同字，因音乐是快乐时的创作。古人的音乐

① 释义均见《汉》。
② 释义均见《汉》。

是连歌带舞的东西,《吕氏春秋》说,古代葛天氏这族的乐是三个人操着牛尾巴,脚踏节拍口中唱歌[①]。换言之,乐(lè)正是这种连歌带舞的乐(yuè)的转义。相关词"乐容"谓舞[②]。

"和"喜类意念从唱和义衍生而来。西周金文从木从口会意,且口字与木枝相连。造字之意,以鸟雀在树木枝上鸣叫,此唱彼和,互相响应,表示相应。是和字本义。鸟鸣叫与人歌唱相类,故又表示人以歌声相应。春秋战国时,改木为禾,淘汰了从木的原始逼真形体。鸟在树木上此唱彼和,表现出喜悦之情,故引申为喜悦。《书·康诰》"四方民大和会",孔传:四方之民大和悦而集会。鸟儿在树木上此唱彼应,自然协调,故引申为和谐[③]。"和"可与其他喜义字近义相连,构成复合喜类词。如"和怡"(犹温和、和谐快乐)、"和悦"(和乐喜悦,又和颜悦色,和容悦色)、"和喜"(和洽喜悦)、"和舒"(和畅舒适)、"和愉"(犹和悦。和颜悦色,心情舒畅)、"和恺(愷)"(和乐)、"和乐"(和睦欢乐)、"和怿(懌)"(和悦)[④]。

"歖"的喜悦义从歌咏义衍生而来。《说文》:歖,吟也,谓情有所悦,吟叹而歌咏。"歖、叹"今均简作"叹"。但段注:古"歖"与"嘆"义别,"歖"与喜乐为类,"嘆"与怒哀为类。

"歖":歌。又通"愉",欢悦(《古》)。

"坎、墫":《尔雅》,坎坎、墫墫,喜也。《义疏》,坎坎、墫墫,皆鼓舞欢喜。坎者,竷之假音也。《说文》云:竷,繇也,舞也。《诗》:竷竷舞我,《玉篇》云:竷,和悦之响也,今作坎。按《诗》之坎坎并主声言。《伐木篇》坎坎言鼓,蹲蹲言舞,分晰甚明。竷,和悦之响。和悦即喜,响即鼓声。墫者,《说文》云:舞也。《尔雅释文》引舍人云:墫,舞貌。

---

① 李金中等:《汉字实用知识》,文汇出版社,1995年。

② 释义见《汉》。

③ 何金松:《汉字形义考源》,武汉出版社,1996年。

④ 释义均见《汉》。

歌、舞义字可与其他喜义字构成复合喜类词，如“欢唱”（欢乐地唱歌）、“喜舞”（欣喜起舞，欢欣鼓舞）、“忻舞”（犹言欢欣鼓舞）、“忻蹈”（欢欣舞蹈）①。

3. /开/ 开解、开脱能生产出喜悦义。

“悦”的喜类意念是从身、心的开释、解脱义衍生而来。《说文》：说，释也。段注：“说释”即“悦怿”，“说、悦，释、怿”，皆古今字。许书无“悦、怿”二字也。“说释”者，开解之意，故为喜悦。《正义》改说为怡悦字。釆部曰，释，解也。《广雅》：兑，解说也。《疏证》：悦，犹说也，解脱也。人心有郁结能解释之也。《学记》云：相说以解。《左传》：卫人出其君以说于晋，公惧于晋，杀子丛以说焉。皆解之义也。《广雅疏证》：输，脱声之转，输之转为脱，犹愉之转为悦矣。《方言》：输，捝也。郭璞注：捝，犹脱耳。可见，“愉、悦”一音之转，两字义理据同构。据“悦”推，“愉”之喜义亦源于开②。

“快”的喜类意念从酥解义衍生而来。《说文》：快，喜也，从心，夬声。《宋本广韵》：称心也，喜也，可也。《古》：“快”在上古只作“高兴、痛快”讲，段注：引申之义为疾速，俗字作“駃”。《说文诂林》引罗汝怀《说“快”》曰：“快有惬义，即惬心之谓，当训惬。《广韵》云称心者，实得其义。新惬而始喜，未有不惬而喜者。《后汉书·华佗传》：体有不快，此言体不惬适耳。如《易·旅卦》：心未快也，则言心之不惬适，然必指体与心言之，不快字乃有著。《辍耕录》乃云，世谓有疾曰不快，此沿《华佗传》而失其文意也。若单言不快为疾，则问疾者可言问人不快乎？”《释名》：夬，决也，有所破坏决裂之于终始也。《广韵》：诀，诀别；缺，器破；玦，佩如环而有缺。《说文》：肤，孔也。段注：尻孔也。

① 释义均见《汉》。

② 另一说，“愉”为“怡”之假借，“愉”的喜类意念从脸色和气义衍生而来。郑注：愉愉，容色和也。《礼记》：有和气者必有愉色。《说文》：愉，薄也。段注：愉读曰偷，此薄也当作薄乐也，谓浅薄之乐也。《唐风》：他人是愉。传曰：愉乐也。毛不言薄者，重乐不重薄也。

《玉篇》:昳,日食色也。《玉篇》:窦,穿也,空也。《广韵》:痪,疮里空也。《古》:抉,挖、戳。《说文》:趹,马行貌。《战国策》《史记》云:秦马之良,探前趹后,蹄间三寻。《广雅》:趹,奔也。《现》:觖,〈书〉不满足。王力说:"水缺为'决',玉缺为'玦',器缺为'缺',门缺为'阙'。它们以语音的细微差别(或同音),表示相近或相关的概念。"[1] 可见,古"夬"旁字大多含损缺、离碎义,"快"亦有开、解之义,故当训"惬",而后又引申为喜。

再看"忻"。《说文》:忻,闿也,从心斤声。善者,忻民之善,闭民之恶。段注:闿者,開也。言闿不言開者,闿与忻音近,如昕读若希之类也。"忻"谓心之开发,与欠部欣谓笑喜也异义,《广韵》合为一字,今义非古义也。王力《同源字典》引《淮南子·览冥训》注:忻忻,犹自喜得意之貌也。《广韵》:忻,同欣,喜也。显然,"忻"的喜义源于开。

不少由人体部位字跟开义字连成的复合喜类词理据自明,如"开心"(心情快乐、舒畅)、"开怀"(心情无所拘束,十分畅快)[2]、"开颜"(脸上露出高兴的样子)、"开眉"(笑,开颜)、"开颦"(舒展双眉,指高兴。按,颦,皱眉)、"开颐"(犹开颜)、"开靥"(犹开颜。按,靥,酒窝)、"舒眉"(展开眉头,表示心情欢乐的样子)、"舒颜"(欢跃貌)、"舒怀"(开怀,心情舒畅)、"解悦"(喜悦)、"解说"(①jiěshuō 解释,说明。②jiěyuè 舒解,欢悦。③jiětuō 解脱,解下)、"解颐"(谓开颜欢笑)、"启颜"(开颜,谓发笑)[3]、"启齿"(笑)、"解颜"(欢笑)[4]。开(開)义字可与其他喜义字近义相连,构成复合喜类词,如"开爽"(舒畅爽快:精神复完,胸次复旧开爽。明李贽《与杨定见书》)、"开畅"(宽敞舒畅:他是那么开畅地笑着。沙汀《困兽记》)、"欢释"(欢心开怀)[5]。

---

① 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
② 释义均见《现》。
③ 释义均见《汉》。
④ 释义均见刘英民等整理、明冯梦龙《古今笑史注》,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年。
⑤ 释义均见《汉》。

与“开”有内在因果关系的宽、松二义，均能相应衍生出喜悦义，但能产性远不及开。这类字可与其他喜义字近义相连，构成复合喜类词，如“宽快”（舒畅、舒适）、“宽愉”（宽舒和乐）、“宽畅”（舒畅）、“宽乐”（宽厚和乐）、“松快”（轻松爽快）、“松畅”（轻松爽快）。宽、松义字也可跟人体部位字组成喜类词，如“宽心”（心情舒畅：等我宽心的吃几杯儿。元李文蔚《燕青博鱼》）。也有含开、喜两义的多义词，如“松”（解开、放开→松快①）。

4. /起举/ 除一般意味的“起举”外，跳、伸、挺、抬、昂等义亦归入此类。

“俑”：《广韵》：心喜也（又，出也）。《说文》段注：凡从甬声之字皆兴起之意。如《广韵》：甬，草花欲发貌；涌，涌泉；踊，跳也；俑，木人送葬，设关而能跳踊，故名之；桶，古之斛，口小底大；捅，进前也。按，痛，刺痛、锐痛，别于钝疼。可见，俑的喜义来源与起举义有关。

“慆”：《说文》：慆，说也。段注，说，今之悦字。《说文》：蹈，践也。段注引《释名》曰，蹈，道也。以足践之如道。引申为跳动，如舞蹈、手舞足蹈。慆、蹈同源，可见慆的喜义来源与跳义有关。

“兴(興)”之喜义属起举义之转。《说文》：兴，起也。《广韵》：盛也，举也，善也。《广雅》：《学记》郑注云，兴之为言，喜也，歆也。《正义》引《尔雅》云：歆、喜，兴也，兴与嬹通。《说文》：嬹，说也。段注：说，今之悦字，兴与嬹古同也。《义证》：《广雅》，嬹，喜也，通作兴。《尔雅》，熙，兴也。兴当为嬹，熙当为媐。

有些词理据自明，如“雀跃”（如雀之跳跃→表示欣喜之极）、“雀踊”（犹雀跃）、“伸眉”② （舒展眉头→形容得志）③。起举义字可和喜义字构成复合喜类词，如“欢腾”（欢喜得手舞足蹈）、“欢跃”（欢腾）、

---

① 释义均见《汉》。

② 《同义词词林》将“伸眉”列入喜类词。

③ 释义均见《汉》。

"欢踊"(欢喜得直蹦直跳)、"喜踊"(欢喜跳跃,形容极度高兴)、"喜跃"(欢欣踊跃)、"忻跃"(犹言欢欣鼓舞)[①]。

5. /鼓掌/ 喜义字与鼓掌义字同源的例子如:"忭"(《古》,喜乐)←→"抃"(《古》,鼓掌)。有些词理据自明,如:"鼓掌"(拍手→表示高兴、赞成、欢迎。《现》)、"抃舞"(形容高兴得又鼓掌又跳舞的样子→表示高兴极了[②])。鼓掌义字可与喜义字组成复合喜类词,如:"欢抃"(喜极而鼓掌)、"喜抃"(谓欢乐之极以至于手舞足蹈)、"忻抃抃"(欢欣)[③]。

6. /叫/ "欢(歡)"的喜义与叫有关。《说文》:欢,喜乐也。《中》:喜动声气,故从欠。《释名》:欠;钦也,开张其口唇钦钦然也。王先谦《释名疏证补》曰,吴校作开张其口作声钦钦然也。《广雅·释训》:钦钦,声也。《说文》:欠,张口气悟也,象气从儿上出之形。段注:此谓之欠,亦谓之嚏。《宋本广韵》:嚏,鼻气也。"欢(歡)"的同源字"讙"(《说文》:哗也,又同"欢")←→"嚾"(《古》:大声呼叫)。

叫义字可与喜义字组成复合喜类词,如:"欢叫、欢呀"(欢呼)、"欢呼"(欢乐地喊叫)、"欢哄"(欢闹)、"欢啸"(欢呼)、"欢闹"(欢腾,嬉闹)。叫的相关义字亦可根据此理组词,如"欢声"(欢乐之声,欢呼之声)[④]。

7. /喘/ 《说文》:啴,喘息也,一曰喜也。以喘息气急喻喜。《礼记·乐记》:其乐心感者,其声啴啴以缓。注:啴啴,宽绰貌。

8. /抖/ "抖"原义颤抖,引申为高兴、得意。如:"现在他抖起来了。"

---

① 释义均见《汉》。

② 释义见王安节等:《简明类语词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年。

③ 释义均见《汉》。

④ 释义均见《汉》。

9. /销魂/　“销魂”,《同义词词林》列入喜类词[①]。

综上所述,汉语喜悦概念的形成都需要借助感觉、动作意念的支撑。是事态相关性主导着这种方式的认知活动和意义扩张。把与喜义单音词及有关的其他单音词按纵向同源、多义关系和横向理据类别关系贯穿起来,马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比较下表(字下用一标出的词,释义在前面已注明,不再重复列出):

理据	系列 1	系列 2	系列 3	系列 4	系列 5	系列 6
明	昕	瞦熹$_1$	烁(爍)	暚	爟	
形美	頎	嬉$_1$ 熹$_2$	爍	瑶榣$_1$ 媱暚	嬳	
美味		熺				
甜						饴
热	炘	熹$_3$				
开	忻					骀
露齿	齗$_1$					
眯眼	昕$_1$					
笑	听齗$_1$ 欣齗$_2$	嘻喜$_1$	乐(樂)$_2$			咍
环顾					矔	
弯曲					蠸躍	
叫					欢(歡)讙嚾	
歌舞			乐(樂)$_1$	谣謡榣$_2$ 飖		跆
起举	掀		躒	鹞摇瑶	權爟顴	
喘				欿		
喜	欣訢$_2$ 忺昕$_2$	喜$_2$ 歖 嬉$_2$	㦡(樂)$_3$	嗂繇傜	欢(歡)懽驩	怡台诒

① 《现》:销魂,形容极度的悲伤、愁苦或极度的欢乐。可见,“销魂”是感情综合词,有别于其他各处所举的感情分析词。

系列 1："颀"（《说文》：头佳貌）；"炘"（《广韵》：热貌。《左传释文》引《字林》：焮，火气也。焮，《玉篇》：炙也；《集韵》：爇也。按：爇，点燃、焚烧。《小尔雅·广诂》：日炙物亦曰焮。疏：焮，干也）；"龂$_1$(yín)"（《汉》：牙床。龂龂：露齿貌。按，"露齿"是"口开"蕴涵式）；"昕$_1$"（《类篇》：视不明貌。按，此与昧眼义相类，比较"昕$_2$"）；"龂$_2$"（笑貌。龂龂：喜笑貌）；"掀"（《说文》：举出也。又《中》：高耸貌，如韩愈诗：蛇虺首掀掀。《集韵》：手高举出也）；"惞"（《集韵》：喜也）；"昕$_2$"（《玉篇》：喜也）。

系列 2："矔"（《说文》：目童子精瞦也。段注：当作曰瞦也，精为精光也）；"熹$_2$"（《广雅·释诂》：美也。《广韵》：盛也博也。古人以壮大为美，故盛，博亦美义）；"熹$_3$"（《说文》：炙也。段注：炙者，抗火炙肉也。此熹之本义。引申为热也。《广雅·释诂》：炽也。《玉篇》：热也）；"歖"（《说文》：卒喜也。段注：卒疑当作猝。歖，古文喜）；"嬉$_2$"（《中》：乐也）。

系列 3："烁(爍)"（《说文·新附》：灼烁，光也。《文选》吕延济注：爍，明。又《汉》：照射、闪耀；热、烤）；"[illegible]"（《集韵》：美貌）；"乐(樂)$_2$"（《汉》《现》：笑。相关词[樂眼]犹笑眼①）；"躒"（《汉》：跳动，跳跃。《玉篇》：动也。《集韵》：跃或字。相关词[樂顛顛]《汉》：形容行走欢乐的样子）。

系列 4："暚"（《玉篇》：日光也。《集韵》：明也）；"謠"（《汉》：歌謠）；"媱"（《说文》：曲肩行貌。段注：要媱，舞容也）；"榣$_2$"（《说文》：树动也）；"飖"（《广韵》：飘摇）；"鳐"（《广韵》：文鳐鱼，鸟翼能飞，白首赤喙，常游西海，夜飞向北海）；"徭"（《方言》：上也）；"𨄞"（《说文》：跳也。《广韵》：跳跃行步貌。段注：陈郑之间曰𨄞）；"㰹"（《说文》、《广韵》：气出貌。《说文·文部》段注：《诗》"君子陶陶"，传曰：陶陶，和悦貌。疑正字当作"㰹"）。

系列 5："爟"（《说文》：举火曰爟。《吕览·本味篇》高诱注：爟火，所祓除其不祥，置文于桔槔以照之。《中》：爟与權通。张晏曰：權火，欲令其光明远照达于祀所也）；"孉"（《正字通》：同"婘"。《广雅·释诂》：婘，好也）；"權"（段注：举也；爟读曰權：爟權一也。）；"顴"（《现》：颧骨，眼睛下边两腮上面突出的颜面骨）；"矔"（《汉》：环顾。《古文苑·刘歆〈遂初赋〉》：空下时以矔世兮，自命己之取患。章樵注：矔，转目视也）；"懽"（《现》：古欢、懽异体，快

① 释义见《汉》。

乐、高兴);"驩"(段注:孟子借驩为歡。《中》:驩,马和乐貌)。

系列6:"骀"(《说文》:马衔脱也。歡注引崔实《政论》曰:马骀其衔是也。衔脱则行迟钝。又引申为宽大之意);"跆"(《广韵》:蹋跆连手唱歌。《说文》歡注:蹋俗作踏。《说文》:蹈,践也。《篇海》:踌,践也);"咍"(《广韵》:咍,笑也。《古》:①嗤笑。②喜悦、欢笑);"台"(《说文》:说也。段注曰:台说者,今之怡悦字);"诒"(郑曰,诒,说也)。

从比较中可以发现,喜悦事态下邻近特征的内在相关性,是约束相互关系,并使之收敛在同一张力下的砝码。五官感觉可以互通。普济岛岛民看见美丽的女性并被她感动,就会自然垂下口水①,汉语也说"秀色可餐"。这是视、味觉美感的互通。除五官感觉的互通,各种感官的舒适又可带来精神喜悦的结果(反之亦然)。"好听、好看"的同义词"悦耳、悦目",直译是"叫耳朵高兴、叫眼睛高兴"。难怪詹姆士(W. James)说,心灵的情感无论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同时也是身体的情感②。《淮南子·本经训》又云,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则乐,乐斯动,动斯蹈,蹈斯歌,歌斯舞,舞则禽兽跳矣。人在喜悦时自然表现出一系列有生物性联系的生理感觉或躯体动作,它们遍布人体各种器官。这些非意志性体态语言② 和相关现实寄生于自然语言之后,只要不犯禁忌,都有资格在语言中作为喜悦感情的替代品,以实现对这种抽象概念的表达和指谓,于是形成这种独特的词义扩张模式。其独特性表现在:同一基本扩张系列的各成员之间不存在任何程度的相似性,其语义流转无法用相似性说明,而是以事态相关性系联在一起的。

词义成员之间的事态相关性,本质上是对液态话语层次上同类现象的筛选和凝定。与词义成员多样性相类似,话语中也有表情线索(expressive cues)的多样性。人在喜悦时的生理表征遍布于各种

① 祖父江孝男:《简明文化人类学》,中译本,作家出版社,1987年。

② (W. James)詹姆士:《彻底的经验主义》,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

③ 卫志强:《当代跨学科语言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

器官,各人的反映又不尽相同。这是其多样性和等价性的共同生理现实基础。将这些词义成员与喜义句的同型话语表达式作一比较,可以加深我们对事态相关性的理解和认识:

——两只眼睛透出了欢快的光泽。(《敌》①。)(——明)

——她说得很兴奋,一双晶亮的眼睛珍珠般地闪耀着。(《红》)(——形美)

——于是一缕愉悦的心情涌起,其滋味如初泡的碧螺春。(《叶》)/他现在高兴哩,恰如吃肉。(泰州盐城一带方言)。(——美味)

——脸上总是露着甜甜的笑意,像是心头搁着一块喜酥糖,老是溶化不完。(《芳草》1982年第9期P30)(——甜)

——我只觉得脸热,真高兴死了。(《城》)(——热)

——放开容颜喜笑。(《徐2》)(——开)

——笑得露出了满嘴的牙齿。(《张》)(——露齿)

——石牛子乐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缝。(《北》)(——眯眼)

——心里喜欢脸上笑,谁还有那些个眼泪往外拌。(《贺》)(——笑)

——他的脸上带着胜利的笑容,一对眼睛活像老鼠眼。(《巴8》)(——环顾)

——笑得直不起腰来了。(《从》)(——弯曲)

——(三个孩子)高兴得呜呜直喊叫。(《平》)(——叫)

——几乎想大声地唱了出来。(《冰》)|码头上敲锣打鼓,一片欢腾。(《主》)(——歌舞)/高兴地舞蹈起来。《许》(——歌舞)

——得意地挺了挺脖子。(《张》)/像孩子似的高兴得蹦起来。(《敌》)(——起举)

——喜得气喘喘地。(《艾》)(——喘)

在印欧语言中,表示情感的词常常来自伴随相关情感的行动、知觉的词或者受这些行动影响的身体器官。肉体的自我与内心的自我

① 书名号内的汉字是引用书名的简称,下同。详见"附录一",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相等的现象在英语和整个印欧语系中是无所不在的[①]。这其实是众多语言的普遍特征。比如,人类感觉与喜义的连通有一定普遍性。由轻义、甜义衍生出喜义的词汇多义现象在许多语言里存在,反映了语言跟人类心理认知的深层关系。试比较:

		(1)轻义	(2)喜义
英语[②]	light	+(不重)	+(愉快的)
	buoyant	+(能漂浮的,有浮力的)	+(心情愉快)
德语[③]	leicht	+(轻的、不重的)	+(轻松的、愉快的)
俄语[④]	легко́	+(轻)	+(轻松愉快)
日语[⑤]	かるい	+(重量小)	+(心情愉快)
		(1)甜义	(2)喜义
西班牙语	enmelar	+(给事物抹蜂蜜,加蜂蜜)	+(使愉快)
	dulce	+(甜的)	+(使人愉快的)
法语	doux	+(甜的,甜味的)	+(愉快的)
英语	sweet	+(甜的)	+(愉快的、快乐的)

哲学将现实主要分为两种实在:一种是物理存在(即占有空间的存在),一种是心理存在(即不占有空间的存在)[⑥]。李安宅说,语言越到有形可见的范围,效能越大,越到心理的情绪方面,越到思想的抽象方面效能越小[⑦]。所以哲学家们认为,人的内心世界是不可直接表达或言说的[⑧],在用物质性语言以某种程度接近这种看不见摸

① 伊万·E·斯威策:《语义结构与语义变化(上)》,中译,载《外语与外语教学》1993.4。

② 《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③ 《德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④ 《大俄汉词典》,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⑤ 金田一春彦等:《学研国语大辞典》,学研社,197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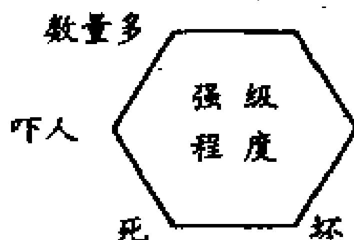
⑥ H·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⑦ 李安宅:《意义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

⑧ 吉尔铂特·赖尔:《心的概念》,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不着的非物质的精神时，只能通过形象暗示的方法，依据与物质世界的类比，从物质世界中抽取出来的形象来描写它，最大限度地接近它，反之，就几乎不可能表现它[1]。

二、强级程度概念的理据 普遍性程度较大的概念理据还有强级程度的理据模式。强级程度义往往与数量多、吓人、死、坏等意义同辞，前者是后者的转义。如图：



以"数量多"转指程度大，如日语すくなからず(不少、很多→非常、很)、；越南语 lam(多、许多→甚、很)；江苏金沙话"交关"[多(如：交关人)→很(如：好了交关)]；德语 sehr(很多、大量地→很、甚、极其、非常)、stark(大量地→很、极、非常地)。

以"吓人"转指程度大，如日语すご(凄)い(可怕、吓人→非常)；德语 unheimlich(阴森森的、叫人害怕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非常、很)、schauerlich(恐怖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骇人听闻的、可怕的→很、十分)；法语 terriblement(可怕地)、effroyablement(可畏的)都可用以表示最高级[2]。金沙话"好了没得魂"，是说"好得很"。

以亡毁相关词转指程度大，温州地区有用"棺材、死人"来表示"很"的，如"棺材好、死人好"是说"非常好，很好"。宿迁话可以用病、死词("死、瘟、瞎")转作程度副词，表强级程度，如"死辣、死热、死懒、

① 莫里斯.贝姆尔：《精神的形象再现和对不可表述之物的表达》，载《美学译文(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② J. Vendryes(房德里耶斯)(1920)：《语言》，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

死慢、死笨、死犟、死蠢；瘟臭、瘟臊；瞎老、瞎涩、瞎丑、瞎腥"等[①]。粤方言廉州话用死表程度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如"基屋头热死广热(这屋里热得要死)；个只老儿番蛮死广番蛮(这个老头非常不讲理)"[②]。安庆贵池话"瘟苦、瘟腥、瘟臊、瘟酸、瘟臭；死长、死重、死高、死厚"中的"瘟、死"表强级程度[③]。

语言常可用"不好"转指程度大，如普通话"不行、坏了"等都表强级程度，如说"热得不行、热坏了"。"蛮"本指凶恶、粗野，后转指"很、挺"。普通话强级程度词"很"原义为狠。《广韵》：很，戾也，俗作"狠"。J. Vendryes(1920)指出，一般说来，只要法语词根表达的是某些粗鲁的、粗糙的观念，就足以表达最高级的意思，因此 rudemment(粗鲁地)、salement(肮脏地)、furieusement(凶猛地)都可用以表示最高级[④]。

除这些理据资源外，强级程度还选择别的理据方式，如"好"等。比较"我等得你好苦！"和古汉语"始皇默然良久(《史记》)"，这里的"好、良"在表强级程度方面，用的是同一种理据方式。

第三节　义类理据

当某种理据不仅适用于一个概念，还适用于这个概念所属的整个义类，这种理据叫做义类理据。古汉语可用头发、牙齿、视力、体力、皮肤等与年龄有常规关系的事物来喻指年龄[⑤]。用人的头发表年龄的如"年发、年鬓"(→年龄)，"童发"(→童年)，"晚发"(→晚年)。

---

① 用"死"修饰的往往是人们厌恶的性状。不能说"死俊、瘟香、瞎甜"。力量：《宿迁方言单音节形容词表程度的几种形式》，载《淮阴师专学报》1984.1。

② 蔡权：《廉州话的形容词谓语句》，载《山西师大学报》1987.2。

③ 李金陵：《贵池方言中形容词语的生动形式》，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85.3。

④ J. Vendryes(房德里耶斯)(1920)：《语言》，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 年。

⑤ 王海棻、吴可颖：《古汉语表年龄的语词及其文化背景》，载《中国语文》1994.5。

以头发的不同颜色表年龄的，如“华发、华颠、华首、华鬓”（→头发斑白的老年人），“白首、垂白”（→白发苍苍、白发下垂的老年人），“黄发”（→头发白久变黄的老年人）。用发形、发式表年龄的，如“髫”（儿童下垂的头发→小孩和幼年）、“总角”（古时候成年男女的一种发式→童年与少儿）。用头发上的饰物等表年龄的，如“笄”（古俗女子满十五岁用笄将头发绾起固定→少女成年：“弱笄、初笄、笄年”），“冠”（古代礼俗，男子二十或十九岁行成人之礼，结发戴冠→男子满二十或十九岁：“冠、既冠、弱冠”）。用人的牙齿表年龄的如“年齿”（→年龄），“老齿、暮齿”（→老年），“壮齿、茂齿”（→壮年、青年），“幼齿、童牙、弱齿”（→幼年、童年）。这些都蕴含着古代社会有关礼制的、心理的、民俗的诸多文化现象，在现代汉语的词中，这种理据方式已见不到了，有些还在言语中得到液态表现，如“我老了，头发都白了”。与习俗和礼制相关的理据方式即使在液态言语中，也不可能找到。尚不清楚同类理据方式在其他语言里的情况如何。

下面看几种具有普遍性的义类理据模式。

一、以度量体态称说非标准长度单位的模式 在许多语言里，非标准长度单位常与人度量时的肢体姿态有关，这是人类普遍运用手或脚作为测量工具的印记。在汉语中，普通话量词“庹(tuǒ)”是成人两臂左右平伸时两手之间的距离，约合五尺。漳州话的“寻[siam13]”、湖南江永话的“[pai55]”等都是这样一种理据来源和指谓意义。普通话量词“拃(zhǎ)”表示张开的大拇指和中指（或小指）两端间的距离，湖南江永话“[tu33]”①、漳州话“[lia13]”② 是拇指与中指伸开的长度，高安（老屋周家）话“[k'am11]”是张开的大拇指和食指两端间的距离③。用人体作度量依据的现象也广泛表现在其他语

① 黄雪贞：《湖南江永方言词汇》，载《方言》1991.4。

② 林宝卿：《漳州方言词汇》，载《方言》1992.4。

③ 也指一条腿迈出的距离。高安地点参《方言》1981.2。

言中,如古俄语的量度 пядь 最初是指伸直的大拇指尖和食指尖之间的距离,后来就定为四分之一俄尺[①]。

肢体也是人类计数的工具。初民们不能直接计算客体本身,而要借助手指、脚趾、石块、木棒等来间接地知道其他物体的数量[②]。英国学者 E.B.Tylor 指出,北美洲土人知一手为五,两手为十之数。许多土人用手指为计,举手三次即是十五,两手为十,加两足为二十,两人为四十[③]。陆懋德根据亲身经历指出,西人谓许多土人中"有称五为一手,及称十为两手"者,其说可信[④]。人体是人类度量的普遍理据来源。用人体某个部位的数目或形状来喻指对象事物的量,是人类语言的普遍换喻方式。相关内容参第一章《导言》第三节"文化对语义的作用"。

二、时间的空间隐喻模式 时间概念大多是在空间概念基础上形成的。时间词多半来自方位词。俄语中所有表时间的前置词差不多都来自表空间的前置词。其他语言如德语的 an(在……旁→在……时候)、vor(在……前面→在……以前),法语 apres(在……后面→在……之后),英语 to(到……地方→到……时候),汉语"从、在"和"上午、下午、年底、以前、日后、远古、三天左右"等等。时间概念也可用表空间运动的趋向动词来表示。如汉语"去年、过去、来年、将来、往日、往常、以往、至今"等等。英语 I'm *going* to write,用"去"表将来,跟汉语用"去"表过去正好相反[⑤]。相关内容详见第一章《导言》第三节"文化对语义的作用"。

三、货币的材料换喻模式 语言里常以货币的材料来称说货币。

---

① 布达哥夫:《语言学概论》,中译本,时代出版社,1958 年。

② A.Г.斯皮尔金:《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上抽象思维的形成》,载《言语思维意志感情及其他》,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56 年。

③ 引自陆懋德:《中国古文数名考原》,载《燕京学报》第 40 期(1950 年)。

④ 引文同上。

⑤ 吴玉璋:《从语言的类型对比看人类的共性》,载《福建外语》1988.3~4。

古代汉、俄民族都曾用布帛作为支付手段，所以古汉语表钱币的“布、币”都与“巾”有关，俄语 платить（支付）和 плата（费，工资）的词根 плат，古义也是“一块布”。拉丁语 pecunia（钱）只是 pecus（牲畜）的派生词①。英语 fee（费）的古义为“牲畜、财产”，跟德语 Vieh，瑞典语 fa，丹麦语 foe 同源，意义都是“牲畜”，反映了古时曾以牲畜作为一般价值形态的体现物。罗曼民族曾广泛地使用银子作货币②，所以法语 argent，西班牙语 plata 既指“白银、银币”，又泛指“货币、金钱”。从汉语表示钱币的“银子、金钱、铜钱”等词中，也都可以看到钱的质料。

第四节 句义表达式

句子语义范畴向其他语义范畴或句法范畴的扩张，以及语义范畴跟句义的关系不仅是句法学研究的问题，也应引起语义学的关注。用什么方式表达一种意思，跟文化和思考方式不无关联。当把几种语言进行对比的时候，就能看出这一点。

一、语义范畴的扩张 为加强现有材料的表现力，语言中的一种语义范畴可以按一定方向朝另一种语义范畴或句法范畴扩张。如日常语言中关于领有的表达。日语是典型的存在表达法，用存在范畴表领有范畴；英语是领有动词表达法，领有范畴配有专门的词汇形式。比较：

日语	英语
私には子供が二人いる。	I have two sons.
（直译：我这儿存在两个儿子。）	（直译：我拥有两个儿子。）

① J. Vendryes（房德里耶斯）（1920）：《语言》，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 年。

② 伍铁平：《论语言中所反映的价值形态的演变》，载《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2.2。

为了跟存在表达相一致，日语连人也场所化了。如ねつがある〔我发热←(热存在)〕是很自然的说法，它的同义补足句是“私にはねつがある”〔我发热←(我这儿存在热)〕。“私には”是非强制成分，即使不出现，人们也感觉不到省略了什么。这一句英语说成 I have a temperature(我有热度)。“私には子供が二人いる”跟“部屋にはまどがある(直译：家里存在窗子)”的表达方式和结构相同。日语将存在转表领有的情况在藏族嘉戎语里也存在。嘉戎语存在动词 ndo 可转表领有，相应地，指人单位也加处所助词-i，从而实现场所化。如：ŋə-i ta-pu ndo.〔我有孩子←(在我这儿孩子存在)〕①。嘉戎语存在动词 ndo 跟日语存在动词いる一样，都是指具体有生命的人或动物而言，不指无生命的事物②。它们表领有都不像英语非用 have 这样专门的领有动词不可。在英语句里，领有以人为成立条件，人作为强制出现的中心成分而处于主语的醒目位置，不可以简单省略。

二、语义范畴跟句义的关系 不同语言表达同一事件所得的同义句往往基于对语义范畴的不同认识和表达。Stuart Chase(查斯)根据一位中国人的研究断言，英语动词 be 与形容词连用，暗示了形容词是独立存在的性质，如 It is yellow and hard〔这硬而黄←(这是硬而黄)〕，似乎假定“硬、黄”是两个独立存在的实体。由动词 to be 创造出“同一”观念：A 就是 A。西方人的这种观念在亚里士多德同一律上开了花。中国人并不认定“硬”和“黄”是独立存在的实体，所以汉语说“这又硬而黄”，不说“ * 这是硬而黄”。所以中国没有出现亚里士多德那样的逻辑。北美印第安部落的温吐(Wintu)人比中国人更注意回避同一律。汉语说“这是面包”，温吐人却说“我们把它叫做面包”，很少把语言和东西混淆起来。温吐人说一件不在自身经历

① 比较完全表存在的句子：wajo ndo(他在)。

② 林向荣：《嘉戎语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 年。

范围以内的事物时，绝不肯定它，只是猜想"也许它是这样的"[①]。根据 Dorothy D. Lee(1936)的观察，"鲑鱼好"这个说法，在温吐语里不但要像英语"The salmon is good"那样明示时间和人称，还要合适地从下面意义中选择一项进行表达："我看到——，我尝出(还有视觉以外的其他感觉)——，我推想—— ，我断言—— ，我听说——"[②]。

汉语句子倾向于隐藏人类因素，英语则不能简单地省略它们。我们就拿相声《鼻子的故事》[③] 中的一段对话为例：

A. 我出生在农村。

B. 噢，(你)长在乡下。

A. (我)刚生下来的时候，(我)生理上有点缺陷。

B. (你)怎么啦？

A. (我)没鼻子。

B. (你)没鼻子？

以上句子的听话人或说话人成分(用括号标示)几乎都被省去了(除第一个句子外)。英语句子要省略这么一些成分，是不可思议的。《The Johnson family》中一段对话跟中译文的直接对比，清楚地反映出两种语言的省略差异：

A. Good morning, Mary, "You" 're playing hookey the hard way.

——你早，玛丽。(你)用苦肉计逃学了吧？

B. Yes. "I" 'd rather be in school than here in bed.

——(我)这样躺在床上，还不如去上学呢。

A. When did "you" first feel any trouble?

——(你)什么时候开始不舒服的？

B. "I" had a little headache yesterday afternoon. Last night "I" didn't feel like eating so much.

---

① S. Chase(查斯)：《语言的暴力》，中译本，台湾三山出版社，1972 年。

② Dorothy D. Lee(1936)：《印第安语言概念的意义》，转引自《文化人類学と言語学》，日訳，弘文堂，1970 年。

③ 《姜昆李文华新相声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

——(我)昨天下午有点儿头痛,(我)晚上就不大想吃东西①。

在英语句子里,若省略引号内代表听话人或说话人的成分,就不成话。但在汉语句里,却能很自然地把它们省略掉(见括号内成分)②。

日语句子与汉语有着类似的倾向。比较:

日语	英语
あたまがいたい〔我头痛←(头痛)〕	I have a headache(我头痛)
はらがいたい〔我腹痛←(腹痛)〕	I have a stomache(我腹痛)
みずがのみたい〔我想喝水←(想喝水)〕	I want to drink water(我想喝水)

日语的这个说法虽似违背逻辑,但隐去动作主体"人"不说,一点儿也不觉得不自然。相反,英语却可在本不应是指人单位所在的位置,用上指人项目。如日语うりきれです(卖完了),もうすみした(干完了),即商品卖掉了、事情干完了,英语却说:We are sold(直译:我被卖了),I'm finished(直译:我被完成了)。日语如说"みずがのみたい(水想喝)"就违背了逻辑。

以上是语义范畴向其他语义范畴的扩张。语义范畴向语法范畴的扩张,可仍以领有范畴和存在范畴为例。在许多语言里,领有范畴和存在范畴可转表时体。英语领有动词 have 可转表动作的完成,如:I have read a book(我读了一本书)中,这句话的实际来自"我有读过一本书"。温州话领有动词"有"强调曾然或完成的意味,如"旧年我有走上海"(去年去过上海),"作业有写呐"(作业做了啊)。普通话领有动词"没有"也常转用于对曾然或完成的否定。日语表存在的动词がる可转表进行体,如"飛行機が飛んじがる"(飞机在飞)。同样,普通话存在动词"在"也能转用于对进行体的表达。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到,不同语言将表领有或存在范畴的词转表时体范畴,这一方面是个普遍现象,另一方面它们在细节意义上又是不完全一样的。

---

① 钱歌川译注:The Johnson family(美国日常生活),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② 马清华:《汉语祈使句理论本质》,载《中国语研究》(日本),第 40 号(1998 年)。

日本学者池上嘉彦综合以上两种情况指出，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属极端发达的人类表达型语言，日语则是非人类表达型语言（汉语也是如此）。有趣的是，不管是英语还是其他一般印欧语，古代都明显表现为非人类表达型倾向。有种极具魅力的假说认为，最早的人类置身于自然时，受自然力和超自然力左右，情形大抵相同。当能运用自身之力征服自然时，情形就变了[1]。

B. L. Whorf 基于对印第安河皮语的句义表达式等与英语的对比研究，推进了 W. von Humboldt 的语言思想，将语言相对论发展成为沃尔夫假说。

---

① 池上嘉彦：《意味の世界——現代語言学から視る》，NHKブックス，1978 年。

第四章 对 应

文化在对比中表现出来。语言之间凡跟语义有关的方面都可展开比较，从语义对应关系中分析其划分和表现世界的异同，找出它们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文化、语言等因素，这对不同语言间的理解和翻译都有实际意义。不同语言间或同一语言不同方言间的语义对应是外对应，一种语言内部的语义对应是内对应。下面主要就外对应中的词义范围对应、词义关系对应、同义形式对应三个方面作些分析。

第一节 词义范围对应

词义范围的对应特指外对应中语义词所指意义(denotative meaning)之间的单项对应，又叫词的单个义项的对应。单项词义对应有等值对应、近似对应、零对应三种类型。

一、等值对应 等值对应又叫完全对应，多见于单义词。作为文明社会共同财富的科技术语、时令、数字等，作为离散体进行单独认知的事物如太阳、月亮等，多属这类。

汉语	英语	俄语	日语
赤道	equator	экватор	せきどう
星期一	Monday	понедельник	月曜日

从总体上看，这类词数量是比较少的。所指意义等值时，联想意义又有同、异两种情况。

有些对应是出于人类普遍的认知，因而联想意义也是相同的。俄语 лиса(狐狸)和汉语“狐狸”都有狡猾、诡诈的伴随意义。俄语

осёл(驴)跟汉语"驴",都有愚蠢的伴随意义①。有些则是文化对应,如东亚人普遍把龙看做力量、吉祥的象征,这种靠文化传播力量建立起来的共同观念和态度,在东亚几种不同语言中映射到相应词的附加意义上。"龙"是东亚人取名时喜欢用的字眼。它在东方语言内部带有某种程度的超语言性,是个相对普遍的文化现象。

有些联想意义源自文化的习惯,常常是不等同的。在中国人眼里,松树长生不老,具有坚贞不屈的品格。俄语 сосна(松树)则完全没有这种寓意。而 берёза(桦树)可以象征"故土"和"祖国",比喻俄罗斯少女的苗条和美丽。对中国人来说,桦树只是普普通通的树,没有其他寓意。在中国人看来,猫头鹰是一种不祥之鸟,俄罗斯人对 сова(猫头鹰)的看法则完全不同,认为是智慧的象征。东西方语言里,龙的附加意义的不对应是典型的相对超语言事例。西方人普遍把 dragon 看做会喷火、有翅的妖魔,他们把东方的"龙"附会成 dragon 一类的东西,将附在 dragon 上的贬义色彩也转嫁给了龙,所以龙在众多欧洲语言里也贬化了,"龙舟"译成 dragon boat,成了西方人心目中如同凶神恶煞的怪船,"龙凤呈祥"译为 dragon and phoenix bringing in prosperity 使西方人不解,"龙的传人"译成 descendants of the dragon 等于把中国人描绘成魔鬼的后代。"四小龙"(韩国、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在俄语里不得不改称虎:четыре азиатских тигра〔四小龙←(四只亚洲虎)〕,西方人看来,虎是生机活力的体现②。有人说,西方人对东方龙的误解,其实导源于误译③。

二、近似对应 近似对应又叫局部对应,它在不同语言间最为常见,近似而不等值的起因有两种:一种是事物相同,分类不同。英语 chair 是供一人坐的、有靠背的坐具。日语いす则是一般坐具总称,

① 谭林:《语言国情学初探》,载《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2.1。

② 王文忠:《跨文化交际中的常规关系差异》,载《中国俄语教学》1999.1。

③ 左飚:《论文化的可译性》,载《上海科技翻译》1999.2。

可以是供一人坐的，也可以是供多人合坐的，后面常有靠背，但也可以没靠背，如“丸いす、長いす”都没有靠背。这与日本榻榻米文化有关，因为他们传统上没有坐椅子或凳子的习惯，坐椅子或凳子的风尚是外来的。藏语的相似传统也导致了语言中椅凳不分的结果[①]。在日常使用中，汉语“头”、日语“頭”都可以是头部除脸以外的部分，如汉语“头上有只苍蝇”，这里的“头”是指头发覆盖的地方，不是说“脸”。又如日语“頭を刈る”{剃头发←(剃头)}。但英语 head 不能指头发覆盖的地方，必须包括 face。汉语“书”、英语 book 都只指书籍，不含杂志。但日语的“本”所指范围包括书籍和杂志[②]。汉语和日语的“鼻”也指象鼻，英语 nose(鼻)不指象鼻(象鼻叫 trunk)，却可指鸟嘴。在土耳其语里，鼻也指鸟嘴。汉语横向突出也可叫“高”，如“鼻子高、颧骨高、肿高了、嘴翘得老高、肚子挺得高高的”，英语却不能说 high，鼻子的高在英语里说 long(长)。这些局部对应在语言上都归因于坐具、生理部位、书籍、几何特征等语义场对应的不齐整。

另一种是事物相似，并不相等。俄语 печь 和汉语“炉子”只是大致相同，但不完全等值，所以词义有差异，中国的炉子是供做饭和取暖用的。俄罗斯的 печь，特别在农村，不仅能做饭和取暖，而且可以在炉顶上睡觉，因为它的顶部类似我国的小火炕[③]。又如天津话“大筐”(收购旧衣服、拾破烂的人)，在南方如江苏南通一带农村，这种人常吹着笛子，招引小孩用旧物去换取麦芽糖，并不直接买取旧物，这些人且都是男性，称做“换糖的”。所以意义也不完全等同。

三、零对应 一种语言里的语义词在另一种语言里没有对应词，形成对应关系上的空白点，这叫零对应。对应关系上的空白点叫做

① 见第二章《分类》第二节“分类细度”。

② 東信行：《語義の比較》，载国廣哲彌编：《日英語比較講座(第三卷)：意味と語彙》，大修館書店，1981 年。

③ 谭林：《语言国情学初探》，载《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2.1。

"词项缺空(lexical gap)",日本语言学界将它形象地译作"穴"。局部对应中,词与词细微末节的差异,一般要经过一番整理才能看出。对于零对应来说,明眼人常常一看便知。如下表(见次页)。

零对应产生的原因之一是甲语言集团中有的事物,在乙语言集团中没有。如缅甸语的 bton: bu{(吃槟榔包时盛作料的)石灰盒儿}、hton: paut(吃槟榔包时因石灰过量把舌头、齿龈烧破),在汉语普通话中无对应词,因为中国绝大多数地方见不到槟榔,更谈不上吃槟榔时的习惯。另一种原因是两个语言集团中都有的事物,甲集团给予它比乙集团更强烈的关注,其具体导因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自然环境　张家口万全话关注脚趾缝里的泥垢,把它叫"里土",可能因为北方缺水,清洗不净。石家庄束鹿话"火岗地(地势高干燥的地方)"等其他方言里的零对应词,也都反映了北方水的缺乏。加拿大法语把冬天刮大风引起的飞旋的大雪叫 poudrerie,这无疑是加拿大所处自然环境中常有的现象,法国法语就没有相应词表达同一概念。

(二)经济原因　满人是狩猎民族,所以对一些动物声音的感知要比现代汉人仔细得多,这样,零对应就形成了。如次页表中所列满语的拟声词在汉语中都找不到对应词。

(三)事态发生的强度　俄语里有专门的词 погорелец 指遭火灾的人,汉语没有对应的词,不是因为汉人不遭受火灾,而是"因为俄国革命前农村经常发生火灾引起庄户人家破产的事件"①。当然这是终也与俄国人的房屋结构、用火的经常性有关。

(四)生活习惯　越南语把脚浸在水里,或在土面上前后左右摆动的动作叫 khoa,因为越南人有赤脚活动的习惯,又处在热带,脚常与水、土打交道。辣椒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地位重要,汉族人(尤其是南方人)喜欢吃辣椒,它可祛湿气、瘴气,因此汉语有单独的词表"辣、辣

① 巴尔胡达罗夫:《语言与翻译》,中译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

	与汉语普通话或江苏金沙话相当的零对应词
河北方言词	**自然环境**　承德平泉话“月黑头”(无月亮的晚上)、天津话“奸天”(无风无雨不冷不热的天)等。 **生物**　唐山大厂话“半蛋”(母鸡孵小鸡时用嘴翻弄鸡蛋)、天津话“诈毛”(母鸡将要孵鸡时占窝不动)、承德滦平话“山葡萄架”(野生葡萄所攀附的树木)、吴桥话“蒜娃娃”或“蒜布袋”(蒜薹上端长小蒜的包囊)、唐山昌黎话“刺针”(枣树上的刺)等。 **意志活动**　保定安新话“磨天黑”(太阳落山后至天黑前的劳动)等。 **习俗**　石家庄束鹿话“通脚儿”(一个被窝内一头睡一个人)、唐山昌黎话“铺”(在田间搭的供看守人睡觉用的棚子)等①。
满语动物义类词	**类别**　uki(母水獭)、urgesen(一岁鹿)、seksen(掉进冰窟窿而冻死的野兽)、zhukturi(两岁熊)、zhursan gio(两岁狍)、hente(四岁以上的公野猪)、sakda(四岁的母野猪)、yelu(大公猪)。 **形态**　boro(牲畜和野兽的毛色青色、棕色)、kaltara(鸟雀等物毛色光泽、光滑)、obdombi(野兽因赶乏肉变得没味道，走味儿)、langtanambi(动物的头显得大，显出肥大)。 **动态**　wasihalambi(野兽用爪子刨地)、loombi(野兽大声嚎叫)、ongkimbi(兽要听到人声或闻到异气而避去，逃跑，逃掉)、melembi(饮牲口。野兽畏缩躲藏，悄悄地钻过去)、shoshombi(鹰拉屎)、sishambi(蛆蠕动)、godombi(鱼跃)、hayalzhambi(爬行动物爬行时摇尾)、loombi(野兽大声嚎叫)、maktambi(马把人摔下)、zhor seme(鸡犬鸟兽东一处西一处，乱叫不已的样子)、pelerzhembi(马头随缰绳向上扬起)、se′sheteembi(马、牲口等抖动脑袋，摇头)、shetumbi(蛇游水)、indahuun fekun(马像狗刨似地走)、zhabchambi(苍蝇、蚂蚁等群聚在一起)、kohodombi(野鸡秋天鸣叫)、kuskurembi(家鸡或野鸡等抖擞毛，扇翅，用爪子乱刨地)、wadabumbi(放狗去闻气味)、urilembi(野鸡肥得飞不动)、on dosombi(牲畜耐走远路)、sofidambi(牲口站立不安，来回动)、zhuntaa(野兽走的小径，兽径)。 **声音**　fosok(野兽猛然跳起的声音)、giyang(拴着的狗急叫的声音)、giyar gir(猴子乱叫，或禽雏唤母，或飞禽急叫的声音)、kiyar kir(貂鼠和鹰等动物拒捕时的叫声)、potor patar(群鸟起飞的声音)、pur(鸟突然起飞的声音)、putur(大鸟儿突然起飞的声音)、putur seme(鸟扑翅落下的声音)。 **人对动物的作用**　dute yali(剥牲口野兽皮时，皮上连着的肉)、kalumimbi(箭头穿透兽皮)、butha(在小范围捕捉禽鱼野兽)、oblihiya yali(水肉牲畜琵琶骨里的肉)。 **其他**　zhurun(小动物的洞穴，鼠洞，兔洞)、omi sangga(野鼠藏食物的洞)、churhuun(一趟，野鸡等扑扇一次翅膀所飞的距离)②。
印度尼西亚语动物义类词	**类别**　jantan(禽兽雄性的)、mangsa(猛兽捕食的动物)、caplak(猫狗身上的虱子)、herbvor(食草的动物)。 **形态**　menjadi(家禽、牲畜等)长得好、moncong(猪、狗等长形的嘴，水禽等细长而扁平的嘴)、dauk(灰白色，指马的颜色)。 **动态**　biasa(动物害怕)、gerayang(虫蚁等爬动，到处乱爬)、menggading(大象用牙戳)、gelésér(翅膀等不停地颤动，抽动)、laga(动物格斗)、denai(野兽的足迹，林中野兽出没之路)、majer(动物不能怀胎的，不能繁殖的)。 **声音**　decak(壁虎等的吱吱声)、decup(鱼儿吞噬食物的声音)、demham(椰子等落地声，砰砰声)、cengking(狗挨打发出的尖叫声)。 **人对动物的作用**　menggeragai(用钩枪捕鳄鱼)、oja(挑逗动物)、penghalau(赶牲口、家禽的人)、kurungan(家禽家畜的笼子、圈)③。

① 参见李行健主编:《河北方言词汇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

② 参见《新满汉大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③ 参见《新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7年。

椒"。许多语言(如日语、维吾尔语、英语等)有表示"辣椒"的词,本来,既已有表"辣椒"的词,将名词转成谓词,造一个专表"辣"义的词也并不费力,但它们却是借其他感觉词作近似或含混的表达,没有明确表"辣"的词(参第一章《导言》第三节"文化对语义的作用")。"看来这同操这些语言的民族不像中国人(特别是部分南方人)喜欢吃辣椒有关"①。一种文化的产生能带动几种相关系列词汇的形成。烹饪文化的发达不仅促成烹饪动词的丰富②,还导致味觉词及其隐喻用途的丰富。比如,汉语基本味觉词引申义比日语丰富,这与中日饮食文化差异有关,日本料理追求色、形、美,中国菜追求色、香、味,味是灵魂③。所以反过来看,一些语言没有专表味觉的辣,原来是因为它们不需要。

(五)利用情况　天津话关注核桃内间隔的皮儿,把它叫"核桃档",汉语其他方言里很少有对应词,这是因为天津当地更有意识地把它作为中药材。

(六)民间风俗　按满族习俗,将牲畜头骨中连接耳根的小骨头挂在婴儿摇车或小孩身上,可防忘事。这种骨头满语叫 onggoro(脑精骨)。汉语没有它的对应词,是因为没有这样的风俗,不是没有见过这样的骨头。邯郸内丘话"天地桌儿(院子里每年正月祭天的地方)",在江苏金沙话里没有对应词,是因为当地没有正月祭天的风俗,不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地方。

(七)集团社会心理本身的特征　集团社会心理本身的特征可引起的

---

① 伍铁平:《不同语言的味觉词和温度词对客观现实的不同切分》,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1。

② 如汉语对用油加工食物这一概念,分别用"煎、炒、烹、炸"等表示,而俄语只用 жарить 一个词称呼。这反映了俄汉民族饮食文化的差异。郑述谱:《试论词汇的比较研究》,载王福祥编:《对比语言学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 年。

③ 张韶岩:《日汉语基本味觉词引申义之比较》,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6。

对事物格外细致的观察。天津安次话把肛门周围的毛叫"护眼毛"，普通话和许多汉方言都没有它的对应词，这个词产生的文化原因尚不清楚，但是，日语里有"尻毛(しりげ)"的说法，显然出自日本人对生理观察的细致，他们对人类生理的观察在其他场合也比汉人仔细得多(参第八章《意念》)。日语不但有"尻毛(しりげ)"这个词，还把它用于熟语中，如"尻毛(しりげ)をぬく"〔乘人不备使人吃惊←(拔他的护眼毛)〕。

以上都只是形成零对应的部分原因，并不是全部。此外，语言有其独立性和任意性一面。零对应的形成原因并不都能从文化、历史、社会和自然方面找答案，如英语的 kick(用脚踢)、punch(以拳重击)，法语只能用分析性的短语如 donner un coup de pied(用脚踢)、donner un coup de poing(打了一拳)来表现。这就很难说有什么语言之外的原因。

零对应也造成语言使用的差异。甲语言可以含混带过的事，乙语言必须进行"强制观察"，非要你说清楚不可，强迫你对细节作出交代。用汉语和英语都可以讲"昨天我陪一位朋友看了场电影"。但德语非要你说明是男朋友还是女朋友，因为德语没有指"朋友"的泛义词，只有"男朋友(freund)"、"女朋友(freundin)"两个专义词。用汉语和英语都可以讲："我妻子到东京去了。"但德语非要你说明是用什么方式去的，因为德语没有"去"这个泛义词，而必须在 gehen(步行去)、fahren(坐车或坐船去)、fliegen(坐飞机去)、reisen(旅行去)这几个专义词中选择一个。零对应还使甲语言的通常概念在翻译成乙语言时受到阻滞，如"林黛玉的母亲是贾宝玉的姑母，贾宝玉的母亲是林黛玉的舅母，又是薛宝钗的姨母。"这几句用英语翻译，除用注解别无他法，因为英语没有"姑母、舅母、姨母"的专义词，只有覆盖全部的泛义词 aunt。

第二节 词义关系对应

词义关系对应是外对应词的所指意义的多项对应，主要有语义场（简称“义场”）对应和多义对应两种。义场对应发生在几个词汇词之间，多义对应则发生在一个词汇词内部。

一、义场对应 义场是意义密切关联的词义群，可按不同词义关系分成上下位义场、协同义场、整体局部义场等①，也可以分成聚合义场（如颜色义场“红、黄、蓝”等、动物义场“猪、狗、猴子、狮子”等、狐狸义场“狐狸、尾巴”等）与组合义场（如反映组合关系的“鼻子、嗅”等）。为使术语在更严格的范围内使用，我们把“义场”和“义类”区分开来。义类是词义体系的领域分类，义场是对词义关系进行条理化和细分的结果。义类跟概念相对，义场跟义类大纲相对。大体说来，义场是词或概念间的意义组织，义类大纲则是义场间的块组织。在基本构成成分上，义类比义场庞杂得多，它可以是各种不同义场中概念成分的混合，如“猪、牛、羊、饲养、饲料、饲养员、兽医、猪圈、牛棚、鸡窝”等构成畜牧方面的义类。

同一义场中两个以上词语的意义对应关系，构成多项对应。它以单项对应关系为基础，是等值对应、近似对应、零对应三种对应类型的组构和汇集。义场对应和单项对应类型有时是互为因果的，如匈牙利语没有单独一个词对应于英语 red，法语没有一个词能准确对应于英语 brown，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也没有单独一个词对应于英语 blue②。单项颜色成分的非等值对应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导源于语言中整个颜色义场的不对应。同时反过来，单项颜色成分的非等值对应也正造成了整个颜色义场的不对应。

① 相关内容参第七章《联想》第二节“联想意义类型”。

② 黄长著：《语言·文化·社会之断想》，载《外国语文教学》1985.4。

已有不少关于义场对应方面的研究，谈得最多的是聚合义场的对应。如不同语言之间亲属称谓词、颜色词、一天时段的区分词、温度形容词、味觉形容词、抓取动词、烹饪动词等方面的义场比较。第二章《分类》提供了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义场对应情况是语义普遍论者(universalist)和相对论者(relativist)为自己寻找证据的传统阵地。B.L.Whorf 指出，河皮语(Hopi)虽有两个独立的词语分指“流水”与“死水”，却无单独的字眼区分“飞行员、飞机、苍蝇”之间的不同。他根据对义场对应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发展了德国学者 W. von Humboldt 的语言相对理论，成为著名的“沃尔夫假说”，认为语法范畴和语义分类决定语言集团的世界观。

普遍论者进行了大量对比研究后认为，所有语言在认识和划分世界的底层或抽象结构上仍然是相同的。B.Berlin 和 P.Kay 等人对 98 种语言中颜色义场的对应关系进行了对比，从曾被结构主义者作为论证人类语言的词汇非同型性的主要领域中，发现了两条语义普遍规律：(1)不同语言的颜色词数量多少不一，外围意义(peripheral meaning)也不完全相同，但倾向认可的语义中心点(focal meaning)是一致的。(2)颜色词发生的普遍序列按先后次序排是：黑、白＞红＞绿或黄＞蓝＞棕＞紫或粉红或橙或灰[①]。A. Lehrer(1974)对英语、法语、德语、波斯语、波兰语、日语、汉语、迦卡特克语(Jacaltec)(危地马拉的一种玛雅语)、那法霍语(Navaho)、阿姆哈拉语(Amharic)、尼日利亚唷卢巴语(Yoruba)、巴西卡亚坡人的基语(Ge)等 12 种语言烹饪动作义场进行了比较，发现在烹调义场结构中有一个语义普遍特征：“在通常情况下，语言至少有两个烹饪词，其中一个必是表煮(boiling)的。”煮和不煮，是烹饪时用水和不用水的对立。在波兰语、德语、唷卢巴语中，表示做饭(cook)的泛义词另有一个更具体的意义“煮(boil)”。日语表做饭(cook)的动词“煮炊(にたき)”，其词根来自

① B.Berlin & P.Kay: Basic Color Term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表煮的动词“煮(に)る”和“炊(た)く”。江苏金沙话做饭说“煮饭”，如“佗赖号帮人家厂里煮饭”(他在某家厂里当厨师)，烧菜也可以说“煮菜”，如“佗煮菜好吃够”(他烧菜真好吃)。反例和例外见于澳大利亚或新几内亚的土著，他们传统上不煮食物。德波(Dyirbal)人的语言中曾经只有一个烹饪词，但现在已经加了一个词表示煮。在斡比利(Walbiri)人的语言中有几个表烹饪的同义词，也有一个词指煮，但它不表烹饪。新几内亚伊霹雳派亚拉(Ipilipaiyala)部落语言中有三个烹饪词，没有一个是特别用来表示煮的：ta(用烫灰烤)、yawa(在敞开的坑里用烫石头烘)、isa(直接在火上烧)。ta是他们最普遍的一种烹饪法，西式烹饪法介绍过去后，他们用ta兼指煮[①]。

组合义场的对称对应也反映文化的一些侧面。在许多语言里，不少动物词都有表示其声音的专义词。如在汉语里，有专门的叫义动词与之相配：“狮一吼/虎一啸/龙一吟/鹤一唳/犬一吠”，或有专门的拟声词相配，如：“虫一唧唧/狗一汪汪/羊一咩/猫一咪咪(或喵)/马一咴儿咴儿/鸟一啾啾”。英语如：sheep(羊)—baa(叫)/crow(乌鸦)—caw(叫)/cat(猫)—mew(喵喵地叫)/owl(猫头鹰)—hoot(叫)/cattle(牛)—moo(鸣)/hen(母鸡)—cackle(咯咯叫)/donkey(驴)—bray(叫)/cock(公鸡)—crow(啼叫)/pigeon(鸽子)—coo(咕咕叫)。日语也有类似现象，但没有这样丰富。这中间有对称对应，如：

汉语：马————嘶
|　　　|
英语：horse(马)—neigh(嘶)
|　　　|
日语：馬————いななく(嘶)

也有非对称对应，如英语有专表猫头鹰(owl)叫的动词hoot，汉语

① A. Lehrer: Semantics Fields and Lexical Structure,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74.

“(猫头鹰)叫”的相应位置上词项缺空,只能用泛义词“叫”。一般来说,专义词的有无,反映这种动物跟该语言集团关系的密切程度。但也有例外,猪在汉文化中占突出地位,却没有专表猪叫的词。在人类对它吆喝的场合,猪受到了重视,如金沙话有唤猪声“狃”。金沙话发音时吸气的“唑唑”是唤狗声,发音时舌尖抵上颚猛然吸气的“嗜嗜”是唤鸡声,“游游”是唤鸭声。吆喝家养动物的叹词是畜牧业造就的产物。

有些义场如数字、日期在语言对比中呈对称对应,并具有语言普遍性。另外有一些可以整理出有限的类型,从中看到局部范围的整齐对应,如几乎所有见到过的语言中,第一人称代词和第二人称代词都只是指人的,第三人称可以指人,也可以指物。

但是,义场对应总还是以非对称对应居多,语义分类中一点细微末节的差异(包括细度和角度差异)都可导致非对称的结果。汉语普通话和英语指代词以说话人为中心,分近指和远指两种,如汉语“这、那”,英语 this(这个)、that(那个),或者 these(这些)、those(那些)。汉语有些方言如江苏常熟话、无锡话、福建潮州话有近指、远指、更远指三类,山东惠民、东营,山西洋曲、寿阳,浙江义乌,江苏苏州话有近指、中指、远指三类。日语和西班牙语也是三分,日语これ、それ、あれ分别指“说话者近处的事物、听话人近处的事物、其他地点的事物”。西班牙语(以阳性单数为例)éste 指离说话人最近的人或物,ése 指离听话人较近而离说话人较远或离二者均不远但亦不在跟前的人或物,aquél 指离说话人和听话人都较远的人或物。吕宋岛上的伊落卡语(Ilocano)用不同指代词分别表示“说话者近处的事物、听话人近处的事物、离开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事物、看不见的地方的事物、已经不存在的事物”[①]。

① 東信行:《語義の比較》,载国廣哲彌编:《日英語比較講座(第三卷):意味と语彙》,大修館書店,198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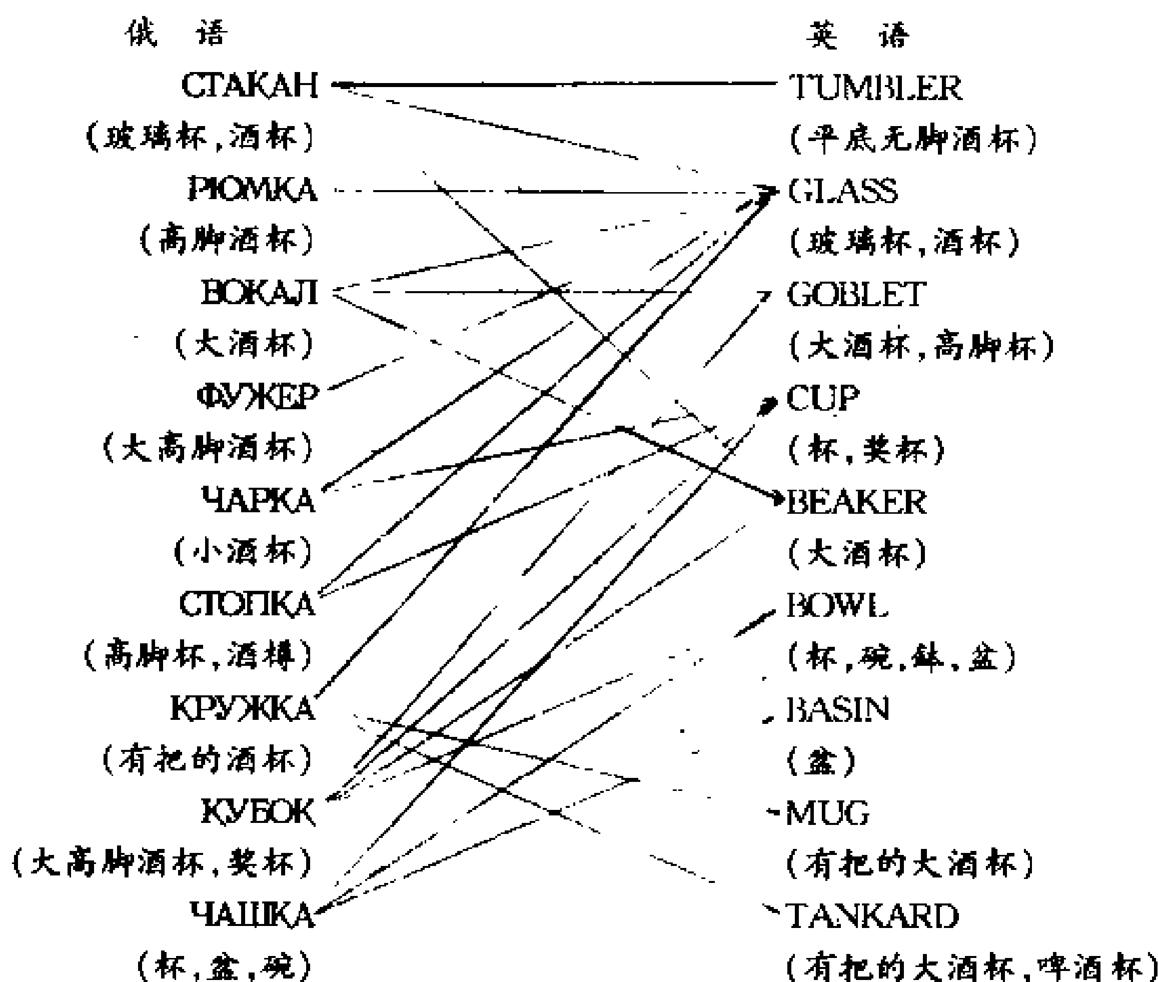
在有的场合，非对称对应的原因可追究到现实基底的差异。以日语和英语的吃喝动词为例。日语"食べる"(吃)与"飲む"(喝)相对，"食べる"的受事是固体，"飲む"的受事是液体，但"食べる"也含"飲む"动作，如"朝食を食べる"。英语 eat 的意义标准有些不同。对受事类型并无一定要求，它是指手握着餐具把东西往口里送的动作。如英语"喝汤"说成 eat soup，eat 是指用勺子从汤碟里舀汤送入口内，如果口凑着杯子喝汤，那才叫 drink。这种非对称对应的形成，可能因为英国人和日本人吃饭时所用餐具不同。日本人跟中国人一样，用碗筷，喝汤时常可就着碗喝。英国人用叉匙盘碟，喝汤时用勺子舀着喝的机会比日本人多。总的说来，非对称对应的原因及解释限制性与分类方式差异的原因大致同型。详参第二章《分类》第二节"分类细度"。

义场对应关系的系联可借助双语词典来进行。前苏联学者巴尔胡达罗夫(Л. С. Бархударов)详细介绍了这一方法。以俄、英饮具词对应关系的系联为例，准备一部收词和解释较全面的俄英词典、英俄词典各一本，如果整理者是俄国人，那么就先从俄英词典中查出所有俄语饮具词在英语里的对应词，然后再从英俄词典中逐词查出所有这些英语对应词在俄语里的对应词，最后整理出这些对应关系的路径，其复杂的对应关系就可以整理成如下之表(见次页)[①]。

二、多义对应 同一词汇词孳生出来的几个义项构成多义关系。如汉语"原始"有"最古老的(如'原始森林')"和"第一手的(如'原始资料')"两个义项。同辞或共名是就形式而言，多义是就意义本身而言，两者侧重点不同。

我们把多义关系放在语义发展的体系内来观察其地位。类推语言谱系分类的理论结构(即分语系、语族、语支)，词的语义发展系统

① 巴尔胡达罗夫：《语言与翻译》，中译本，中外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



可按范围大小分为义系、义族、义支。

有时可以从比词或语素的语音单位小一级的音位或音位组合中寻找到共同的内在意义因素。L. Bloomfield 说,英语词首音/sn/表示三种经验:(1)呼吸声:sniff(用鼻吸)、snuff(用鼻子吸气而有声音)、snore(打鼾)、snort(牲口等鼻吸);(2)很快的分离或运动:snip(剪断)、snap(突然折断)、snatch(抢)、snitch(偷);(3)虫、蛇等爬行蠕动:snake(蛇)、snail(蜗牛)、sneak(偷偷溜走)、snoop(偷偷地走来走去)。词尾音/ɛə/暗示很大的光或声:blare(高声叫)、flare(光焰闪闪

发光)、glare(发眩光)、stare(盯着看)[1]。在这种相同音位要素和义素特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词的集合叫做词系,同一词系的词相关义项的集合构成一个义系。E. Cassirer(1953)[2]把语言分化世界的过程分为拟态、类推、象征三部曲,义系及其共同的内在意义因素是语言类推阶段的产物,在类推阶段,语音形式和事象的关系形式以类推来确定,比如不少语言里元音是 a、o、u 的指远方,元音是 e、I 的指近处等。显然,义系应成为历史语义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语言发展过程中积累起音(就词的语音整体而言)义相通(或相近)但形式已起变化(或裂变)的一些词,构成同源词。它们按组分类,每组自成体系,训诂学将它称做词族[3]。同词族词相关义项的集合构成一个义族。跟义族不同的是,词族主要是从形式角度着眼的,如上古汉语"黑、墨"。《说文》:黑,火所熏之色也。墨,书墨也。王力《同源词典》拟"黑"的古音是 mxək,"墨"的古音是 mək,两词同源,其义同族。

具有多义关系的几个义项构成一个义支。词义的体系发展除义系、义族、义支外,还有义群。局部同源或同根的词,其集合构成一个词群,其相关意义的集合构成义群。汉语合成词"伟大、巨大、高大、宽大、宏大、粗大、远大、壮大、大型、大量、大批"等的意义同群。英语 *body*(肉体)、some*body*(某个人)、no*body*(没有人)、any*body*(任何人)、every*body*(每个人)的意义构成一个义群。

下面着重就多义对应作些分析。不同语言间的多义对应所牵涉到的是义支,多义对应也叫义支对应。两种语言的义支对应有对称和非对称两类。对称对应是指义支中每个相关义项的所指意义之间

[1] Leonard Bloomfield(布龙菲尔德)(1933):《语言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 年。

[2] E. Cassirer(1953): 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I: Language). Bloomington: Indian University Press.

[3] 周祖谟:《词族》,载《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年。

都是等值的。以下是对称对应的一些例子。

第一組：引申关系义项

语言	词	义支				
汉语	运动	1.物体运动	2.身体运动	3.社会运动		
日语	うんどう	1.物体运动	2.身体运动	3.社会运动		
汉语	生产	1.生产	2.分娩			
日语	さんする	1.生产	2.分娩			
汉语	习惯	1.习惯	2.风习			
日语	しゅうかん	1.习惯	2.风习			
汉语	想	1.思考、想	2.认为	3.回想	4.打算	5.判断
日语	かんがえる	1.思考、想	2.认为	3.回想	4.打算	5.判断
汉语	慢慢地	1.缓慢	2.逐步地			
日语	徐徐に	1.缓慢	2.逐步地			
汉语	知道	1.知道	2.感觉	3.认识	4.理解	5.体验
日语	知る	1.知道	2.感觉	3.认识	4.理解	5.体验
汉语	组织	1.组织机构	2.团体	3.生物组织		
日语	そしき	1.组织机构	2.团体	3.生物组织		
汉语	在	1.存在	2.正在			
日语	おる	1.存在	2.正在			

第二組：比喻关系义项

语言	词	义	支
汉语	沉重	1.物体沉重	2.心情沉重
日语	おもたい	1.物体沉重	2.心情沉重
汉语	上流	1.河川的上游	2.社会上的上层
日语	じょうりゅう	1.河川的上游	2.社会上的上层
汉语	基石	1.基石	2.基础
日语	そせき	1.基石	2.基础
汉语	咀嚼	1.咀嚼	2.理解、体会
日语	そしゃく	1.咀嚼	2.理解、体会
汉语	抬头	1.抬头、得势	2.书信等的抬头
日语	たいとう	1.抬头、得势	2.书信等的抬头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对称对应的义支所从属的词汇词大多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借词，属于文化接触中的词义扩散现象，因此往往也是不同语言集团之间文化作用关系的写照。

对称对应也可发生在特殊情况下。如汉语词"窝"的两个义项关系都是事物类意义，日语词"巣くう"的两个义项都是活动类意义，但相互间的对应与一般的语义对应结构有一致性。比较：

词	义支	
汉语"窝"	1. 鸟等的巢	——2. 坏人盘踞的地方
日语"巣くう"	1. 鸟筑巢、搭窝	—— 2. 坏人盘踞、栖息

这是一种潜对称对应。对称对应或潜对称对应可因历史演变而使义项关系发生局部断裂，或者部分义项遭到淘汰，失去对应的对称性。除以上所说的外对应情况外，内对应中也存在义支对称对应现象，它导源于类推，反映着词义发展的平行性。这部分内容见第五章《变化》第一节"词义变化"。

非对称对应在语言对比时是最常见的。比如两个词只有少数义项形成对应，另外的义项毫无关联等等。由于完全对称对应的义支极少，所以有价值的分析是看义支对应在多大程度上对称或不对称。《牛津英汉双解词典》在英语词 movement 条目下列举了 7 个义项，《法汉词典》在法语词 mouvement 条目下列举了 16 个义项，尽管差异相当明显，但有些英、法对称之处跟汉、日语"运动——うんどう"的对称毫无关联，如英语 movement 跟法语 mouvement 都有"乐章"和"数量上的波动"的意思，汉语"运动"和日语うんどう都没有这样的意思。对称对应现象虽数量极少，但若非巧合，往往有着深层文化根源，因而在揭示语言文化性质方面，如语言共性、语言谱系分类、语言接触关系、其他角度的语言类型关系等方面而有它的意义。

第三节　同义形式对应

同义形式的对应是指同一种概念下变体数量的对应，即同义词数量的对应。概念变体的表达对象具有同一性，所以相互之间不构

成对立，在"对不对"这个标准下可以替换。如"张安是张康的父亲"，可以替换成"张安是张康的爸爸"，句子意义不变。概念变体又有些细微末节的不同，出现场合各有差异，所以相互之间又往往是互补的，在"好不好"这个标准下不总能替换，如在填写档案时，社会关系一栏，最好填书面词"父亲"，不填口语词"爸爸"。

同义词的好处是使语言表达更加丰富、精密、富有音乐美和避免重复。它的产生既有文化、现实原因，又有语言和语言运用方面的原因。具体说来，其直接原因不外乎以下八种：

一、表现特有的态度、感情和关注　顺应禁忌、委婉、传情、风趣等需要，最能触发人神经、唤起多样感情的事物或观念往往拥有丰富的同义词，如"说"有同义词"吹牛、唠叨、啰嗦、胡扯"等。对低贱事物，有出于恶毒蔑视的鄙称，还有出于同情尊重心理的婉称，或出于平淡心理的通称，如"奴隶"在景颇语里有通称 mǎjam，又有婉称 poilo[①]。汉语对身心残缺的人有系统全面的鄙称，如"瞎子、聋子、瘸子、拐子、哑子、驼子、矮子、呆子、疯子"等带词缀"子"的名词统为贬称，但除"瞎子"有婉称"盲人"外，其他都没有相应婉称，至多只用临时性语句来表达，如"耳朵不方便、腿不方便"等。可见，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多采用抑制、掩饰、回避（即制造"语义空白"）的做法表示对他们的尊重。在正规场合，中国人则沿抽象阶梯爬上去，用它们的上位词"残疾人"来迂回指谓。

事物如有因情景而不同的各种次要价值，它的同义词聚中往往就不止一个词，如表示钱币、支付的词在许多语言里都不止一个。具有重要生活意义的事物也是如此，如"拿"有同义词"操、取、抓、握、持、把、擒、攥、秉、执"等，历史还淘汰过一批同义词"引、援、将"等。

二、满足社会风尚对界别的期求　在受儒教伦理制度影响而具有谦让精神的越南、日本、朝鲜和等级制度森严的缅甸、西藏，语言中

① 戴庆厦等：《景颇语词汇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 年。

第一、第二人称代词都很多[①]。如缅甸语第二人称代词按说话人的性别、身份,听话人的性别、身份以及说听双方的亲密程度、熟悉程度、辈分关系、亲属关系、地位关系,说话的场合,附加的情绪,适用的语体等,分出不下十二种类别!第一人称略少,但也不下四五种。汉语有所不同,许多旧有的封建称谓如第一人称的“小的、在下、奴婢、奴才、朕”等代词经过时代变迁和社会变化,都消亡了。只是第二人称代词在通称“你”之外,还有一个表敬称的“您”。

新的统治者或制度出现后,为了表现跟过去划清界限,往往要设法给一些已有名称的事物披一套新装,敌对势力之间为划清界限,也对一些相同事物制订一套各不相同的名称,如解放军的领导干部叫“首长”,国民党军队的领导干部叫“长官”。这样,同义词又形成了。

三、精细分析的需要 在彝语中,构成同义词的以动词、形容词为多,其次是名词[②]。一般来说,动词、形容词不如名词的意义那么实在(参第五章《变化》第一节“概念体系调整”),所以很明显,彝语中的这一分配比例反映了同义词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顺应了语言精细表达的需要,这一点也正是贯穿所有语言的普遍性原则,各种词汇方面的教科书里都明白阐述了这一需要。动词、形容词的同义词比名词多,还有从总体上减轻动词、形容词词义负荷的原因。第五章《变化》第一节“概念体系调整”中说,动词、形容词的多义程度比名词高。义项数和词形变化有内在相关性(参第五章《变化》第三节“名称变化”)。

四、词法转型或变换的影响 刘叔新根据他的同义词词典编写实践说,汉语不少同义关系的词仅包含一个单音词及另一个由它拉

---

① 参黄敏中等:《实用越南语语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陈信德:《现代日本语实用语法》,商务印书馆,1980年。宣德五:《朝鲜语基础语法》,商务印书馆,1997年。汪大年:《缅甸语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志敬:《藏语拉萨口语语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② 戴庆厦等:《彝语词汇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

长的双音词[1]。汉语"鞋—鞋子"、"砖—砖头"等,就属于这类情况。它们是汉语由"单音节词占优势"向"双音节词占优势"转型形成的产物。再比如,英语 sell-out 由短语动词凝化,转成名词,表示"出卖",就跟原有的 treachery(背叛)构成同义,前者是分析式,后者是综合式。

五、文字、语音讹变　语音变化使原本相同的词裂变为两个形式不同的词。"逗、住"在现代汉语里是意义相近,读音和文字都不同的两个词,"逗"的口语性比"住"浓。其实它们在古代是音义皆同的异体字[2],字形不同加强了两者的分裂。彝语表父亲的同义词 bo 和 pha,同样是语音讹变而成[3]。语音讹变往往源自对语音的不同理解和发音习惯。

六、语体分化　语体分化使同义词成为必要。在景颇语中,单音节名词和前面加 a、ʃiŋ、tiŋ、tum、kă 等音节的双音节名词构成同义词,这种现象大量存在。双音节名词适合文学语言双音节节律需要,多出现在诗歌、唱词等文学语言中。有时也出现于口语,含强调的意思。如:

同义词		词义
phum	apham	树
mun	ʃiŋmun	粉末
noŋ	kănoŋ	推

在许多语言里,不少事物既有它的俗名,又有它的行业名称,如口语的"偷、扒",在司法行业叫"盗窃"。口语的"脑袋、腰子",解剖学上分别叫"头部、肾"。俗名是口语的,专业领域的名称是书面的,后者又可以分化为政论的和科技的。

---

①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1990 年。

② 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 年。

③ 戴庆厦等:《彝语词汇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年。

七、语言分合 语言先因地域不同形成变体，产生不同的方言词，而后接触、借用，将它们汇聚为同义词。如“西瓜”在埃及方言、伊拉克方言、叙利亚北部方言、黎巴嫩方言、也门和沙特部分地区方言、希贾兹方言中各不相同，标准阿拉伯语都把它们吸收进来，形成同义词①，方言词一般都带有地方色彩。

可以从宽地把外语借词放在这个类别下观察。本语词能跟外语借词构成同义词，如汉语有本语词“杜鹃花”，又有同义的朝鲜语借词“金达莱”；景颇语有本语词 maina，又有同义的汉语借词 tintse（钉子）。不同的借用方法也可形成同义词，如“巧克力”和“朱古力”都是对英语 chocolate 的音译。

八、新旧词竞争的胶着 语言新词和旧词的交替，常常不是一顶一的替换，而是同台较劲的拉锯战。一个新词出现了，同义的旧词往往还要延续使用很长时间，如果新词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不强，仍然要被顽强抵抗的旧词顶出局外，反之，旧词则慢慢引退，直至迁移或死亡。文字和印刷技术的发明，给走向衰亡的旧词普遍打了一支强心针，使它们能够苟延残喘。

语言中哪些概念有同义词，哪些概念的同义词数量多，常可根据同义词的来源来分析。比如，在汉语内对应中，“老师”的同义词有“教师、先生”，而“学生”一般仅有这一种说法，从中可看到传统师道尊严的影响②。从《同义词词林》（梅家驹等，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所列的词目数量看，汉语中“朋友”的同义词比“敌人”的同义词多，反映汉民族是一个善良的民族；肢体动词中，手部动作的同义词比脚的同义词多，因为手在人类劳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创造

① 国少华：《阿拉伯语词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

② 语言对现实的反映是客观、公平的，它还反映了现实的另一方面。汉语知识阶层称做“知识分子”，“分子”至今在其他很多场合带贬义，如“走私分子、犯罪分子、投机倒把分子”等，反映了知识阶层在不远的过去（比如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遭受严重蔑视的历史。

了人类自己；脸部器官动词中，眼部动作的同义词最多，因为视觉是最重要的感觉通道。外对应研究也很能反映文化对语义的作用，不同语言针对同一概念所设定的同义词数量，可因所受文化限制和语言限制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前面讲到，某些东方语言里第一、第二人称代词多，主要是文化作用使然。印欧语言第一、第二人称代词也不少，但它们是按形态分化出的形态词，如西班牙语第一、第二人称代词都分别有主格（nominative）、所有格（genitive）、与格（dative）、宾格（accusative）、离格（ablative）等五种形态[①]，这五种形态词都表达同一概念，它们的存在主要是语法作用使然。

① 张耀武：《西班牙语语法》，商务印书馆，1996年。

第五章 变 化

第一节 概念体系调整

特雷尔(J. Trier)1931年发表的《论词汇场和概念场》一文中提出语言存在概念场和词汇场两个系列的理论。概念场跟一个个具体的概念一样,也有生(产生)、死(消亡)、损(减缩)、益(增殖)四种变化形态。"文科、理科"等是新出现的概念场;王莽时代作的货币"大布、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等十品是已消失的概念场[①];汉语几类家畜(如马、牛、猪)的概念场缩减了(参第二章《分类》第二节"分类细度");车的概念场却明显地增殖了,"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等在古代是没有的。这些变化都是事物和社会风情演变的结果。

未知存在是语义系统开放性形成的依据。语义系统的开放性正是为适应不断膨胀的新指而设。语义容量的增加是适度的,历史上关注过的对象被冷落后,就逐渐清除出语义系统,系统随之收敛。膨胀和收敛形成语义系统的弹性。语义系统的各个子系统的活性程度不同。如果把概念体系分为自然环境、文明物质、社会内容(包括社会制度、经济和意识形态、民俗习惯等)、精神内容(包括心理活动状态等)、哲理内容(包括事件事理、性能数量、抽象关系等)五类,那么很明显,文明物质、社会内容的稳定性不如自然环境和精神、哲理内容的稳定性高,如气象用语的稳定性比食物用语强得多。但前者内

① 贾彦德:《汉语语义场的演变》,载《中国语言学报》第5期(1995)。

部的稳定性也很不均衡，在美语中，亲属用语的稳定性也比点心用语的稳定性高得多。

Spitzer(1948)指出，词义的历史是各个时代风情和恒常性的辨证反映[①]。词义恒常性需要上升到概念层次，才能充分地认识和理解。对每一种具体语言而言，概念体系中总有一些相对恒定的概念，我们称之为"恒指"。它所表事物的重要性在语言集团的共同现实经验中千古不变，不被其他事物替代。比如，自然现象(气候、地貌、天文、水文等)不以人的意志而存在、变化，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人类的生活，人类文明的很大一部分都是针对自然创造的，船用以渡"水"，伞用以避"雨"，各地房屋结构也与当地气候有很大关系，所以自然现象词所表现的概念一般来说都是恒定的。恒定概念在人类生活的基本面占据重要的位置，它们差不多都是日常生活词汇，而且很多都是基本核心概念(basic core concepts，即名称恒定不变的恒指)(参第三节"名称变化")。原始语言时代是孳生基本核心概念的时代。有人说语言越原始，恒指所占的比重越大；语言越发展，恒指所占的比重越小[②]。这是因为原始形态的社会中，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内容是日常生活，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分工的细化，日常生活在总的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下降了。应当承认，恒定概念不可能都是同时产生的。比如汉语方位、时令等概念的形成比自然现象和肢体概念晚得多，它是人类文化很当发达以后的事。上下概念早于四方(东、南、西、北)概念。"年、岁、春、秋"都是从农业用语发展而来的。而"夏、冬"的出现又晚于"春、秋"[③]。从总体上看，它们的出现时间都要比一般词汇早得多。晚近发生的概念或新指显然无从确认其恒定性资格。恒指是

① Spitzer(1948), Essays in Historical Semantics. New York: Russel &Russel，转引自柴田省三:《語彙論》，大修館書店，1975年。对词义恒常性的探讨，显然比对变异性的探讨薄弱得多。

② 张永言:《词汇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

③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

指导制订外语教学或对外语言教学上的依据，最初级的语言教学要从这里起步。

从当前概念体系中排挤出去的所指概念叫曾指。除历史文化词所表概念外，曾指一般不能自由地恢复生命。消亡的事物不需要继续在语义表达中保留。许多概念的死亡，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主要归因于所指事物的命运。

第二节 词义变化

下面来看围绕概念所作的语义分配和词义体系的调整。

词义是一个规范词形所容纳的意义总和。语义学自产生之日起，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认作是研究词义历史的科学。直至现在，"语义变迁"问题仍"继续引起语言学家的注意"①。与语音变化无关、受概念初质制约而发生的"独立词义变化"② 并不反映词义变化的全貌。独立词义变化有新生、变异、置换、消亡四种形态，与词义互为表里的词形变化也是如此。反映词义体系的词汇场也跟概念场一样，有生、死、损、益四种形式的变化。词义与词形等诸多方面同时变化、胶着一气。比如，"除新词外，名称的转移同样构成词义的变化"③。所以词义除单纯（即独立的）变化外，还有复合变化（Carnoy 的观点④）。50 年代曾有人责难，在词义变化的研究方面，人们比较多的是对变化事实进行分类和描写，对变因的研究却不够好⑤。几十年

① S. Ullmann：《语义学的最近进展》，中译，载岑麒祥：《国外语言学论文选译》，语文出版社，1992 年。

② Wundt, W. 语。参兹维金采夫：《语义学研究中的主要流派》，中译，载《语言学译丛》1959.4。

③ T.B. 斯特洛也娃：《词义变化的原因》，中译，载《语言学译丛》1959.1。

④ 参柴田省三：《語彙論》，大修館書店，1975 年。

⑤ T.B. 斯特洛也娃：《词义变化的原因》，中译，载《语言学译丛》1959.1。

过去了，综合各方面成果发现，现实作用力、心理力量、文化压力、语言内部力量是推动词义变化的四种力量。为能从更高层次去认识，有时也把词义的体系变化、社会变异和心理发展增入观察范围。

一、现实作用力 外部现实原因是人们最早发现的词义变因。自罗曼语学者们开拓词义中人类精神史、文化史的研究方向以来，人们已深刻认识到词义体系的历史是反映人类时代风情（如风俗、习惯、居住、服装、技术、社会、政治等）的博物院。19世纪末，Hugo Schuchardt（1842～1927）提出研究"实物词的历史"的口号，认为必须把词义史同物质文化史协调起来，才能揭示词义的历史①。有的词义变化背后，有相应表象群的转化。如果将重要的语义变化联系起来考察，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思想发展经纬，反过来，语言变化可以从一个民族的历史来理解。因为语言中为名称起点作证据的语源，都是语言中凝固的思想。语义发展中，都寄托了一个民族的思想史和精神史。有人认为语言就是它自身。至少从语义学领域看，这是错误的宿命论观点。但在研究实践上，出现了两种机械唯物论的错误观点，把词义变化机械对应于自然或社会的变化。首先是 Max Müller（1823～1900）倡导的自然法则论，把词义变化无例外地归因于自然的影响，如气候、地貌的影响。其次是原苏联学者 Nikolai Marr（马尔 1865～1934）提出的社会法则论，认为词义变化都有规则地与原始部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等社会状况同步②。

平心而论，如把自然和社会因素看做影响词义（或词义体系）变化的"倾向性原则"，而不看做影响整个语言体系的"无例外的规则"，就一点儿也不算过分。澳大利亚英语和英国英语的 Christmas（圣诞

① 威廉·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60年。

② Walter Porzig (1962): Das Wunder Der Sprache (ことばの不思議)，日訳，白水社，1973年。

节)有不同的现实意味，前者使人想到夏假时的海滩，后者使人想到冬天灰色的天空。词义的这种地域变异是澳大利亚和英国分处南北半球、季节相反引起的。澳洲的一些花草树木、飞禽走兽与欧洲不同，因此发展了特有的词汇，如 koala(树熊)、dongo(野狗)等野生动物的名称①。住在深山里的人能用山里、山外表示方向，却可以不考虑东、西、南、北②。在社会方面，阶级分化和职业专门化、产品、为生产而建立的多样化技术体系、巨大建筑物的建造、历法的发展、政治组织的复杂化、生产流通等经济结构的变化、大规模体系化宗教制度的产生、学问和艺术的发达等等，这些社会事实和文化特色都无不反映在语言的词汇体系上。

Darmesteter 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就指出，制度、文物等历史事件的废弃可引起词或词义的消亡。我国古代用兽角做的酒器"觥"、盛物用的带高座的盘"豆"等，这些词都随物而亡了。在法语中，封建法制用语因法国大革命而没落成历史，古代交通、照明工具等大量过时的文明事物也随技术进步而消亡了③。新文明物质的出现、新观念的产生，都使新词或新义的产生成为必要。社会变动的激烈程度影响着它产生的规模。汉语"文革"词汇、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政策词汇和俄国十月革命后俄语迅速发展的科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词汇④，都发生在重大社会变革的历史时期，表现了对词义和词义体系的急剧调整。所指事物外形或内质的变化，也引起词义发生相应的变化，如"船"随现实事物的变化，词义从最初的独木舟，变成包括拼造的木船、铁船、水泥船、轮船、汽艇、军舰等在内的宽泛概念。解放以来至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前，汉语的"食品"还只是人吃的

---

① 魏敏:《浅议澳大利亚英语》，载《松辽学刊》1993.3。

② 平洪:《语言结构和文化结构》，载《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4。

③ A. Dauzat: Le Génie De La Langue Francaise(フランス語の特質)，日訳，大修館書店，1982 年。

④ 郭聿凯:《十月革命后俄国词汇的某些发展趋势》，载《外语学刊》1986.3。

东西，张志毅《简明同义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将"食品"解释为"经过加工的供人食用的东西"。但最近几年，宠物食品出现，食品便不再是人的专用品了，其意义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句话，这些词义(或词义体系)变化均都归因于所指事物的命运。

二、心理力量

(一)认识和态度 对现实的认识或态度的改变，可引起词义变化。许多语言原把"鲸鱼"归入鱼，现代科学使人们认识到它是一种哺乳动物，认识飞跃造成了意义更新。"电"的意义变化亦复如是。情势、经验、习惯、宣传等差别形成的对所指事物主观态度和感情的变化，可形成对"少年犯、离婚"等事物的不同观念，导致不同诠释[①]。认识和态度也具有推动词义心理发展和共时性社会变异的作用。受教育程度和年龄结构不同，对"动物"一词的意思也有不同的认识(参第六章《观念》第一节"观念和概念的关系")。"动物"的生物学特征是"(身)体能随己意而自由行动"[②]。但抽样发现，三年级学生认为鱼和蚂蚁都不是动物，它们或者是没有腿，或者是太小。五年级学生根据常识课里有没有讲过，断定鱼是动物，蚂蚁不是动物。

抽象程度高的事物，言语者无法通过具体感觉来直接接触到它，容易对之产生各种不同的态度和感情，加上概念本身含义的广泛、含混，所以这种词的意义常出现游动。在日语中，感情词汇大多寿命短，意义容易变化，因为它们意义抽象，相互间的意义差别微妙，所以既模糊又容易混同。相比而言，感觉词汇的稳定性大，残存率高，因为后者比较具体，相互间的意义差别大[③]。

---

① 瑞典学者 Erik Wellander 把所指或主观理解已起变化的词叫"伪言(subreption)"，Stern 叫"置换"。

② 《动物学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33 年。

③ 山口仲美：《感覺·感情語彙の歷史》，载森岡健二等编：《講座日本語学(4)：语彙史》，明治書院，1982 年。

汉语形容词“好”的义项不下20个[①]！同样，英语good一词的意义也是花样繁多，Paul Ziff(1960)用了160个句例来谈good这一个词的意义[②]。S. Chase(查斯)在1937年搜集过当时“法西斯”一词的流行定义，结果得了42种答案！他说：“当我在写《语言的残暴》一书时，每个人都在大声谈论‘法西斯主义’，我问了一百多个身份不同的人，要他们告诉我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的见解如何，结果没有两个人的看法是一致的。”[③] 即使可以感知，立场喜好不同，意义也不一样。同样的菜，一个人说好吃，一个人说不好吃，“好吃”在各人、各地都有不同意义。大家讨论问题时，谁不小心偶尔提出一两个高度抽象词语，就会马上引起强烈争议，真正要讨论的中心问题反搁置一边。普通语义学家曾特别指明，抽象词语时常成为思考的绊脚石和行动陷阱，须加以警觉[④]。

表面同一的印象下常隐藏着知觉、感情、伦理、文化观念的差异，英语凶恶恐怖的dragon(龙)，香港英语里却仁慈可敬[⑤]。梅耶说，印欧语中表father的词在语源上虽广泛同一，但语义价值不同[⑥]。拉丁语Pater带社会含义，生理之父过去用parens或genitor表达。

(二)激情 一种社会集团的专门词汇向别的集团移动，移动后的语汇叫社会借词[⑦]。在借贷过程中，被搬弄的词改变了原先具有的意义。美国学者Sperber指出，这种变化的动力源是激情动力。它是社会抑制下潜意识的表白，在怒、爱、狂热、激奋下，热情和灵感催使着意境新奇的词自然涌出。以法语战争俚语为例，把“豆”叫做

① 孙秋秋：《“好”在语义上的模糊性与确定性》，载《汉语语义学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② Paul Ziff: Semantic Analysi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0年。

③ S.Chase(查斯)：Power of Words(语言的暴力)，中译本，台湾三山出版社，1972年。

④ 徐道邻：《语意学概要》，香港友联出版社，1957年。

⑤ 王守元：《英语在香港的使用特点》，载《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2。

⑥ S. Ullmann: The Principles of Semantics(意味論)，日訳，紀伊国屋書店，1964年。

⑦ P. Guiraud: La Sémantique(意味論)，日訳，白水社，1963年。

shrapnells(榴霰弹),把多子妇女叫做 mitrailleuses à gosses(带小孩的机关枪),这是由本领域向别的领域所作的扩张移动;用 machine à coudre(缝纫机),用 moulin à café(咖啡磨)指机关枪,这是由本领域对别的领域所作的引诱移动。扩张力(expansion)和引诱力(attraction)的加合① 促成了社会借词 (语)的实现。

(三)情感联想 对事物的厌恶、恐惧等情感联想往往带动这些事物的名称发生更易,而更改名称的目的其实是为调整色彩。亵渎性、危险性的词使人听起来感到不快,受感情、道德观和社会支配,人们一般禁忌直接提起这些词,于是造出各种婉曲说法,在使用中替换它们。有时为表现对批判对象的憎恶而逆向处理,造出各种鄙称,同义词因此大量增加②。几乎所有语言都有一大堆关于死的婉称("永别、长眠"等)和鄙称("翘辫子、断气"等),有关残疾、病患的名称也是如此。被文革亵渎或推崇的词语已带有文革色彩,为避免不愉快的回忆和联想,人们一般不愿使用它们,于是改变名称,如文革词"物质刺激"换成了"物质奖励","赤脚医生"换成了"乡村医生","学军"换成了"军训",蜕去了已注人的政治、时代、感情色彩。在伦理观念制约下,为突出伦理尊卑秩序,迎合尊长者的喜好,便建立起敬称和卑称等委婉说法。但随着旧的制度、风俗和观念的变化,卑称如"小的、不才、奴婢、奴才、老拙"等在现代汉语词义体系里消亡了。

(四)通感 通感促成触觉、听觉、嗅觉、味觉等感官系统的词意义互相转移。汉语"闻"原指"听",后指"嗅";日语きく表"听、尝、嗅、问";威尔斯语动词 clybod(听)也指"尝、嗅、触"③;德语 stumpfe 既表触觉的钝,又表示视觉的迟钝,比较 eine stumpfe Schere(一把钝剪刀)~ein stumpfe Blick(迟钝的目光);英语 broad、deep、low、full 本来

① P. Guiraud: La Sémantique(意味論),日 訳,白水社,1963 年。

② 能唤起多样感情的事物或观念,同义词聚中常不会仅有一个词,参第四章《对应》第三节"同义形式对应"。

③ J. Vendryes(房德里耶斯)(1920):《语言》,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 年。

表视觉空间关系，但在 broad sound，deep note，low voice，full voice 中，转表听觉方面①。

(五)认知联想　相似联想、邻接联想、推导联想、情景联想、错误联想都可引起词义变化。词义相貌隐喻② 大多是由相似联想引起的。身体部位词"屁股"，通过联想发展出表示"香烟"等其他物体尾部或底部的义项。邻接联想使身体部位词在相邻部位间互相转移。在邻接联想和其他某些因素的作用下，汉语"脚"原指小腿(《说文》：脚，胫也，从肉却声)，后用小腿转指脚；"涕"原指"眼泪"，后指"鼻涕"；威尔斯语 mant(牙床)和德语 Mund(嘴)源自同一原始形式；法语的 bouche(嘴)来自拉丁语的 bucca(原指面颊)③。

推导性联想的主要表现是类推。保罗比例式 a:b=c:x 说明类推适用于语音变化，句法变换的平行性原则表明类推适用于句法变化。张芷根据《广雅疏证》研究成果提出词义发展的平行现象，说明类推也适用于词义变化，如古汉语词"敦、庞"厚、大二义的形成："敦"{厚:大}="庞"{厚:大}④。受平行原理的支配，词义变化时，派生词的意义也会随之变化。英语 diplomatic 原指"外交的"，19 世纪初获得第二个意义"老练的"，名词 diplomacy 也发生了相应的词义变化。当英语形容词 hard(硬的)和 soft(软的)扩展至 a hard teacher(一位严厉的教师)和 a soft teacher(一位宽厚的教师)时，hard 和 soft 便具有了新的意义。hard 和 soft 的这种反义现象在新获得的意义中仍旧存在。有人还提出，在一定范围内，词的同音关系也会带来意义的同化⑤。

当词所表达的概念与该词最常用的现实场合之间建立联系时，

---

① 柴田省三：《語彙論》，大修館書店，1975 年。
② 马清华：《词义类扩的相貌知觉倾向》，载《语文研究》1999.2。
③ J. Vendryes(房德里耶斯)(1920)：《语言》，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 年。
④ 张芷：《词义发展中的平行现象》，载《南京师大学报》1984.4。
⑤ 董绍克：《"声近义通"的适用范围及其与"约定俗成"的关系》，载《山东师大学报》1984.3。

词义也会出现联想转移。德语词 Gift 的本义为“赠品”，这种意义仍保留在复合词 Mitgift(嫁妆)、Brautgift(妆奁)中，但由于它经常和从药房柜台授药(赏赐)的过程发生联系，而柜台上也放有毒药，因此 Gift 又获得了“毒物”的意思①。

缺乏教育的人因错误联想，对词义产生架空的、想当然的语源(即民俗语源)，从而引起了词的价值和意义的变化。如法语词 jour ouvrable(工作日)，把 ouvrable(必须工作)跟本无关系的 ouvrir(开)联系起来，恰似指商店、工场开门的日子②。

(六)求新和猎奇　喜新忌泼也是词义变化的心理原因。德语“窃听器”已有现成的词可以表达，为图新奇，又用 Wanze(臭虫)来称说，对它表现了更强烈的感情色彩，Wanze(臭虫)一词的意义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变化③。由于同样的原因，死去的语词一般不能自由恢复生命。书面语里，人们努力避免在短距离内用同一个词表示同一种意思④，否则会引起厌倦，这为同义词的形成注入了推进剂，一个概念下因此能繁殖多个备用的同义词；如表威武概念的同义词有“威武、威风、英武、威严、虎彪彪”等。

(七)注意　当某些事物的区别不再引起注意时，词义将发生液化，回归到言语的临时表达中，反之，词义分类细度就会加强。古汉语有“羹、胾、酣”等词，分别指“带汁的肉、大块肉、喝酒喝得很畅快”，后来人们不觉得有必要特别注意这些区别，于是这些意义的词消亡了，现代汉语要反映这些对象，只能用短语。相反，古汉语不需跟弃物特别区别开来的弃水动作，在现代汉语里却凝定为“泼”的词义⑤。

(八)附会　一个新概念、一项新技术或一件新事物进入某种文化

① 兹维金采夫：《语义学研究中的主要流派》，中译，载《语言学译丛》1959.4。
② P. Guiraud: La Sémantique(意味論)，日譯，白水社，1963 年。
③ 瞿则诚：《心理活动与词义扩展》，载《外国语》1987.6。
④ M. Cohen(柯恩)：《语言——语言的结构和发展》，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59 年。
⑤ 蒋绍愚：《关于汉语词汇系统及其发展变化的几点想法》，载《中国语文》1989.1。

或某种社会，一时未找到恰当的新词来表达它，便会通过扩展现有词意义的办法来表达它，从而导致一个新词的出现。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附会。附会常常出现在文化接触中。有人认为，西方人之所以对东方龙不抱好感，导源于西方人以传统知识中与东方龙毫无关联的 dragon 形象对之所作的附会。

同一语言集团因环境变异而分裂成几个文化集团，这时可明显看出新集团的语言变体中由附会引起的词义扩展和对词义的改变。同是一个 robin，在英国和美国所指对象不同。原因是英国人到美国定居后，用他们的 robin（知更鸟）来指称美国的一种比英国的 robin 体积要大得多、而且不同种属的一种红襟的画眉鸟（它们的羽毛颜色近似），从而把 robin 的词义扩展了[①]。

三、文化压力 译借可导致现有词意义的改变，汉语"菜单"随译借英语 menu〔项目表（←菜单）〕后，义项增加了。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化，外来词成为文明语言发展新概念以使词义体系增殖的主要方式之一，与社会集体活动有关的文化词特别易于借用。外来词常和所表事物一起输往各地，如汉语在汉、唐引入的西域借词"葡萄、狮子、玻璃"等。反过来也可预料，新事物传播到何地，指说它的词也会深入到何地。有的外来词只引入外文化事物的名称，并不引入外文化事物，如英语中有关中国史实和政制的汉语借词[②]。有的外来词是民族语言中缺乏的抽象词，由于精神的惰性，语言很乐意接受它们，以弥补本语言概念体系及表达能力的不足。日语的汉语借词"どうぶつ（动物）、しょくぶつ（植物）"等，汉语的日语借词"表决、采光、财团"[③] 等，属此类。桂南桂北等地瑶语原有反映"鸡、鸭、牛、猪、床、

① 黄长著：《语言·文化·社会之断想》，载《外国语文教学》1985.4。

② 英语词汇中的汉语借词基本上都是文化词，如还有丝绸棉布一类的、瓷器和制瓷原料方面的、有关茶的、中国其他土特产的、表达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等。参李学德：英语词汇中的汉语贷词探源，载《甘肃师大学报》1963.2。

③ 刘正埮等：《汉语外来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

热、坐船、猪粪”等基本层次概念的词,却无反映“家禽、家畜、家具、民族、气温、生产、交通、肥料”等概括性更强的抽象词,现也从汉语借了过去[①]。

在吸收外来词时,借入方一般要根据固有词义体系或习惯对词义进行改造[②],如改变义项数、所指范围或色彩义[③],进行意义归并等,不是把外来词义原封不动地植入本语言,如汉语的英语借词“坦克”只借入了 tank 原有的 5 个义项之一[④],日语借入英语词 watch、clock 时,只用一个泛义词“時計”。

就外来词而言,文化接触模式、文化差异情形、文化规约政策等决定了发生怎样的借用。换言之,语言背后的文化背景决定着借贷的路径、方向、领域和规模。

(一)借贷路径 借贷路径分直接借贷和间接借贷两种。两种文化集团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是借贷的先决条件。间接借贷通常发生于以下三种情况:

1.落后的陆路交通方式,制约了遥遥相隔的两种文化的直接交流,如英语的汉语借词 satin(缎子)、galingale(高良姜)等就是 15、16 世纪通过古法语和阿拉伯语等间接渗入的[⑤]。

2.有在词语借贷上做得更好的第三种语言作中介,尤其当中介语的借词构造符合借向方的词法规则时,中介的作用就发挥得更大。如汉语的日语借词“表决(英语 decide、pass a vote)、采光〔英语(natu-

---

① 舒化龙:《浅谈双语的变化和发展》,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5.1。

② 借入方还根据固有形式习惯对外来词进行形式的本语化改造。汉语对外来词(如 butter)的改造大多经过“音译(如‘白脱’)→音译+意符(如‘白脱油’)→意译(如‘奶油’)”等程序。日语对外来语的改造则有不同习惯,如在接受意大利语词 piccolo flauto(小笛)时,舍去 flauto(笛),仅以 piccolo(小)的译音ピッコロ指“小笛”。

③ 高晓华:《谈外来语的日语化》,载《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6。

④ 原来的意思有:大容器、槽;储水池、游泳池;船的液体舱;坦克;混合牢房。

⑤ 严筠:《英语中源自汉语的外来词》,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7.2。

ral)lighting]、财团(英语 foundation、syndicate)"[1] 等,本来就是日语利用汉语词构造法为借取西方语言的词而自造的[2]。

3. 封锁政策限制了直接沟通,如16世纪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来到日本,以后从江户时代开始,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只有荷兰这个窗口可间接通向欧洲文化。尤其是江户中期以来,日本对外国的关心程度增加了,惟一的手段是通过荷兰语来了解各种事物或概念,日语中的荷语借词ゴム(gom,橡胶)、ビール(bier,啤酒)等就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二)借贷方向　双方根据自身或交流需要,从对方词义体系中汲取营养,互补互流,如贸易一般。汉语有英语借词"啤酒、卡车、吉普车"等,英语也有汉语(或汉方言)借词如各种茶叶的名称等。但总体倾向上,文化优势一方以充当借源方为主,劣势一方以充当借入方为主,在两种文化之间,有一种力量要把它们的参差扯平,追求进步、维持生存的力量主导着选择吸收的方向(殖民迫害下的非自主借用另当别论)。

外来词借用的轨迹实际上就是国家或民族文化交流的缩影,同时也是外文化压力主体的变更史。日本一千数百年间一直在中国的强大影响下,因此汉语借词占非常大的比例。日本人对汉字的训读已经习惯了,意识不到它们是外来词了。这正如德国人对自己语言中来自拉丁语的外来词一样。明治以来,欧洲文明传入日本,学术词汇常借自拉丁语词。自从英国掌握了世界霸权,日本从荷兰语转向重视英语,シャツ(shirt,衬衫)、マッチ(match,火柴)、バター(butter,黄油)等都是来自英语的外来词。二次大战后,日本沦为战败国,由美国占领,日语受到美国英语的强烈影响。ハンバーガー(hamburg-

---

① 刘正埮等:《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

② 新田春夫:《ドイツ語ことばの小径——言語と文化の日独比較》,大修館書店,1993年。

er,汉堡包)、サーフィン(surfing,冲浪)、スペースシャトル(space shuttle,太空梭)等都是来自美国英语的外来词[①]。

(三)借贷领域 文化交流着重在哪些方面展开,哪些方面就将是词义互流的重点领域。双方根据各自需要,从对方的概念体系中汲取新指。中国接受印度宗教影响时,汉语从梵语借入了大量的宗教词汇,如"佛、塔、和尚、菩萨、罗汉、地狱"等,向西方学习科学文明时,又从欧洲借人了大批科技词汇"钾(kalium)、钙(calcium)、钠(natrium)"等。

一批专业领域词的引人能带动另一领域词的成批引人,文化依附力更可起推波助澜的作用。维吾尔语就是很好的实例。随着伊斯兰教的迅猛传播,它先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人宗教词汇,如借自阿拉伯语的有表"安拉、阴间、坟地、忏悔、折磨、膜拜、功修、帽子(宗教)、缠头巾、新约(圣经)、开斋、穆斯林、宗教大学、清真寺、宗教司法官、非伊斯兰教徒、税(宗教农产)"等的词,借自波斯语的有表"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礼拜、第一次礼拜、第二次礼拜、第三次礼拜、第四次礼拜、第五次礼拜"的词。一天做五次礼拜,根据各次时间的不同,"第一次礼拜"表拂晓,"第四次礼拜"表黄昏。此后,科学文化及各方面的词汇便接踵而来。维吾尔语由于大范围植入了来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新指,一方面引发了词义体系的膨胀,另一方面也在语言中形成了相当可观的伊斯兰文化的累积层[②]。

借词在多数场合为语言输入新的概念,但有时也仅仅引发名称的更换,并不植入新指,后者往往以音译方式直接搬用过来,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词形借用"。如汉语已有固有概念,仍从朝鲜语中借用

---

① 新田春夫:《ドイツ語ことばの小径——言語と文化の日獨比較》,大修館書店,1993年。

② 牛汝辰等:《试论伊斯兰教对维吾尔书面语的影响》,载《新疆大学学报》1984.1。

的"阿妈妮(母亲)"、"金达莱(杜鹃花)",在特定时代,把它们用于有关朝鲜族的文学作品里,可以表现特殊形象、感情、态度等色彩①。词形借用现象在双语区更是普遍。借词注重词汇体系中有无出现新的语词形式,借用新指仅仅注重有无植入一个新指。

掺杂在文化接触中的集团心理有时强烈影响着借词活动。美国加州西北部的卡罗克印第安人把对白人的对抗心理扩大到对英语的态度上。尽管处于英语包围之中,其语言只从英语借了少数几个词,宁愿自造词表示现代文明所需的新概念②。

四、语言内部力量 并不是所有语义发展都是社会原因造成的,比如英语 large 表示"大",意大利语 largo、葡萄牙语 largo、罗马尼亚语 larg 和法语 large 却表示"宽",西班牙语 largo 表示"长"。尽管它们都是亲属语言中的同源词,但含义大不相同③。这是语言系统本身制约的结果,很难找到什么社会原因。显然,语言内部力量在词义发展变化中起着重要制约影响作用。

(一)经济原则的制约 受语言经济原则的制约,词汇不可能无限增加语义容量,它不断更新自己,消亡的事物不再继续留在词义体系中(少数必需的历史词除外),现有形式、意义资源得到充分活用,它利用已知构词因素创造新词,或根据日常心理逻辑在原有词义基础上发展新义,既促成了词义体系的年轻化、丰富化,又便于轻松地表达和把握词义。新事物要成为词义一员,常需经过固定化和通用化考验,而后从短语凝缩为词(缩略语)。汉语短语"公共关系、等待就业"等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凝缩成了"公关、待业",英语 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凝缩成了 TOEFL。这是众多语言的普遍现象。

---

① 方言跟方言或共同语之间,经常出现这种形式借用现象。如南通话叫妻子为"奶奶",为了避俗,借用普通话"爱人、夫人"等说法。

② 黄长著:《语言·文化·社会之断想》,载《外国语文教学》1985.4。

③ 伍铁平:《不同语言的味觉词和温度词对客观现实的不同切分》,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1。

从另一个角度说，先造出短语作详细描述，也是为了便于认识、理解和掌握。

(二)习惯组合　组合关系上的固定联系也可成为词义变化的原因。感染、省略、蕴涵是这种情况的典型表现。一个词经常用在某种句子中，因此携带上这个句子的特有特征，这叫感染(contagion)。M. Breal(1924)首先注意到这种过程。法语 rien、pas、point、personne 等在语源上并非否定词，但它们差不多都用在否定句里，与否定词 ne 同现，于是俗语不用 ne，而把它们当单独的否定词用①。

两个词由于习惯搭配，以至其中某个词可表示整个短语的意思，这叫"省略"，W. Wundt(1900)称之为"浓缩"。如英语 a general officer → a general，coal gas → gas②。这跟缩略语和语音磨损的形成原理相似。感染和省略的区别在于影响意义变化的介质不同，前者是和整个句子的句法联系，后者是和一个词的句法联系③。

当词在组合关系中不能被聚合对立词替换，以构成对立搭配式，这个词就获得了上位词的意义，这叫"蕴涵"。如"多事之秋"不存在"＊多事之春"、"＊多事之夏"、"＊多事之冬"的对立搭配结构，也就是说，在这个结构中，"秋"不与"春、夏、冬"构成对立，因此，"秋"就带上了"季节"的意思。英语 autumn 没有相应的搭配形式，也就少了"季节"这个义项④。

(三)词义磨损　任何词的感情、形象等色彩或透明的理据，都可因频繁使用而棱角尽消、价值变弱，这叫词义磨损⑤。H. Sperber 说：

① P. Guiraud: La Sémantique(意味論)，日訳，白水社，1963年。

② 曹务堂：《试论英语词义变化的原因及趋势》，载《外语教学》1994.4。

③ 兹维金采夫：《语义学研究中的主要流派》，中译本，载《语言学译丛》1959.4。

④ 张宁：《词义衍生原因小议》，载《语文论丛》(4)，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

⑤ 词语频繁使用导致词形缩短，叫语音磨损，如 automobile 变成了 auto。如词形太短，词语就失去区别能力，终至消亡。

"凡字经惯用,热情渐歇,历时弥久,且一与习常蹈故之语相同"①。喜悦概念词原有的理据义(生理感觉义或躯体动作义)也是这样磨损掉的②。语素义本身的理据磨灭了,但仍可成为复合词某些概念义特点的形成依据。比如,《简明类语词典》:"欢快"常表内心或精神上的轻快感,有近似心旷神怡的情绪,"欢乐、欢喜"常表示外部状态的高兴。"欢快、欢乐、欢喜"三词的区别只在其中一个语素"快、乐、喜"上。"喜"源自开口而笑,"乐"源自连歌带舞,"快"源自舒惬(参第三章《理据》第二节"概念理据"),前二者立足于外,后者立足于内,与"欢快、欢乐、欢喜"的意义区分相应。可见,语素义的理据意义仍对后起复合词的概念意义产生作用。

(四)表达力的更新和加强 语义分配可因词本身缺乏表达力而调整。人们在语言使用中总是避免跟同音词太靠近,防止同音冲突(homonymic clash),从而引起语义创新(semantic innovation)。如法语按拉丁习惯保存着 fils(儿子)和 fille(女儿),但当两者对举时,fils一定要换上其他同义说法。法国西南部语言的词末-ll在语音上变为-t,原 cattus(猫)、gallus(雄鸡)因此发展成了同音词 gat。为避免同属家养动物的词产生同音冲突,gat 逐出了"雄鸡"义,改由 bigey 表达,仅保留"猫"义③。古英语词 letten 是阻止的意思,当它变成 let(让,允许)的同音异义词后,就不再能有效使用了,因为像 let him 这样的说法可能具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意思:"同意他……",也可以是"阻止他……"。古汉语词"首"的消亡也有同样的原因。"首、手"上古同音(均为书纽、幽韵、上声)④,宋以来仍同音(《广韵》:首、手,书九切。现代汉语也同音)。为避免同属身体部位的词发生同音冲突,对脑袋的表达不得不由同义词"头"所独占,"首"只能退缩到语素这块残留

① H. Sperber(师辟伯):《情为语变之原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29 年。

② 马清华:《论汉语喜悦概念的形成》,载《中国语研究》(日本)总 41 号(1999 年)。

③ S. Ullmann: The Principles of Semantics,日本,紀伊国屋書店,1964 年。

④ 唐作藩:《上古音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年。

阵地上。"指、趾"在古代原不同音(《广韵》:指,手指也,旨韵。趾,足也,止韵),后发展变化成同音。为示区别,不得不扩展名称,变成"手指(或'指头')、脚趾",避免了同音冲突。

此外,难念、模糊或理据隐晦的词也都因表达力不强而成为可能被淘汰的对象①。

(五)词类分配 名词构成真正的开放词类,动词、形容词则更多地属于核心词汇(central vocabulary),所以名词多义性程度相对较低,动词、形容词则是多义词最多的词汇部分。动词和形容词大量的多义现象还归因于它们跟名词的分布差异(distributional variation),并且动词在这方面的情况比形容词更为突出。比如在瑞典语中,名词就不如动词或形容词那么容易多义化,其义项数和词条(lemmas)数之比,在名词为 1.4,在动词不下于 2,在形容词不下于 1.6②。

(六)体系调整 词义体系调整是人们最常提起的影响词义变化的语言原因。概念和形素往往互相挤逼,你推我撞,你躲我闪地去填补现有空格,又产生一些新的空格,新空格在永远很窄的范围内不断地拥挤着,因为整个形态体系仍总是有限度的,不能包括词汇在其他场合所阐明的、存在于言语者意识中的所有概念③。"每一个词从产生时起,就不断地力图获得新的意义,同时它的每一次胜利只能靠损害他的邻居才能获得(A. Dauzat 语)"④。如"涕"替换"泗"表示"鼻涕"后,"涕"原来的眼泪义被逼挤掉了。

---

① 比如,古英语同义词 niman (取)和 tacan 竞争,结果难念的 niman 失败了。参 M. Sheler: Der englische Wortschatz(英語語彙の歴史と構造),日訳,南雲堂,1988年。另参第四节"理据变化"。

② Sven-Goran Malmgren: On Regular Polysemy in Swedish, Studies in Computer-aided Lexicology (ed. by Sprakdata), Almqvist & Wiksell International, Stockholm, 1988.

③ M. Cohen(柯恩)(1950):《语言——语言的结构和发展》,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④ 参 T. B. 斯特洛也娃:《词义变化的原因》,中译,载《语言学译丛》1959.1。

第三节 名称变化

人们习惯于“从词到所指”(Word→Referent)的来说明词义关系,现在我们反过来按“从所指到词”(Referent→Word)的程式,看看是什么力量决定了概念名称的变化,这种名称学(Onomasiology)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对语义学研究的补充。

正如前面所说,许多名称(如大量古代器皿的名称)是随着它所表概念一起同归于尽的。有些因语义分类方式的改变而丧失,如“犥”(说文,白黑杂毛牛)等相当一部分词就是这样被排挤掉的。这是一般概念词的变化情况,很容易理解,而对恒指名称的变化研究,则明显存在理论的不足。下面着重谈这个问题。

恒指是就概念而言,其名称并不总是恒定不变的,有不变的情况①,也有数度更易的情况。名称恒定不变的恒指是语言中最稳固的,叫“基本核心概念(basic core concepts)”,它是语言比较研究的基础,已用于语言史、方言学、语言类型学等研究实践。

W.P.Lehmann 指出,概念的核心资格不同文化间并不一定是共通的。根据人类学者 G.Sjoberg 和 A.Sjoberg 发表于《美国人类学》(American Anthropologist 第 58 卷)杂志上的研究报告,南亚诸文化中指称太阳等自然物的概念,不属于核心概念,而是属于被广泛借用的宗教词汇②。在汉语中,太阳、月亮的名称总比星星为多,比较《同义词词林》所录的名称数:太阳—12 种、月亮—29 种、星星—6 种,其中包括了不少已失去生命力的名称。河北各地方言中,太阳的

① 词形的恒定不变,并不排除自然的、符合规律的语音变化,否则无任何稳定概念可言。

② W.P.Lehmann:Historical Linguistics,An Introduction(歷史言語学序説),日訳,研究社,1967 年。

名称总共不下26种，月亮的名称不下28种，星星的名称只有1种[①]，这些都是活跃着的名称。太阳、月亮名称繁多，不断易名或积聚同义词，显然是它们本身的用途和人类的美学、崇拜心理造成的。

核心概念名称的恒定是就程度而言，并不是绝对的。如英语 die（死）、egg（蛋）、happy（快乐）、husband（丈夫）、skirt（裙子）、sky（天空）、window（窗）是古英语时代就进入英语的斯堪的那维亚语借词[②]，它们仍被确认有恒定的资格，在奥格登和理查兹1928年提出的自称能自足表达人类经验、思想的850个基础词里，egg（蛋）、happy（快乐）、window（窗）、skirt（裙子）、sky（天空）都收在其中[③]。语言年代学家 Sarah C. Gudschinsky 曾列出一个只有200个词的"基本核心词汇（basic core vocabulary）"表，die（死）、egg（蛋）、husband（丈夫）、sky（天空）也录在内[④]。可见，概念的文化重要性丝毫不因它是古老的借词而衰减。概念的核心地位是从语言和文化两方面而综合认定的。

张永言曾指出，人们至今还不清楚"究竟是哪些性质造成了基本词的稳定性，使它们在全民语言里巩固下来的，有待于继续努力探讨"[⑤]。这只提到恒指概念名称的稳固性一面，事实上，对恒指名称变易性缘由的探讨，同样存在理论的不足，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知。下面我们试对它们作些解剖。总的说来，恒指概念名的稳固或变易，既有概念的原因，又有名称本身的原因，既有外部现实原因，又有语言内部原因，当然还有人类心理因素的作用。

重要概念也往往在语义分配中为自己争得相应的形式优势，名

① 李行健主编：《河北方言汇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

② W.P. Lehmann：《描写语言学引论》，中译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

③ 程曾厚：《计量词汇学及其他》，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

④ W.P. Lehman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歷史語言学序説），日訳，研究社，1967年。

⑤ 张永言：《词汇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

称稳定性就是形式优势的显著表现。因为它们多是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概念，具有全民性和常用性，所以它们的地位受到全社会的维护。马克思说，英语本族核心概念词在词汇系统中的中枢地位是英国老百姓维护的[①]。一个语言的借词再多，本语词在词汇中枢（即基本词汇）里常常还是占压倒性优势。日语是个好例子，它虽有大量借词，但基本词汇大多都是自己语言中土生土长的，如自然类はる（春）、あき（秋）、ほし（星）、动物类ひと（人）、ねこ（猫），植物类まつ（松）、ゆり（百合），工具类はこ（箱）、つえ（杖）等[②]。英语也是如此，英语本语词与外来词之比虽为3:7，但本语词起着特别的功能价值，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仍是本语词占主导地位[③]。核心概念词是这些起特别功能价值的本语词的一部分。马克思指出，英语中的法语借词就占了55%以上，它们往往表示抽象的概念，英国上层社会曾经都说法语，同上层社会活动有关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法律名词多半是从法语借来的，但英国老百姓仍说英语，因此表日常生活、具体事物的词都仍用英国本族词[④]。核心概念的名称具有基本词汇所拥有的构词能产性，能产性不可避免地又反作用于这些构词元素，维护其名称的稳定性，使之免受形式上的排挤。本族核心概念词这种形义关系的恒定性，同语法等相对恒质因素有相似的深层语言根源，最终归因于语言认知心理和语言形式体系的需要。

恒指名称拥有的形式优势至少要受到两种力量的冲击。一种来自概念本身的性质。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当恒指反映人类自身概念时，往往多多少少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掺人人类对于自己的感情和趣味，所以一旦词的这些情味被磨损以至人类的这种表现欲得不到

① 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

② 《講座日本語学(4):語彙史》，明治书院，1982年。

② M. Scheler: Der englische Wortschatz（英語語彙の歴史と構造），日訳，南雲堂，1977年。

④ 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

满足,人们就会无情地更换它们的名称。这样,恒指名称的恒定性就受到了伤害。所以,人类身体部位词一直不如呈中性的基本数词、天体等自然概念词那么稳定。W. P. Lehmann 指出,身体部位词、动物、植物等类别的词虽较稳定,但稳定性都要比基本数词和自然现象词弱①。汉语自然现象词如"风、雨、雷、电、冰、霜、雪、星、云、露、水、火、山、土、天、地"等几千年来沿用不变。而身体部位词几千年来沿用不变的却很少,"首、领、面、目、口、齿、足、肌、肤"等均被别的词形替代了。汉方言里表"脖子"的说法可谓千差万别,永定下洋话②(属客家方言)称"颈筋",湖南江永话③(属湘方言)称"颈骨",汕头话④ (闽南方言)称"额",苍南灵溪话(属闽南方言)称"红关",温州话(属南部吴语)称"头颈",通州金沙话(属北部吴语)称"颈房",昌黎话⑤ (属北方方言)称"脖子",汉语史上,也有过"颈、项"等说法。跟这些显豁部位相对,身体中一些不特别引起注意的部位(如"背、肩"等)或内隐部位(如"心、筋骨、灵魂"等),却可幸运地维持原来的名称不变。由于相近的原因,人们设计出很多委婉、迂回的说法以避免说"死",这些说法因色彩磨损而被淘汰,又换一批新说法,如此不断循环着,本词"死"却因人们的回避而免遭磨损,延续数千年。

还有一个情况是,反映可改制或互换事物的恒指,常常很难有足够张力应付因事物不断变化导致的意义膨胀,并管束住它们的名称,使它们不发生崩裂。"房子"和"手"所表示的都是恒定概念,但名称的稳定性却不一样。苏联语言学家 S. Starostin 说:"表示房子的词比表示手的词要不稳定得多,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整个结构和房屋

① W. P. Lehman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歷史語言学序說),日訳,研究社,1967 年。

② 黄雪贞:《永定下洋方言词汇》,载《方言》1983.3。

③ 黄雪贞:《湖南江永方言词汇》,载《方言》1991.2。

④ 林伦伦:《汕头方言词汇》,载《方言》1991.3。

⑤ 《昌黎方言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 年。

建筑系统都会发生替换，相应的词汇也是如此。大家都可以借用东西，也可以借用描述这些东西的词语。可你并不借用别人的手，这类事从未发生过。"[①] 但这并不是绝对的。袜子是种典型的可改制或互换的事物，在汉语中，"袜"出现的历史很早，古写作"襪(wà)"。《左传·哀公二十五年》："褚师声子襪(wa)而登席"，晋杜预注："襪(wà)，足衣也。"但"足衣"的说法没有沿用下来。"袜"古代还写作"韈(wà)"，王力主编的古汉语教材说，可能因为上古时代人的袜子是用皮革做的。袜子在许多方言中也都称"袜子"(如金沙话、昌黎话)或"袜"(如下洋话、江永话、汕头话、苍南灵溪话、温州话)。这只能归诸其他方面的原因。

另一种力量来自语言本身，也分两种情况。一是词形损耗。词的损耗不仅能磨去词的意义，也能磨去词的形式，使之词形缩短，棱角尽消，失去表现力，从而导致词形改变。方法之一是通过添加成分，把它们拉长，扩大词的体积，俗拉丁语 apis(蜜蜂)→apicula，auris(耳朵)→auricula，sol(太阳)→solicula[②] 等就是这样的例子。这种情形和处理方法在印欧语里是明显存在着的。

汉语词的双音节化也是拉长词形的突出事例，但不是词形磨损，以单音节词为主的上古汉语音节数有限，不可能无限制增加音节数，如果不拉长词形，就无法提供足够的语义容器。汉语为减轻单音节语体制的语义负荷，增强语言表现力，通过复合法或派生法把大量单音节词拉长为两个音节，如：备→防备/舌→舌头。其中，词的义项数和词形变化有一定的关系。从对上古汉语身体部位词所作的调查发现：词形全部改变的词，原平均义项数最多；词形局部改变的词，原平均义项数次之；词形不变化的词，原平均义项数最少(古代义项数[③]，

① P.E.Ross：《语言学的发展趋势——原始词语》，载《科学》1991.8。

② J.Vendryes(房德里耶斯)(1920)：《语言》，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

③ 主要参考《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不含使用相对灵活的相貌隐喻义)。

·完全易名(古名 12,义项数 43):目(5)→眼睛/领(5)→颈项/羽(4)→翅膀/首(4)→头/翼(4)→翅膀/踵(4)→脚后跟/毛(3)→毛/辅(3)→面颊/足(3)→脚/涕(2)→泪/面(4)→脸/口(2)→嘴。

·局部易名(古名 21,义项数 62):节(7)→骨节/容(5)→容貌/牙(4)→牙齿/齿(4)→牙齿/体(4)→身体/尸(4)→尸体/右(4)→右手/鼻(3)→鼻子/身(3)→身体/色(3)→脸色/左(3)→左手/爪(3)→脚爪/骨(2)→骨头/颜(2)→颜色/颜色(2)→脸色/掌(2)→手掌/臂(2)→手臂/耳(1)→耳朵/唇(1)→嘴唇/膝(1)→膝盖/舌(2)→舌头/发(1)→头发。

·名称保全(古名 9,义项数 21):背(5)→背/灵魂(4)→灵魂/手(3)→手/心(2)→心/肉(2)→肉/肩(2)→肩/身体(1)→身体/肌肤(1)→肌肤/筋骨(1)→筋骨。

数据总结如下,请比较:

词形发化	全部改变	局部改变	不变化
平均义项数	3.6	3	2.33

可见,过度多义可导致词义的重新组配。语义负荷越重,形式更替的要求就越强。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英语词 pēod 的众多意义("民族、种族、国民、国家、地方、乡村、人、军队、语言"等),最终要由 tribe、nation、country、people、region、province 等)许多的词来分担[①]。

二是词形优选。拗口难念、理据隐晦模糊的词因表达力不强而容易损耗,成为可能被淘汰的对象(参第二节"词义变化")。汉语具有音乐性的美感[②],所以汉语词的名称有时还受语音节律的优选。

在语言的音乐性上,音节平稳是一个方面,音调和谐是另一个方

① M. Sheler: Der englische Wortschatz(英語語彙の歴史と構造),日訳,南雲堂,1988年。

② 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商务印书馆,1979年。

面。以汉语双音节喜悦概念词中喜类语素的竞争与更替为例，看音调和谐是怎样在名称优选中起作用的。比较《现代汉语词典》所有双音节喜悦概念词中的语素配置：

首字 配合 尾字		古平				古上	古去	古入		总计
		欢	欣	愉	怡	喜	快	乐	悦	
古平	欢	×	–	–	–	–①	–	–	–	0
	欣	+	×②	–	–	–	–	–	–	1
	愉	–	–	×	–	–	–	–	–	0
	怡	–	–	–	×	–	–	–	–	0
古上	喜	+③	+	–	–	×	–	–	–	2
古去	快	+	–	+	–	–	×	–	–	2
古入	乐	+	–	–	–	–	+	×	–	2
	悦	–	–	–	–	+	–	–	×	1
总计		4	1	1	0	1	1	0	0	

从上表中归纳出如下数据：

	欢	愉	乐	悦	喜	快	欣	怡
首字	4	1	0	0	1	1	1	0
尾字	0	0	2	1	2	2	1	0

不难看出，这些词对四声作了二元化处理，平、仄二类区分对待。平声一般作首字，仄声一般作尾字，如“欢、愉”只作首字，不作尾字，入声“乐、悦”只作尾字，不作首字。上、去字多用在平声字后，如“欢喜、欣喜、欢快、愉快”。两个仄声相连时，上、去作首字，入声作尾字，如“喜悦、快乐”。当首字也是平声时，平声字才可用作尾字，如“欢欣”。“怡”缺乏能产性，既不作首字，也不作尾字。违背这一模式的语音配

① “喜欢”的意思不是喜悦，而是喜爱，所以均不计入。

② “欣欣”属重叠，不是复合。

③ “欢喜”在近代也有及物性用法，如“‘欢喜’死的都上来”。比较：“那庄家‘欢喜’道：‘在哪里这半日？’”例均出自《荡寇志(上)》。

列都不具有生命活力，如"乐欢（欢乐）、乐欣（安乐欢欣）、乐娱（欢欣）、乐恺（欢乐）、乐喜（欢乐）、乐笑（欢笑）"[1] 等，在汉语史上都出现过，但不久就消失了。

至迟到明清时期还是"喜"的自由运用时代，但"悦、乐"已开始变得不那么自由了，并出现了有趣的分工："喜"用于肯定；"悦、乐"用于否定，且紧邻于否定词"不"后。比较明《醒世恒言》所录话本[2]《卖油郎独占花魁》、《钱秀才错占凤凰俦》和清俞万春《荡寇志》第一百零六回至一百零九回中"喜、悦、乐"的使用情况：

		肯定	否定
《卖油郎独占花魁》	喜	3	1
	悦	0	1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	喜	2	0
	悦	0	1
	乐	0	2
《荡寇志》	喜	35	0
第106回至109回	悦	0	1
	乐	0	2

"喜"用于肯定句的例子如：

——依了张家，违了李家，一边喜，少不得一边怪了。（《卖油郎独占花魁》）

——高赞闻言，心中甚喜。（《钱秀才错占凤凰俦》）

——端的十分如法，众人皆喜。（《荡寇志》）

"悦、乐"用于否定句的例子如：

① 参《汉》。

② 有人认为其中有些话本的年代可推前到宋元。

——心里甚是不悦。(《卖油郎独占花魁》)

——见他有怫然不悦之意/高赞心里大是不乐。(《钱秀才错占凤凰俦》)

——大义不悦/丽卿和大义不是真厮杀,心中不乐。(《荡寇志》)

《卖油郎独占花魁》中惟一一例"喜"用于否定句的例子是:"做得成,不要喜,做不成,不要怪。"其中,"喜"并不紧邻否定词"不"。因此,"喜"和"悦、乐"的本质区别在于,"悦、乐"在这一时期都有前接词"不","喜"则没有这样的前接词。这种分工的起源是语音优选。

《广韵》:"不",分勿切,入声。"不"与"悦、乐"相连,形成入声相连的叠韵连绵效果。"不悦"后来终于凝定为词,被收入各种语文词典。前面说过,在喜悦类成分的双音组合中,两个仄声相连时,上、去作首字,入声作尾字。所以,"不喜"之说让位给"不悦"。

近代白话已有可观的双音化倾向,"不喜"虽算不上一个词,但要适应二音步[①] 的一般语音要求。上古汉语的词汇以单音词为主,语言节律呈单音步,所以有"不喜"之说。《史记》语言属上古汉语,"不喜"之说,全书共 3 句,如"不行不喜/故三得相而不喜/福至不喜",但"不悦"有 7 例,"不乐"不下于 10 例。看来,这种语音配置的优势差异在汉朝已见端倪。

"喜"在近代白话中已在逐步走向僵死。较多双音节喜悦词[②]出现了,有的更把"喜"作构词语素,如《卖油郎独占花魁》"欢喜"(6 次)、"快活"(2 次)、"高兴"(2 次)、"欣然"(1 次),《钱秀才错占凤凰俦》"欢喜"(2 次)、"喜欢"[③] (2 次)、"高兴"(1 次)、"欣然"(1 次)、

① 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商务印书馆,1979 年。

② 当然还有熟语,如《荡寇志》"欣欣得意",话本《卖油郎独占花魁》"朝欢暮乐、欢天喜地、千欢万喜"。

③ 同"欢喜",与现代汉语中表"爱好"的及物性意义不同。

"快意"(1 次),清俞万春《荡寇志》第一百零六回至一百零九回"欢喜"(2 次)、"高兴"(1 次)。这都就增强了将"喜"排挤出喜悦概念名称体系的力量。清俞万春《荡寇志》第一百零六回至一百零九回中,喜悦概念词"喜"共出现 35 次,22 次竟都是"大喜"!

在很多场合下,名称变化和词义变化是交织有一起的,两者有着同样的变因。所以有关名称变化的其他原因,还可以回过头来在本章第二节"词义变化"中找到。此外,人们对词据的错误理解也往往导致词形的讹变,参第四节"理据变化"。

可以肯定,任何一项原因都不能决定一个概念名称的必然走向。只有当它成为所有原因中的主要作用力量时,概念名称才会呈现相应的变易特征。比如,J. Vendryes 说,许多语言里脚的名称没有变,手的名称却常被表示钩子、钳子、羹匙等的词更换,这是因为手比脚的用途多。但汉语里却相反,手概念的名称恒定不变,脚概念的名称却被更换了。脚在古汉语里原叫"足","脚"是小腿的意思(参第二节"词义变化")。用小腿转指脚的意义转移方式,是身体部位概念常用的邻换换喻方式。

马的名称在大多数印欧语言里都已更换,牛的名称都几乎未变,这是因为马的用途比牛广泛[①]。尹斌庸整理几种语言统计数据后发现,使用频率最高的动物词普遍都是马[②],可见马用途的广泛及其重要性。但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汉语马的名称却数千年未变。

第四节　理据变化

一、词据变化　根据正确理解解释的词据,叫"专家语源"[③]。但是,在日常生活或一般民众中,也往往概据错误理解来解释词据,由

① J. Vendryes(房德里耶斯)(1920):《语言》,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 年。

② 尹斌庸:《语言定量研究的一个趣例》,载《中国语文天地》1988.2。

③ 日本学者柴田武把它叫做"学者语源"。参柴田武:《方言論》,平凡社,1988 年。

此得出的语源阐释叫民俗语源(folk etymology,又叫"流俗语源、俚俗语源、民间语源")。俗语源是词据在人的主观认识中的变异。推动俗语源形成的心理力量,是给隐晦理据重新注入有契性,以适应人们认识上的需要,它是对词义任意性和约定性的反动。

俗语源可形成词的语音形式的扭曲,通过这种扭曲加强错误理解的理据。换句话说,俗语源为巩固其所曲解意义,常常歪曲词形,造成理据和名称同时发生变化。不过,扭曲后的语音跟原先的语音总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如普通话音节 è 对应于温州话[ŋo12]、[u23],按源州话字音规律,普通话"鳄(è)在温州话里本应念[ŋo12],但一部分缺乏文化教养的市民在接受普通话借词时将"鳄鱼"(如"鳄鱼牌衬衫")的"鳄"误读成别字"恶[u23]"认为这种鱼凶恶,所以叫"恶鱼",这种错误大概是从文化水平较低的商贾口中发起的,知识阶层中有人已感到从俗的压力。

诗经时代鹈鹕光叫"鹈",《诗经》"维鹈在梁",后因嗉子特大,就加个"胡",叫鹈胡,《庄子》:"鱼不畏网而畏鹈胡。"经过民俗语源,名字改成了"淘河"、"逃河"。郭璞曰:"今之鹈鹕也。好群飞,人水食鱼,故名洿泽,俗呼之为淘河。"英语 sirloin(牛腰窝儿),本来是法语 surlonge〔sur(上)+longe(腰肉)〕,英语将它借入时,改成 sirloin〔sir(爵士)+loin(腰肉)〕,于是有人说 sirloin 的来源是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James Ⅰ)有一回吃牛腰窝儿吃得高兴,就把 loin 这种肉封成爵士了[①]。德语 dromedārius"双峰驼"变成了 Trampeltier"踢脚兽"〔trampeln(踢脚)+Tier(兽)〕[②]。

从方言词的地域分布上也可看出词据讹变的线索。唐山丰润县将遗腹子叫做"殁(普通话念 mò)生儿",西面临界的玉田县叫"墓生",东面临界的滦县叫"梦生"。"殁、墓、梦"音近而义同,但都能透

① 俞敏:《古汉语里的俚俗语源》,载《燕京学报》第 36 期(1949 年)。

② Ferdinand De Saussure(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 年。

明地附会出“遗腹子”的意思，说明其中包含着俗语源的地域变异。有时为了某种需要，人们还有意识改变词据，如苏州“陆墓”，这个不吉利的地名跟苏州旅游城市的地位很不相称，所以改成了“陆慕”。

成语来源于书面，多有书面色彩。缺乏文化教养的人使用它时，常有不伦不类的说法。南通的一般市民将“装模作样”说成了“抓猫儿做样”，在南通话中两者读音相似。近邻通州农村（说的是金沙话）的村民则把“莫名其妙”说成“莫门其妙”，泼妇骂街时把恶毒的骂人成语“灭门绝户”说成“眯门欺户”，根本无法从字面上理解，但读音在金沙话里都相近，实际意义也仍然得到保留。这些词据变异的俚俗说法说普遍了，有教养的人也不得不跟着从俗。

名称和理据是两样东西。有时词的理据变了，获得了新的解释，而名称却没有变。如德语 durchblaüen（痛打）源出于 bliuwan（鞭挞），但人们把它跟 blue（青色的）加以联系，因为殴打可产生“青色的伤痕”[①]。名称变了，也可不改变理据。普遍性理据的存在等于告诉我们，即使有些所指的名称被废弃了，替换它的新名称也可能套用着旧名称的理据。如“朱颜”和“红颜”均指美女，在相互竞争中，“红颜”获胜，保留在现代汉语书面语里，《现代汉语词典》收“红颜”，而不收“朱颜”，实际上两词理据是完全相同的。

词据磨损是词据历史变化的典型。透明理据可因长久使用受到磨损，变得隐晦起来，单纯词在这方面显得尤为突出。已经隐晦的理据只有通过语义学家或词汇学家利用历史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如古音的重建、音变规律的确定、同族词的系联、亲属语言同源词的比较剖析，才能揭示出来。我们在第三章《理据》第二节“概念理据”中，可以看到不少喜悦概念词鲜明的生理感觉理据或躯体动作理据都因词的长期使用而损耗泯灭了。

---

① Ferdinand De Saussure（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

二、概念理据变化　J. Vendryes(房德里耶斯)(1920)在20世纪20年代预言,"将来会建立一门普通语义学,把各种语言里有关意义变化的资料集中在一起,从心理而非逻辑的观点来归纳其中的原理,不是以词为出发点,而是以词所表达的观念为出发点"[①]。国内也有人提出比较词源学,并在这一方向进行了一些研究,伍铁平更提出一套规划,预言可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完成四部著作或词典:《比较词源学》、《比较词源词典》、《世界主要语言语义演变类型词典》和《世界主要语音音转(或语音交替)类型词典》[②]。

对概念理据资源结构的选择也在发生变化、调整。"光、明"在汉语喜悦概念中的理据资格就经历着一次深刻的变化。把几种语言中含喜悦意义的多义词比较一下就可发理,光明义与喜悦义的通转关系具有某种程度的语言普遍性,它们可成为一个词的两个义项,即构成多义或(同支)关系。比较:

英语 bright(光明的、光辉的、鲜明的→快活的、欢欣的),light(光、光线→表示快乐的光彩,尤指眼睛发出者,如:The light died out of her eyes.她眼中的光彩消失了),radiant(光芒四射的、光辉灿烂的→指人、其面容、眼睛明亮的、流露喜悦或热情的,如:the radiant figures in the paintings of Renoir.雷诺瓦绘画上喜气洋洋的人物)。

德语 sonnig(有阳光的、阳光灿烂的、阳光充足的→开朗的、快活的、愉快的),heiter(明朗的、晴朗的→快活的、轻松愉快的、快乐的),Strahlen(发光、射出光芒、闪闪发光、闪烁→喜形于色、容光焕发),aufhellen(天空明朗起来→脸露出喜色)。

---

① 房氏所谓的"普通语义学",是就语言普遍性而言,译作"普遍语义学"似更准确,与生活在美国的美籍波兰裔学者科热布斯基(Alfred Korzybsky,1879～1950)创立的就大众化而言的"普通语义学"显然不是同一样东西。

② 伍铁平:《论语言中所反映的价值形态的演变》,载《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2.2。

法语 gaieté(悦目、鲜明→愉快高兴)。

明喜义通关系在古汉语同源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成为喜系字滋衍中异常活跃的一支,第三章《理据》第二节"概念理据"列举了不下十组明喜义通的例子(兹略),这些多义或同源关系中所反映出来的明喜义通的自明性,都因长期使用而损耗殆尽了。

属于生现感觉范畴的明义和属于心理感情范畴的喜义之间,不存在任何程度的相似性,其语义关系是通过事态相关性[①] 系联在一起的。明亮、光辉不仅作为喜悦之果表现于喜悦者的自身的眼、脸(喜悦时生理反射的一种体态),而且还包括能够激发视觉感官愉悦的外部光源。

跟古汉语相比,明喜义通法则在现代汉语里却几乎失去了全部的能产性,看不见反映这种意义流转关系的喜类词。惟独的一例是跟明亮义有关而不直接表达明亮义的"开"。《汉》解释它有这样三个义项:

·开朗、明亮,如:"天开了,太阳出来了。"

·清楚、明白,如:"大爷说开了很是了,为什么又外头打架?"

·宽解、舒畅,如:"怀抱何时好一开。"

"开"可以喻指明,但明不是"开"本来的意思,不能扩展到别的方面,如不能将"房间里亮了"替换成"*房间里开了"。"灯开了"的"开"相对于"关"而言,不指"明","开、亮"可同时用在同一句中表达不同的意思,如:"灯开了,不亮"。所以"开"的所谓明义,其实很难作为明喜义通的典型例子。

另一方面,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话语表达中却没有放弃把眼、脸、心等表情体的发光、明亮作为喜悦的表情线索(expressive cues)。请看下面的一些例子:

① 马清华:《论汉语喜悦概念的形成》,载《中国语研究》(日本)总41号(1999年)。

[眼/亮]——他的眼睛欢乐地闪亮(《徐》①)/两只眼睛透出了欢快的光泽(《敌》)/慕天恢喜得眼睛发亮(《危》)

[脸/亮]——脸上闪着兴奋的红光(《子》)/脸上总透出洋洋的喜气,闪着幸福的光彩《天》/黝黑的脸上,不自主地发出了喜爱的微笑和快乐的光辉(《冰》)。

[心/亮]——他的心中光亮起来(《四》)

"心"在这里指感情容器②,不指心脏。但感情容器不过是抽象体而已,本无明亮可言,如无" * 心脏明亮"之说。心之明亮是对内在感情所作的物化比喻,或正是根据与眼、脸部体态的类比所作的内化,与"脸上笑" 内化为"心里笑"的现象同理。

现代汉语回避用古代曾达到活发化程度的明、喜义通法则作为新造喜类词的理据,却仍然利用在古代并不如它活跃的甜("甜蜜")、笑("乐呵呵")、跳("欢腾")、叫("欢呼")等③ 与喜悦的事态关联,说明为减除心理的疲惫和厌倦,义通法则本身也在发生变迁,并在法则调整时表现出求新的倾向。

① 圆括号中书名号内的汉字是引用书名的简称,下同。详见"附录一",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② "感情容器"的术语见 G. Lakoff: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認知意味論——言語から見た人間の心),日訳,紀伊國屋書店,1993 年。汉语"肚子、胸"等有时也具备感情容器的功能,如南通话:"他实际上肚子里欢喜了交关。"(他其实心里很高兴)

③ 引文同上。

第六章 观 念

第一节 观念和概念的关系

为把语义学范畴的义素嫁接到人类文化和心理的研究中，并区别于概念，我们把单项义素类别所反映的思想范畴叫观念。观念不同于实实在在的概念体，它比概念抽象、虚化、空灵得多。笼统、弥散的观念化过程跟能得出概念体的抽象活动相对。过去探讨词义跟文化的关系时一向偏重概念。实际上，观念同样带有深刻的文化烙印，它既有区别于概念的独立特征，又有跟概念同构、互补的文化底蕴，是文化对语义施加影响的重要阵地。观念和概念的关系可从三个方面来看：

一、成分对应关系 观念常表现在词汇组合框架对候补词项的选择上，也能在聚合对立关系中得到表现。“__想、__听、__踢”这些固定的词汇组合框架设定了“人、耳朵、脚”的观念地位，这些观念又是相应的概念实体。动词“敲”在组合关系上选择[＋带硬质外壳的东西]。被选择的这一特征在普通话里仅仅是一个观念，却没有一个专门的概念指所有“带硬质外壳的东西”。有些观念是零散的、拆开的，这就决定了它不能对应于一个概念。“驰骋”的组合框架选择“车、马”。“车、马”是个析取关系的观念，分析时只能把它拆开，变成[车/马]，显然它不对应于一个概念，与合取关系词“车马”的意义有别。

捷克 D. 赫罗尔多娃详细分析了汉语表白色的 ABB 形容词的意

义①,如:白皑皑(雪、霜白)、白澄澄(雪、银、银器白,这种白不能用来形容霜)、白光光(月亮、洋钱等白,这种白是从物体内部发出的比较强烈的不动光源)、白亮亮(灯、月亮、洋钱等白,这种白是从比较强烈的不动光源表面发出的)、白花花(银子、霜花、水面使人看了就觉得眼花缭乱的白)、白刷刷(人体的各部分、墙白)、白溜溜(光滑、圆圆的和长长的物体,最好形容剥掉皮的树枝白)、白糁糁(液态的东西的整个表面白或微白)。这些词所牵涉到的对象事物都离散而缺乏意义的整体性,所反映的观念也就没有相应的概念形式。

在词汇的聚合关系上,常可表现出人和动物的区别特征。如汉语不少方言中,人的性别用“男/女”,动物性别用“公/母、雄/雌”,它潜在反映着“[+人]/[+动物]”这对语义特征的存在。汉语任何方言都有“人”这个概念,但除普通话外,大多数方言没有概指一切动物的概念,即没有普通话“动物”那样含义广泛的土语词(文人口中的普通话书面词除外)。这就说明,有些观念具有相应的概念实体,有些观念则没有相应的概念形式。

可见,无论在组合关系还是聚合关系上,观念都可能有一个相应的概念实体,也可能没有。有相应概念形式的观念叫定观念,没有相应概念形式的观念叫散观念。

二、相互独立性 观念和概念的相互独立性也表现在语言习得差异中。观念和概念的形成不是互为前提的。比如,在动物观念的习得上,儿童们倾向于作最大范围的泛化。小孩初学语言时,从鸟窝、兔穴到其他动物小窝等一切住居之所,恐怕都叫“房子”。之后,慢慢学习词汇上一连串的区别,如摩天大楼、茅屋、农舍等许多细类。在动物概念的习得上,情况刚好相反,幼儿不是先学会高层抽象的动物词,而是先学会各种具体的动物类别,如他们不是先学会“动物”一词,而是先学会“狗”(参第一章《导言》第三节“文化对语义的作用”)。

① L. Zgusta(兹古斯塔):《词典学概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

虽然发达社会的儿童有机会较早从动物园、动物画本、动物影视片中接触到高层抽象的动物概念词，使用频率也较高，但经常会局限于指某些具体的典型成员。1981 年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以“どうぶつ(动物)”一词为刺激语，测试了东京(城市)和鹿儿岛甑岛(非城市)两地 4 岁儿童的联想词汇，结果普遍联想到的前 8 个词多指动物园中的动物：

日本东京(总人数 100)：	象(69)、长颈鹿(65)、狮子(46)、猿猴(35)、兔子(34)、熊猫(30)、老虎(27)、非洲大猩猩(25)
鹿儿岛甑岛(总人数 23)	象(17)、长颈鹿(14)、狮子(8)、兔子(5)、马(4)、猿猴(4)、老虎(4)、狗(3)①

其他指家养的或动物图画书中可以见到的兽类。显而易见，语言习得中，儿童有时对观念范围的把握能力和对概念范围的把握能力有明显反差。

观念和概念的相互独立性也表现在表义功能的差异上。在表义中，动物观念的存在不以有相应广度的动物概念为条件，所指范围可达到尽可能广泛的程度，它具有日常词汇化和语法化的特点，因此跟语言系统的关系密切。日语跟人或动物搭配的存在动词いる，与无生命事物搭配的ある，两相对立。景颇载瓦语表生物的“在”和非生物的“在”，用不同的动词②。许多语言的性范畴、自主自控动词、生理动词等，既适用于人类，又适用于动物，等等。

与动物观念相反，高层抽象的动物概念往往具有书面性。汉人要全面把握普通话“动物”一词的意义，须有科学知识的支撑。“动物”的生物学特征是“(身)体能随己意而自由行动”③。但抽样发现，三年级学生认为鱼不是动物，理由是它没有腿；蚂蚁也不是动物，理

① 这些词以汉语列出。

② 徐悉艰等：《景颇族语言简志》(载瓦语)，民族出版社，1984 年。

③ 《动物学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33 年。

由是它太小。五年级学生认为鱼是动物，理由是常识课里讲过；蚂蚁不是动物，理由是常识课里没有讲过。“动物”一词在好些语言里都有两三种含义①：一是生物学含义，包括人；二是社会学含义，指人以外的一切动物；三是日常语言含义，主要指稍大一些的哺乳动物（不含人）。我们把第一种含义叫义项 A，第二种含义叫义项 B，第三种含义叫义项 C。未进过学的成人对“动物”的 A、B 义项不甚了了。一个世居北京、现为北京某大学服务员的中年妇女告诉我，鸡属“家禽”，不属“动物”，鳄鱼算“动物”，鱼不是“动物”，经过认真思考后又认为鱼是动物，因为电视片动物世界中有鱼，蛇属爬行动物，是“动物”，昆虫如苍蝇、蚊子等不算“动物”，没有听说过苍蝇属“动物”。方言是日常口语的典型，汉方言的土语词中大都没有与 A、B 义项范围相当的动物概念词②，如北京话口语很少说“*到动物园看‘动物’”，而说“到动物园看‘老虎’”或“到动物园看‘鹦鹉’表演”等，“动物园”中的“动物”不是单独使用的词，而是词的构成要素。共同语有全面记述功能，可表达文化关心的一切内容（如日常生活、科技、社会、人文理论等），所以 A、B 义项才能在普通话“动物”这个词中出现和扎根。“动物”一词的 A、B 义项只出现于文人口中，在普通话里也有较明显的书面色彩。书面性跟高度抽象性是相互关联的。

大多数汉语方言中，意义范围最大的是表家养兽类的“畜生、牲畜、牲口”或野生兽类的“野兽”。由于是俗概念，它们的意义不能离开实际指谓经验作现性推演，比如“野兽”仅指稍大一些的野生兽类，不包括老鼠等。个别汉方言在动物概念中努力寻求与人类的区别特征，从文化角度最大程度地接近 B 义项，但差不多都比 B 义项的范围窄。金沙话有比“畜生”意义范围更宽的词“槼牲”，指家养禽兽、野兽等，但不包括小型兽类、野禽、鱼、虫、介等。浙江萧山河上话把除

① 如普通话“动物”、日语どうぶつ（動物）、英法和拉丁三种语言的 animal、德语 tier 等。

② “动物”是普通话借词，主要出现在文人口中。

人以外、有脚、杀后有鲜红血液的动物都叫“畜生”,它适用于哺乳类动物(如兔子、老鼠)、禽类(如鸡、鸭、鹅、鸟)、两栖类动物(如青蛙、蛤蟆、乌龟)等,但不包括鱼虾、河蚌、螺蛳、蝴蝶等①。在金华蒋堂人看来,人是吃熟食的,动物是吃生食的(熟饲料是人做的)。他们把吃生食的禽兽叫“牲徒”,通常指的是具攻击性的动物如“狼、蛇、老虎”等。

不单是汉语,S. G. Pulman(1983)说,许多语言中高层抽象的动物概念(A、B义项)都使人感到隔膜和不自然②。某大学一位美籍英语教师告诉我,英语口语中,animal 指兽类或牲口,不包括 insect、fish 等,animal 的 A、B 义项只是科学意义,不用于口语。可见,跟人类互补对立的动物概念并非日常生活语言里普遍存在和使用的。

统计发现,发达社会的共同语里的高层动物词有口语化趋势。根据《常》对我国 1978～1980 年中小学语文课本所作的书面和口语的混合调查,汉语前六个动物类词的频率按从高到低排为:“马、鸡、羊、鸟、动物、狼”。《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统计了汉语报刊政论、科普书刊、剧本和日常口语、长短篇小说类文学作品四个门类约 180 万字的材料,结果是前六个动物类词的频率按从高到低排为:马、鱼、动物、牛、鸡、羊。汉语的两个统计虽然结果不一,但“动物”的位次均居前,前 6 个词中有“动物”反无“畜生”。根据 G. Gougenheim 等对法语口语录音材料(163 篇共计 312135 个词)的统计,animal(动物)出现频率在法语动物类词中居第二位,数据如下③:

	Cheval (马)	Animal (动物)	Bête (兽类畜生)	Poisson (鱼)	Poule (母鸡)	Canard (鸭)
出现的次数	116	48	30	25	24	24
出现的篇数	30	10	11	10	8	6

① 海豹没有健全的腿,又见不到,他们就不知道是不是“畜生”,但认为斑马是“畜生”。

② S. G. Pulman: Word Meaning and Belief, Croom Helm, 1983。

③ 程曾厚:《计量词汇学及其他》,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年。

普通话“动物”和法语 animal 都是 A、B、C 义项齐全的多义词。词的口语化并不等于高层动物概念的口语化。这些词仍可能是在相对较低的义项层次即 C 义项上使用，因为它们都是多义词。正如前面所说，许多人知道“动物”一词，却不知道它的全部意义。由于生物、社会、文化科学的广泛普及，人们想到取用它们来冲淡一般口语动物词在长期使用后携带的贬化或咒骂色彩。尽管有时它自己也避免不了贬化命运，但其兼有的高层义项多少充当了增人中性色彩的调和剂，尽量维持雅言的色彩①。

使概念活动感到无能为力的、广泛抽象的事物，却往往能在观念活动中表现自如。除了动物范畴的例子之外，张志公提过时间和空间范畴的一个悬案。他问，为什么时间和空间概念的语言表达方式和理解的难易不同呢？在我们知道的大部分语言里，表示时间范畴所用的手段和空间范畴不一样。凡有形态的语言，都用动词的形态这种手段来表示时间范畴，却很少用形态这种手段来表示空间范畴②。事实上，如果根据对观念和概念差异性的认识，并不难理解时间和空间范畴的这一区分。形态是观念的实现方式之一(参第二节“实现方式”)，时间范畴比空间范畴抽象得多，在概念活动中，时间概念也都来自空间概念(参第一章《导言》第三节“文化对语义的作用”和第三章《理据》第三节“义类理据”)，所以，一方面时间范畴需要并且可以借用形态方式实现为观念，另一方面，空间范畴却没有这样的需要，因为它比时间范畴具体得多，概念活动可以胜任对它的抽象。此外，人们日常觉得每一事件都有必要放在时间参照系中，而不一定得放在空间参照系中来观察。

三、文化同构和互补性 概念和观念都是对经验世界的整合。

① 当然，也不排除概念的抽象性在口语中出现某种程度的升级或滋长(主要在文化阶层)。

② 《张志公自选集(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

注入文化关注的基本原则最终在语义分配上释放出来。概念为经，观念为纬，成为组织人类经验核心的网络，所以它们在本质上具有文化同构和互补性，从第四节“文化释放”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第二节 实现方式

不同类型的义素实现为观念的方式不完全相同。聚合义素中，跟理性义总和有直接上下义关系的义素叫核心义素，如“猴子”的义素[+动物]，其他聚合义素叫非核心义素，如“尾巴”的义素[+动物]。反映组合特征的义素叫组合义素，如“下(生育)”的义素[+动物]。核心义素靠形态标记实现为观念，非核心义素或组合义素则一般是靠隐性词义范畴(covert categories)实现为观念的。下面以动物观念为例进行分析，“动物”用语主要指它的第二种含义(义项)，即与人类互补对立的这种意义。J.N.Leech(1974)的语义分析中，[±human]从属于[+animal][①]，S.R.Levin(1977)中，[+human]与[+animal]处于并列层次[②]，D. A. Cruse(1986)中，[+animal]并列于[+bird]、[+fish]、[+insect]等[③]，从中可以看到义素[+动物]意义层次的不定性。若不对之作出界定，难免会在几个不同层次上游动，造成理解错乱，从而使研究成果失效[④]。

一、形态标记 核心义素与词义的关系，跟概念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一的，比较“猴子:[+动物]～猴子:动物”。一般可以把核心义素撇除在观念以外，以免作重复观察，因为它是上下位词义关系(supraordinate)的复写。但当它有形态标记时，形式就要求赋予它以

---

① J.N.Leech(利奇)(1974):《语义学》，中译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年。

② S.R.Levin(1977):The Semantics of Metaphor,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③ D.A.Cruse: Lexical Seman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④ 成果失效在许多辞书对动物相关词的解释中表现得很严重。

动物观念的资格，因为这种形式意义具有明显的独立性，与其说它是理性义总和的概念，不如说是单项义素表现的观念。

汉藏语系一些语言的动物名词常带严格程度不等的前缀①。布依语(属侗台语族)② 动物名词加前缀 duez，如 duezgvaaul(蜘蛛)、duezxiez(黄牛)等；湘西苗语(属苗瑶语族)③ 兽禽鱼虫介等动物名词加前缀 ta，如 taba(猪)、taqa(鸡)、tacen(虫)、tanen(蛇)等④；哈尼语(属藏缅语族)⑤ 的动物名词加前缀 xa，如 xala(老虎)、xadze(老鹰)、xapha(青蛙)，同属彝语支的凉山彝语也有类似现象⑥，彝语义诺话动物名词的前加成分可以有 a 等两个⑦，珞巴语(属藏缅语族藏语支)昆虫名词加前缀 ta，如 tamit(苍蝇)、tator(蚯蚓)、tapum(虫)等⑧；拉基语(属仡佬语族)动物名词加前缀 li1，如 li1qho(猴子)、li1qɛ(鸡)等，小动物名词加前缀 mia，如 miapei(四脚蛇)、miaten(萤火虫)、miatɛ(土蜂)等⑨。有人试图证明汉语上古时期也有动物前缀 s*-等，认为“豕、鼠、兕、象、兽”等动物词都带有这样的前缀⑩。现代汉语虽没有动物形态，但指人名词前缀“阿”，人或动物名词前缀“老”

---

① 湘西苗语的动物名词前缀 ta 不加在指人名词前。布依语的动物名词大多加前缀 duez。珞巴语有些非昆虫名词也有加 ta 的，有些昆虫名词(如表蝴蝶、四脚蛇、虮子的词)前面也不加 ta。

② 《布依语常用词汇选编》，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 年。

③ 易先培：《论湘西苗语名词的类别范畴》，载《中国语文》1961.3。

④ “种(specfic)”层次上的动物类词因追加具体限制，反失去了带前缀的资格，不能加前缀 ta，如 neba(母猪)、qaxwa(芦花鸡)、nenu(水蛇)等，这是一种变则。例见《苗瑶语方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 年。

⑤ 戴庆厦等：《哈尼语概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 年。

⑥ 张余蓉：《凉山彝语词的构成》，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 年。

⑦ 戴庆厦等：《彝语义诺话动物名词的语义分析》，载马学良等：《藏缅语新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 年。

⑧ 孙宏开等：《门巴、珞巴、僜人的语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年。

⑨ 张济民：《仡佬语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 年。

⑩ 金理新：《汉藏语的肢体与动物名词前缀s*-》，载《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8。

等非严格形态都与之有某种程度的平行性，说明动物形态在汉藏语系中有着广泛的形式基础。

汉藏语系以外，法国语言学家 M. Cohen 指出："某些语言，特别是大洋洲和非洲的某些语言，在语法上把事物分成类，如动物、植物、大地及其产物、水和能溶解的物质等等，这些类别的标志一般是词缀。"[①] 比如，东非斯瓦希里语的前缀也对改变词义有重要作用，人物、动物类名词的前缀属 wa 类，除人以外的生物名词的前缀属前缀 mi[②]。汉藏语系的这种动物形态在印欧语中是少见的。难怪 M. Cohen 慨叹说："我们的'性'只不过是这种分类的一个缩图而已！"

以上是核心义素〔+动物〕依仗形态标记实现为动物观念的例子。

二、隐性词义范畴 伯林等人提出，在许多语言里有中间隐性范畴(intermediate covert categories)存在[③]。隐藏在相关事物词背后，从聚合或组合结构中表现出来的对立特征归结为"隐性词义范畴"。组合义素或非核心义素常通过隐性词义范畴实现为动物观念。这些对立主要发生在量词、动词、形容词和名词上。这里说说量词(其他词类参后文)。

有量词的语言总要借量词消除被计数事物之间的差异[④]，似乎不分类就无法计数一样[⑤]。在文化和固有语言体系等多重压力下，人和动物的观念对立形成了。印欧语没有专门的个体量词，谈不上这方面的作用，但在个体量词丰富发达的汉藏语言和东南亚其他语言里，量词却是表现组合对立的典型方式。汉语莆田话量词"头"可

① M. Cohen(柯恩)：《语言——语言的结构和发展》，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59 年。

② 章培智：《斯瓦希里语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0 年。

③ S. G. Pilman: World Meaning and Belief, Croom Helm Ltd. 1983.

④ W. V. Humboldt(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 年。

⑤ E. Sapir(萨丕尔)：《语言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4 年。

以计量家畜(如牛、羊、马)、家禽(如鸡、鸭、鹅)、野兽(如象、鹿、老虎、兔子)、野禽(如麻雀、乌鸦、鸟)、虫(如蝉、苍蝇、蚊子、蜜蜂)等,但不计量人[①]。同类情况如闽南安溪话的"只"[②]、湖南江永话[③]和古汉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量词"头"[④]。唐朝的"头"义域也很宽,甚至可以计鱼,例如柳宗元《小石潭记》:"潭中鱼可百许头。"侗语(属侗台语族)量词 pəu 计人,to 计动物,məi 计植物[⑤]。纳西语(属藏缅语族)量词 kv 计人,me 几乎可以计量人以外的一切动物[⑥]。景颇(载瓦)语(属仡佬语族)[⑦]量词 ju 计人,tu 计量禽兽虫鱼等类动物[⑧]。阿昌语(属藏缅语族)[⑨]量词 u 计人,tu 计量人以外的动物。缅甸语也有适用于从蚊子到象(如狗、牛、马)等一切飞禽走兽(如狗、虎、鸡、鱼、蛇、马、牛、猪等)的单一量词[⑩]。这些几乎适用于一切动物的量词都避开了与人的组合,把所表现的动物观念限制在与[+人]相对的意义上。

有的量词不计量动物,而计量动物的相关事物,并在计量中表现出与[+人]的对立。闽南安溪话用"埒"计量动物屙的屎,用"腹"计量人的大小便。比较:蜀埒牛屎(一泡牛屎)、四五埒狗屎(四五泡狗屎)~蜀日放去三四腹屎(一天屙了三四泡屎)、放蜀腹尿(撒一泡尿)。"埒"也可用来计量人的大便,反过来,"腹"不能计量动物的屎

① 林文金:《莆田话的物量词》,载《方言》1979.6。

② 林华东:《安溪话物量词说略》,载《中国语研究》(日本)第 40 号(1998 年)。

③ 黄雪贞:《湖南江永方言词汇》,载《方言》1991.3。

④ 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华书局,1965 年。

⑤ 石林:《侗语汉语语法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年。

⑥ 和即仁等:《纳西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 年。

⑦ 徐悉艰等:《景颇族语言简志》(载瓦语),民族出版社,1984 年。

⑧ 同样,仡佬语量词 xen 计人,san 计动物。

⑨ 戴庆厦等:《阿昌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 年。

⑩ 汪大年:《缅甸语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尿，这是非均衡对立形式（参下节）[1]。

第三节 对立模式

反映隐性词义范畴的词汇对立关系究竟有哪些模式？以动物与人类的对立模式为例，至少可以从意义、结构、事项来源、作用方向、普遍性程度等五种角度来观察。以下分别来看。

一、意义类型 从意义看，动物与人类的对立模式有析取、合取两种。动物的下属成员分别与[＋人]构成的对立，是析取对立。动物有哪些下属成员呢？按分类层次结构理论（参第二章《分类》第一节“民俗分类”）可以发现，以“动物”为起点的词汇分类层次，纵度至少有五层，从高到低排为：

(1)起点(unique beginner)：“动物”。

(2)形态(life form)1：“兽、禽、虫、鱼、介”。

(3)形态(life form)2：“牲畜、野兽；家禽、野禽”等。

(4)基本层次(basic lever)：“猪、牛、羊、鸡、猴、虎、蛇”等。

(5)种(species)：“黄牛、金丝猴”等。

种以下可能还有变种(Variety)。为了不把动物观念弄得过分支离破碎[2]，我们把参与析取对立的动物成员限制在形态层次。德语人吃 essen，兽吃 fressen（还可细分成家畜吃 weiden，野兽吃 asen），禽吃 atzen。俄语人嘴 рот，兽嘴 пасть，禽嘴 клюв。这些是[＋人]与[＋禽]、[＋兽]的析取对立。合取对立是动物的总和与[＋人]构成对

---

① 有些量词对动物的分类没有强有力的核心统摄住观念的下位成员，呈散观念，如彝语义诺话与量词 tɕl 组合的是条形的虫类和高大而有角的动物（如牛、蛇、蚂蝗、尖角鹿）名词，又如汉语用“条”计量的条形动物、某些凶悍的动物（如狼、狗）和某些役畜（如驴、牛）等。

② 如普通话人的住所叫“房屋”，猪的住所叫“圈”，牛的住所叫“棚”，鸡的住所叫“窝”，鸟的住所叫“巢”。这种对立关系中的动物成员跟含义宽泛的动物起点相距太远。

立,如普通话人的性别叫"男、女",动物性别叫"公、母"或"雄、雌"。

二、结构类型 从结构看,对立有均衡、非均衡、缺项三种模式。人和动物的相关事物分别取用不同的词,这种对立是均衡的,如:普通话人的食物叫"饭",一般动物的食物叫"食儿";永嘉岩头话中,人攀登或爬是[uo44],动物攀登或爬是[po42];哈尼语存在动词 bo(有)用于人及人体器官,jol(有)用于动物;印尼语① maut 谓人死,modar 谓(动物)非宰而死(病死等)。

适用于人和动物的通式,跟仅适用于动物的词构成的对立,属非均衡对立。通式跟仅适用于人的词构成的对立,也是非均衡对立。前者重心在动物,叫外向式,后者重心在人,叫内向式。外向式如德语:皮 Haut,动物皮、甲、壳 Schutzhülle,血 Blut,野兽血 Schweiß②;满语③:浮水 selbimbi,动物浮水 funtumbi,(马牛鸭鹅等)浮水 niyerembi。内向式如普通话"尸体"是通式,只有人的尸体可婉称"遗体"。也有通式分别与人或动物相关词构成对立的混合式,如仡佬语④ 喂是 tu,喂人叫 taŋ,喂动物叫 ɳuɯ。

缺项对立指的是在人和动物的对立两方,一方有词汇形式,另一方词汇空缺。它也有外向式和内向式两类。内向式如普通话"想"适用于人,动物不会想,没有相应词。外向式如黎语:剥(动物皮)de:ŋ,剥(树皮等)di:n;西藏东南的珞巴博嘎尔语:动物脂肪 uji:,植物油 num⑤;苗语黔东方言:植物油 eb yux,动物油 diangx。不存在剥人皮

① 《新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7 年。

② 又如德语:Zahn 牙,Wehr 兽牙;Auge 眼,Licht(偶蹄兽的)眼,Seher(兔子和其他小野生动物的)眼;Bein(人和动物的)腿,Lauf(狗和除熊獾貂外的野兽的)腿、脚,Ständer(野禽的)腿、脚。

③ 《新满汉大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年。

④ 贺嘉善:《仡佬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3 年。

⑤ 欧阳觉亚:《珞巴族语言简志》(崩尼-博嘎尔语),民族出版社,1985 年。

和利用人油等现实，所以当然只能跟人构成缺项对立[1]。

三、来源类型 从事项来源看，对立有自然形态对立和文化对立两种模式。自然形态的相似在观念归并上起着一定作用，彝语义诺话[2] 蛇、鸡、鸟、鹅等咬用 thu，印尼语鸟啄、蛇咬说 catuk（或 pagut），都基于蛇、鸡出击时动态的相似，是典型的自然形态归并。但事态发生的场所等其他因素在归并时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印尼语鸡或羊的相斗都叫 belaga，满语狗、鹅赶着咬都叫 kemkimbi，这种归并仅在家养动物间进行，可见它们不仅基于动态的相似，还因为都发生在人类的养殖环境中，可以看做自然形态和文化双重因素作用下的归并。

最明显的文化归并是畜牧狩猎经济影响下的禽、兽归并。在形态上，禽类与兽类有相似性，如都是热血动物，但与飞虫的相似程度更多，如有翅、有喙、会飞、产卵等。不过，禽、兽在人类生活中的价值和地位接近，都是人类生活的依靠，飞虫却不是。畜牧狩猎自原始以来，均以禽兽为主要对象，经济形态强化了禽兽连带归类的关系，使人类把兽、禽归在一起的文化倾向变得非常强烈，如满语 geolembi 指袭捕禽兽，英语兽类臀部或禽类尾梢通称 rump。印欧语的性范畴能按自然性别确定家养禽兽的性属，却不能确定鱼虫介和远离畜牧环境的禽兽类的性属，如葡萄牙语[3] 对人和动物名词分阴阳，但不注意 onça（雪豹）等非家养动物的性别，常常只有一个阳性或只有一

---

① 除人和动物的对立、其他事物和动物的对立外，还有动物和动物的对立，如义诺话量词 tɕl 设定的虫类、高大有角的动物和量词 ma 设定的其他动物之间的对立。tɕl 换用于后者，对动物名词有贬义。

② 戴庆厦等：《彝语义诺话动物名词的语义分析》，载马学良等：《藏缅语新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 年。

③ 蔡子宇：《简明葡萄牙语语法》，商务印书馆，1998 年。

个阴性[1]。彝语关注畜牧生活内禽兽的性别和生育处理，除区分出通性、阳性、阴性外，还用特定后缀表示家养动物的骟性，而对远离畜牧环境的"虎豹"等却不区分性别。禽兽的文化归并在构成对立关系中发挥了作用。如均衡对立：闽南话人的住居是"房厝"，家养禽兽的住居是"牢(如鸡牢、牛牢)"；普通话人的医护人员叫"医生"，家养禽兽的医护人员叫"兽医"；日语人的食物是ごはん，家养禽兽的食物是えさ。再如非均衡对立：黎语驱赶是 lu:i，把禽畜赶到某一个地方是 kwa；普通话"绝育"是通式，用在家养禽兽叫"骟"；江苏金沙话"血"是通式，供人食用的动物血叫"血子"。又如缺项对立：普通话使家养禽兽交配叫"配种"，却没有专门指完全为生育目的而促使男女双方发生性关系的词。所有这些对立涉及生殖、喂养、食用、医疗、住居等养殖或与养殖相关活动的各个方面，表明这些对立关系的形成跟畜牧经济有很大关系。

有些对立只能归诸人们的价值观，人们想方设法要通过对立把对动物卑贱性的认识释放出来。浙江永嘉岩头话把人奔跑叫[so52]，动物(禽兽等)奔跑叫[za24]，当地人已说不出这种区分的现实原因，但从他们把岩头北部方言用[za24]兼指人和动物奔跑当作一大笑料中，可以看出价值观在起作用。有时，人类出于兴趣，也能充分关注与自身利益并无重大关系的动物事项，建立起对立关系。如昆虫交尾本来与人毫不相干，但白语用 jinl kuil zix 来指说，跟 jinl kail fvx(狗、猪等动物交配)区别开来[2]。

四、作用类型　从作用方向看，有自闭和施为两种。动物和人之

① 这样的处理策略中还夹杂着对小动物的忽略倾向。彝语忽略"苍蝇、蛇"的性别、葡萄牙语忽略 sapo(蛤蟆)、andorinha(燕子)的性别，表明对动物的关注程度遵循着较大动物优先于微小动物的序列。与此有关的证据还有，越南语对极小动物(如蚂蚁、小虫、虱子等)，可以和没有特定量词的物件一样，用适应性量强的量词 cái 来计量。

② 北京人仔细到关注蜻蜓交尾，把它叫"架追"！参陈刚：《北京方言词典》，商务印书馆，1985 年。

间不互施影响的对立是自闭对立，如人和动物的爬、跑对立，尾巴的缺项对立（人没有尾巴）等，都属自闭对立。施为对立是反映动物和人之间互施影响的对立，又分两类，一类是在人对动物的作用（如捕捉、训育、饲养、配种、宰杀、食用等）下形成的对立。普通话“拴着”指动物说，“绑着”指人说，天津吴桥话分别说“缚着”和“系着”。黎语殴打、狠揍是 nom，打动物是 nan；剥皮是 i:k，剥动物皮是 de:ŋ，剥树皮等是 di:n[①]。另一类是在动物对人的作用（如攻击）下形成的对立，如彝语义诺话蛇、鸡、鸟、鹅等咬用 thu，虫类动物咬用 tshl，凶猛动物（如熊豺狗豹）咬用 ε。

五、普遍性类型 人和动物的观念对立通及生理器官（如舌、嘴、臀部、骨、残骨、肉、乳房[②]、尸体等）、医食住行（如医生、食物、喂食、喝、吃、住居、奔跑、爬行、攀登等）、性别生育（如交配、使交配、绝育等）、身体状态（如肥壮）等各个领域。两种语言的对立单元如果意义领域相近，常常可以建立起比照关系。彝语中，未生育过的女青年叫 ɕɿle，未生育过的家禽家畜（小母猪、小母牛、小母鸡、小母山羊、小母绵羊），词末都带 mo，如小母猪 xomo[③]。这跟普通话中把人生育叫“养”，动物生育叫“下”[④]，人的性别叫“男、女”，动物性别叫“公、母”或“雄、雌”是大致对应的。

不同领域被选择来作为表现人和动物对立观念的普遍性程度不同。从语言普遍性看，对立领域或对立方式有普遍的、选择的、特殊的三种类型。许多语言里都存在的对立理象是普遍对立，最突出的

---

① 郑贻青等：《黎汉词典》，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年。

② 东乡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里，乳房叫 gogo，动物的乳房叫 dzialian，参刘照雄：《东乡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1 年。德语 Mamma 乳房，Brust（妇女的）乳房，Euter（牛马羊等的）乳房。

③ 彝语中，妇女绝育手术和动物骟割的名称不同，参戴庆厦等：《彝语词汇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年。

④ “养”也用于哺乳动物，但“下”只适于禽兽，不用于人。这是非均衡对立的例子。

是人和动物身体部位在可食用性上的对立。人的身体部位几乎没有从食用性角度命名的，但正如有人说，几乎所有语言对家畜等动物身体部位都有“食用的”和“非食用的”两种概念的对比(比较普通话的“肋骨”和“排骨”)。英语将人或兽类的肉叫 flesh,供食用的兽类的肉叫 meat,用餐时谈到动物的肉又不用 meat,而用 beef,mutton,veal 等词。金沙话中，人和禽兽的臀部通称“屁股”,供食用的大家畜的臀部叫“坐墩”。湖南娄底话[①] 禽类鱼类的内脏，作食物用时叫“肚杂”。动物的身体部位可按人的食用趣味作详细划分，如北京话猪的食用部位词“肚尖儿、夹裆儿、双皮、尾柱儿、硬勒、肘棒儿、肘花儿”;羊的食用部位词“上天梯、天花板儿”;牛的食用部位词“和尚头、子盖儿”;猪羊的食用部位词“脸子、连帖、沙肝儿”;牛羊的食用部位词“杂碎”;猪羊牛的食用部位词“拐棒儿、骨棒儿、腔骨、上脑儿”;鸡的食用部位词“黄瓜肉”;鱼的食用部位词“肚裆儿”等[②]。有的类义词典甚至把强调对每种动物可食用部分的分析作为它的最大特色[③]。但这里的对立普通性仍主要表现为一种总体的原则倾向，而不反映或决定某一具体事项普遍、必然的对立。

任何语言都一方面选定某种角度释放着人类和动物对立的观念，另一方面又在语义组织中忽略人类、动物及其相关事物的差别，它根据自己关注的焦点，决定文化释放和观念分配的策略，并在历史变化中对策略作出调整，这为对立的选择性提供了条件。如现代汉语“骨头、血、肉、口”既适用于人，又适用于动物，忽略了人和动物的区别，但在计数时，表多数的“们”一般只附在指人名词后(拟人用法除外),不附在动物名词后，表现了对区别性的关注。上古汉语又与现代汉语不同，“骨”和“肉”都浸透着人与动物的区分，如“禽兽之骨

① 颜清徽等:《湖南娄底方言词汇》,载《方言》1990.2。

② 陈刚:《北京方言词典》,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③ 《当代英汉分类详解词典》,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

曰骼，骨主谓人。骴，鸟兽残骨。人曰肌，鸟兽曰肉，此其分别也。"[①]

存在于一些语言中而另一些语言中不存在的对立现象是选择对立。英语人的尸体叫 corpse，remains 是婉辞，指遗体，动物尸体叫 carcase，body 是通式[②]；印尼语人的尸体叫 mayat，遗体叫 layon，动物尸体叫 buntang；白语[③] 人的尸体叫 yin conl，动物尸体（主要指家畜）叫 xix nge xix maix，猛兽尸体叫 xix lo xix banrt，塔吉克语萨里库尔话（属伊朗语族帕米尔语支）[④] 遗体叫 dʒasat，畜尸叫 torp。瑶语[⑤] 中人与动物的脸部呈系统对立：

	人	动物
嘴	nzuih	nzuih baengx
鼻子	mbiutc kotv	mbiuih kotv
鼻尖儿	mbiutc zorngh dix	mbiuih zorngh dix
鼻根儿	mbiutc zorngh ngangx	mbiuih zorngh lorngh
鼻牛儿	mbiutc nqaiv	mbiuih nqaiv
塌鼻子	mbiutc zorngh maqv	mbiuih zorngh mapv
翘鼻子	mbiutc zorngh njux	mbiuih zorngh njiux
缺鼻子	mbiutc kotc morng	mbiuih kotv nquaqv

又如德语：人嘴谓 Mund，兽嘴谓 Maul，鸟嘴谓 Schnabel。普通话和许多汉方言都没有专门的词指动物尸体或嘴。有些民族特别关注动物的机警与情绪，如乌克兰语[⑥] наставляти（动物竖着耳朵听），满语 kirimbi（鸟兽惧怕人，静静地不动、伏藏），印尼语 biasa（动物害怕）。包括汉语在内的很多语言都不大关注这些特征。普通话"胖"指人

① 参《说文》段注。
② carcase 用于人表轻蔑。
③ 赵衍荪等：《白汉词典》，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年。
④ 高尔锵：《塔吉克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 年。
⑤ 毛宗武：《汉瑶词典》，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年。
⑥ 《乌克兰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9 年。

说,"肥"指动物说,古汉语"人曰肥,兽曰腯。此人物之大辨也"[1] 但这种对立看来也是选择性的,满语 zhoholimbi 就兼指"(人越来越)胖"和"(牲畜逐渐)长膘"。

性别对立及其方式也是选择性的。普通话人的性别叫"男、女",动物性别叫"公、母"或"雄、雌",汉语许多方言的区分模式与之相近。乌克兰语动物雄性叫 самець,动物雌性叫 самиця。景颇语[2] 指人名词后面加名词 wa 表男性,加名词 jan 表女性,动物名词后面加名词 la 表阳性,加名词 yi 表阴性有些语言则呈现一种性别对立、另一种性别中和的状况,台湾阿眉斯语[3] 表人和动物阳性时,名词前加成分同,表阴性时,指人名词前加 fafahian(女性),动物名词前加 tawinaan(雌性)。相反,彝语南部方言[4] 中,人或动物的雌性表示法相同,表雄性时,人用 po,除狗、牛等少数动物也用 po 外,其他动物的雄性表示法都与人不同。缅甸语雌性动物的标示法跟人类有交叉,雄性动物的标示法跟人类完全不同[5]。有些语言则完全取消人和动物在性别上的对立,如珞巴语[6] 表示人和动物性别的方法是一样的,词根-po 表男性或雄性,-nə 表女性或雌性,如 pakpo(男奴隶)、rokpo(公鸡)、paknə(女奴隶)、roknə(母鸡)。绝大多数印欧语存在大量这类证据,但本质的不同是,珞巴语用词汇手段表达性别(加词根),印欧语一般采用语法范畴(加词缀)。

仅见于极少语言的对立现象是特殊对立。哈尼语的宾语助词 zo 表示前面的成分是宾语,宾语是指人名词时一般要用到它,宾语是动物名词可用可不用,宾语是事物名词一般不用。这种表示人、动物、

---

① 《说文》段注。
② 戴庆厦等:《景颇语语法》,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年。
③ 曾思奇:《台湾阿眉斯语语法》,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 年。
④ 李生福:《彝语南部方言研究》,民族出版社,1996 年。
⑤ 汪大年:《缅甸语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⑥ 孙宏开等:《门巴、珞巴、僜人的语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年。

事物对立观念的方式是少有的。

第四节　文化释放

促使观念形成的动力源是人类的基本文化结构，包括生活方式、文化秩序、认知结构和价值标准。这种文化结构可从观念本身及其传达方式中抽理出来。尽管各种语言中动物观念的分配策略常常很不相同，但推动人类和动物对立观念形成的基本文化结构却是相同的。人与动物的各项分界点几乎都表明，语言观念所围绕的中心是人类利益和规准，动物的利益、品质均受到蔑视，动物是下贱的，人是高贵或应是高贵的。这在语言运用上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表现：

一、动物观念词转用于人，一般引起降格，这是语言的普遍特征。普通话里"肥"指动物肥壮，转指人胖时，成了"不尊敬人家的表现"①；天津话"嗑"本指动物之间撕咬，比喻人打架时转贬义②。浙江永嘉岩头话人攀登或爬行叫[uo44]，动物（或小孩）攀登或贴在地上爬叫"[po42]"，用于成人转贬义。汉藏语系的其他语言也是如此，缅甸语计量动物的类别词用于人，转表对小孩或他人的侮辱蔑视。在印欧语中，英语 rump 本指动物臀部和禽类尾梢，若指人的臀部，则转成戏谑③；德语 Maul（兽嘴）、Schnabel（鸟嘴）转指人的嘴时，言语是粗俗的。请看次页之表中关于德语动物相关词转用于人的色彩变化情况：

① 周长楫：《闽南话与普通话》，语文出版社，1991 年。

② 又如河北全省大部分地区把"作食品用的动物的舌头"叫"口条"，唐山玉田话可把它转用于讽刺别人时指人的舌头。李行健主编：《河北方言词汇编》，商务印书馆，1995 年。

③ 人的臀部叫 bottom。

	动物	人
Maul	兽类的嘴	[粗](人的)嘴
Schnabel	鸟嘴、有喙昆虫的喙	[粗、贬](人的)嘴
Borste	粗而硬的兽毛,鬃(尤指猪鬃)	[口、谑]头发、胡子
Schwarte	兽皮、生皮、獾皮、野猪皮、肉皮	[俗](人的)皮
Fressen	饲料	[野]食物
Atzung	小鸟的食儿	[转、谑]食粮
Klaue	兽蹄;猛兽猛禽的利爪	[转、俗、贬]手、魔爪
Pfote	兽类的爪子	[俗、贬]手
Pratze	兽类的爪、兽掌	[口、谑]爪子(指人的手)

基于戏谑和幽默,动物相关词转用于小孩,这是许多语言的共同倾向。动物观念词也用作自谦,自谦是贬化的延长。莆田话量词“宿”计量禽兽或其相关事物,同普通话“窝”,如“一宿乌鸦、一宿鸟蛋”,转指人时,则表谦称,如“我有一宿男女子(我儿女多)”。S. Ullman(1962)也说,动物词转用于人,一般有贬义或幽默、挖苦、侮辱、恶毒含义[①]。

二、人有避讳需求,常寻求委婉说法掩盖人的不洁行为和相关性质,但同类现象发生在动物身上却直言不讳。不少对立因此而生。普通话表人性交的“睡觉”和表动物交配的“交尾”一般不可互换;人的排泄物叫“大便、小便”,动物排泄物常常粗俗地叫“屎、粪、尿”,“屎、尿”用于人时显得粗鲁[②]。

三、动物一般不能跟人一起计数和称代。因经济性需要,有时可通过数字暗示人类的存在,如“撞车事件造成一死两伤”,死伤的显然全部是人,不是动物。尽管动物也有隐性生死范畴(如动物“尸体”意味着动物已死),但死伤的动物不能跟人在一起计算,否则就成了笑

① S. Ullmann: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言語と意味)、日訳,大修館書店,1969 年。

② 湖南娄底话把人的粪叫“大粪”,动物的粪叫“秆筋粪(厩肥)、狗屎粪(拉在野地的粪)”。

话。有些语言还设定人和动物各自不同的计量形式。普通话人和动物表多数，指人名词后可加“们”，动物名词后不可加“们”。错那门巴语（在西藏东南错那县）[①] 动物名词、指人名词、无生物名词表多数时，所加助词都有区别。语言在正常情况下几乎都不能用一个词同时称代人和动物，如汉语一般不能用“我们”称代“我和我的狗”，不能用“它们”称代“狗和它的主人”。动物不具有跟人平等交流的资格。几乎所有语言的第一、第二人称代词都指人，而不指动物，只有表局外对象的第三人称代词才可在指物的同时兼指动物。第三人称代词人、物的综合式如景颇语 shi（他、她、它）和 shanhte（他们、她们、它们）[②]，分析式如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③] Ȍn（他），Ȍna（她），Ȍno（它）和 Ȍni（他们），Ȍne（她们），Ȍna（它们）。又如波兰语 on（他）、ona（她）、ono（它）和 oni（他们）、one（她们、它们），日语かれ（他），かのじょ（她），それ、あれ（它）和かれら、かれたち（他们），かのじょたち（她们），それら、あれら（它们）[④]。这些表明，文化和语言在人与动物之间划下了深刻的鸿沟。人凌居动物之上，是一切事物的中心。

四、与动物观念具有文化同构和互补关系的动物概念同样证实了人类对动物的蔑视。观念比概念空灵，但隐晦地携带着某些与概念相当的信息，努力挣扎着发挥类似概念的作用。老舍《赵子曰》有句话：“不幸自从发觉他那头或那匹妻子的短处以后，他懊悔地至于信了宗教，以求一些精神上的安慰。”不直接把人喻说成牲畜，而是间接用计量牲畜的量词来计量人，达到了相同的表达效果。

---

① 孙宏开等：《门巴、珞巴、僜人的语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年。

② 又如普通话 ta（他、她、它）和 tamen（他们、她们、它们），撒拉语（街子土语）u（他、她、它）和 ular（他们、她们、它们），斯瓦希里语（属班图语系）yeye（他、她、它）和 wao（他们、她们、它们）。撒拉语情况参林莲云：《撒拉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 年。

② 黄雨辰主编：《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7 年。

④ 李金涛：《波兰语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年。

反过来，概念也可为观念提供文化印证。动物形态(life form)概念词如兽、禽、虫、鱼等转用于人，一般都引起贬化，表示对人的詈骂。

> 有个人家里清贫，不善饮酒，出门时常只吃两个酒糟煎的饼子，就好像喝醉酒一样。一天出门时，朋友问："你早晨喝酒了吗?"他说："没有，只吃了两个糟饼罢了。"回家后告诉妻子，妻子埋冤他："你就说喝酒了，也装装门面。"丈夫点头同意他的指点。过几天，又是这位朋友像以前那样问他，他回答说是喝了酒。朋友追问说："是烫热了喝的，还是喝了冷酒?"那人回答："是煎的。"朋友笑着说："你还是吃的糟饼。"不多一会儿回家妻子知道了，便责备说："你怎么能说煎的呢? 应该说是烫热了喝的。"丈夫百依百顺说晓得了。此后出门又遇上了这位朋友，不等朋友问，就夸口说："我这次是烫热了喝的。"朋友问："你吃了多少?"他伸出两个指头说道："两个。"

这一点与观念词是共通的。英[1] 法和拉丁三种语言的动物概念词animal都可转作人的卑称，意思是"畜生、可怜虫、蠢货"；俄语动物概念词 животнoё(动物)转指人时，义为"愚笨粗野的人，畜生"，有藐视意味；日语きんじゅう本指禽兽，可喻骂人类；普通话"禽、兽、虫"等比做人时，都带明显的贬义色彩，如"人面兽心、衣冠禽兽、禽兽不如、如鸟兽散，可怜虫、应声虫、糊涂虫、寄生虫、放屁虫、书虫、蛀虫、害人虫、虫豸"；美国俚语 fish(鱼)喻指人时，意思多达 7 种，通含贬义，指"傻瓜、窝囊废、淫女"等。动物概念词用于人所产生的贬化，同样反映了关于动物卑贱性的思想。比如在性约束上，动物放荡不拘，人就不是这样，所以美国俚语[2] 把性生活放荡的人喻作 animal。动物狡猾、凶残、狠毒、蛮横(尤其是猛兽)，人类是或应是文明讲理的。是否文明讲理是人兽对立的焦点之一，汉语"你简直是头野兽"和"你简直不是人"意思相同，都咒骂野蛮的人。人类是聪慧的世界主宰，动物愚蠢、窝囊，美国俚语用 fish(鱼)骂人就有这样的含义。

---

① 佐佐木達：《言語の諸相》，三省堂，1966 年。

② 罗伯特·查普曼：《美国俚语大全》，中译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9 年。

家养禽兽任人宰割、食用或奴役的悲惨命运,使人类与之区分开来的需要变得最为急切,这种心理在詈骂语中溢于言表。动物的卑贱性使本来很普通的动物名词普遍地兼作贬义词。"畜生"在普通话和汉方言里大多指家养禽兽①,普通话可用它骂人;金沙话用它骂人比用"畜牲"更毒辣,后者意义范围较大,包括家养禽兽和野兽等;蒋堂话用"畜生"骂人同样比用"牲徒"毒辣②,"牲徒"指凡吃生食的动物(尤指具攻击性的动物如"狼、蛇、老虎"等)。"畜生"在金沙话和蒋堂话里,都分别比"畜牲、牲徒"常用。温州洞头是个面积不大的海岛县,以渔业经济为主,畜牧业极不发达。本岛土话(属闽南话)甚至连范围相当于"畜生"的词也没有。骂人时,只把人贬作"猪、狗"等具体动物,不能进一步抽象概括。这又从反面证明家养禽兽优先对立于人是跟畜牧经济有很大关系的。综言之,概念中的文化结构是对观念中文化结构的有力印证。

以人的利益为中心,以人的规准为参照,这在语义中有着普遍表现。因此语言设定人的高贵性,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又蔑视动物的利益和品质,认为动物是下贱的呢?因为:

一、动物肮脏、乱伦、粗野、蛮横、愚蠢等。动物观念词蕴涵着人类对动物品行根深蒂固的陈见,人类的卑鄙行为常被贬作"禽兽行为"或"鸟兽行为"。语言在好些方面反映了动物和人类在品行上的本质区分。动物饮食姿态粗野,人饮食斯文:德语 essen(人吃)与 fressen(兽类吃)的对立,trinken(人喝)与 saufen(兽类喝)的对立。类似的思想从捷克语③ 动词 Žrát 的堂义中可以看到,它一个意义指

① 浙江萧山河上话"畜生"一词的用法分出非咒骂式(见第二章分类第一节"民俗分类")和咒骂式两种,其咒骂式的适用面也相应表现得很广,对人、猪、咬人的蚊子、绊脚的石头等都可骂"畜生"。

② 蒋堂话用"畜生"詈骂时只适于人,对家养动物不骂畜生(因为它们本来就是畜生),一般采用拟人的骂法,如"要死了、见鬼了、打死你"等。

② 《新捷汉词典》,商务印书馆,1998 年。

“(动物、牲畜)吃”，而在另一个指人的意义上，则指“(人)狼吞虎咽地吃”。动物四脚行走，人两脚走路：这里用弗洛伊德举的一个语言机智的例子来说明。一个幸灾乐祸的男孩子取笑成绩退步的模范生卡尔：“卡尔正在四条腿往后跑。”只有动物才有四条腿，通过推论导向辱骂[①]。广东横县平话[②]人跑叫“走”，兽类(家畜和野兽)奔跑叫“跑”的对立，是否反映了当地人这种观念，有待印证。动物性欲无节制，人有节制：动物常跟无约束的性欲联系在一起，汉语把“野蛮的性欲”叫“兽欲”。人的性活动不但有节制，而且讲求秩序，北京话管不正当男女关系叫“臭男”，动物就没有正当和不正当的分别。动物无高级情感和智能，不能思维、说话等等，人相反：“ * 狗在想问题、* 狗爱上了小李、* 狗对我说”，语义上都不成立。若作拟人格重新认识其语义合法性，则“狗”已被加上了[+ 人]的义素。可见在人们观念中，“狗”不会思维，没有高级情感。其他动物也是如此。

二、家畜等动物是供人类食用的。家养动物的身体部位可从养殖标的定名，也可从人的食用趣味定名，如家畜的肥肉或脂肪在普通话里叫“膘”，又如家畜供食用的胃在普通话里叫“肚(dǔ)子”。这些名称均不适用于人，因为人类不是自己的食用对象。

三、动物尤其家畜的命运大多是悲惨的，它们被人类畜养、食用、奴役、戏耍，人类无法容忍自己被当作动物对待。在语言观念中，动物遭人类残害理所当然，人类遭残害是可悲的，家养动物任人宰割后供给食用。所以普通话专指杀牲畜、家禽等的“宰”色彩呈中性，用于人则呈贬义，“我杀了你！”仅表威胁，“我宰了你！”既表威胁，又表蔑视。

语言对观念释放角度的选择并不完全是任意的。隐性词义范畴

---

① S. Freud(弗洛伊德)：《机智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

② 闭克朝：《广西横县平话词汇》，载《方言》1994.3。

中被作为对立焦点的相关事物，往往在本民族生活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汉语古代选择肉、骨，德语选择皮、血，都因为这时畜牧狩猎经济在生活中发挥着最重要的影响或者距这种影响作用的时间还不长。印度尼西亚语之所以选择尸体，不是因为别的民族不死，而是因为印尼人基于宗教风俗上的原因，更关注死和尸体，其语言中很多这方面的词都跟汉语形成零对应，如：bangar（尸体腐臭味），berbujuran（尸体等横七竖八地躺着），bungking（尸体背朝上漂着），memandikan（洗尸，与给"洗澡、使洗澡"同辞），mawai（横死在地上）。印尼人对尸体给予的关注远甚于汉人。在印尼松巴岛，死者埋葬前一般都要用松巴布层层包裹，包上几十层，甚至上百层，有一些人家在屋里放了好几具尸体，有的甚至存放十几年几十年。因为松巴人把祖宗奉为神明，认为死者在阴间和活人一样需要吃饭穿衣。在巴厘岛，火葬要花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一般平民先把死者埋葬起来，待积够了钱再火葬。火葬前，他们把尸体和骸骨从坟墓中挖出洗净，火葬前人们都拥向尸体争着抬举，以表敬重。每百年举行一次大型火葬，非常热闹隆重①。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印尼人很容易接受宗教，全印尼的伊斯兰教徒占世界伊斯兰教徒的五分之一②。对动物非宰而死（modar）和被宰牲畜（bantai 被宰牲畜的肉）等的关注恐怕与宗教有关，伊斯兰教忌食自死动物。

永嘉岩头话选择攀登来表现人和动物的对立，是因为岩头处山区和狭小平原对比强烈的地理环境，更关注垂直方向的运动。岩头北部全是山区，不存在平原和山区的对比，所以反面不选择攀登。与之同辞（共名）的贴着地爬虽也是对立焦点（参前），但相比而言极不普遍。在岩头人看来，成人贴着地爬这种动作非常少见，以至于不费一番心思回忆，很难想起有表这种动作的词。泰顺处山区（与岩头同

① 俞松年等：《异国风情录》，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4 年。

② 郝时远：《世界民族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 年。

处温州，但县属不同，相隔较远)，说蛮话，属另一种方言，当地人把"人爬山"叫"爬"，"动物爬山"叫"跑"(同"人跑"的"跑")，因为他们看来，山区动物爬山不费力，它们的运动方式不存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对立，人往上爬比水平走路费力，所以人的运动方式才有这样的对立。泰顺蛮话跟岩头话的对立方式不同，岩头话"爬、跑"两个概念毫无联系(参第二节"实现方式")，蛮话却把它们牵扯起来，说明采用的是另一种观察方式。东乡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①] 和德语选择乳房，归因于操这两种语言的民族现在或不远的过去所经历的畜牧或狩猎经济。语言在发展中调整着观念释放的策略，如汉语为了在词义中表现人和动物的对立，上古汉语选择生理部位，中古汉语选择量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量词"头")，现代汉语选择计量的助词("们")作为对立的焦点。

---

① 刘照雄：《东乡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1 年。

第七章 联 想

第一节 联想类型

一般所谓的联想不很稳定，它因人和语境而异，又有时代性，是偶然的。但也有很稳定的联想。这里要谈的是后一种，分三类：词的文化联想、词义关系联想、同音联想①。

一、词的文化联想 词的文化联想是文化集团根据自己对某一事物的认识而产生的联想。在文化联想中，很多人可以想到事物醒目的特征、习性、传说、与文艺的关系、历史事件以及文化集团中与之有关的社会风俗等。它分两种，一种主要是属性联想，即从客体属性方面产生的联想。有些事物由于普遍具备某种明显属性，所以在不同语言中往往有共同的联想意义。汉语的"狐狸"，英语 fox，俄语 лиса 都会引起"狡猾"的联想。这种联想意义即便本语言没有，也容易理解其他语言中的此类意义。

不同集团所接触的客体若属性不同（即异质的），那么对这一客体的联想意义就将产生差异。东风（east wind）在中国可指春天的暖风，在英国则指冬天凛冽的寒风，英语春天的柔风用 west wind（西风）表达。汉语常有赞美东风的文句，英语却不乏歌颂西风的诗篇。汉诗多描绘春天之美，英诗多抒写夏日之丽。这些都与文化的地域性相关。

另一种是习惯联想，各语言就常不一样了。英语世界中，Friday the thirteenth（十三号的星期五）是令人讨厌的日子。这一忌讳事出

① 联想还有另一种分类法，即分成接近性联想（如由"教学"想到"教室"）和相似性联想（如由"宏伟"想到"宏大"）。

偶然。据说在耶稣最后的晚餐上，第十三个人是叛徒犹大，耶稣遇害的那个日子是星期五，恰巧又是十三号。对一般中国人来说，就没有这样的联想。中国人从“乌鸦”联想到晦气，也起因于一个纯粹偶然的事件。曹操赤壁之战前所作《短歌行》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之句，接着在战争中全军覆没。后人认为曹诗中的“乌鹊”是凶兆，自此便忌讳乌鸦。但俄国人从 ворона(乌鸦)一词只能联想到“多嘴、唠叨、马大哈”。汉语和日语颜色词“桃色”(如汉语“桃色事件、桃色新闻”，日语“桃色遊戯、ピンクサロン、ピンク映画”等词语)，都使人自然想到性方面的不纯。但英语 pink(粉红色)就不会令英美人想到这些方面，倒是 blue(如 a blue film 色情影片)令他们想到色情方面；相反，汉语的“蓝色”、日语的“青い”，都不会引起中国人或日本人这样的联想。汉语“蜡烛”、英语 candle 在与民族文化色彩有关的国俗语义方面也不能一一对应。“蜡烛”让中国人想起执著追求的精神(“蜡炬成灰泪始干”)、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品质(“教师像燃烧的蜡烛”)、老人生命的结束(“他如同一支将要熄灭的蜡烛”)、婚礼喜庆(“洞房花烛夜”)、有傻气的人(“蜡烛胚”)[①]。

国俗语义反映使用某个语言集团的历史文化和民情风俗，具有民族文化特色。这种附加在概念义上的民族文化色彩，离开民族文化背景往往就难以理解。“国俗语义学”或“国情语义学”就是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提出来的。

编纂“联想词典”以扩充普通词典，已受到国内外的注意，日本《英语岁时记》(全 5 卷，研究社出版，1968 年～1969 年)[②]、中国《汉语国俗词典》等都是这方面的尝试。日本学者土居光知(1935)[③] 在

① 王德春：《国俗语义学概论》，载《文化语言学中国潮》，语文出版社，1995 年。

② 国廣哲彌：《連想の比較》，載國廣哲彌編：《日英語比較講座(第四巻)：《発想と表現》，大修館書店，1982 年

③ 土居光知：《英文学の感覺》，岩波書店，1935 年。

"莎士比亚与花"、"雪莱诗中颜色的象征"各章中描述了花名和颜色词的联想意义，给人以非常新鲜的感觉。如 rose(玫瑰)使人想起恋爱中女性的脸颊或嘴唇，lily(百合)使人想起处女的姿貌、额头、白嫩嫩的手，purple(紫色的)可联想到豪华。外语学习者在学习这些方面有一定困难，不过正如中国人理解英语熟语 hold a cadle to the sun(拿着蜡烛照太阳)的含义是"白费、徒劳"一样，只要解释出这些联想意义的文化背景，就不难理解它跟概念意义之间的联系。

二、词义关系联想 词义关系可以按联想在语言纵横关系坐标上所处位置分为两类：

(一)聚合关系的语义联想 聚合关系的语义联想凭借对事物的感性认知，是自由联想或外向选择性联想，如英语从 day(白天)到 night(夜晚)的联想，法语 toit (屋顶)叫你想起 maison(房屋)，汉语从"鞋子"到"袜子"的联想。

(二)组合关系的语义联想 动作、性质词(动词、形容词)跟物体词(名词)，或类别词(量词)跟物体词等之间的语义关系是组合语义关系，亦即 W. Porzig(1934)所谓的"本质语义关系"①。这种语义联想完全是符号性、内向约束性联想，其联想范围随组合任意性的减小而减小。如英语从 night 通过 dark night 联想到 dark，德语 reiten(骑)叫你想起马，fahren(搭乘)叫人想起车、船。

词义关系联想也可按所属意义领域分为三类：

(一)逻辑关系的联想 上下位关系("鸟—麻雀")、反义关系("难—易；昏迷—醒")、反对关系("买—卖；教—学；兄—弟、妹")、同义关系("微小—细小")、全体局部关系("鸟—翅膀；手—指头；身体—脚—后跟")、协同关系("牛—马；梨子—苹果")等。

(二)语言关系的联想 首先是聚合联想关系，有词形变化关系("做

① 属于隐喻用法的搭配称为"非本质的语义关系"。参柴田省三：《語彙論》，大修館書店，1975 年。

—做法；吃—吃客；米—米浆”①）等。其次是组合联用关系，有主体行为关系（“狗—吠；鼻—嗅；头—磕；贼—偷”）、行为客体关系（“写—字；炒—菜；撑—船”）、量词物体关系（“封—信”）等。

（三）常规关系的联想 事物同另一事物的惯常性关系叫常规关系（stereotypical relation），它是一种社会共识或集体意识的体现，也就是说，是建立在常识基础上的。基本的常规关系，有互参关系（“马车—马夫—伯乐；祭—坛—香—纸—披麻戴孝—哭—嚎—哀—死；长叹—落泪—忧客—伤悲；厨下—酒席”）、预设关系（“熟—烧、烤、蒸……；焦—烧、烤、烘……”）、特征关系（“柠檬—酸；象—大；蜗牛—慢”）、惯连关系（“狗—骨头；农民—拖拉机；流氓—殴斗”）、部件关系（“墙—地板；手臂—头”）、因果关系（“掼—碎、坏；食物—成长’）、材料关系（“面—油条；米—米饭；纸浆—纸”）、工具关系（“洗衣机—衣服；缝纫机—衣服；演奏—乐器；嘴—吃；膝—跪”）、顺承关系（“跪—拜”）、处所关系（“脚—鞋子；手—手套；头—帽子；脖子—项链；手腕—手表；上身—衣服；下身—裤子；脚—路；嘴—碗”）、同现关系（“头—面：油头粉面；头—脑：油头滑脑、呆头呆脑、头昏脑胀；口、嘴—舌：张口结舌、尖嘴薄舌、口干舌燥、油嘴滑舌、弄口鸣舌、七嘴八舌、调嘴弄舌；口—唇：口燥唇干；唇—齿：唇亡齿寒、唇齿相依、唇红齿白；口—心：有口无心、佛口蛇心、口不应心、口是心非、心口如一、心服口服、心直口快、苦口婆心；口—声：异口同声）。

其中有的是纯常规关系，如惯连关系中的“狗—骨头”、因果关系中的“掼—碎”、顺承关系中的“跪—拜”等。当词项关系中的一个词是另一个词某义素的一部分时，常规关系就兼有了语言关系，如“手”是“手套”的义素[＋套于手上]里的一个成分，语言因素使“手—手套”原有的常识关系变得更紧密了。常规关系跟逻辑关系并无绝对

① 森川彌寿雄：《言葉の連合》，創文社，1965年。

界限。如汉语的“红—白”对立，在其他文化中并不一定对立[1]。这种形式上的逻辑关系是靠常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

词的语义关系跟人的社会关系网一样。本来，杭州的“李宁”跟日本冈山的“松本”没有直接关系，但李宁是“张大”的朋友，张大是留日学生“张三”的哥哥，在京都读书的张三，寄住在祖籍是冈山的“横山富士”家，横山富士的侄子“横山太郎”在冈山市政府教育部门工作，松本因子女入学事找过横山太郎。这样一转三折，“李宁”跟“松本”就扯上了关系。词际联想关系也是如此。日本学者柴田武说，不存在毫无关系的两个词，比如像“天空”和“高兴”这类的词，至多可以说在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连线[2]。贾彦德《语义学导论》词义关系中专列一项叫“相对无关关系”，这只能就逻辑关系而言，从联想关系的整体范围来观察是不适合的。日本电视娱乐节目中，有一种叫做“魔术香蕉”(マジカルバナナ)的联想游戏，如听到“大豆”这个词，甲便说：“だいずといったらおみそ(说起‘大豆’，我想起了‘豆酱’)。”乙接着“豆酱”说：“おみそといったらきゅうり(说起‘豆酱’来，我想起‘黄瓜’)。”丙接着“黄瓜”继续说下去。

词义关系联想除逻辑关系外，其他都有很强的语言性或文化性。以常规联想的文化性为例。尽管常规联想随意性大，但在一种文化内部，往往有共识性、普适性和惯常性。文化不同，人们生存发展的方式、历史传统、社会规约、生活习惯、民俗风情、文化活动等发生差异，常规关系也会相应有所不同，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区域性与社团性。所以常规联想走向和脉络有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是不能相互接受的。比如，中国人可能会由“大豆”想起“豆腐”，但很少想起“豆酱”，因为中国人现在很少吃酱，即使吃，也很少是用大豆做的。相

---

① 曹聪孙：《词义的平面范围和立体范围》，载《天津师大学报》1986.4。

② 柴田武：《言語における意味の體系と構造》，載《科学基礎論研究》第7号(1965年)。

反，日本人每天都跟酱打交道，每天都要喝酱汤(みそしろ)，而且很讲究，一定要是大豆做的，其他原料做的酱都属次品，很便宜。日本人黄瓜多生吃(跟中国一样，四季都有)，不少到过中国的日本人批评中国将黄瓜炒熟或煮熟吃不好。一碟拌有蛋黄酱的黄瓜蔬菜，一碗紫菜酱汤，那是日本人菜桌上常见的东西。当然会由豆酱想起黄瓜。从饮食习惯出发，中国人很少从酱想到黄瓜。日本学者新田春夫从“秋”这个词出发，联想出这么一大串：“秋－蓝天－絮云－秋刀鱼－葡萄－红叶－落叶－落日－死－人生－人类存在”等等[①]。联想是根据相邻和相似的原理进行的。在这一串联想中，根据时间、空间的邻接性和事物的相似性产生了“落叶－落日－死－人生－人类存在”等联想的飞跃，根据相似性与它们的平行性关系原理产生“落下－终了－有限过程”等联想。其中有些联想如“秋－红叶－落叶－落日－死－人生－人类存在”在人类心理中可以被普遍接受，有些则具有文化的个性。日本是岛国，海捞是重要生活来源，中国内地人居处大陆，就不能像日本人那样由秋季想起秋刀鱼，甚至连“秋刀鱼”是什么样儿也不知道。可见，文化是指引词际语义联想的重要因素。

三、同音联想 通过同音或近音关系中介作用的联想，是同音联想。它根植于语言内部语音关系，所以形成联想差异的具体方式因语言而异。它由语言和心理共同制约着联想的方向，主要有积极联想、消极联想、幽默联想三种[②]。

(一)积极联想 中国人从“圆形”联想到“团圆”。日本人喜欢“五”，新年赴神社常向神前扔五元的硬币，因为“五円”和“ご縁”的发音都是ごえん。现代中国人喜欢“八”，因为它在最早取得经济发展的广东，读音同发财的“发”。

---

① 新田春夫：《ドイツことばの小径——言語と文化の日独比較》，大修館書店，1993年。

② 除此以外，还有诅咒语和影射语的攻击性联想。

(二)消极联想 日语中“四”的发音是“シ”,与“死”的发音相同,“九”的发音“ク”与“苦”相同,所以“四”可联想到“死”,“九”可联想到“苦”,“四、九”在日本便成了令人讨厌的数字。中国人从“梨”联想到“离别”。日语“梨”则引起另一种情形的消极联想,它的发音是ナシ,与表示一无所有的词“無し”发音相同。

(三)幽默联想 幽默联想可以看做语音机智(sound-wit)的一种表现。汉语通过谐音达到幽默联想的现象大量反映在歇后语上,如“外甥打灯笼——照舅(旧)”等。相声《找舅父》中,故意把拉砖的车叫做“砖车”,让对方以为自己可以坐“专车”了,从而实现了幽默。

同样是根据音近关系的附会,布谷鸟的叫声在江苏金沙农村,根据农时附会成“归家,归家,小豆开花”,在北京都市则附会成“单身汉苦”,曲阜话更是根据儒家注重的“德”把它附会成“张三怪古,你在哪住,我在家后”。显然,语言和文化背景二者是制约着联想方向的双重因素。

文化联想、常规联想、同音联想以及由此形成的风俗习惯(参第四节“联想对语义的作用”),构成一种文化的风情知识。

第二节 联想意义类型

词义的第一功能是指谓,第二功能是唤起联想。联想意义因语言而不同,而且文化色彩很浓,属于文化意义(cultural meaning)的一部分。辞书的意义解释中常有说明。文化意义还包括另外的东西,如某些词语跟这个社会的文化事实如习惯、制作方法、思维方式、价值观等方面的关系。英语词 Sunday 的所指意义是星期天,有时可喻作休息天。但是,单说这两个意思还不充分,对基督教徒来说,Sunday 被赋予了特有的文化价值,规定了如何度过 Sunday 的办法。这种信息可叫文化意义或文化信息。所指意义属于语义范围,联想意

何也唤不起它的意象，如“荭草、缬草、萱草、葎草、苌草”，从构词上我们知道它们属于“草”，但我们根本不知道它们是怎样的。调查未发现意象值最低的第 5～7 共三等的词，说明抽象名词唤起意象虽比具体名词困难费力得多，但绝非不能唤起意象。

原始初民对现实世界没有过分抽象的需要和心理能力，所以偏于具体思维，语言多为具体词。冯德指出：“吾人所欲表明之文字久已脱离其原义，一种极抽象之思想及其用久，每为具体概念之元素[①]。抽象之思想实由具体中脱胎而出者矣。‘彼给与儿童石笔’是语也，在吾人观之，不特为简明之叙述，抑亦为直接的具体之表现。但若将是语译与非洲之太谷(Jogo)土人听之，则能了解者恐什不得其一二。盖‘石笔’两字，在彼方人民观之，已觉偏于抽象，难以悟会，更遑论其他。复次，任何一物，向未见及者，在彼等思之，必为之惊奇不置，以为一人安能获有是物，是物又安能转给他人?”[②] 但是，高意象值的具体词正是低意象值的抽象词成立的基础，原始语言中的具体词被广泛用来喻指文明语言中的抽象事物[③]。在汉语中，单音节抽象词的前身几乎都是具体词，而复合抽象词也几乎都是由古代单音节具体词组成的。

对于同一种对象类别，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意象和意象程度不同。如对中国人、日本人来说，“外国人”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但在美国，很难从外表上分辨出外国人，本国人和外国人中的白人、黑人、黄种人都很多。后者的意象程度就较前者为低，所以在美国，值用“foreigner(外国人)”这个词并不太多，它给人的是一种疏远和排他

---

① 布达哥夫也说，许多现代语言中仿佛是纯粹抽象的词，在历史上正是从实际经验和具体现实中产生出来的。参布达哥夫(1953)：《语言学概论》，中译本，时代出版社，1958 年。

② 冯德：《心理学导论》，中译本，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1939 年。

③ E.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 (I. Langua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53.

何也唤不起它的意象，如"荭草、缬草、萱草、葎草、苄草"，从构词上我们知道它们属于"草"，但我们根本不知道它们是怎样的。调查未发现意象值最低的第5～7共三等的词，说明抽象名词唤起意象虽比具体名词困难费力得多，但绝非不能唤起意象。

原始初民对现实世界没有过分抽象的需要和心理能力，所以偏于具体思维，语言多为具体词。冯德指出："吾人所欲表明之文字久已脱离其原义，一种极抽象之思想及其用久，每为具体概念之元素[①]。抽象之思想实由具体中脱胎而出者矣。'彼给与儿童石笔'是语也，在吾人观之，不特为简明之叙述，抑亦为直接的具体之表现。但若将是语译与非洲之太谷(Jogo)土人听之，则能了解者恐什不得其一二。盖'石笔'两字，在彼方人民观之，已觉偏于抽象，难以悟会，更遑论其他。复次，任何一物，向未见及者，在彼等思之，必为之惊奇不置，以为一人安能获有是物，是物又安能转给他人？"[②] 但是，高意象值的具体词正是低意象值的抽象词成立的基础，原始语言中的具体词被广泛用来喻指文明语言中的抽象事物[③]。在汉语中，单音节抽象词的前身几乎都是具体词，而复合抽象词也几乎都是由古代单音节具体词组成的。

对于同一种对象类别，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意象和意象程度不同。如对中国人、日本人来说，"外国人"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但在美国，很难从外表上分辨出外国人，本国人和外国人中的白人、黑人、黄种人都很多。后者的意象程度就较前者为低，所以在美国，值用"foreigner(外国人)"这个词并不太多，它给人的是一种疏远和排他

① 布达哥夫也说，许多现代语言中仿佛是纯粹抽象的词，在历史上正是从实际经验和具体现实中产生出来的。参布达哥夫(1953)：《语言学概论》，中译本，时代出版社，1958年。

② 冯德：《心理学导论》，中译本，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1939年。

③ E.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 (I. Langua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53.

何也唤不起它的意象,如"莛草、缬草、萱草、葎草、苲草",从构词上我们知道它们属于"草",但我们根本不知道它们是怎样的。调查未发现意象值最低的第5～7共三等的词,说明抽象名词唤起意象虽比具体名词困难费力得多,但绝非不能唤起意象。

原始初民对现实世界没有过分抽象的需要和心理能力,所以偏于具体思维,语言多为具体词。冯德指出:"吾人所欲表明之文字久已脱离其原义,一种极抽象之思想及其用久,每为具体概念之元素[①]。抽象之思想实由具体中脱胎而出者矣。'彼给与儿童石笔'是语也,在吾人观之,不特为简明之叙述,抑亦为直接的具体之表现。但若将是语译与非洲之太谷(Jogo)土人听之,则能了解者恐什不得其一二。盖'石笔'两字,在彼方人民观之,已觉偏于抽象,难以悟会,更遑论其他。复次,任何一物,向未见及者,在彼等思之,必为之惊奇不置,以为一人安能获有是物,是物又安能转给他人?"[②] 但是,高意象值的具体词正是低意象值的抽象词成立的基础,原始语言中的具体词被广泛用来喻指文明语言中的抽象事物[③]。在汉语中,单音节抽象词的前身几乎都是具体词,而复合抽象词也几乎都是由古代单音节具体词组成的。

对于同一种对象类别,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意象和意象程度不同。如对中国人、日本人来说,"外国人"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但在美国,很难从外表上分辨出外国人,本国人和外国人中的白人、黑人、黄种人都很多。后者的意象程度就较前者为低,所以在美国,值用"foreigner(外国人)"这个词并不太多,它给人的是一种疏远和排他

---

① 布达哥夫也说,许多现代语言中仿佛是纯粹抽象的词,在历史上正是从实际经验和具体现实中产生出来的。参布达哥夫(1953):《语言学概论》,中译本,时代出版社,1958年。

② 冯德:《心理学导论》,中译本,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1939年。

③ E.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 (I. Langua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53.

的感觉①。

有时由于词据的暗示作用，在对词义的理解上出现某种程度的意象偏误。这在年龄层次或文化层次低的人中容易发生。我亲历过一件事，一个农民家突然断电，见邻居家有电，于是埋怨自家地势低，电流不过来。这就是因对“电流”的意象偏误引起的。

四、意味 同一种意义的词所蕴涵的某些细节性来源或结果等，叫做这个词的意味。不同民族语言中表示友好、友爱的“爱”的感受，可有不同来源。中国人的“爱”常与“哀怜”的感受接近。《广雅疏证》：“哀与爱声义相近，故怃怜既训为爱，又训为哀。”《吕氏春秋·报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务哀士？”高诱注云：“哀，爱也。《檀弓》云‘哭而起则爱父’也。”《广雅疏证》：“爱犹哀也。”“爱”可与“怜”组合，有“怜爱、爱怜”，“怜花惜玉”表对女性的爱②。哀也能生爱，有些爱常常是诱于同情。日语“可爱”和“可哀”也同音，比较：“可愛い(かわいい)”和“可哀相(かわいそう)”。但是，有的民族(比如萨摩亚人)认为族给自己东西就是对自己的爱③。“杀人犯”在汉语里或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意味着他要被枪毙，在其他诱言里或别国文化背景下，则意味着他要被绞死或监禁。

五、态度和情感 对一种抽象概念所固定表现出来的主观评判或心理反应叫做态度。这与文化上单注意有利、有害、有趣事物的原则一脉相承。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也说：“一种语言的词往往并不反映外语世界的全部实际情况，只是反映出操这种语言的人

① 小笠原林樹：《語義の文化面比較》，载《日英語比較講座(第三卷)：意味と語彙》，大修館書店，1981年。

② “疼”也可表“爱”，如“我很疼他”，又有复合词“疼爱”。金沙话“这小孩真惹人痛”，表“这小孩可爱”。“疼、痛、怜”常是表哀的。

③ M. I. Posner(1989)：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Science(記憶と思考)，日訳，産業図書株式会社，1991年。

们注意到的地方。"[1]所以人类在对事物进行指谓的同时，常常把事物对自身的利害关系标记出来，这是合乎情理的。比如，人们对"法西斯"这个词一般都有恐怖的反应(参第三节"语义测量")。不同民俗和文化的人们对同一世界的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理解，直接影响他们对词义态度的主要社会文化因素有信仰、价值观和审美观、世界观、对人们生活起主导作用的社会组织形式(如家庭、学校等)、社会和科技发展水平、生态环境等。汉语"红"、英语 red 都可象征革命，但态度不同，汉语呈褒义，英语呈贬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地主"是剥削阶级，因而是贬义的；在资本主义国家，英语 landlord，日语じぬし(地主)等都代表一种正常资产者身份，因而是中性的[2]。

六、典型感受 关于词义或概念的最典型样例的设想叫做原型。对绝大多数词义或概念来说，人们都有关于其典型成员的坚定看法。在美国人眼里，鸟和鸡都是鸟，这从分类学上看也是恰当的。但 E. Rosch(1973)对美国人的实验结果表明，跟鸡相比，人们能更快把知更鸟认作鸟，在这一点上，受试者的反应极其一致。评定表从非常典型到非常违典型，分为七级，知更鸟的平均等级是 1.1，鸡的评定等级是 3.8。知更鸟和麻雀都是比较小且非常驯服的，它们成为鸟的典型成员，鹰是次典型成员，说明典型的鸟在大小和驯服性上与知更鸟相似。词义所指事物集合中的典型成员因文化而异。越是典型的成员，越容易被联想到，联想概率就越高。说到"鱼"，苏州人是先想到熟知的"鲫鱼、鳊鱼"等，温州洞头本岛人最先联想到熟知的"小黄鱼"(海鱼的一种)，北京人首先想到的是"带鱼"，原因是苏州产淡水鱼，洞头产海鱼，北京人家常菜中多吃带鱼，所以当地人有关典型鱼的常识也因此不同。罗马人心中的"建筑"跟中国人心目中"建筑"尽管功能相似，但典型感受不同。处于不同气候地区的人们对温度词

① L. Wittgenstein: Philosphical Investigation, Oxford, Blackwell, 1953.

② 朱明炬：《浅谈英汉互译中的文化障碍》，载《武汉冶金科技大学学报》1998.4。

如"冷"的典型感受也不同。

当然,联想概率有时还可能与典型感受以外的心理素质和兴趣取向等有关。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对东京儿童作过一次语言心理测试,调查他们听到"動物"这个刺激语时最先想到哪些动物[①]。每个年龄段的被调查人数都为100人(男女各50人),首先联想到うさぎ(兔子)的被试人数如下表:

	3岁	4岁	5岁	6岁	1年级学生	2年级学生	3年级学生	4年级学生
男	6	9	12	20	12	28	27	24
女	11	25	30	28	30	44	38	41

不难看出,想到うさぎ(兔子)的女童人数总比男童多,有时高达一倍以上,这反映东京女童比男童更喜欢兔子,这种差异主要是心理素质和兴趣取向等引起的。

第三节 语义测量

美国伊利诺伊(Illinois)大学交际研究院 Ch. E. Osgood, G. J. Suci, P. H. Tannenbaum 三人(1957)的《语言计量》一书[②],首先提出并尝试对词的心理距离(sychological distance)进行图解和数量分析,这种分析法叫语义微分法(semantic differential)。分析虽也触及词的理性义,但主要触及到词的联想义。G. Leech 在他的《语义学》著作中说,"联想意义含有很多无法正确估计的因素,以至于只能用近似统计的方法对它进行系统的研究。实际上,Osgood 等人的《语言计量》一书就提出一种对联想童义部分地进行分析的方法"[③]。所以利

① 日本国立国語研究所:《幼児児童連想語彙表》,東京書籍株式会社,1981年。

② Ch. E. Osgood, G. J. Suci, P. H. Tannenbaum: The Measurement of Meaning,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7.

② G. Leech:《语义学》,中译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年。

用语义微分法，也可以看到一个词有着怎样的联想意义以及它们的强度如何。

以对刺激语 HERO(英雄)和 DEATH(死亡)的联想分析为例。根据以下标准(还可以有更多的标准)可评判这两个词的联想意义：

·评价(evalution)：good(好)～bad(坏)，beautiful(美)～ugly(丑)，happy(喜)～sad(悲)，clean(洁)～dirty(脏)，wise(智)～foolish(愚)，et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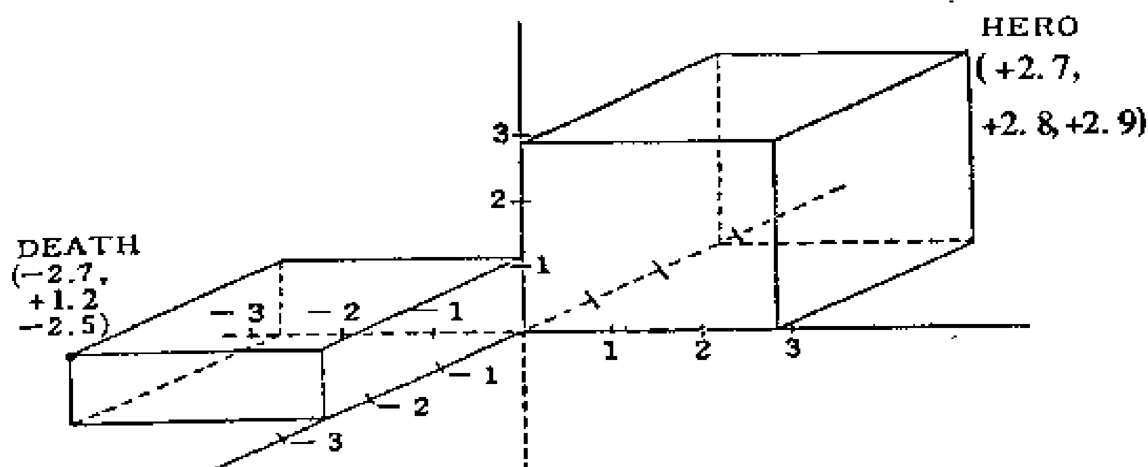
·潜力(potency)：strong(强)～weak(弱)，large(大)～small(小)，heavy(重)～light(轻)，hard(硬)～soft(软)，thick(厚)～thin(薄)，etc.

·行为(activity)：fast(快)～slow(慢)，sharp(锐)～dull(钝)，active(主动)～passive(被动)，hot(热)～cold(冷)，etc.

评价采用量化方式。把评价数值“根端、很、比较、两可、－比较、－很、－极端”等七度分别量化为〈＋3〉〈＋2〉〈＋1〉〈0〉〈－1〉〈－2〉〈－3〉，下面是调查得出的刺激语在每一判定标准下的平均数值：

	评价	潜力	行为
DEATH:	−2.7	+1.2	−2.5
HERO:	+2.7	+2.8	+2.9

下面用长度代表强度，用线的方向代表质，可以得出 DEATH 跟 HERO 在坐标系里的语义空间(semantic space)图：



HERO 的语义空间在坐标系中居右上方，在人们的印象中，它倾向于好、美、喜、洁、智、快、锐、主动、热；DEATH 居左上方，倾向于坏、丑、悲、脏、愚、慢、钝、被动、冷。

日本学者渡边友左[①] 1960 年以日本迹见学园女子短期大学和中央大学文学部、工学部学生共 137 人为对象，让他们用 16 种色纸表达对“法西斯”的态度反应。反应结果是：黑色 26 人、红色 16 人、灰色 15 人、浊紫红色 14 人、暗褐色 10 人、紫红色 6 人、橙色 6 人、青紫色 6 人、绿色 6 人、黄绿色 5 人、黄色 4 人、粉红色 4 人、青色 3 人、紫色 3 人、白色 1 人、青绿色 0 人、不答 12 人。在此基础上对 125 个回答出的情况进行分类综合，得出下列结果：

分　类	纸　色	反应人数	所占比例(%)
根据色彩明暗分	明色(粉红、橙色、黄色、黄绿色、绿色)	25	20
	中色(红色、紫红色、白色、青绿色、青色)	26	20.8
	暗色(青紫色、紫色、暗褐色、浊紫红色、黑色、灰色)	74	59.2
根据色彩在心理上的反映程度分	紧张色(粉红、橙色、黄色、红色、紫红色、青紫色、紫色、暗褐色、浊紫红色、黑色)	95	76
	松弛色(黄绿色、绿色、白色、青绿色、青色、灰色)	30	24

结果表明了日本民众对法西斯的恐怖反应。如果调查对象是犹太人或中国人，这种情况可能更为明显，因为日本是个有法西斯行为历史的国家，而后者则是法西斯行为的受害者。这里还有一个因素干扰着调查结果所反映的本质性程度。尽管色彩本身是物理现象，但很多语言对色彩的联想除共通部分外，还有文化的不同。比如对色彩的消极联想本身有民族性：日本人忌绿色；暹罗人忌红色，因为写死

① 渡边友左：《語の感情的价值(＝意味)を画定しようとする試み》，载《計量国語学(17)》。

人姓氏是用红色的墨；土耳其民间视花色为凶兆；埃塞俄比亚人忌讳淡黄色，这是哀悼死者时穿的衣服颜色；比利时人认为蓝色是凶兆；巴西人忌讳棕黄色，认为一个人离世犹如黄叶落地；欧美许多国家则以黑色为丧礼的颜色[①]。

利用语义微分法进行跨文化(crosscultural)研究，确实可以发现一些联想意义的细微的文化差异。Kumata 和 Schramm 在 Osgood 指导下，以在美留学的 25 位日本学生，22 位韩国学生作为两个对象群进行实验，并将其结果跟 24 位美国学生的另一组进行比较。拿 30 个概念在 20 种尺度下进行语义微分法分析，结果发现有一些文化差异。如韩国学生明显把 richpoor 置于价值纬度(dimension)下，日美学生则并不那么显著。而对 Delicate(精美的)，韩日学生强烈地将之置于价值纬度下，美国学生则无如此大的程度[②]。

通过语义微分法，也可以发现词义关系联想上的一些普遍规律。如在亲属关系场中，表辈分差的纵向联想关系跟表性别差的横向联想关系相比，前者的语义距离往往比后者远。本来从理论上看，下列有连线的任意两个词之间只存在一个义素差异，似乎四条连线所代表的语义距离都是相等的，其实并非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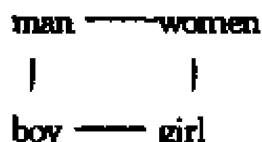
+[直系]	+[男性]		−[男性]
+[长辈]+[一辈]	ちち(爸爸)	——	はは(妈妈)
	|		|
+[晚辈]−[一辈]	むすこ(儿子)	——	むすめ(女儿)

梅本(1969)以ちち(爸爸)、はは(妈妈)为刺激语，对联想反应作了调查，数据结果如下：

① 顾义章：《世界民族风俗与传统文化》，民族出版社，1989 年。
② 芳賀純：《Ch. E. Osgood の Semantic Differential について》，载《計量国語学(10)》。

刺激语	反应语	反应率
ちち(爸爸)	はは(妈妈)	35%
ちち(爸爸)	むすこ(儿子)	0%
はは(妈妈)	ちち(爸爸)	11%
はは(妈妈)	むすめ(女儿)	0%

这说明,与爸爸妈妈之间横向联想关系相比,纵向联想关系是很疏远的,即语义距离比较远。Deese(1965)的调查结果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这一点。在理论上等距离的下列语义场中:



由连线连接起来的4组词的联想共通率数据为:

横向	man — women	0.68
	boy — girl	0.73
纵向	man — boy	0.04
	women — girl	0.16

结果也表明,横向联想关系的共通率比纵向联想关系的共通率高得多[①]。

词义关系联想的非对称性也是一条普遍联想规律。人们由"狼"可想起"尾巴",但由"尾巴"很难直接联想起"狼"。表示步行的"步(あゆ)む"常使日本人想起"步(ある)く",但"步(ある)く"就不大能使他们想起"步(あゆ)む"[②]。对"药柜—药",仅凭语言关系就可由"药柜"联想到"药",但由"药"联想到"药柜",则主要凭常规关系。

---

① 梅本(1969)和Deese(1965)的调查结果,转引自池上嘉彦:《意味論》,大修館書店,1975年。

② 森川彌寿雄:《言葉の連合》,創文社,1965年。

第四节 联想对语义的作用

在社会、文化或宗教因素的影响下，巫术(magic)已深入人心而不可拔，人们相信语言有着神奇魔力，这都属于“联想误用”[①]。中国春联就是一种巫术。巫术分求吉的白巫术和求凶害人的黑巫术两种。也可分感致巫术和染触巫术两种，前者根据同能致同的原理，以为相似的东西，都是同一的东西，后者根据接触律的原理，以为凡曾接触的东西，永远保持交互影响的关系。语言中的禁忌、詈骂、祈愿等等，其实都与巫术同实而异名。

禁忌(taboo)的心理动机是为减轻恐惧、掩盖不洁和分清伦常。为了避免直接提起它们，以防它们产生邪魔的威力或引起人们心理上的抵触，语言常常设法利用暗示方法拐弯抹角地表达它。具体说来，这些列为禁忌对象的主要是涉及性关系、死亡、排泄机能、辱骂、姓名等方面的词语。这些不想提及的词语叫禁忌语，而相应产生的各种婉曲、迂回的表达法都是委婉语。人有善恶两面，巫术有黑白两种，禁忌也有它永远的附带产品——詈骂。越是禁忌的对象，越是人家不愿听到或想到的事，越是要揭其伤疤，不但直言之，而且惟恐人家想得不仔细，要描绘其细节特征，才能达到刺伤别人心灵的目的，如死的詈骂语“翘辫子、上西天、挺腿、见阎王”等，对腿部残疾者的詈骂语是带“子”的词“跛子、瘸子、拐子”等。詈骂永远跟禁忌相伴而生，它们正好是对立的两极。

禁忌对语义的影响程度，跟社会发展程度有关。“一般来说，后进民族的禁忌总比先进民族多，过去保留的禁忌总比现在多。这反映社会越发展，越进步，禁忌习俗就越少，对民族社会发展的影响力也就越弱”[②]。禁忌的多少直接决定对语义影响力的大小。禁忌对象的类型也因社会、

---

① 李安宅：《巫术与语言》，商务印书馆，1936年。

② 白振声：《民族现代化与禁忌习俗》，载《民族学研究》(第11辑)，民族出版社，1995年。

文化不同而异，并决定它在不同语言里对语义的不同影响方式。

禁忌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针对禁忌概念本身。为避免过分直率地触及到人们不愿意言说的事物，常需通过暗示方法即用委婉语来表达它。但由于人们对这类事物保持高度的神经质，暗示效果一般损耗得很快，常需要对它的表达方式不断地进行更新，从而形成同义词或同义表达式的大量积聚（参第四章《对应》第三节“同义形式对应”和第五章《变化》第三节“名称变化”）。

禁忌一般是针对两样事物，一是恐惧事物，如“死”是人类最惧怕的字眼，它在许多语言里都有一大串委婉语，汉语委婉语如“去世、辞世、谢世、与世长辞、去了、走了、离开了我们”。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人因害怕被蛇咬，交往中避免 serpiente（蛇）一词出口，而是说 bicho（小虫子，小动物）[①]。二是渲染伦理秩序。为了表现对长者、祖宗和上级的敬重，禁忌直呼其姓名，姓名的避讳在我国古代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②]。为了表示对神的敬重，我国民间有些禁忌活动中，凡涉及到法物时，称“‘请’(invite)法物”而不是用“‘买’(to buy)法物”[③]。出于同样的原因，泰国禁忌在购买佛饰时说“购买”，认为这是亵渎神灵，会引来灾祸，只能说“求租”[④]。还有是表示对动物等其他生物形态的敬重，如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猎熊时有很多禁忌仪式。猎到熊后，不能说“打着了”，而要说“可怜我了”。熊被打死了，不能说“死了”，要说“布士恰”或“阿帕恰”，即“成了”或“睡了”[⑤]。再有是对有缺陷者的文明、尊重，前面已举过汉语的例子，英语中同样存在这样的现象，如形容人胖时，说 on the heavy side（偏向于重），这比说 fat people（肥人）听上去顺耳多了[⑥]。甚至否定也不能否定得

① 马联昌：《试析西班牙语词义变化的外因》，载《现代汉语》1984.1。
② 陈垣：《史讳举例》，载《燕京学报》第4期（1928年）。
③ 何冬立：《英汉委婉语析议》，载《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8.5。
④ 段宝林等：《世界民俗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⑤ 潘世松：《地理环境与民俗修辞》，载《咸宁师专学报》1998.2。
⑥ 何冬立：《英汉委婉语析议》，载《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8.5。

那么彻底、干脆，如汉语为表示客气，明明是完全否定，表面上却偏要用"不很、不太、不十分、不大、不那么"把话说得不那么彻底[①]。对人们错误观念中的一些低档职业的称谓，要避免过于直率，如在英语世界的某些社团里，社会地位较高的人跟一般垃圾清扫人员接触时，应小心避免用 dustman 一类多少带有点不敬意味的词去称呼他们，以免造成感情上的伤害，而应使用 sanitary engineer（环境卫生工程师）等委婉词语。但对他们的描述又要与其社会地位相称，否则就将被视为侮辱。清洁人员不愿意别人用 divine（神的、神圣的）等跟他们自身特点相去甚远的形容词来称颂他们[②]。在中国社会里，说法正相反，如果把清洁工说成"环境卫生工程师"，那是讽刺，如果说"这是神圣的职业"、"马路天使"，就是褒扬。区别在于中国人多为无神论者，"神、天使、神圣"在中国人看来是可以比较随便说说的东西，"工程师"的称号却是必须有权威机关认定和证明的职称资格，而非口头上可以随意授予的东西。汉、英两种不同说法的背后或深层，所受制约的规则有些反而是一致的。

在第二个层次上，与禁忌事物名读音相同或相近的词因为能勾起对禁忌事物的联想，也成了禁忌对象。对于这类情况，一般采用两种避讳对策。一是改为联想词的反义词。日语里"梨"的发音是ナシ，与表示一无所有的词"无し"发音相同。为了避开这一忌讳，日本人把"梨"叫做"有りの実"（存在的果实）[③]。香港人忌讳"输"，连买书也说成"买赢"[④]。现代汉语的"筷"就是船家为防由"箸"联想起禁忌的"住"，反义处理改为"筷"（联想为"快"）的。渔村老师让学生翻书，不用"翻"，只能说"把下一页书'划'过来"[⑤]。"翻"和"划"是构成情景反义关系的。

---

① 马清华：《现代汉语的委婉否定格式》，载《中国语文》1986.6。

② 黄长著：《语言·文化·社会之断想》，载《外国语文教学》1985.4。

③ 鲁宝元：《中日谐音文化对比研究》，全国语言文化比较学会 1999 年年会论文。

④ 廖道政：《商名代称归类探略》，载《中国包装工业》1998.5。

⑤ 潘世松：《地理环境与民俗修辞》，载《咸宁师专学报》1998.2。

昔有一士人，带仆挑行李上京城赴试，忽被风吹落头巾，仆曰："帽落地！"士人嘱曰："今说落物，没说落地，只说及地（第）。"仆如其言，将行李牢拴于担上，士曰："仔细收拾。"仆曰："如今就走上天去，也不会及地（第）了。"（明·无名氏撰·时尚笑谈）

第二种办法是回避。日本人讨厌"四"和"九"，因为"四"的发音是シ，与"死"的发音同；"九"的发音ク与"苦"相同，于是有些医院便不设带"4"和"9"字号码的病房。汉语"送钟"与"送终"谐音，所以送礼时忌送钟。年青人结婚时所用的绸料讳说成"缎子"，因为它与"断子"同音，结婚时红包里的钱忌用"三"，因为它是"散"的谐音字[①]。

同音引起对禁忌对象的消极联想，会在语言学习中形成某种程度的抵触情绪。一些普通的英语词因跟其他语言的禁忌词语音相似，可遭到禁用。英语词 such 跟美国温哥华岛的努特卡（Nootka）印第安语中的 sac（女性生殖器官的某部分）相似，老师就很难说服当地的女学生发这个英语词的音。英语词 yet 念起来非常像泰语词 jét（性交），由于粗俗，jét 被禁绝进入任何泰语词典和教科书，只有关系亲密的人才用，因此英语词 yet 常在泰国人中造成麻烦，泰国课堂上对学习英语的泰国姑娘要力避说这个词[②]。

求吉的积极联想和为追求风趣的幽默联想都常通过同音联想暗示出所期求的目的物。积极联想如中国过春节的风俗习惯中，"年年有'鱼'"取"年年有'馀'"之义，"年'糕'"取"年'高'"之义，倒贴"福"字是取"福'到'"之义。熊、参、菇、笋等是山民的生活来源，所以有些地方的挖参人把抽烟叫"拿火"，做饭叫"端锅"，都谐"大货"之音，希望采得"大货"人参[③]。解放前福州新年旧俗中，新娘家、公婆家给送灯老嬷子的花彩都有定额，普通是一百三十三文，阔绰人家是三百三

① 何冬立：《英汉委婉语析议》，载《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8.5。
② 黄长著：《语言·文化·社会之断想》，载《外国语文教学》1985.4。
③ 潘世松：《地理环境与民俗修辞》，载《咸宁师专学报》1998.2。

十三文,因为福州话"三、生"同音,所以给钱以"生"为多[①]。积极联想也用于广告用语,如"三角牌电熨斗,百'衣'(←依)百顺",某热水器厂的广告词"万家乐热水器,随心所'浴'(←欲)"。求吉的祈愿还大量表现在专有名称(如人名、店名、品名等)的命名理据上。日本人也有意识地用"豆(まめ)"来取"认真(まじめ)"之义。幽默联想也不乏实例,汉语中人们将"向前看"改成"向钱看",把"自由恋爱"改成"自由乱爱",把"繁荣昌盛"改成"繁荣娼盛",把"有理走遍天下"改成"有礼走遍天下";日语也有将"夫唱妇(ふ)随"改成同音的"夫唱不(ふ)随"[②] 的。

① 叶树坤:《福州旧历新年风俗之调查》,载《燕京学报》,第1期(1927年)。

② 鲁宝元:《中日谐音文化对比研究》,全国语言文化比较学会1999年年会论文。

第八章 意 念

第一节 意念关系

当描述性短语表达的字面义跟实际意义分离时，我们把从实际意义中抽象出来的基本意义范畴叫意念(notion)，从字面中抽象出来的一般意义模式叫取象，因为它往往具有较强的形象性。如“教室里像油锅里爆进了水，立时闹了起来”。“油锅里进水”和“闹”有意念关系，后者是前者的意念，前者是后者的取象。意念关系应语言生动性表达的需要而产生，为抽象的性质或动作概念补足意象性，通过描述，将它具体化为一种可感的图景。

短语意义直接反映人类认知焦点(focus)。Chafe 用下表说明了认知焦点和短语意义之间的关系以及认知焦点在认知结构中的地位①：

语 言	认 知
sentence(句子)……………	thought(思想)
phrase(短语)………………	focus(焦点)

短语义在语义分析上归作义丛②。

意念和取象在不同时代可呈现不同的对应关系。如在近代中国人看来，(面部)肤色白、唇红、齿白就是美，两者有意念关系。不论对

① M.L.Owen: Book Review: Syntax and Semantics (by T. Giuor), in Linguitics, vol. 19—1/2, 1981.

② 王德春:《语义学略论》，载《词汇学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 年。

象性别，都可适用此项标准[①]。以清代小说《小五义》和清至民国初年小说《孽海花》的语言为例，试比较下表（见次页）。

在现代，"（面部）肤色白、唇红、齿白"用于女性，仍可谓美[②]，但用于男性，则不一定如此，有时反归于"丑"，常有人把这种形象贬作"小白脸、奶油小生"。再比如，《孽海花》中的一句话："满头一寸来长的短头发，怪模怪样。"现在看来，男性头发一寸来长，并不为怪，两者根本无意念关系。清朝男性是留长辫的，所以对留短头发的人觉得怪。如不用历史眼光去剖析这句话，现代人就无法理解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意念可以表示与概念相当的意义类别，但不能完全代替概念。比如，感情意义可以用躯体行为来描述，但躯体行为不能代替躯情概念。比较：我感到高兴→ * 我感到自己"笑得合不拢嘴"/他感到非常愤怒→ * 他感到"气吼吼的"。感情也可以用生理感觉来描述，但生理感觉跟感情有质的区别。身体感觉在经验者可控范围以外，如不说：* Don't be hungry（不要饿）/ * Don't feel hungry（不要感到饿），但是，躯情并不超越经验者的控制范围，比较英语：Don't be sad（不要悲伤）—— * Don't feel sad（不要感到悲伤）。英语感情动词可用进行时，表示内部感觉的就不能，比较：John was feeling sad（约翰正感到悲哀）—— * John was feeling that life in the country was preferable（约翰正感觉到这个国家的生活很优越）[③]。

---

① "（面部）肤色白"还可表现一定的地位，如：掌柜的马大官人是白脸面（《小五义》）/四十多岁的体面人是雪白的皮色（《孽海花》）/户部侍郎总理衙门大臣的少大人是胖白面（《孽海花》）。

② 但在大革命时代有所变化。

③ W. A. Wierzbicka: Lingua Mentalis——The Semantics of Natural Language, Academic Press, 1980.

作品	性别	原文语句		
		对象	描述	评议
小五义	男性	投山的	面如傅粉，唇似涂朱，牙排碎玉	好一位面如少女的英才
		卢珍大官人	粉融融的脸面	品貌不凡
		卢公子	粉融融一张脸，口赛涂朱，牙排碎玉	姑娘一照，羞了个面红过耳
		白芸生，十七八岁	面似美玉，唇似涂朱，牙排碎玉	好似未出闺阁的幼女都没他长得体面、俊秀、清雅
		少主人施俊的书童，岁数不大，二十上下的光景	面如美玉	五官清秀
		老道	面似美玉，唇似涂朱，牙排碎玉	透出一派的仙风道骨
	女性	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	粉面桃腮	十分的俏丽
		女贼	粉白的脸面	必是娥眉杏眼
孽海花	男性	一少年	唇红齿白	美少年
		一少年	面不粉而白，唇不朱而红	美人儿
		孙三儿扮着十一郎	丹唇白齿	真是女娘们一向意想里酝酿着的年少英雄
		三十来岁年纪的男主人	雪白的长方脸	很俊伟倜傥的中国人
	女性	结婚新人	桃腮樱口	真不啻嫦娥离殿，妃子降云霄矣
		二十来岁女洋人	粉白的脸，红的唇	真是说不出的一幅绝妙仕女图
		二妞儿	嫩白的脸	越显娇媚

第二节 取象结构

本节以感情意念为例，分五个方面对取象进行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分析：一、层级结构；二、异构的等效性；三、同构多能性和意念分化；四、表情体使用频率与外界的关系；五 体态的内化。

被作为对象叙述或描绘的感情叫"对象感情"，被说话人附加在话语上的感情色彩叫"说话人感情"①，只有对象感情才可抽象为意念。感情概念的产生需要躯体行为概念和生理感觉概念的支撑②。同样，感情意念的取象也常由表情体和体态两部分组成。表情体指参与表情线索(expressive cues)的躯体(如"眼、牙、脸、头、颈、口、胸、腹、腰、身、手、足、肝、肠、肺、胆、心脏")、躯体形态(如"皱纹、酒窝")、体液(如"血")、体毛(如"眉、发、须")、分泌排泄物(如"泪、尿、屎")、精神(如"魂、魄、心灵")及其他跟感情活动有关的事物；体态指表情体的动作(如"抖、跳、叫、咳嗽、笑、哭")与情状(如"热、甜、痒、轻、醉、柔")。喜悦意念的取象如有[口/开][眼/眯][泪/流]等，[ ]内为取象，/线左是表情体，/线右是体态③。句子"老大娘们张大着干瘪的嘴，眯起眼，多皱的脸上洋溢着喜悦的表情(《王 1》)"中，画线部分表达的是喜悦意念，它的三个取象可分别表示为[嘴/张][眼/眯][脸/皱]。讨论仍限于喜怒哀惧这四种基本原始感情。我们对现当代中

---

① 如"我一连叫你好几声，你为什么不答应？你是不是死啦？"这里传达的是说话人感情。

② 马清华：《论汉语喜悦概念的形成》，载《中国语研究》(日本)第 41 号(1999 年)。

③ 有时，谓词性成分也能充作表情体，如[笑/甜]。形式完整的表情线索往往是表情体和体态俱全，不过表达中也可只有表情体而无体态，或只有体态而无表情体。比如，无法指明"她抽搭着(《四》)"中体态[抽搭]的表情体是什么，"悲哀已爬到她的眉梢同她的眼睛里去了(《中》)"也未交待表情体[眉梢/][眼睛/]的体态。人是感情当事人，悲哀是感情概念词，一般不把它们看做表情体和体态。

国作家近2000万字的作品材料作了调查,有关调查和统计的材料来源及其简称详见本书书末《附录二》,正文引用时不再作说明。

一、层级结构　取象有层次,它纵向有表层和深层两面。比较:

——座山雕气得他满脸横肉抖动,两牙乱龇。(《林》)

——娅明斯的面纱似乎抖动了一下,从面纱后面传来怒气冲冲的声音:"你不要脸。你对女孩子这么不规矩。"(《巴基斯坦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

两句画线部分均表愤怒意念,上句取象是[脸部/抽动],下句取象是[面纱/抖动]。遮掩脸部的面纱是伊斯兰国家成年女性不可缺少的服饰成分,这种文化背景自然使[面纱/]成为表情体(非伊斯兰国家一般不使用"面纱"作表情体)。[面纱/抖动]由[面部/抽动]引起,两者是深层同构的。根据这一原理,纷繁复杂的表层取象可归结为数量有限的深层取象模型。

在横向方面,处于同一纵向层次的取象,又可按种属关系分出几个不同的级。[头/]作普通话喜悦意念的表情体时,取象有[头/点][头/转][头/昂],上位取象都是[头/动]:

——郑介民狂喜地连连点头。(《夜》)

——"唔",长大爷微笑着,把脑袋画了几个圈。(《张》)

——她说着又笑了,昂着头笑得合不住嘴。(《巴〈7〉》)

川北南充话说"高兴得帽儿都戴不稳了"①,用[帽儿/不稳]作取象,与[头/动]深层同构,可归入同一取象模型。

二、异构的等效性　不同感情下的身体反应特征是各种离散、独立特征的变化和重组。语言在表达感情意念时犹如用破网捞鱼、用筷子夹面,受语言表达能力和语言经济性原则的制约,无法也不需要把所有反应特征描述殆尽,相反,每一单项特征都有取得独立表达资格的可能,这就为异构取象的等效性奠定了基础。等效就是指在表

① 这是一个超季节性的说法,不戴帽子时也这么说。

达同一感情的前提下，异构取象可以换用。德语 sich krumm und schief lachen〔捧腹大笑[1]（←身体笑弯了）〕、英语 He laughed himself into convulsions〔他大笑捧腹[2]（←他笑得全身发抖）〕，意译、直译的取象无论在深层还是表层都是异构的，但它们都是等效的。

三、同构多能性和意念分化 感情与身体反应特征的关系错综复杂。一部分取象有区别性，如取象[眼珠/凸起]专表怒（不表喜哀惧），这是因为愤怒时内压增高的缘故，如“气得他眼珠凸起（《敌》）/她的眼睛好像要从眼眶里跑出来马上落到地上似的（《萧》）”。取象[心/甜]专表喜，如“她从心里发出一种甜滋滋的喜悦的感觉（《上》）/（白茹）心里涌出无限的甜蜜（《林》）”。但是，很多取象（如[脸/红][腿脚/发软][手/抖][身子/抖][心/跳]等）都有表达几种不同感情的功意。以[脸/红]为例，试比较：

喜——她白净的脸蛋上泛出兴奋的红晕，眼睛地微笑着（《乎》）
怒——柔嘉脸红得像斗鸡的冠，眼圈也红了（《围》）
哀——（李少祥）心里一阵难过，脸不觉一红（《乘》）
惧——辛楣进来，像喝醉了酒似的，脸色通红，行步摇晃……（《围》）

同构多能性并不能取消语言对感情意念的区别性表达，感情意念的区别性通过取象本身的副特征和取象之外的附加条件得到补足。下面分别来看：

（一）副特征 同一体态的细节形态有意念区别作用。如[笑]虽可通作喜哀的体态，但喜悦的笑是自然的，其发生可用水或花的自然动作“涌、泛、漾、浮、绽”等来比喻，其声音可用各种拟声词（如“嘿嘿、哈哈、嘻嘻、格格、呵呵、噗嗤”等）来描绘。喜笑是甜蜜的，美丽迷人的，如甜甜的笑只用于喜；悲哀的笑是勉强的，其发生要用“勉强、逼出、做出”等来描绘，不用拟声词；哀笑是愁苦的，难看的，尽管哀笑时

---

① 译文见《德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

② 译文见《最新英汉求解文法作文解义辨用辞典》，The World Book Company，Ltd.

也有酒窝，却不会说它。比较：

喜——马丽琳脸上立刻漾开了笑纹(《上》)/脸上绽开一片欣慰的笑影(《天》)/嘿嘿地笑了(《丈》)/母亲听了这句话，甜蜜地微笑着(《张》)/微微一笑，圆圆的脸上，两边腮巴露出两个笑涡(《上》)

哀——她惘然呆立半晌，这才勉强收来心神，逼出一个苦笑(《子》)/装作为了友谊的完美，带着一点悲伤，一种出于勉强的充满痛苦的笑(《沈》)/可是这笑中似乎含有一点辛酸(《杨 2》)

同一体态的动作程度也有感情区别作用。如悲哀时流的泪往往比喜悦的泪多，调查结果显示，取象为[泪/出]的，哀有 170 例，其中有 40 例含“泪多”蕴意①，喜有 27 例，仅 1 例有“泪多”蕴意。比较：

哀——生命好像只剩了一根线那么细，而这一根线还要涌出无穷的泪来(《四》)/朱获堂一走进卧房，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簌簌的滚落下来(《上》)/少妇每当夜里，往往独自一人泪湿衾枕(《药》)

喜——李耋看到了姑娘，狂喜之下，泪如雨注，上前紧紧地一把抱起(《林》)

(二)附加条件　直接表达概念的词叫概念词，通过描述性方法间接表达概念的词叫形象词(如表喜悦的“鼓掌、甜蜜”等，参第二章《分类》第四节“分类单位”)。喜悦概念词有“欢乐、欢喜、喜、喜悦、喜欢、欢欣、快乐、兴奋、欣悦”等，概念词在语句中可起感情标记作用。取象[泪/出]表哀喜时，概念标记词的使用情况统计如下：

	哀	喜
有概念标记词	9 例	21 例
无概念标记词	161 例	6 例
总计	170 例	27 例

① 哀泪可比作“泉、溪、瀑、线、海、潮、湖、雨、水”，如“涌泉一样莹洁的泪珠，簌然间沿着她痛苦的面颊往下淌线”(《红》)/“热泪小溪般流淌着”(《危》)/“五百年的辛泪倾泻如瀑”(《女》)/“泪珠线般地滴了下来”(《张》)/“我被沉痛的魔掌，推入悲哀的泪海里去”(《曹》)/“她晶莹的泪珠汇成了蓝色的瀑布”(《赵》)/“泪如潮瀑”(《徐》)/“她的叙述不时为阵阵泪溪打断”(《徐》)/“酸泪像开闸的水滔流在老人的破衣襟上”(《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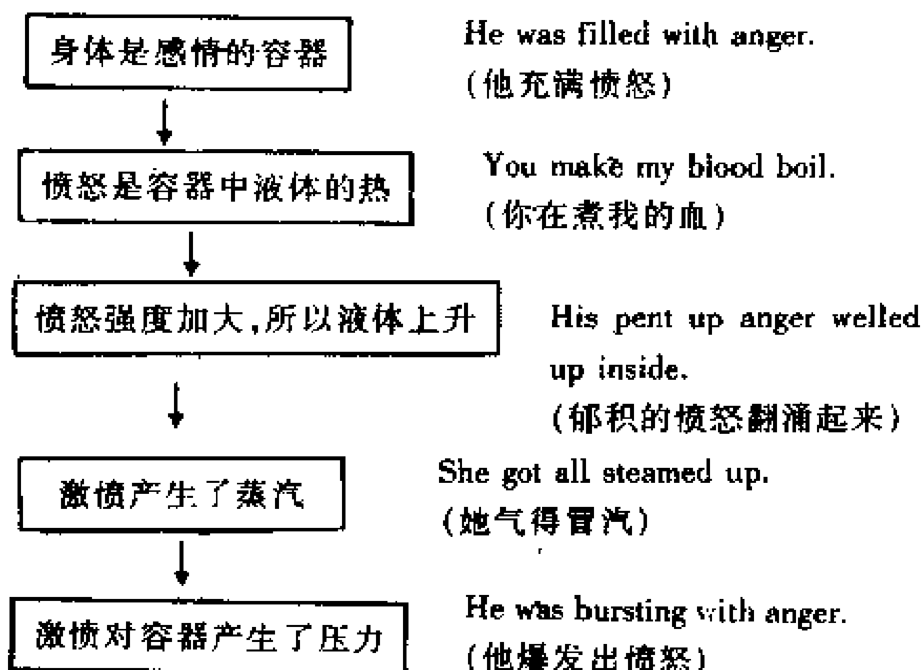
比较可见，哀大多不用概念词标记，因为流泪是悲哀的常态。喜则大都有概念词标记，带概念词后，明显可确定为喜悦意念，如："欢乐的眼泪跟眶里转(《贺》)/你在没有人再来抢走的劳动果实上，滴下了欢喜的眼泪(《胡》)/橘韵喜得一个劲地抹眼泪，一面扑向女儿(《危》)"。伴随特征也能起到区别作用。喜意念的上述6个仅有的例子虽不带概念词标记，但全都有伴随体态[笑]，如："总经理鼻涕，眼泪，笑声，捧着肚子一起来了(《徐》)/妞儿已经笑得挤出了眼泪(《城》)"。相对固定、频繁地表达一种意念的取象也有某种程度的区别性。根据调查，体态[笑]在各种感情意念中的用例数依序为：喜(251例)＞哀(4例)＞怒(1例)、惧(1例)，很明显，笑倾向于表喜悦意念。又如，[脸/红]表喜怒哀惧的频度差为：怒(14例)＞喜(11例)＞哀(1例)、惧(1例)。表面上看，[脸/红]表喜怒的频度接近，但[脸/红]表喜时，11例中竟有6例含伴随体态[发光]，如"老大爷挤满皱纹的脸上腾着红光，仿佛变得年轻了些(《王2》)"。就是说，纯粹用[脸/红]表喜哀惧三类感情的用例总和，只有表怒的二分之一，说明[脸/红]倾向于表怒，从这里也看到了为什么汉语"脸红"一词表生气、愤怒而不表喜哀惧的原因。除概念标记词、伴随特征、频率倾向外，语境也是区别意念的因素。

四、概念隐喻 G. Lakoff 从生理、心理甚至物理角度和生成语义学基础出发，提出"概念隐喻"学说，认为一种感情的单一表达模型可派生出其他一系列相关模型。这就把取象结构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G. Lakoff 的"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理论指明在起点领域和目标领域间有一系列存在的(ontological)或认识的(epistemic)对应关系，如"'液体的热'是'怒'"表明存在的对应关系，而以下则表明起点和目标领域间的认识对应关系：

起点——液体强烈增热的影响是容器增热、内压增大，于是流体的容器摇晃。

目标——强烈愤怒的影响是体温上升、身体内压增大、心身摇动。[①]

它特别强调比喻之间的生产和推论关系，下列表达愤怒意念的句子之间存在着一种具有普遍物性特征的脉络，因而是可推导的：



很明显，概念隐喻强调的取象生成规则是建筑在普遍生理、心理、物性和感情发生时的事态相关性基础上的。这在概念理据中也有相同的表现(参第三章《理据》第二节"概念理据")。

五、表情体使用频率与外界的关系 跟外界关系越密切，一般就越能经常充任表情体。在日语里，用眼、脸、口、头、手等构成的惯用句比用胡子、手指、爪子、手腕、膝盖、屁股、腰部等构成的惯用句多[②]，因为前者一般比后者更易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汉语有着同样的原理，比如，日语"目、手、足"等身体词汇的用途比"頭、胸"多[③]。

---

① 例见 G. Lakoff: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認知意味論——言語から見た人間の心)，日訳，紀伊国屋書店，1993 年。

② 宫地裕：《慣用句の意味と用法》，明治書院，1990 年。

③ 星野命：《身体語彙による表現》，载鈴木孝夫編：《日本語講座(第四巻)：日本語の語彙と表現》，大修館書店，1981 年。

现代汉语的统计也得出如下序列：[眼睛／](148 例)＞[腿脚／](77 例)、[手／](62 例)＞[头／](49 例)＞[胸／](24 例)。语句中有明确体态的表情体用例数详见下表：

	表情体	喜	怒	哀	惧	总计		表情体	喜	怒	哀	惧	总计
头部	脸	74	64	26	64	228	内部组织	脑	0	1	1	0	2
	眼睛	34	63	30	21	148							215
	嘴	36	11	8	6	61	肢体	腿脚	42	14	4	17	77
	头	8	2	20	19	49		手	13	33	5	11	62
	牙	3	33	0	1	37							139
	眉毛	14	9	6	1	30	躯干	身子	10	5	11	43	69
	鼻	0	4	8	0	12		胸	3	10	7	1	21
	颊	0	5	0	7	12		颈脖	1	3	0	5	9
	喉咙	0	3	2	3	8		背	0	0	0	7	7
	头发	0	2	0	4	6		腹	4	2	0	0	6
	胡须	1	1	0	0	2		肩	0	1	1	2	4
						593							116
头部派生物	泪	27	0	170	3	200	一般组织	骨	1	0	0	6	7
	声音	57	4	47	9	117		肉	1	0	1	4	6
	气息	3	2	26	14	45		血管和筋	1	3	0	0	4
	唾沫	1	6	1	1	9		血	0	0	2	1	3
						371		汗毛	0	0	0	3	3
内部组织	心	27	27	80	55	189		毛孔	0	0	0	1	1
	内脏	0	1	6	9	16							24
	魂	1	1	1	5	8		总计	362	310	463	323	1458

六、体态的内化 取象的实际指向是在心理，所以它常常不滞限于描绘人的客观外部表征，而把外在体态转用于内在心灵，这种现象叫内化(internalization)。如表达喜悦意念时，心可以笑、可以醉，可以感到甜、感到亮、感到痒；表达悲哀意念时，心可以哭、可以落泪、可以叫，可以感到酸苦、感到冷、感到痛。如：

喜——(杨子荣)内心发出一阵喜笑,暗喜他初步的成功(《林》)/我的心醉了,迸跳着异样的兴奋和喜悦(《杨2》)/她的长长的眉毛情不自禁地杨起,从心里发出一种甜滋滋的喜悦的感觉(《上》)/他的心中,北平,全世界都光亮起来(《四》)/谢老师高兴得连心都痒起来(《张》)

哀——感到自己的心尖也在哭泣(《王2》)/由心里向外倾倒眼泪(《四》)/我痛苦地在心里叫了起来(《巴(8)》)/心中泛起一股苦涩的味道(《平》)/心里一阵酸(《叶》)/只有他底心有若在严冬的季节(《灭》)/心痛得像锥子扎似的(《杨2》)

统计表明,无论表达哪类感情,[心/]都在使用几率占总量5%以上的表情体之列,这些表情体按频度大小排列如下:

喜:[脸/]>[声音/]>[腿脚/]>[嘴/]>[眼睛/]>[泪/]>[心/]

怒:[脸/]>[眼睛/]>[牙/]>[手/]>[心/]

哀:[泪/]>[心/]>[声音/]>[眼睛/]>[脸/]>[气息/]

惧:[脸/]>[心/]>[身子/]>[眼睛/]>[头/]>[腿脚/]

从心理学角度讲,感情属脑部活动,但用脑做表情体是少见的,调查中只发现三例[①]。对心灵取象的感知,常常不是通过五官感觉渠道,如[心/寒]、[心/酸苦]等绝非基于温度觉、味觉等。事实上,内化都是外部感觉形象的内比,不过切换了表情体而已。为什么要这样切换,并把各种外部感觉形象聚焦于心呢?因为心是感情的容器。古人甚至现代人日常观念中,普遍认为感情是心脏功能。荀子《正名》曰:"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许多语言中表心脏的词兼指心灵,如汉语"心"、英语heart、俄语сердце、捷克语srdce等。日语虽然以しんぞう、こころ来分指"心脏"和"心灵",但这种对立在"胸(むね)"等词的意义中得到了中和,"胸(むね)"兼具"心脏"和"心灵"两种意义[②]。1849年北美奥杰布华七个部落给美温总统的请愿图画中,七个动物

① 它们是:怒——脑子里嗡嗡直响(《平》)/愤怒从心底升上来,烧着我的身体,烧着我的脑子(《巴(7)》)|哀——脑子里一片空白(《平》)。

② 参《新日汉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

图腾的心脏相连[1]，反映了印第安人同样的观念。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在今人表达感情时仍流露出来。作表情体的[心/]有时可换用成[心脏/]而不影响意义合法性，如《张》里出现的两个句子"快活得心脏都痒起来了"和"高兴得连心都痒起来"，换用情况一目了然[2]。难怪哲学上强调，在身体感受和心灵感受之间很难画上一条严格的界限[3]。

第三节 文化认知

以表情线索为取象，是所有语言表达感情意念的普遍特征，这是受语言表达能力的制约造成的。哲学告诉我们，人的内心世界看不见、摸不着，是"不可表达之物"或"不可言说者"[4]，只能通过形象暗示的方法，依据与物质世界的类比，用从物质世界中抽取出来的形象来描写它，最大限度的接近它。反之，就几乎不可能表现它[5]。人类的身体是其心灵的图象[6]，于是借用躯体行为和生理感觉表达感情意念，就成为自然选择。连感情概念的产生也都需要行为概念和感觉概念的支撑(参第三章《理据》第二节"概念理据")。

首先，从一般生理学角度看，人类的生理组织和生理反射基本相同，许多语言只要以人类相同生理基础为取象，取象结构就常常是相

---

① 高名凯等：《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63年。

② 当然，也有不能互换的，比较：他的心中光亮起来(《四》)→＊他的心脏中光亮起来 / 心里甜滋滋的(《乘》)→＊心脏里甜滋滋的 /我的心醉了，迸跳着异样的兴奋和喜悦(《杨1》)→＊我的心脏醉了，迸跳着异样的兴奋和喜悦。

③ 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④ 鲍亨斯基：《当代思维方法》，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⑤ 莫里斯·贝姆尔：《精神的形象再现和对不可表述之物的表达》，中译本，载《美学译文(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⑥ N. Malcom: Knowledge of Other Minds, in'Readings in Semantics', ed. by F. Zabech, E. D. Klemke and A. Jacobs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4.

似的。比如,不管属于哪种文化的人,发怒时都有温度上升、内压增大、心跳急速、胆汁增多、呼吸加快、鼻孔扩张、胸部鼓胀、全身发抖、充血等生理反应。比较汉语和日语、英语对愤怒意念的表达:

[鼻息/响]——〈日语〉鼻息(はないき)鳴(な)らす[暴跳如雷(←鼻息在响)]~〈汉语〉像一头困顿的发怒的狮子被关进铁笼,不住地喷着响鼻(《天》)

[额筋/暴露]——〈日语〉額(ひたい)に筋(すじ)を立(た)てる[怒容满面(←额上青筋暴露)]~〈汉语〉额角上的青筋条条绽起(《天》)

[身/颤]——〈英语〉He was quivering with rage(他怒得浑身震颤)~〈汉语〉当下气得浑身打颤(《贾》)

[血/沸腾]——〈英语〉You make my blood boil[你让我气愤万分(←你在煮我的血)]~〈汉语〉心血沸腾,怒火如焚(《叶》)

[脸/变红]——〈英语〉He was red with anger(他气得满脸通红)~〈日语〉満面(まんめん)朱(しゅ)を注(そそ)ぐ[怒容满面(←满脸通红)]~〈汉语〉脸红得像斗鸡的冠,眼圈也红了(《围》)

把[鼻息/响][额筋/暴露][身/颤][血/沸腾][脸/变红]这样一组取象群综合起来,感情当事人就如同一个盛着沸腾液体的加盖铁桶暴涨着、鸣叫着、摇动着。这种普遍的生理、心理、物性和感情发生时的事态相关性是构筑取象生成规则(或概念隐喻规则)的基础,G. Lakoff 说,"可以预见,世界所有语言愤怒意念的比喻中,绝不会出现与皮肤温度上升或脉搏增速等生理反应相矛盾的语例"①。

其次,感情发生时未经反省的动物性"心理反射行为"② 也在人类中普遍存在。能用木棍从树上打落水果的猿猴,斗殴时便远远抛弃木棍,张牙切齿③;人类愤怒时,也咬牙切齿、两眉倒竖、两眼圆睁、

---

① G. Lakoff: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認知意味論——言語から見た人間の心),日訳,紀伊国屋書店,1993 年。

②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6。

③ 彼特鲁舍夫斯基:《巴甫洛夫学说的哲学基础》,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55 年。

伸拳捋袖、怒打怒骂[①],[牙/咬]是出于报复心理的动物性反射行为,是普遍适用于人类语言的表怒取象。日英汉三种语言中怒与[牙/咬]的关系相似,比较:〈汉语〉瑞宣不敢再看,低下头,他把嘴闭紧,待了一会儿,他的牙咬出响声来(《四》)/马希山狠狠地咬着牙根骂道(《林》)~〈日语〉牙(きば)を噛(か)む〔咬牙切齿(←咬牙)〕、牙(きば)を鳴(な)らす〔切齿痛恨(←牙咬得格格响)〕~〈英语〉He set his teeth〔他气愤(←他切齿)〕, bite one's head off 或 bite one's nose off〔愤怒,怒责某人(←咬断别人的头)〕。

但是,不跟文化和语言结合起来分析,结论必然是片面的。一旦把感情意念取象跟文化和语言相联系,马上就显露出复杂性、差异性和选择性,规则性常为约定性所掩盖。表情本身的文化差异[②],各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都勿庸置疑地引发出不同语言间取象的差异[③]。具体地说,其差异性成因有如下几种:

一、文化习俗差异 受社会规范的制约,身体反射行为并不总能得到自然释放,就像用裹脚布约束脚的自然生长一样,它有时会在文化规范的约束下接受调节和修饰,其结果或是被禁忌,或是被收敛,或是被夸张。新几内亚的阿拉贝加等部族不愉快就大便[④];沙特阿拉伯的匈蛮人高兴时忌讳笑,这由文化观念而起,他们把笑看做不友

---

① 伍棠棣等:《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

② 孟昭兰:《人类情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③ 有些学者的研究已触及到各语言中感情范畴本身的差异,如Gerber(1985)指出,英语love侧重指亲密、性爱、个人魅力评价等,萨摩亚语alofa强调关怀、给与、恩义。转引自M. I. Posner(1989):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Science(記憶と思考),日訳,産業図書株式会社,1991年。这些主要针对高级感情而言。还有人说各民族观察感情的方法也不同,大河内康憲说,日本人是细微地揣摸感情当事人的心理状态,中国人则倾向于从外部客体去感捉。参大河内康憲:《日本語と中国語語彙の対照》,载玉村文郎编:《講座日本語と日本語教育(第七巻下):語彙史》,明治書院,1990年。

④ 祖父江孝男:《简明文化人类学》,中译本,作家出版社,1987年。

好的象征①，因为笑可以令人想到许多恶意成分，如轻蔑的嗤笑、讽刺的冷笑、凶恶的狞笑、阴险奸诈的奸笑、轻视瞧不起的鄙笑等。除消极调节外，有些表特定意念的动作还可以创造出来，正如张世禄所说，有些表情掺杂了意志作用②。有的地方，人们故意用吐唾沫动作作为泄愤方式，但在江苏通州，这种行为的泄愤意义就不这么明显。英语字面上是咬鼻的短语，意思是怒责(参前)，但太平洋特里布里安群岛上的居民，咬鼻表示求爱③。意志行为不属于生理范畴，直接跟文化心理相关，这就为取象差异性提供了条件。当然，并不是所有掺入意志作用的体态就一定没有某种程度的语言普遍性，如高兴时拍手是意志行为，受训的猩猩在高兴时拍手，人会觉得滑稽，但比较：〈英语〉He clapped his hands with delight(他欢喜地拍手)～〈汉语〉于是他们拍手，他们欢呼，他们乐开了(《药》)。文化交流的结果或巧合都将为普遍性提供机遇。

属于文化禁忌对象的事物或现象常常因此丧失表情体或取象资格。第二节所述伊斯兰国家成年女性的面纱，替代了鼻子等面部器官的表情体功能。又如，日本学者长谷川洁说，英语中用 loin(腰)、waist(腰)构成的惯用句几乎是见不到的。英语中回避这些词，因为它们易引起性和排泄行为的联想，而后者在公开场合是禁忌言说的④。严格地讲，英语 waist(腰)在 rib(肋骨)和 hip(髋部、臀部)之间，日语こし(腰)大体覆盖了英语 waist、hip 两部分⑤，就是说，日语

---

① 任骋等：《风俗奇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

② 张世禄：《语言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39 年。

③ 焦宏昌：《中外禁忌与礼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年。

④ 星野命：《身体語彙による表現》，载鈴木孝夫编：《日本語講座(第四卷)：日本語の語と表現》，大修馆书店，1981 年。

⑤ 国廣哲彌：《語彙の構造の比較》，载国廣哲彌編：《日英語比較講座(第三卷)：意味と語彙》，大修館書店，1981 年。

こし比英语更接近敏感区，但对日本人来说，这种禁忌简直不可思议[①]。比如日语有惯用语“腰(こし)が拔(ぬ)ける”[②]〔非常吃惊(←腰都落下来了)〕。中国人对“腰”没有英语式的联想，所以[腰/]可用作表情体，如：喜——掩着嘴角，笑得直不起腰来了(《北》)｜惧——弯着腰，连连后退几步(《危》)。

根据心理学报告，感情活动能引起外生殖器的反射行为[③]，中国人即便是观察细致的文学家，也从不在这方面捕捉细节。然而日本人却能细微感知它，并使之成为恐惧意念的取象，如：金玉(きんたま)が縮(ちじ)み上(あ)がる〔毛骨悚然[④]（←睾丸都抽缩了)〕。这与社会文化规范差异不无关联。比如，日本不论性别年龄教养如何，在公开场合可自由使用诸如“粪”这种“污秽词汇”，英语则禁忌在公开场合提及它们[⑤]，在汉语里使用这种词也是有场合限制的。

二、视点差异 不同感情下的身体反应特征是各种离散、独立特征的变化和重组。每一单项特征都有取得独立表达资格的可能，这就为异构取象的等效性奠定了基础，如英语 He laughed himself into convulsions〔他大笑捧腹[⑥](←他笑得全身发抖)〕，意译、直译的取象异构，但可换用，说明是等效的。语言在表达感情意念时，受语言表达能力、经济性原则的制约，无法也不需要把所有反应特征描述殆尽，所以，身体反应特征并不都有资格成为感情意念的取象。面对同一种感情事态，各民族或文化集团观察、捕捉感情线索的视点不完全

---

① 星野命：《身体語彙による表現》，载鈴木孝夫编：《日本語講座(第四卷)：日本語の語彙と表現》，大修館書店，1981 年。

② 例见白石大二：《国語慣用句大辞典》，東京堂，1977 年。

③ 北京师大等：《普通心理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年。

④ 译文见杜建极：《日汉成语谚语词典》，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 年。

⑤ 比嘉正範：《会話構造の比較》，载国廣哲彌编：《日英語比較講座(第五卷)：文化と社会》，大修館書店，1982 年。

⑥ 译文见《最新英汉求解文法作文辨义四用辞典》(简称《最》，下同)，The World Book Company，Ltd.

相同,不在观察之内的特征行为当然不能成为意念取象。日语可以用[肚脐/]作为表情体,如"臍(へそ)で茶(ちゃ)を沸(わ)かす"〔笑破肚皮(←肚脐上烧茶)〕,汉语却几乎不见类似用例。普通话[肝/]不表惧,可表哀怒,如:哀——肝胆俱裂/撕肝裂胆/揪心裂肝 | 怒——大动肝火。但在日语里,[肝/]可以表惧:肝(きも)をつぶす〔吓破了胆(←肝都碎了)〕。汉语中未见用[鼻子/]表喜惧的用例,但它可表哀怒,如:

哀——鼻子发起酸来(《王 2》)/鼻尖一阵刺痛,鼻孔抽筋地一揪(《张》)/鼻子一皱(《热》)

怒——气得鼻子孔里喷着热气(《平》)/鹰钩鼻子向上拱起(《天》)

日语却有用[鼻子/]表得意之喜的熟语,如:鼻を蠢(うごめ)かす〔洋洋得意(←鼻子在蠢动)〕、鼻が高くする〔尾巴翘到天上去了(←鼻子抬得高高的)〕。体态[冒烟]表极度气愤时,汉语相应表情体可以是[七窍/],如"七窍生烟",也可以是[嗓/],如"嗓里冒烟,眼中喷火(《天》)",但用[耳朵/]的尚未发现,英语里有这样的说法,如:Smoke was pouring out of his ears〔他爆发出愤怒(←他的耳朵里冒烟)〕。这些都反映了不同民族或不同文化集团观察视点的差异,尽管如此,相互间完全不同的取象仍可以是等效的,能够互译。

同一语言中不同方言的取象之间也存在视点差异。如牡丹江话"把他美出鼻涕泡来了"表喜悦,它以[鼻涕泡/出]为常用取象,在其他汉方言中是少有的。也许因为北方天气严寒,流鼻水的人多之故。通州金沙话可用[下巴/脱落]表喜,如"下巴笑失了"(下巴笑落了),日语也可以,如"顎(あご)が外(はず)れる"〔捧腹大笑[①] (←下巴都脱落了)〕,普通话现在也有类似用例。

三、观察细致程度的差异　不同民族观察感情发生时身体反应特征的细致程度不同。陈原说,不同感情状态下,眼睛的形状和神色

---

① 译文见杜建极:《日汉成语谚语词典》,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

是不同的，现在还没有明确表达这种无声动姿的图谱，即"眼谱"①。我们来对比一下中国人和日本人对愤怒时眼谱的观察。[眼睛/张大]是怒哀惧的共同取象：怒——气得眼珠瞪圆(《敌》)/哀——张大悒郁迷茫的双眼(《天》)/惧——吓得他们龇牙瞪眼(《林》)。发怒时内压增高，故眼珠凸起，中国人捕捉到这一点，并把它用作愤怒意念的取象，如："气得他眼珠凸起(《敌》)/她的眼睛好像要从眼眶里跑出来马上落到地上似的(《萧》)"。日语也有类似的表达，如：目(め)を剥(む)く[(怒火冲天(←剥眼睛)]。日本人还捕捉到怒时眼睛的形状是呈三角的，并把它反映在取象细节中，如：目(め)を三角(さんかく)にする[怒不可遏(←眼睛张大成三角)]/目(め)に角(かど)を立(た)てる[怒目而视(←眼睛张成角形)]）。一般中国人却没有捕捉到这个细节，可见，在这一点上，日本人观察之细超过中国人。

四、知识和文化观念的差异　对感情的不同知识或文化观念(ideology)也可造成取象差异。如 He almost had a hemorrhage[他突然间气得几乎要死←(差不多要[脑]溢血了)]②，这里用了"脑溢血"知识。在医学尚未发达到发现脑溢血的时代，就不会有这样的句子出现。日本人认为"虫(むし)"是体内引起意识感情变化的东西，所以用作表情体，表示气情、怒气，如表强压怒火的惯用语句"虫(むし)が治(おさ)まる、虫(むし)を殺(ころ)す、虫(むし)が承知(しょうち)せぬ"等。中国人从没有想象过体内有一个能引起感情变化的物质性成分，当然也不会有类似的表达。汉语很早有用肝、肠、肺、胆等内脏表感情的习惯(在日语中也是普遍的)，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传统中国知识(也可能是互为因果)。英语也表现了感情与内脏反应的关系，如感情与肝的关系：liver 义为"肝"，而口语 liverish 指"脾气坏

① 陈原：《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1983年。

② G. Lakoff: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認知意味論——言語から見た人間の心)，日訳，紀伊國屋書店，1993年。

的",hot liver 指"易怒"(《最》)(←热肝)、white liver 指"胆怯"(《最》)(←白肝)等。再如感情与胆的关系:bilious 义为"胆汁的、胆汁质的",又指"易怒的";gall 义为"胆汁",又指"怨恨、痛苦"。这完全基于西方最早为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罗马医生盖伦(Galen)提出的气质概念。这一种观点认为,人体内有四种体液(humour):血液(blood),粘液(phlegm),黄胆汁(choer)和黑胆汁(melancholy)。人的气质、性情和情绪方面的不同,是由于这四种"体液"在人体内各占的比例不同所造成的。胆汁质的特点常被认为是直率、脾气急躁、容易冲动。因此,许多表示"胆汁"的词都带上了"愤怒、暴躁"的意思,又如法语的 bile,file,德语的 galle,俄语的 жёлчь(均为胆汁)都具有这种转义①。

英语即使用肝、胆等内脏作表情体,也远不如汉语和日语那么丰富。汉语用[肠/]表哀,如:愁肠郁结,伤痛如焚(《萧 2》)/肠胃里像有些滚烫的水在流着(《张》)。查遍多种英语词典,找不到一例用[intestines(肠子)/]作表情体的英语惯用语句。

五、取象功能的差异　有时,取象表现生动性和程度的作用比表现感情意念本身更为明显。如[灵魂/出窍]通用于惧喜哀三种感情②,它虽是无从感知的虚设事实,但使用它,强化了感情的程度和生动性:

惧——白黎生以为是虎啸,吓得魂儿都飞出了七窍(《北》)

喜——我兴奋得像是灵魂出了窍(《萧 1》)

哀——我那时虽然醒了,而那一阵的凄惶与悲酸,像是灵魂出窍似的(《中》)

取象表现身体情状,又表表程度意义,与句法学中的状态形容词兼具

---

① 粘液汁的特点是冷静、稳重。于是,英语的 phlegm,法语的 flegme 和俄语的 флегма(原均指"粘液")都有"冷静、冷淡"的意思。参吴玉璋:《从语言的类型对比看人类的共性》,载《福建外语》1988.3~4。

② 主要用于恐惧,调查结果:惧 5 例,喜 1 例,哀 1 例。

形象、程度意义的原理是一致的。不同的取象有时反映不同的感情程度，如“吓了一跳”要比“吓得魂儿出窍”的程度弱得多。

取象的适应对象并不都具有人的全面通用性。有时有性别之分，有时有年龄之分，如“气哭了”大多只适用于女人和小孩，不适用于成年男人。表喜的“禁不住满脸须眉颤动(《红》)”不适用于女人和小孩，表喜的“扬起红脸蛋儿(《夭》)”不适用于老人。有些取象是固定地跟正面形象或反面形象联系在一起的，如《大刀记》描写敌人“吓得咔嚓拉了一裤裆屎”，这种取象显然只适用于反面人物。又如“屁滚尿流”也是贬义的。即使表情体相同，体态不同也可表达不同的感情色彩，如[齿/露]在普通话书面语中表示的喜悦意念是中性的：格格地笑起来，露出一行歪歪倒倒的牙齿(《张》)/欢喜得合不住口，两排雪白的牙齿露了出来(《灭》)。但[齿/掉]表示喜悦所及事物是贬义的，如：真让人笑掉了牙。即使取象相同，用在不同语言里，也可有不同的感情色彩，如[齿/露]在金沙话中表喜时就含贬义：“牙齿蚀到在啊笑嘞”(牙齿龇露着在笑呐)，表达的就是一副得意的丑态。

根据调查，属于四种不同文化的人在选择与英语感情概念词 happy，sad，angry，frightened 相对应的恰当项目时，不管项目排列顺序如何变化，都不约而同地分别选择 good(好)，bad(坏)，strong(强)，weak(弱)，可见对这四类感情，异文化间的观念相当一致①。在语言表达上，喜是积极感情，有取象[面色/发亮]；怒哀惧是消极感情，有取象[面色/发暗]。感情发生时，面部的色彩体态有[红][青][白][黄][黑][紫][灰]等，[红]以外的其他色彩全只用于怒哀惧，它们都是丑陋的。[红]可用于各类感情，但喜时的[脸/红]是美好的，如“一层红霞上了他底面颜(《灭》)”，怒哀惧的[脸/红]是丑陋的，如表怒的“脸红得像斗鸡的冠，眼圈也红了(《围》)”，前者喻作“霞”，后

① M. I. Posner(1989)：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Science(記憶と思考)，日訳，産業図書株式会社，1991 年。

者喻作"斗鸡的冠"，一喜一厌，区别鲜明。在选用非基本的色彩词时，褒义词适合表喜，却不适合表怒哀惧。如表怒惧的白色词可以是"刷白、死白、苍白"，有"脸气得刷白(《热》)/吓得脸色苍白(《贾》)"等，但一般不能是"＊洁白、＊雪白"。脸色及其明亮度的对立固然由感情本身的反应引起，但反过来也多少表现了人们对感情的观念。

六、比喻中联想和语言技巧的差异　在取象的层级结构中，纵有表层和深层两面，横可按种属关系分出几个不同的级。这就为不同语言间取象差异的形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例见第二节"取象结构"。

取象使用身体词汇描写感情，但都不局限于对身体反应特征的具体描写，而是根据因果关系来暗示事情的起因，形式上有换喻(metonymy)〔如"高兴得帽儿都戴不稳了"〕、直喻(simile)〔如"心，整天像在蜜糖罐里泡着"(《草原》1982.1)〕、活喻(personification)〔如日语表哀的"肝臓(かんぞう)が泣(な)いている(←肝脏在哭)〕"[①] 等等，这样，表层取象就可自由利用本文化事象随近取譬，如女性戴面纱的伊斯兰国家用[面纱/]作表情体。各语言比喻种类的不同，无疑也会推动取象差异的形成，如日语表喜的"膝(ひざ)が笑(わら)う"[②](←膝盖笑)，髪(かみ)が喜(よろこ)ぶ(←头发高兴)"[③]，这种修辞处理在汉语里是见不到的。联想有民族性，不同的联想直接形成取象差异，如美国人把女性愤怒联想成生育了小猫、小牛，实际上等于把她们比作刚生育的母猫、母牛，如：She was having kittens〔她狂怒了(←生小猫了)〕/My mother will have a cow when I tell her〔妈妈听说后一定会发怒的(←会生小牛的)〕[④]，直译成汉语时，很难跟愤怒意念挂钩。表层取象的一个比喻有时是两个或多个深层取象的综合，

---

① 例见中村明：《比喻表現辞典》，角川書店，1980 年。

② 例见山梨正明：《比喻と理解》，東京大学出版会，1988 年。

③ 例见中村明：《比喻表現辞典》，角川書店，1980 年。

④ G. Lakoff：Women，Fire，and Dangerous Things(《認知意味論——言語から見た人間の心》，日訳，紀伊国屋書店，1993 年。

表明了语言对表达方式的独立影响作用，如“村长听了这话笑了起来，一笑，他的脸形就像一刀切开的两半甜瓜”，画线部分包含[脸/舒展][笑/甜]两个深层取象，分别与“幸福展开他的笑颜(《王1》)”和“甜蜜地微笑着(《中》)”的取象同构。巴金表达得意之喜时，选择[眼睛/闪光]和[眼睛/转动]这两种深层取象，又通过形象化比喻，把它们凝聚在同一表层结构中，如“他的脸上带着胜利的笑容，一对眼睛活像老鼠眼《巴〈8〉》”，新鲜、形象、简洁！所以取象不仅反映一个民族的心理图象，还反映“作家之影”①。

七、语体制约差异 一种语言内部不同语体的取象有规模和类型差异。艺术语体出于形象化需求，需要进行具体表达。为抵抗惯用化，经常凭作家细致敏锐的眼光和细腻新颖的表达技法进行创新②。其中诗歌体和散文体又很不相同，科日布斯基等人指出，日常语言处于纯逻辑语言(数学和正统科学)和直观语言(诗或音乐)的中点③，散文体语言最接近日常语言，因此跟诗歌语言有本质区别。诗歌是抒情性的，其感情常以“说话人感情”或非意念形式出现，散文体是叙述描写性的，其感情常以“对象感情”或意念形式出理。一般说来，日常口语体不需要经常更新取象结构(特别是深层取象)，许多取象成为惯用化形式，当初能唤起新鲜图象的形象性被部分冻结(frozen)，方言属日常口语体，它的取象稳定性较大，远没有散文体那样丰富，在日常口语里，若已有定型的取象模式，常常就不大继续寻求新的取象，一些明显观描到的身体反应特征因此不能成为一般取象。比如体态[抖]在书面中用于表喜，分属表情体[身/][手/][肉/][描眉/][心/]，如：[身/]——全身因过度的惊喜而颤动了(《灭》)；

① 中村明：《比喻表现の理論と分類》，国立国語研究所，秀英出版，1977年。
② 山梨正明：《比喻と理解》，東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
③ 井上尚美：《一般意味論の實践的性格について》，载《东京学芸大学紀要(2)(人文科学)》1972.2。

[手/]——笑得手都哆嗦起来(《北》);[筋肉/]——老人底快乐都表现在脑上颤动的筋肉了(《俞》);[须眉/]——禁不住满脸须眉颤动(《红》);[心]——心乐得发颤(《杨 2》)。而在温州话、金沙话等方言里,喜却见不到这样的取象。又如,温州话常用"眼睛笑眯了、高兴得嘴合不拢"等描述喜悦,却不以[眼睛/发光]为取象[①],其实后者对温州人来说,也是明显感知到的事实。汉语许多方言如江苏南通话、通州金沙话、川北南充话等也都有类似现象。可是,浙江萧山河上话里连[眼/眯][口/开]也不大作喜悦的取象,常说的只是"高兴得要死"。科技、政论、事务语体主要是议事论理,不需要用取象勾起读者的形象化感觉,一般仅依靠概念词来表达感情。

综上所述,由文化习俗、社会心现、语义分配、言语技巧和原则等形成的取象差异性、选择性和约定性常使取象的生成关系偏离规则成受到约束,从而对概念隐喻现论构成制约。所以分析感情意念的取象时,既要从物理、生理、心理的角度入手,又要从社会、文化、语言等角度入手,以生成规则为经,约定变则为纬,这样才能全面透彻地揭示出它的本质。事实上,即使生现分析,若不考虑反射特征外的生理背般的作用,也不能把取象解释清楚。人种生理差别有时可反映到取象差异中来。人在恐惧成楚哀时,面部失血,皮肤本色凸显,黄种人便可用取象[皮肤/发黄],如汉语:惧——吓得脸色焦黄(《敌》),哀——(吓得她)脸比蜡黄(《敌》)/脸越发黄了(《曹》),但把这种取象用于白种人就令人奇语了。

① [眼睛/发光]是汉语书面语中表示喜悦意念的常见取象之一,例见第五章《变化》第例节"理据变化"。

第九章 常 识

第一节 知识类型

知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社会活动、科学研究中获得的对事物的可靠了解，是人类的认识成果。从语言学角度看，知识可分成语言知识和非语言知识，我们把后者叫做一般知识。依照反映对象的深刻性和系统性程度，一般知识又分日常(生活)知识和科学知识。科学知识是跨国界的，具有人类经验的普遍性；俗科学(folk sciense)知识带有复杂的文化特点，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可归入日常知识。

在语言理解时，记忆中贮存的知识要和当前新输人的信息进行整合，才能达到对当前话语的理解。有一道三年级数学题，要求在括号(　　)里填上适当的数："小文的身高是132(　　)。"完成这道题必须具备三种知识前提：

·科学知识——数学知识告诉我们，计量高度均用长度单位。

·日常知识——在长度单位"毫米、厘米、分米、千米"中，选择哪一项呢？人的身高若为1米多，那是可以接受的，但若判定为10几厘米或10几米，显然违背我们的日常知识，是可笑的，正确答案只能是"厘米"。

·语言知识——首先要理解这两句话的意思，最后要理解各项长度单位词的实际意义，并能够用它来表达。

认知心理学根据型和例、恒常和临时、必然和偶发的差异，又把一般现实知识分成语义知识(semantic knowledge)和偶然知识(episodic knowledge)两种，前者如"猫是动物"、"豹身上有斑点"、"玫瑰是红的"等，后者如"张三今天吃了早饭"、"李四的衬衫是红的"等。这一分类对语言学同样有效。偶然知识尽管能通过预设、言外之义、

自由隐现等各种方式表现在语句里，但它对语义的作用和价值仅限于所在语句本身(与给定情景有关)，不对语义系统产生影响，它代表的只是个别人的经验，不是语言使用集团的共有知识。比如下列例句中预设、言外之义、自由隐现传达的知识都是偶然知识，不是语义知识：

——杰克的小儿子是船员。(预设：杰克有小儿子)

——他启动那辆汽车花了老半天时间。(言外之义：他那辆汽车出现了机械故障)

——They chat for 35 or 40 minutes, then Bill slows down……(汉译：他们在车上闲聊了35到40分钟光景之后，比尔才把行车的速度慢下来……①)(自由隐现：英语原句没有"在车上"、"把行车的速度"等内容，但翻译时从上下文中推断出这些内容，把它们表现在译句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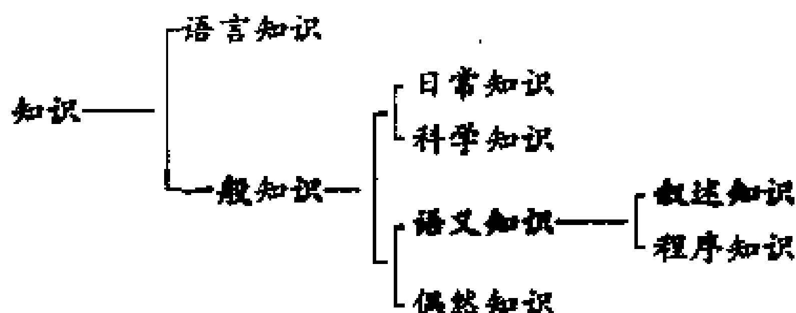
语义知识是具有语义体系性价值的知识内容，是衡量句子常规性的一般标准，比偶然知识更具文化意义。但偶然知识和语义知识之间常常交互作用。当我们把偶发句"邮递员今天没来"解释为"今天没有信"时，我们是在利用语义知识进行理解，因为邮递员只有在送信时才来。毫无疑问，语义知识是影响语言意义的最重要的知识内容，给日常语言意义以深刻影响的是日常语义知识。

语义知识还可进一步分成程序知识(procedural knowledge)和叙述知识(declarative knowledge)两种类型。程序知识是关于如何做(knowing how)的知识，包括技能、规则、程序、计划，叙述知识是关于事实的知识(knowing that)②。知识类型因此可以总结如下：

---

① 译文见钱歌川译注：The Johnson family(美国日常生活)，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

② Judith Greene：Language Understanding(言語理解)，日訳，海文堂，1990年。



其中，日常语义知识是最具有文化意义的知识内容，简称“常识”。

第二节　常识补足

常识作为先验证据强制注入词句意义中，因而对词句意义具有非常巨大的影响力。piano 在下面第一个句子里只能显示为乐器，与口琴等属同一类成员，在第二个句子里又只能显示为家具，与沙发等家具是同一类成员：

——Piano can be pleasing to listen to.（钢琴很好听）

——Piano can be difficult to move.（钢琴很难搬）

只有脑中具备足够的文化知识，方可使语言的使用成立，因为词句意义的解释一般需要语言知识和常识并用[①]。违背常识、范畴错乱、不符合日常习惯认识的句子都是可笑的。如：

——？小文的身高是 132 米。（人类身高至今还没有超过 4 米的）

——？张三用鳃呼吸。（鱼类才有鳃）

——？人吃蟹的卵巢。（《现》：蟹黄是蟹体内的卵巢）

语言理解也是如此。沉淀在语言接受者头脑中的常识被对方言语提示所激活，成为预知言语者意图，猜测其省略部分，与新语境交感互动，并生成新语义和新信息的基础。已有常识可借以消除因文化差异面产生的隔阂，使理解成为可能。很明显，语言接受者记忆中

① 引文同上。语言知识如别名、组合关系的习惯搭配等。

贮存的旧知识是通向新知识的地址,只有将当前新输入的信息同它进行整合,才能达到对当前语句的理解。头脑中若不具备相应的常识,就会出现理解障碍,或产生歧义,或一知半解。常识对言语理解的作用都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的[①]。Yamadori 跟 Albert(1973)曾报道过一种"特殊词汇范畴失语症"(specific word category aphasia)的病例,病人无法制造和理解与房屋部件范畴相关的名称,如 floor(地板)、ceiling(天花板)和 walls(墙)[②]。这表明,知识还影响着相应领域的语义记忆。

儿子:今天考了历史,问"老子"是谁,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父亲:笨蛋!天天见面还会忘了!"老子"就是我嘛!

日本学者国广哲弥把言语理解时预备知识的补足分为以下五种[③]:

·场面补足(the situational retrieval)——如"我咖啡",实际意思为"我要买的是咖啡",这是基子在咖啡厅的一种情景省略,单从字面上不能解释其确切意思。

·词项补足(the lexical retrieval)——如 I finished the salad first(我首先沙拉完了),实际意思是 I finished eating the salad first(我首先把沙拉吃完了)。

·句法补足(the syntactic retrieval)——如"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了信心",前一分句省略了主语"我们",意思是"我们展望来来"。

·百科补足(the encyclopedic retrieval)——如 The painting my grandfathergave me turned out to be a Constable(我祖父送的那幅画,原来出自康斯太布尔之手),Constable 是英国 17 世纪著名风景画家,不知道这方面的知识,就会像某部权威词典那样,把它错译成"我祖父送的那幅画,原来出自

① 王敏:《篇章潜存意义理解中的文化因素》,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 年增刊。

② Gillian Cohen(1977). The Psychology of Cognition, Academic Press, Inc.

③ 国廣哲彌:《総説》,载《日英語比較講座(第五巻):文化と社会》,大修館書店,1982 年。

王室管家之手"①。

·文化补足(the cultural retrieval)——如 five-O' clock shadow，西方男子的毛发生长比较旺盛，长得特别快，早上刚刮过胡子，傍晚又长了出来，如要参加重大社交活动，出于对别人的礼貌，动身前往往还得刮一次胡子。于是，便有了这个专门的词语来指早上刮过到傍晚又长出的短须。学习者在理解它时，若不能补足这一背景常识，就会误解为"傍晚5点钟左右的暮色"②。

场面补足属于偶然知识的补足，百科补足属于科学知识的补足，词项补足和句法补足属于语言知识的补足，文化补足属于常识补足。掌握一种文化的常识，是正确理解和掌握一种语言的必备条件之一。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也表明，外国学生通过直接观看中国影视，能理解原本无法理解的语句③。

常识跟语言之间有能动的处理空间，即使整句话标志的实物和现象处于语言接受者感觉器官所触及的范围之外，但仍可以被理解。C.F.Hockett《现代语言学教程》把语言的这一特性叫"换位"(displacement)。各式各样的童话、神话、宗教传说和一些虚构的谎言等等，都是如此。N.Chomsky《句法结构》中举了一个例子：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无色的绿色想法在狂怒地睡觉)。这句话虽然荒诞，但可以被理解。《嘻谈续录》中一段吹牛的笑话说，清代有两个把兄弟，把兄对把弟说："我昨天吃了极大的肉包子。一百斤面，八十斤肉，二十斤菜，包了一个，煮好了，用八张方桌才放得下，二十几个人，四面转着吃；吃了一天一夜，没吃到一半，正吃得高兴，不见了两个人，到处找不着，忽然听到肉包子里有人说话，揭开一看，原来那两位钻在里头掏馅儿吃呢。你说这个包于大不大?"把弟说："我昨

① 杨广育等：《英美文化的背景知识是英语学习不可缺少的一环》，载《天津商学院学报》1998.3。

② 郑立信：《英汉用法词典中语言文化对比信息的传递》，载《外国语》1999.5。

③ 祝秉耀：《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影象资料利用》，载《外语电化教学》1998.1。

天吃的那个肉包子，才算大呢。几十个人吃了三天三夜，还没见到馅儿，拼命朝里吃，吃出一块石碑来，上写：离肉馅还有三十里。"① 两个人的话虽然不着边际，离现实和常识太远，仍然可以让人理解和发笑。这些常规变则虽然失真，但同样可以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因为它们是由"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成分"构成的，其幻想性质仅仅是由于把这些现实存在的成分作了违背现实生活的拼凑。因此从原则上说，人类的语言可以描绘任何环境，不仅包括已知，而且包括新知的、过去未碰到过的、臆想的、不存在的和幻想的环境②。

对违背常识的现象加以巧妙利用，反有奇特效果，童谣"东西路，南北走。出门看见人咬狗，拿起狗来打石头，却被石头咬了手。"不符常理的句子通过组群，营造了一个容受变则的语境，不但未丧失整体合法性，反而带有特殊的幽默感。这说明，常识对语言的作用要通过语言本身来实现，语言并不绝对屈从于常识。在认识常识的重要性时，要紧紧围绕语言这个中心。

第三节 常识模式

常识框架中表现出来的、语言集团共有的主观认知大纲，叫做常识模式，它既有文化普遍性一面，又有差异性一面。自然谈话如何依存于常识的文化模式(cultural models)，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是当前语义研究的焦点之一③。人类学家期待语言习惯用例为文化模式的重构提供可利用的最好证据，语言学家期待文化模式成为语言使用的关键。

---

① 转引自王春瑜：《吹牛考》，载《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1976～1982)》，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 年。

② 巴尔胡达罗夫：《语言与翻译》，中译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 年。

③ M. I. Posner(1989)：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Science(記憶と思考)，日訳，産業図書株式会社，1991 年。

描述常识模式的最常见方法是词典释义(或称语言表达式)。如"玫瑰"的释义:"灌木的一种,枝多刺,花多为紫红色,也有白色等其他颜色的,花美丽香甜,可作为男女表达爱情的赠物,也可作为制作食品的辅助材料。"

提炼出的常识模式应能在言语活动中得到自然的还原或复制,并使这种还原具有复呈性,这样才能达到指导言语实践的目的。设a为动物学类别、b为形体、c为擅长、d为活动时间,如《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商务印书馆,1988年)对cicada(蝉)的释义:

> 翅翼透明(b、c_1[①])之昆虫(a),雄者在干燥的暑天(d)发出尖锐的鸣声(c_2)。

释义是英国人对英语词cicada(蝉)作出的,但用汉言语检验,仍能清楚看出这一释义的可还原性,反映了常识普遍性的一面。比较言语片段:

> 急雨之后,蝉翼(b)湿得不能再飞(c_1)了。那可怜的小虫(a)在地上慢慢地爬,好不容易爬到不老的松根上头……蝉嘶了一声(c_2)。(《蝉》,载《许地山选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在岛上,这是少有的热天(d)。柳枝上的蝉哑(c_2[②])了。(《张岐:神秘的小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相比而言,《现代汉语词典》对"蝉"的释义要欠缺得多,请看它对"蝉"的释义:"昆虫(a),种类很多,雄的腹部有发音器,能连续不断地发出尖锐的声音(c)。雌的不发声,但在腹部有听器。幼虫生活在土里,吸食植物的根。成虫吃植物的汁。"它丢弃了一些重要的日常经验知识(如b、d等构件),所取内容有些并非日常常识(如"幼虫吸食植物的根"、"雌的腹部有听器"等),所以释义很难与言语的语义结构和表达相印证。

对叙述知识的描写还有另外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表述[③]

---

① "翅翼"的言外之义是"能飞"。

② "蝉哑"是"蝉叫"的预设式。

③ 马清华:《句子的语义结构》,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4。

式，如："玫瑰"{(玫瑰是红的)；(玫瑰是花)…[1]}。表述式列出的是常识元，在这种式子里，通常一个表述即是一个常识元。语言集团对跟生活关系密切的事物，往往拥有丰富的常识。俄国人"橡树"知识的丰富程度可从俄作家克雷洛夫《寓言集》(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一书的描写中窥见一斑，从中归纳出的模式是非常细节性的，有九种以上的常识元："橡树"{(橡树高 a)；(橡树根深 b)；(橡树可生在寒冷地带和草原 c)；(鹰常在橡树上栖息作巢 d)；(橡树可长在乡树小路的两边 e)；(橡树可有爬藤草缠绕 f)；(橡树树龄可很长 g)；(橡树有子实 h)；(橡树子实和根为猪所喜食 i)…}。请看这些常识元在言语中的还原形式：

——那棵树冠高耸入云(a)，树根深入浓荫下土壤里(b)的橡树。

——太阳使参天的(a)橡树和雪松(c)温暖繁荣。

——不是还有苍郁的(a)橡树吗？

——周围草原(c)好像海洋泛着青光，往哪里躲呀，幸好，一眼看到了一株干枯的橡树。

——(鹰)没有合身份的栖息地方(d)，既没有橡树，也没有花岗石岩壁。

——希望老鹰不要在橡树上筑巢(d)。

——他带着它们顺着橡树夹道的乡村小路(e)，慢吞吞地走回去。

——我们的爬藤草已经缠到橡树身上(f)。——一只猪在一株百年的(g)橡树底下饱餐橡实(h、i)，又用嘴巴去啃橡树的根(i)。

不是本文化的事物，描写时是小心而粗略的。大象是俄罗斯文化环境中没有的东西，克雷洛夫《寓言集》对它的描写，反映了一般俄国人脑中关于"象"常识的文化模式：{(象可牵行 a)；(象是稀奇的 b)…}。请看具体描写：

——有人牵(a)着大象在街上转悠，看来是让人们开开眼界(b)，谁都清楚，在咱们这里大象罕见少有(b)，因此，爱看热闹 (b)的人都跟着大象

① 为使文字紧凑，在比较、列举的句式中，省略号用三个点，下同。

走。

——你有没有看到大象(b)? 它的外表是什么样子(b)?

第二种描写方式是构件式,如:"玫瑰"{〈红〉;〈花〉…}。构件是常识元的关键词。这种方式看上去与义素分析法基本同构,实际上两者有本质差异。前者是对知识的描写,后者是对词义的描写。作为词义分析材料的义素一方面来自词义,另一方面要受到全部义素集合即元语言系统的统筹约束。相比而言,知识的描写对象和描写式中的构件都要比词义描写开放得多,所以两者本质上并不能互相演换。如:我国高寒地带的森林景观可以靠下列常规构件的组合表现出来:{〈森林、林中、林峰〉;〈树木、云杉、山花红…〉;〈野樱桃、酸果、树果…〉;〈播种造林〉;〈猎人〉;〈鸟兽、岩鹿、野牛、马熊、獐子、飞鼠…〉、〈雪山…〉、〈瘴气…〉}。请看话请:

> 大森林的林峰,已经长得和雪山尖一样高了。云杉的年纹,不知过了多少时辰,不知记载了多少鸟兽的故事,不知野樱桃结了多少酸果,可有人来采摘过樱桃? 山花红开花时节,是不是看见猎人走进了森林? 岩鹿和野牛的寿命最长,它们几辈子在林中,还没有碰见一个人呢。飞鼠吃掉了多少未来的树木,它不会想到有人来把树果采去,播种造林。马熊、獐子做梦也不曾想到,有谁会来请它们搬家。雪山上飞起的烟雾,林中升起的瘴气,卷走了森林漫长的历史,罩住了森林世界。(傅仇:《森林炊烟》,载《中国新文艺大系散文集(1949~1966)》,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

词典释义、常识元、构件是逐级蕴涵的。常识的文化模式在形式上体现为构件或常识元的类型、结构、数量的总和。但是,不管哪种文化模式,人们一般都很难描述出其组织的全貌,往往一个模式的构件可以再作进一步分解。如"钱"的模式{〈购买〉;〈利息〉;〈银行〉;〈通货膨胀〉;〈给予〉;〈借〉…}中,各构件又可广泛适用于其他知识领域,并且各自携带一簇构件,自成一个知识内容。

对程序知识的描写除一般释义外,还可以用流程式来描述。如关于"下雨"的程序知识是:{天暗/刮风…→下雨},关于"避雨"的程序知识之一是:{下雨→打伞}。请头右侧代表下一步发生的事态。

第四节 语义组织

常识贯穿语义组织的一切方面，下面重点对七个方面的作用进行分析。

一、词汇量 常识（包括自然常识和文明常识）的丰富程度在同时代不同语言上打上的烙印可从词汇量上反映出来。

（一）绝对数量 从聚合层面看，某一类事物下的绝对词汇量是衡量一种文化对之关注程度和知识性程度的指标。方言本质上属于口语，它是语言的一种狭隘的地域变体，共同语是口语和书面语的混合语，并且是属于全民的。从汉方言和普通话教育文化类（含同义词）词汇量的比较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词汇量
方言	湖南娄底话①	65
	江西余干话②	48
	金华汤溪话③	20
普通话④		1261

同一种事物在两种文化中因广泛性程度不同、境遇不同、不同文化集团对它们的知识差异，也会被分解成若干零对应词，从而导致词汇量对比的严重失衡。缅甸人跟棕榈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甚至把与棕榈有关的词用来计量、计时，如：htan:t-det（大约爬一棵棕树的时间，相当于汉语的一袋烟工夫）/htan:t-phya:（一棵大棕榈树的高度）/htan:t-yin:det（棕榈园中一个工人通常能爬树的数目，约50至60棵）/ht-bo gyein（熬棕榈糖的季节，缅历12月和1月）。他们对棕

① 据颜清徽、刘丽华：《湖南娄底方言词汇》，载《方言》1990.3。

② 据陈昌仪：《江西余干方言词汇》，载《方言》1996.2。

③ 据曹志耘：《金华汤溪方言词汇》，载《方言》1993.1。

④ 据梅家驹等《同义词词林》，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

榈以及如何运用棕榈的常识，比大多数中国人丰富得多，这就决定了缅甸语里有比汉语更丰富的关于“棕榈”种类、形态、功用等方面的词汇。缅语中的棕榈词不下于 40 个（参下表），由此表现出缅甸人

缅甸语的部分棕榈词

·**种类**—— ht-ma'((雌株棕榈)/ht-yain:(野生棕榈树)/ht-yin:(人工种植的棕榈树)。

·**形态**—— htan:gyaw:(棕榈植的外皮)/ht-za'(棕榈枝的外皮)/ht-phon:khun(棕榈树皮)/ht-zit(棕毛)/htan:phu:(棕榈嫩叶)/htan:let(棕榈枝)/htan:u(棕榈树干的心)/htan:dhi:(棕榈果)/ht-zei'(棕榈籽)/ht-bo'(长棕榈花梗的棕榈枝)/ht-no'(棕榈花梗，雄性棕榈树取棕榈汁的花梗)/htan:le zit kyo:(树冠光秃的棕榈树)/htan:dhi:zan(棕榈核)/ht-bin myit(棕榈籽埋在土中生出的嫩根，可食)。

·**处理过程**—— htan:htu'((敲棕树果蒂部使之出棕榈汁)/htan:hn-wei:(用棕皮紧缠棕榈使之出棕榈汁，或捣嫩的棕果蒂部使之出棕榈汁)/htan:pyin(给棕榈树剪枝)/ht-yi nin:(为了便于采棕榈汁，把碍手的果柄、叶柄等扒开)/htan:tet(攀登棕榈树取棕果汁)。

·**处理器具**——ht-hnyat(为压出棕榈汁而用于夹棕榈的夹子)/ht-yi gyo:(发酵酿制的棕榈酒中的沉淀物)/htan:hli:da:(为取棕榈汁割棕榈用的刀)/ht-nyin:gwin:(爬棕榈树时两脚上的绳套)/ht-bo'o:(接棕榈汁的罐)/htan:gaut(编织“棕皮筐、棕皮席、棕皮筐”等用的棕皮)。

·**处理结果**——htan:kh-let te:(棕榈枝搭的草屋)/ht-zei'hmout(棕榈采壳制成的瓢)/ht-bo u:ht-nyet(用雄性棕榈树所得的第一批棕榈汁熬成的糖)/ht-mon'(棕榈糖糕)/ht-yi(棕榈汁、棕榈酒)/htan:le-yet(棕榈糖)/htan:dhi:mon'(棕榈糖糕)/htet mi:aut mi:(缅甸人用米粉加棕糖制成的一种烘糕，烘制时锅上和锅下都有火)/htan:shaw(从棕树的长叶柄上剥下的皮)/htan:shaw:(从棕榈树上失足摔下来)。

·**处理人员**—— htan:dh-ma:(靠爬棕榈树取棕榈果汁为生者)。[①]

① 参见《缅甸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0 年。

对棕榈的利用是多方面的，如他们把"棕榈汁、棕榈枝、棕榈果壳、棕榈皮"等分别用来"制糖制酒、搭屋、制瓢、编织"等，一般中国人只能靠想象来理解。《现代汉语词典》所收棕榈词仅3个(除别名)："棕榈、棕毛、棕绷"，反映汉人仅侧重于对棕毛的利用。棕榈知识程度的差异，是缅汉语棕榈词数量差异的直接原因。

(二)词频　文化上重视的事物，不但表现内容丰富，而且代表这种事物的词在话语中常常高频率出现。第五章《变化》第三节"名称变化"中提到，有人从多份词频数据中整理发现，马是在许多种语言里频率最高的动物词，这是极具文化普遍性的例子，马的交通功能是重要成因之一。橡树是欧美常见树木，所以欧美人的艺术作品常提及它，俄国克雷洛夫《寓言集》写得最多的植物是橡树，以译本计，在总计193篇寓言里，有9篇写了它，总出现次数是30次(含橡实2次)。罗马尼亚加拉克逊《鹰巢峰》(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也有关于"橡树"的描写：

——旷地的中央屹立着一棵桠杈上霉毛斑斑、盘根错节的橡树。

——暴风雪仍对着那些橡树在肆虐。

美国歌曲"Tie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ak Tree"中反复唱着这样一句：

——把一条黄飘带环系在那棵老橡树上已三年了，你还愿要我吗？

难怪《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认定："(橡树)普遍生长在世界许多地方。"

释义者如果换成中国人，恐怕就不会有这样的表述。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对橡树知之甚少，有影响的作品中很少有写到它的，是因为生活中不大见到它。北京语言学院《现代汉语频率词典》[①] 曾统计了180万字的汉语材料，在统计结果中，"橡树"的出现频率为零。可见，本文化事物的词即使用有，也很少在话语中出现。

① 《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

在一种语言内部,言语时的词频表征可以用来衡量关注程度,但有时并不能用来衡量常识性程度。常识性程度越高,其内容越容易在整个言语表达结构中隐含起来。我们调查了温州城乡八所学校,看学生 1999 年~2000 年度上半学年所有散文体作文中反映出来的交通工具情况,调查对象是:黎明小学四年级(黎小四)、松台山小学五年级(松小五)、梧埏镇小学五年级(梧小五)、水心二小五年级(水小五)、仰义乡中心小学六年级(仰小六)、瓯北二中初一(瓯初一)、温州六中初三(温初三)、梧埏镇一中(梧初三)。共 8 个点,其中小学 5 所,初中 3 所。每点被调查的人数为 40 人(男女生各 20 人)。根据调查统计,可分别得出如下 1、2 两表(见次页),表内数据明显反映出小学生比初中生更关注交通工具的类别和使用情况,初中生对它们的关注程度却减弱了。从逻辑上说,初中生对交通工具的知识程度一般略高于小学生,或者至少不比后者低。在这里,常识性程度和关注程度成了反比!

规约性常识的作用可导致词频几近于零,形成语义空白(semantic zero)。民俗禁区中予以回避的事物,言语时一般采取忌讳的态度,虽有相应的词,但在话语表达中仍可出现语义空白。土耳其文学极少言及鼻子,几乎是刻意不提。按伊斯兰教习俗,女性面部忌讳给近亲以外的人看。土耳其数十年前已否定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小说插图中的女性完全是欧化形象。但在土耳其各地,伊斯兰教仍有很强的影响力。在这种文化风俗的国度里,女性美仅靠眼、眉、额及周围的肤色、头发来判断,是可以理解的①,英语小说也极少写到鼻子,但原因稍有差异。在欧美人看来,鼻子总引起猥亵感,即使言及人物鼻子,也常指人物丑陋的缺点(但有时也作为人种的区别点)中国人和日本人看来,鼻子没有任何掩饰的需要,所以中国文学或日本文学要详细描写人物面部,鼻子就可以自然地连同眼、口、眉一起被描写出来。

---

① 铃木孝夫:《ことばと文化》,岩波書店,1973 年。

表 1：

交通工具 \ 调查结果 \ 调查学校		小学 黎小四	小学 松小五	小学 梧小五	小学 水小五	小学 仰小六	初中 瓯初一	初中 温初三	初中 梧初三
自行车	自行车	3	5	0	0	1	0	0	0
	脚踏车	0	0	1	0	0	0	0	0
	山地车	0	0	0	0	0	0	1	0
	骑小车	0	0	0	0	1	0	0	0
	(骑)车	0	0	0	0	0	1	0	0
	小凤凰	0	0	0	0	0	0	0	2
一般乘用汽车	公共汽车	0	0	13	1	0	0	2	0
	汽车	4	0	0	0	0	0	0	0
	公交车	0	1	0	0	0	0	0	0
	出租车	0	1	0	0	0	0	0	0
	(上、下、坐、开、乘)车	28	0	0	1	0	1	0	0
	的士、(打)的	0	0	1	0	0	0	1	0
	计程车	1	0	0	0	0	0	0	0
其他动力车	小轿车	0	1	0	0	0	0	0	0
	宝马车	0	0	0	1	0	0	0	0
	摩托车	0	0	1	1	0	0	0	0
	三轮摩托车	0	0	0	1	0	0	0	0
	三轮车	0	0	0	1	0	0	0	0
	观览车	0	0	0	3	0	0	0	0
	运输车	0	0	0	1	0	0	0	0
	大货车	0	3	0	0	0	0	0	0
火车		0	0	1	1	3	0	0	0
船	船	0	1	0	2	1	0	0	0
	渡船	0	0	0	1	0	0	0	0
	游船	0	0	0	1	0	0	0	0
	渡轮	0	0	0	2	0	0	0	0
	快艇	0	1	0	0	0	0	0	0
飞机		0	0	1	0	0	0	0	0
(骑)马		0	0	0	1	0	0	0	0

表 2：

	小学		初中	
	总计	平均每班用词数	总计	平均每班用词数
自行车	11	2.2	4	1.3
一般乘用汽车	51	12.2	4	1.3
其他动力车	13	2.6	0	0
火车	5	1	0	0
船	9	1.8	0	0
飞机	1	0.2	0	0
马	1	0.2	0	0

二、词据 词据是引导经验归向沉淀并指导造词的动态法则，所以词据也能还原为常识。“蝉”在河北石家庄话叫“热热儿”、井陉话叫“热得啦”、丰润话叫“小热儿”，这是第三节“常识模式”有关“蝉”的词典释义中构件 d 的还原(参第三节“常识模式”)；普通话“知了”因叫声而得名(《现》)，这是构件 c_2 的还原。常识的文化差异性可成为词语选择不同理据的理由。日本是岛国，日语“海外”就等于“外国”或“国外”，出国说成“出港、海外渡航”，但德国是欧洲大陆国家，所以德语无同等现象[①]。温州临海，旅温的外地人大多居处内陆，于是有的温州人把“外地人”叫“内地人”，这种现象在内陆地区不会发生，因为在内陆地区的语言中，“外地人”和“内地人”的意思刚好相反。所有这些都不是简单的语音区别或词汇差异，它反映了语言集团共有常识的差异。

三、词义移动 在词义张力范围内，同一项知识的不同构件可成为同一个词的不同意义变体。比较以下各言语片段中“信”的意义：

——信(a)在你的桌子上。

——信(b)里谈了些什么？

——对许多作家来说，信(c)是一种很有真实感的文学样式。

信 a、信 b、信 c 分别是“信”知识的三个不同构件：{〈某一物体 a〉、〈信的内容 b〉、〈书信体这一文体 c〉…}。“信”的这些不同意义变体构成“信”的词义移动[②]。词义移动是对词义的微调，这种正常的语言现象，词典一般不作详细描写(如《现代汉语词典》只确认“信”的一种意思，即 a)，接受者可以根据先验的常识证据去理解和确认词义移动，自为地把握词义变化的动向。

四、比喻 常识是比喻的基础。以常识作背景的比喻比比皆是，

---

① 小坂光一：《意味構造について》，载《富山大学教養部紀要》1973.3。

② M. Bierwisch：《形式语义学和词汇语义学》，中译，载《外语学刊》1983.1。

大量熟语都是这种类型，如成语“牛郎织女”喻不能团聚的恋人或夫妻，源自凡间牛郎和仙界织女之间相恋成婚后，被王母娘娘用法术分隔开的一个传说。英语成语 Tom and Jerry 喻弱小者可用智慧战胜强大者，源自美国动画片猫和老鼠的名字，猫 Tom 总是对老鼠 Jerry 穷追不舍，但 Jerry 却总能设法逃脱。

五、隐含　与文化模式相关的信息量的多少，并不是以明示为前提的。因为对于明白的事情不需要作特意说明。很多隐含的背景常常是文化模式中的成员，如“用钥匙开门”和“开门”是同义表达式，“用钥匙”可以在后一种说法里被隐含[①]。对购物者来说，买东西所凭是钱，说“买”而不需说“用钱买”。因为“钥匙——锁——门”、“买——钱”有常规关系，而常规关系是常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话语中常常只出现一个支点词，与之构成一目了然的常识关系的另一个词，则被当作冗余成分删略掉，而不特意说明。以常识性工具或材料变元的隐含为例：

A组	B组	C组
快剃胡子。	*快用剃须刀剃胡子。	没有剃须刀，怎么剃？
快写上几个字。	*快用手写上几个字。	手断了，怎么写？
快炸油条。	*快用油炸油条。	没有油，怎么炸？

比较 A、B 两组句子，可见，在同一个单句结构里，常识性工具成材料变元通常是强制能含的。但是，被隐含的变元其实仍然影响着 A 组句的成立，当常识性工具或材料变元未曾预先具备时，就会利用重现隐含变元的 C 组句进行质疑。显然，当前语句只是“冰山一角”，语句形式上没有出现的常识犹如潜藏在水面之下，对当前语句仍然施加着影响。

隐含成分填补着话语中常规关系词的“缺空”（或叫“穴”，gaps）。如：

① 马清华：《句子的语义结构》，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4。

王铜子见他穿的黑夹袄已被汗水湿透，一铜下来色礼帽，头发茬里直冒热气。(《迎春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汗水"与"夹袄—湿透"、"礼帽"与"头发茬—冒热气"分别靠括号()内的常识性隐含变元"身上"、"头"桥接了起来，如：

汗水—— 湿透　　礼帽　　冒热气
|　　　　|　　　　|　　　|
(身上)——夹袄　　(头)——头发茬

发生在体热事态下的三个分句"夹袄被汗水湿透→摘帽→头发茬冒热气"的同态链接，依据的也是对日常事态的常识。

不同语言对同类事件隐含的变元，可以因文化不同而有所差异。汉语"我吃饭"隐含的工具是"筷子"，英语"He has eaten enough(他吃饱了)"隐含的工具是"knife and fork(刀叉)"。现代汉语"我想"和古汉语"吾思"隐含的成分有差异。古人不知脑是思维器官，所以古汉语隐含的不是"脑"，而"心"为思维的器官(这在其他许多语言里都是如此)。因为语言变化速度比文化慢，现代语言总留有古代的遗迹，所以现代汉语也可以是"心"，但是由于人们认识的提高，更常见的是以"脑"为隐含成分，如"你这个人真没头脑，做什么事情都不好好想想"。

常识关系不但可帮助我们确认隐含成分，还可帮助确认省略或照应成分，使当前语句发挥暗示限定的作用。当看到言语片段"眼光炯炯如火焰，吐着舌头，发出咝咝的声音"时，能判定它的主体是蛇，因为只有蛇才有这样的动作神态。惟其如此，语言接收时才能有准确的预期。常识还可以正确引导我们把上位词理解为其所有下位词中的某一个。有人用"The fish attacked the swimmer(那条鱼袭击了这个游泳者)"这句话测试过，发现10%的人在自由复述时，把"fish(鱼)"换说成了"shark(鲨鱼)"①。孤立的"鱼"可指称其任何下位词，

① W. A. Wickelgren: Cognitive Psychology, Prentice-Hall, Inc. 1979.

但由于常识限定，此处一般只可理解为“鲨鱼”。

六、言外之义　常识是理解言外之义的基础。如祈使句“你喝水”往往预设“这里有水”。说明这两者间有常规关系。所以，“这里有水”有时也可用来传达“你喝水”的言外之义①。又如“约翰推着购货小车来到计价处”的言外之义是“到计价处付款，准备带东西离开”。这样的句子同样需要恢复“商场购物”的常规关系，它包括“进入—推购货小车—将装货车推至计价处—付款—离开”等一系列行为②，这是理解该句言外之义的基础。

七、语义线索　常规关系的概念群（简称“常规词群”，暂借用构件式表示），可以在言语活动中成为话语组织的语义经络或线索。

——港里的船，撑起了遮荫的帆布。渔人们怕太阳晒裂了船板，不停地用桶子或是潮瓢舀着海水，往甲板和船舷浇泼。（张岐：《神秘的小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

——张三感到头痛，赶紧翻药柜找药。

前一个言语片段是根据常规词群{〈港、船、海水、渔人们〉；〈船板、裂〉；〈桶子、潮瓢、舀〉}组织起来的。后一个言语片段是根据常规关系词群{头痛、药、药柜}组织起来的。由逻辑关系或语方关系联起来的词群，也是言语组织中语义经络的一部分，如前一个言语片段中的词群{船，〈船板、甲板、船舷、帆布〉}，是逻辑关系中的整体局部关系，又如词群{〈太阳、晒〉；〈舀、水〉；水、浇泼〉}则属语言关系。它们都和常规关系一起，形成把词群聚集成更大词汇场的巨大合力，使话语统摄在某一共同的主题下。

文化不同，作为语义线索的常规词群也常常因此表现出差异。如普希金诗中的一段：

三个姑娘坐在窗口下

---

① 马清华：《汉语祈使句理论本质》，载《中国语研究》（日本）第 40 号（1998 年）。

② 王文忠：《跨文化交际中的常规关系差异》，载《中国俄语教学》1999.1。

夜晚时候在纺纱。

……

"假如我是个皇后,"

第三个小妹妹说,

"那我要替沙皇

生养一个勇士。"

小妹妹的话音刚落,

门就轻轻地咿呀打开,

那地方的国君沙皇

走进了明净的正房。

姑娘们在谈话的时候,

他一直站在围栅后头,

最后一个姑娘讲的话,

他听了心里最喜欢。

(《普希金童话诗》,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反映俄式建筑特点的常规词群{〈窗口〉;〈门〉;〈正房〉;〈围栅〉}是组织这段诗文的线索之一。围绕这几个支点,还贯穿着对于这些建筑部位的常识性内容的确认,如:

窗口	门	正房	围栅
|	|	|	|
下	开	明净	后头

这种常规词群在蒙古或老挝传统建筑中是不存在的,比较:

蒙古童话——两位哥哥这下真的生气了:"我们不想同你这样的蠢货生活在一起,请你滚出我们的帐篷,你想到哪里去就去吧!"年老的父亲非常舍不得自己的小儿子达瓦多尔斯,他说:"我们要把他赶出自家的帐篷,让他到哪里去呢?他会到处流浪的!"(《达瓦多尔斯》,载《亚洲童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

老挝童话——有一次,何方的手里扎进了一根刺,当他看到手上鲜红的热血时,突然想起了故乡、双亲、兄弟姐妹和木桩上的老朽房子。(《蝴蝶姑娘》,载《亚洲童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

显然，分别以帐篷和竹木结构的房子[1]为传统建筑的蒙古或老挝，言语时不大会选择俄式建筑的词群来进行组织。

地貌、气象、植被等自然环境差异常常能在这个民族的语言中表现出来。从克雷洛夫《寓言集》中，可以看到富有异国情调的植被：

雪松—橡树—白桦树—胡桃树—栗树—枞树—矢车菊—芦苇—爬藤草—麦子—葡萄—树林（森林）—灌木—草原

可见，常规词群的特征性组合，可在言语世界中再现这种常规关系形成的环境等条件。

① 段宝林等：《世界民俗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附录一　调查统计材料和语料来源及其简称

《艾》:《艾芜文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 年
《巴〈7〉》:《巴金选集〈第七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
《巴〈8〉》:《巴金选集〈第八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
《北》:《北国草》,从维熙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 年
《冰》:《冰心文集〈第四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年
《曹》:《曹靖华散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
《乘》:《乘风破浪》,草明著,光明日报出版社,1980 年
《城》:《城南旧事》,林海音著,花城出版社,1980 年
《敌》:《敌后武工队》,冯志著,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 年
《丁》:《丁玲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 年
《风》:《风帆》,袁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年)
《绀》:《绀弩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
《贺》:《贺敬之诗选》,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年
《红》:《红岩》,罗广斌等著,人民出版社,1963 年
《胡》:《胡风的诗》,中国文联出版社,1987 年
《贾》:《贾平凹散文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92 年
《靳》:《靳以散文小说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年
《林》:《林海雪原》,曲波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年
《落》:《落叶集》,艾青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年
《灭》:《灭亡·新生》,巴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
《女》:《女神》,郭沫若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
《平》:《平凡的世界》,路遥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年
《热》:《热爱生命》,程海著,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 年
《上》:《上海的早晨》,周而复著,人民出版社,1980 年
《沈》:《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
《四》:《四世同堂》,老舍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 年
《天》:《天职》,郭雨庭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 年
《王 1》:《王统照文集》,第五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 年
《王 2》:《王西彦选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年
《危》:《危城》,庞瑞垠著,花城出版社,1986 年
《围》:《围城》,钱钟书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年
《我》:《我这一辈子》等,老舍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年

《萧 1》:《萧红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 年
《萧 2》:《萧乾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年
《徐 1》:《徐迟散文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年
《徐 2》:《徐志摩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 年
《许》:《许淇散文选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 年
《杨 1》:《杨沫文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 年
《杨 2》:《杨朔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年
《药》:《药眠散文选》,黄药眠著,花城出版社,1983 年
《夜》:《夜潮》,梁修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 年
《叶》:《叶圣陶散文》,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年
《俞》:《俞平伯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年
《张》:《张天翼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 年
《赵》:《赵丽宏散文选》,三联书店出版社,1990 年
《中》:《中国纯情随笔》,金峰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年
《子》:《子夜》,茅盾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年
(此系第三章、第八章调查统计材料和语料来源,前为简称)

附录二 术语索引

B

百科补足 251
拜物教 43
卑称 150
本文化事象 245
本质语义关系 204
本族核心概念词 163
鄙称 138,150
变化速度 49,57
变元 60,263
变元兼职 60
变种 25,186
辨证名实观 11,16
表层词据结构 94
表情体 97,228～229,233,235～236,239,242～244,246
表情线索 110,174,228,236
表述式 254～255
表象群的转化 146
表现浓度 50
表现性 25
不可表达之物 236
不可言说者 236
部件关系 205
部位词 61

C

材料关系 205
残存率 148
曾指 145
常规变则 253
常规词群 265～267
常规关系 78,114,205,219,265,267
常规关系词 261
常规关系词的缺空(或"穴")263
常规关系的联想 205
常规构件 256
常规联想 206
常识 72,250
常识补足 252
常识的文化模式 253
常识模式 253～254
常识性 263
常识性程度 260
常识元 255～256
场面补足 251
超语言性 122～123
成果失效 182
程序知识 249
抽象词 67～68,212
抽象框念 9
抽象范畴 10
抽象阶梯 26,138
抽象名词 211
抽象思维 10
抽象语义结构 31
处所关系 206
传统中医知识 242
创造性想象 12
纯逻辑语言 246
词的体积 165
词的文化联想 202
词的心理距离 215
词法理据 72
词法转型 139
词汇场 143
词汇词 71,129,133,136
词汇方式 56
词汇非同型性 130
词汇化 70
词汇量 257
词汇移动 149
词汇语义系统 96
词汇组合框架 176
词据 72,257,262
词据表层 94
词据讹变 171
词据关系 102
词据磨损 172
词据延展幅度 94
词据资格 173
词类分配 160
词频 257
词群 135
词位 24
词系 135
词项补足 251
词项缺空 125,132
词形变化关系 204
词形借用 156～157
词形损耗 165
词形优选 166
词义变因 146
词义单纯变化 145
词义地域变异 147

词义发展的平行现象 151
词义发展的平行性 137
词义范围对应 122
词义复合变化 145
词义负荷 139
词义关系对应 122
词义关系联想 202,204
词义恒常性 144
词义互流 156
词义扩散 136
词义扩展 153
词义扩张模式 110
词义类扩 74
词义磨损 158
词义社会变异 146,148
词义体系 150
词义体系变化 146
词义体系膨胀 156
词义体系调整 145,160
词义体系增殖 153
词义微调 262
词义消亡 147
词义心理发展 146,148
词义移动 262
词义隐喻 77～78
词义张力 262
词族 135
刺激语 216,218
从俗 171
错误联想 151～152

D

单项对应 122,129
单项义素 183
道德伦理观 4,42,44
等效 229
等值对应 122,129
典型感受 209,214
定观念 177
动态文明词 6
动物隐喻 84
独立词义变化 145
对称对应 131～132,135～137
对抗 157
对立搭配式 158
对象感情 228,246
多式综合语 51
多项对应 129
多义对应 133
多义性程度 160

E

讹变 140
二次名 25～26
二项式名称 62

F

反对关系 204
反义关系 204
范畴错乱 250
泛义词 59,128,132
非标准文化因素 47
非对称对应 131～133,136～137
非核心义素 182
非均衡对立 186～187,189
非人类表达型语言 121
非素志性体态语言 110
非语言知识 248
分布差异 160
分类层次 24
分类成分关系 35
分类方式 133
分类角度 60
分类结构 35
分类式对立词汇结构 83
分类体系 65
分类细度 36
分析式 140,196
分析性言语表达法 62
附会 153
附加条件 231
附注关联事项 209
副特征 230
复合隐喻 82

G

概念 66,70,176
概念变体 70
概念场 143
概念场减缩 143
概念场增殖 143
概念词 231～232
概念活动 181
概念理据 72,96
概念理据变化 173
模念群 265
概念世界 20
概念体 176
概念体系 9,143,156
概念隐喻 232～233
感情 96,174
感情容器 175
感情意念 228～230,236,240
感染 158
感致巫术 220
高度抽象词 149
更远指 132
工具关系 205
共名 89,133,200

共识性 206
构词能产性 163
构词元素 163
构件 256
构件式 256
孤立隐喻 78
孤立语 51
观察角度 89
观察视点 240～241
观念 176
观念分配 191
观念化过程 176
观念活动 181
观念实现方式 72,188
观念释放角度 199
关系词 67～68
关注 138
关注程度 53,56,257,259～260
关注焦点 59
惯常性 206
惯连关系 205
规约性常识 260
过度多义 166

H

海洋生物的陆地化隐喻 82
行业名称 140
合取 186
合取对立 186
合取关系 176
核心部分 62
核心词汇 160
核心所指 63
核心义素 182
恒常附件 62～63
恒定概念 144
恒指 144,161～164
恒质因素 163
横向联想关系 218～219
洪堡特主义 18
宏观语义学 2～3
候补词项 176
互参关系 205
话语组织 265
换位 252
换喻 73,86～87
混合式 187
活动词 67～68

J

基本层次 186
基本层次概念 24,27～29
基本词汇 29,163
基本概念 28,31
基本核心概念 144,161
基本类名 28
基本文化结构 1,194
基础词 28
积极联想 207,223
激情 149
集体认知水平 46,59
集团社会心理 127
极远指 17
间接借贷 154
价值标准 194
价值观念 5～9,36,42
价值观 8,189,208
阶级观 4,42,46
解析法 61
借词 154
借词活动 157
借贷方向 155
惯贷领域 156
借贷路径 154
借入方 155
借源方 155
禁忌 209,220～223,239
禁忌语 220
近似对应 122～123,129
近指 17,132
经济 125
经济地位 39
经济形态 11,92
经济原则 157
精神惰性 153
敬称 150
局部对应 123
具体词 212
具体范畴 10
具体概念 9
具体名词 211
具体思维 10
具体文化事象 1
局部符号化 86
局部易名 166
句法补足 251
句义表达式 72,117
聚合对立词 158
聚合联想 204
聚合义场 129～130
聚合义素 182
聚合语义场 56
均衡对立 187,189

K

开放词类 160
看不见的文化 4
看得见的文化 4
科技水平 4,41
科学分类 21,27
科学知识 248

跨文化 218
块组织 129
扩张力 150
扩张系列 110
扩张移动 150

L

类化 82
类名 85
类推 18,135,137,151
类义词 36
詈骂语 220
理据 72
理据方式 114
理据结构 97
理据磨损 97,159
理据同构 104
理据透明 95
理据透明度 95
理据性 50
理据隐晦 95,160,166
理据资格 173
理据资源 114
理据自明性 96～97
礼制 115
利害关系 214
利用 127
连带所指 63
联想 12,202,208
联想的非对称性 219
联想反应 218
联想分析 216
联想概率 88,215
联想共通率 219
联想类型 202
联想误用 220
联想意义 122～123,216
联想转移 152
量词物体关系 205
猎奇 152
邻接联想 151
临时分析性手段 17
零对应 122,124～126,128～129,200
零对应词 126,257
伦理秩序 221
逻辑概念 23
逻辑关系联想 204
逻辑内核 23

M

盲目类接 91
媒介型 36
描述性短语 225
民间风俗 127
民俗 115
民俗分类 21,25,29
民俗概念 23
民俗科学 31
民俗语源 152,171
民族心理图象 246
民族性 206
名称保全 166
名称更易 150
名称学 161
明示 263
命名 23
命名角度 89
命名理据 224
命名论 25
命名体系 25
命名层次 25

N

内对应 122,137,141
内涵意义 7
内化 97,175,234
内向式 187
内向约束性联想 204
内质变化 147
能产性 106,163,174
拟态 135
粘着语 51
凝固的思想 146
浓缩 158

O

偶然知识 248

P

平行性 207
普遍对立 190
普遍换喻的偶 87
普遍换喻的型 88
普遍换喻方式 116
普遍性理据 73
普遍性文化 67
普遍序列 130
普遍隐喻的例 85
普遍隐喻的型 74
普遍隐喻模式 74
普适性 206
普遍语义学 26,149,173

Q

起点 25,186
起点义项 94
气质概念 243
潜对称对应 137
强普遍现象 19
强制观察 11,19～20,128
强制性变元 263
倾向性原则 36,49

情感 138,209,213
情感联想 150
情景联想 151
求新 152,175
躯体动作 96,110
区域性 206
屈折语 51
取象 225
取象层级结构 228～229,245
取象结构 228,236,246
取象模型 229
取象群 237
取象生成规则 233,237
取象同构 196
全体局部关系 204
缺项对立 187～189

R

染触巫术 220
人类表达型语言 121
人类理解因素 93
认识 148
认知程式 12
认知方式 4,9,11,36,46,89
认知焦点 225
认知结构 194,225
认知联想 151
认知水平 9
任意性 50,72
日常口语体 246
日常生活词汇 144
日常心理逻辑 157
日常语言 246
日常语义知识 249～250
日常知识 248
弱音通现象 19

S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18
三次名 25～26
散观念 177
散文体 246
色彩调整 150
色彩调和剂 181
上下位关系 204
上下位义场 129
设定功能 60
社会法则论 146
社会风尚 138
社会阶层 38
社会借词 149,150
社会心理 247
社团性 206
深层词据结构 94
审美观 4,42
省略 158
省略成分 264
生成语义学 232
生活方式 194
生活习惯 125
生活习俗 4,36
生理感觉 96,110,174
声音理据 72
诗歌体 246
施为对立 190
失语症患者 12,46
实地调查 32
实际意义 225
实际指谓经验 179
时代差 57
时空邻接性 207
视点 240～241
世界观 18,130
示类 78

事态发生强度 125
事态相关性 108,110～111,174,233,237
属 25
属层次 27
属概念 25,27～28
属性联想 202
顺承关系 205
说话人感情 228
四声的二元化处理 167
俗分类 22,24,57
俗概念 179
俗科学知识 248
俗名 140
俗语源的地域变异 172
所指意义 122

T

态度 138,148,209,213
特殊对立 190,193
特殊概念词 27
特殊性文化 67
特征关系 205
特征性组合 267
提喻 73,88
提喻法 55
通称 138
通感 150
同辞 87,89,113,133,200
同构多能性 228,230
同群 135
同现关系 205
同义关系 204
同义形式对应 122,137
同音冲突 159
同音联想 202,207

同音异义词 159
图象化 28
推导联想 151

W

外对应 122,137,142
外来词 153
外围意义 130
外向式 187
外向选择性联想 204
外形变化 147
外延分析法 61,64
外延量义 7
完全对应 122
完全易名 166
婉称 138,150
婉曲 53
唯名论 16~17
唯实论 16~17
纬度 218
委婉式 53
委婉语 220~222
文化变异 79
文化补足 252
文化词 153
文化对立 188
文化关联 69~70
文化关注 11,14,36,56~57,182
文化关注程度 48,51,53
文化观念 242
文化归并 188~189
文化过滤 14
文化互补 176,182,196
文化价值 6,208
文化接触 136
文化模式 263
文化诠释 50,59
文化认知 236
文化容量 56
文化释放 191,194
文化特色性程度 48
文化同构 176,182,196
文化习俗 238,247
文化信息 208
文化压力 31,146,153,155
文化依附力 156
文化意义 208
文化秩序 194
文化作用的不透明性 49,57
文化作用关系的多重性 49,58
文明 4,36
文明词 5
沃尔夫假说 130
巫术 220
无标记 82,88,92
无媒介型 36
无羡词 61~62,64
无形 62
物化文明词 4,6
物理存在 112
物体词 67~68
物质词 61
物质概念 62
物质名词 62

X

析取 186
析取对立 186
析取关系 176
习惯联想 202
习惯组合 158
习俗 115
系统隐喻 78
现实基底 53,133
现实文化 49,57
现实作用力 146
线索有效性 28
相对普遍 123
相似联想 151
相似性 207
相貌隐喻 74~79,82,90,93,151,166
象征 135,209~210
消极联想 207~208,223
协同关系 204
协同义场 129
新旧词竞争 141
新义 147
新指 144,156
心理 115
心理存在 112
心理力量 146,148
心灵图象 236
信息量 28
形态 25,186
形态标记 182
形态层次 27
形态词 71,142
形态概念 27,29
形态概念词 197
形式更替 166
形式资源 157
形体词 61
形象 209
形象词 231
行为客体关系 205
叙述知识 249
选择对立 190,192
选择性理据 73
选择性文化 67

穴 125

Y

言外之义 248,257,265
言语技巧和原则 247
眼谱 242
液态话语层次 110
一般概念词 27
一般知识 248
一次名 25～26
异构等效性 228
异构取象 229～230
异状同所之名 63
译借 86
易名 162,166
艺术语体 246
义场19,129～130,132
义丛 225
义类 66～67,69,78,
96,114,129
义类大纲 66～68
义场对应 19,129～133
义场对应关系的系联
133
义类理据 72,114
义类理据模式 115
义类组织 66
义群 135
义系 134～135
义项方式 56
义项关系断裂 137
义支 134～137
义支对应 135,137
义族 134,135
意念 225～226,228～
230,232,234
意念分化 228
意念关系 225
意念取象 72
意识形式 246
意识形态 11
意味 209,213
意象 209,211～212
意象补足 225
意象程度 212
意象偏误 213
意象值 211～212
意义扩张 97,108
意义理据 72
意义流动 6
意义流转 174
意义膨胀 164
意义容器 97
意义同化 151
意义游动 148
意义资源 157
意志行为 239
音调和谐 167
音节平稳 167
因果关系 205
隐含 257,263
隐含变元 263
隐含成分 263～264
隐性词义范畴 182,184,
199
隐喻 73
隐喻式对立词汇结构 83
隐喻式命名 25
饮含习惯 207
引诱力 105
引诱移动 105
影响意义变化的介质
158
有标记 82,88,92
有害 213
有利 213
有契性 72～73,171
有趣 213
有羡词 61～64
有形 62
有用性 13
幽默联想 207～208,223
～224
迂回指谓 138
语法词类 68
语境补足 86
语篇组织 72
语素义隐喻 78
语体分化 140
语体制约 246
语象 89
语言本身的因素 93
语言个性 49～50
语言关系联想 204
语言机智 199
语言经济性原则 229
语言内部力量 157
语言普遍论 11,18～19
语言普遍性 132
语言任意性本质 49,59
语言习得 177
语言相对论 11,18～19,
130
语言知识 248
语义变迁 15
语义测量 215
语义创新 159
语义词 71,122
语义词类 68
语义场 36,44,129
语义对应结构 137
语义范畴 117～118
语义范畴扩张 117,120
语义分割 21,78

语义分类 21
语义分类体系 71
语义分类细度 48
语义分配 55,145,159,162,182,247
语义分配的不平衡性 49,55
语义负荷 166
语义记忆 251
语义价值 149
语义结构 254
语义借用 49
语义经络 265
语义距离 219
语义空白 138,206
语义空间 216~217
语义流转 110
语义凝聚 49~51
语义普蕴论 130
语义普遍特征 130
语义容量 143
语义容器 165
语义体系性价值 249
语义微分法 215,218
语义文化 49,57
语义系统 143,249
语义系统的弹性 143
语义系统开放性 143
语义相对论 130
语义线索 257,265
语义知识 248
语义中心点 130
语义组织 191
语音讹变 140
语音机智 208
预期 264
预设 248
预设关系 205
喻体供给源 89
原型 214
远指 17,132
蕴涵 158

Z

照应成分 264
整体局部义场 129
支点词 263
知识 242,248
知识补足 86
知识程度 259
知识性程度 257
直观语言 246
直接借贷 154
指谓 115,208,214
指谓性 25
指谓意义 115
中间世界 11
中介语 154
种 25,186
种概念 25,29
主体行为关系 205
注意 152
专家语源 170
专义词 48,59,128,131
自闭对立 190
自律连辞 52
自然法则论 146
自然环境 11,125
自然环境因素 36,47,91
自然类名 28
自然现象词 144
自然形态对立 188
自由隐现 249
字面义 225
宗教 200
宗教观 4,42~43
综合式 140,196
纵向联想关系 218~219
组合联想 204
组合联用关系 205
组合义场 129,131
组合义素 144
组合语义场 56

后 记

句法是语言的骨骼,语义是语言的血肉。语义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文化界而上看待语言在共时、历时、泛时而上的语义表现,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发掘语义学的本质特征,广泛发现这些语义特征的普遍性程度,寻找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文化缘由,加强微观语义学(即"语言学的语义学")的解释性,构成对整个语义学理论的必要补充。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曾在给大学高年级本科生开设的选修课上讲授过。在各方面的热情支持下,它终于出版了。对写作本书起过重大作用的有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内以及国外将近二十位教授、副教授和研究员,他们分别以邀请讲学、赠书、来信、组织小型沙龙、专访等不同方式给予了精心指点和亲切关怀,并赐予了优越的研究条件。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德春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林书武研究员给本书赐序。黄世中教授热情为本书的出版穿针引线。江西人民出版社充分肯定本书的学术性,果断判定出版此书,这在当前特别注重经济效益的情况下,更显得难能可贵,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书中符号多、图表多、稀见字多,幸亏出版社委托功力深厚、经验丰富的同志担任责任编辑,使本书不但能顺利出版,而且令人满意地保证了质量。美术请辑王伟同志不惮反复修改,提供了精美的封而设计。承蒙不少杂志相继发表(或即将发表)与书中某些章节内容相关的论文,使本书增加了检验质量的机会。温州师范学院为相关专题提供了重点科研基金。因为写作本书,我曾经放弃过许多次与妻子和女儿出外度假的机会,也未有更多时间与远在家乡的父母在一起,却还是得到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谨向以上提到的专家、机构以及我的家人表示衷心感谢。书中被引用的文献为本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或事实材料，其作者都是研究相应问题的先行者，在此也谨向他们表示感谢。

书中不当之处一定不少，请读者朋友们不吝赐正，以便再版时修改。

马清华
Maqh@mail. wzptt. zj. cn